SDE / 符号发生学研究

婴儿
符号发生学

从独特的“我”
到三界高阶符号的发生

现实 · 理念 · 自我

每一个独特的“我”
都在关系中持续发生

秦莉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婴儿符号发生学

从独特的“我”到三界高阶符号的发生

秦莉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版与版本信息

书名	婴儿符号发生学
副标题	从独特的“我”到三界高阶符号的发生
作者	秦莉
出版品牌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版式版本	v1.1 · 逐页精修版
正文基线	v0.6 全稿精排版
正文规模	247,354 汉字；导论、十二编六十章及结语
开本	190 mm × 250 mm
编排日期	2026 年 10 月 22 日
出版编号	第 417 卷 · 定价 US$23.00 ISBN 待出版社书号台账核定
审定状态	三轮 AI 辅助审校；在线阅读版。原典核验范围见文后说明。

本版由秦莉署名，保留十二编六十章的理论结构，修订作者归属、证据说明、版本接口和文字疏漏。配套提供逐章阅读、六十章学习任务及智能问对。三轮 AI 辅助审校分别检查内容与证据、全书一致性、版式与配套接口，不冒充三名独立专家的学术评审。

参照样式：第 220 号《我的三个宝贝》与第 302 号《AI 时代死亡的困境和出路》的公开阅读版 PDF。采用两书的蓝金层级、宋体风格正文、独立分编页及章首设计；具体行距与留白按本稿内容重新适配。

版本与阅读说明

全书结构与配套阅读

本版以 v0.6 书稿为底本，保留导论、十二编六十章、结语及参考文献。正文约 24.7 万汉字；本次为统稿与配套出版，不将学习包、审校记录或排版页数计入正文规模。

三个阅读层级

第一至六编：从符号的存在方式，进入出生历史、感觉与行动、爱的共同发生，以及独特“我”的形成。

第七至十编：进入个体差异、跨文化养育、日常实践与科学验证。

第十一至十二编：与既有理论正面对话，讨论创新边界、爱的意义、儿童权利与继续发生的可能。

论证边界

哲学命题、作者构造、实证发现与规范判断不能相互替代。符号的独立性不等于撤除必要照护；理论分析不替代专业评估、儿童安全或可及支持。

目录与书签

目录可点击跳转；Word 导航窗格按编、章、节定位。正文中的方括号引文链接保留。页码随 Word 字体环境或后续编辑可能变化，编辑后可更新域。

文字统计规则

仅计正文汉字，不计各级标题、前置说明、目录、参考文献、审计附录、标点、数字和拉丁字母。参考文献编号完整不等于全部原文已经完成终审。

目录

导论 一个婴儿，为什么不能被一张属性表替代.....1

第一编 符号何以存在：婴儿高阶符号的本体论.....8

第 1 章 名字之前：婴儿是不是符号.....9

第 2 章 SIO 不是 S、I、O 的机械拼盘.....13

第 3 章 符号粒子化：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20

第 4 章 从局部 SIO 到高阶“我”.....27

第 5 章 独特性、同一性与可追溯历史.....34

第二编 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符号发生的历史转换.....41

第 6 章 母胎互动不是出生后的空白前奏.....42

第 7 章 宫内三界和出生后三界何以不同.....49

第 8 章 出生：连续性与断裂性同时成立.....53

第 9 章 带着差异出生：早产、双胎与先天障碍.....57

第 10 章 生命条件如何成为后续符号历史.....61

第三编 自然环境中的婴儿：感觉、身体和世界.....68

第 11 章 视觉、听觉、触觉：三条门还是三种纠缠.....69

第 12 章 石头、阳光和重力能不能参与意义发生.....76

第 13 章 手—眼—口—物：最早的行动网络.....80

第 14 章 爬行、站立、行走：空间符号的重组.....87

第 15 章 日常物体怎样成为婴儿的“世界”.....94

目录 / 续

第四编 爱与关系：婴儿如何参与爱的发生.....98

第 16 章 爱从内在情感走向可回应的行动.....99

第 17 章 喂奶、抱起、安抚：亲情的发生单元.....106

第 18 章 保护、稳定、自由：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110

第 19 章 爱不只来自母亲：家庭中的多主体 SIO.....117

第 20 章 婴儿让成年人生成新的“我”.....121

第五编 符号粒子、波与场：从哭声到可调用的世界.....125

第 21 章 一声哭如何由事件成为可辨认符号.....126

第 22 章 重复不是机械堆积：经验怎样留下结构.....133

第 23 章 活动序列中的波态：预期与转折.....139

第 24 章 场态：环境 SIO 集合与高阶约束.....146

第 25 章 打开旧符号：从稳定到再发生.....153

第六编 “我、你、他、我们”：婴儿的自我和语言符号.....160

第 26 章 在说“我”之前已有独特的“我”.....161

第 27 章 “你”如何进入婴儿正在形成的世界.....169

第 28 章 “他”与“我们”：共同注意的生成.....174

第 29 章 命名、解释、规训如何回写婴儿符号.....180

第 30 章 语言发生是否改变高阶“我”的结构.....186

目录 / 续

第七编 每个婴儿都不同：双胞胎、残障与发生自由.....195

第 31 章 同卵双胞胎：基因相近不意味着 SIO 相同.....196

第 32 章 同一个物体，不同的行动可能.....202

第 33 章 听觉与视觉障碍：多模态路径的改变.....208

第 34 章 先天疾病和长期照护中的生命符号.....214

第 35 章 个体独特性：不是标准差的装饰.....220

第八编 不同文化中的婴儿符号.....226

第 36 章 独立与依赖：美日亲子文化的局部差异.....227

第 37 章 阿卡父亲与共同照护的生命世界.....233

第 38 章 古西人的触觉敏感回应.....239

第 39 章 Beng 婴儿的精神身份.....245

第 40 章 中国坐月子与新加坡多元城市家庭.....251

第九编 养育与教育：促进婴儿符号的正向发生.....257

第 41 章 从“培养什么”改问“正在发生什么”.....258

第 42 章 保护、稳定、自由的三重互构工艺.....264

第 43 章 亲情不是单一输入：回应式照护的操作.....270

第 44 章 评估婴儿，不应把婴儿缩成分数.....275

第 45 章 AI 和辅助技术：新的符号环境与边界.....280

目录 / 续

第十编 科学验证：婴儿高阶符号怎样成为研究对象.....285

第 46 章 SIO 事件切片：怎样记录而不切碎婴儿.....286

第 47 章 三界与高阶结构的操作化.....292

第 48 章 整体、稳定、独立的三项实证测试.....300

第 49 章 个案、双胎与跨文化纵向设计.....305

第 50 章 什么结果能够反驳 SDE 婴儿符号假说.....310

第十一编 全球近邻理论对话与本体论冲突.....318

第 51 章 从索绪尔到皮尔斯：符号是表征还是发生.....319

第 52 章 皮亚杰与维果茨基：个体建构、社会中介与高阶符号.....324

第 53 章 吉布森、泰伦和动态系统论：关系不是 SDE 的专利.....334

第 54 章 鲍尔比、安斯沃思与气质适配：安全如何容纳新的“我”.....344

第 55 章 剥夺研究、神经可塑性与伦理边界：历史能够改变什么.....353

第十二编 人类学意义与符号发生学的新命题.....363

第 56 章 “我”与“我们”并行发生：个体和共同体的高阶组织.....364

第 57 章 爱的发生学：给婴儿以什么，而非宣称多少.....371

第 58 章 婴儿权利、残障正义与文化谦逊：谁有权规定一个“我”.....378

第 59 章 SDE 符号发生学的创新边界：从存在论主张到能够承担风险的命题.....385

第 60 章 让每一个婴儿拥有继续发生的可能.....395

结语 在名字之外，让一个生命继续成为自己.....402

参考文献与核验范围.....408

附录 新增量、插入位置与编辑审计.....421

导 论

一个婴儿，为什么不能被一张属性表替代

返回目录

一、从一声没有被翻译的哭开始

凌晨的房间里，一个婴儿哭了。照护者醒来，走近，俯身，却没有马上知道该做什么。他先检查孩子的状态，试着抱起，改变支撑的姿势，再观察孩子怎样回应。在这个为说明而构造的场景里，没有人说出“主体”“客体”或“符号”，但我们的全部问题已经开始：究竟是谁在改变谁？一种关系如何从反复试探中变得能够继续？那个尚不能介绍自己的生命，又以什么方式成为不可替代的“我”？

成年人容易把这一夜描述为“母亲安抚了孩子”。这句话并没有错，却省略了关键的中间过程。孩子身体的放松或绷紧、哭声的变化、头部的转动，持续修改着成人的判断。即使成人心中的爱并未增减，爱的行动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安抚并不是一件预先完成的礼物被交到婴儿手中，而是双方在不同能力与责任条件下共同实现的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负有相等的责任。婴儿能够改变照护，不等于婴儿必须使成人善待自己；孩子不能清楚表达，更不意味着成人可以免于寻找合适支持。共同发生是关于过程的判断，照护责任则是关于应当如何行动的判断。若把两者混在一起，本书就可能把一种尊重婴儿的理论，写成要求婴儿为成人情绪负责的借口。

我们从这个场景出发，不是为了给普通养育换一套复杂名词，而是要改变研究的基本单位。若只记录孩子哭了多久，就可能遗漏成人调整的作用；若只记录成人抱了多久，又可能遗漏孩子如何使某种抱法得到保留或被放弃。必须进入他们与身体状态物体、时间安排和既往经历共同构成的活动，才能说明这一夜实际发生了什么。

二、符号首先怎样存在

“婴儿是一个符号”很容易被理解成婴儿代表希望、家族延续或者父母的未来。那些都是重要的社会表征，却不是本书所说的首要意义。本书采用王德生提出的理论

约定：符号首先是主客互动复合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其次才成为对存在物的表征；婴儿的“我”是多 SIO 在三界中纠缠、聚合而成的高阶符号。[S06][S06]

这里的“首先”不是要求名字必须晚于出生。父母可能在孕期就选好了名字，甚至形成了关于孩子一生的故事。本体论上的优先，是说这些故事不能代替实际发生的生命关系。一个名字能够被重复千次，照护仍可能没有承接婴儿的需要；一个名字尚未确定，生命的活动与关系却不因此空缺。先有何种实际存在，表征又怎样进入并改变它，是两个必须连接但不能混同的问题。

SDE 符号学以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讨论特征纠缠的粒子化存在。[S01]本书把这个理论入口用于婴儿时，必须说明层级差别：一个抓握组织的独立调用，不等于整个婴儿不再需要他人；一段安抚活动的稳定，不等于一生人格已经固定；成人能够认出孩子，也不自动证明孩子已经能反思自己。相同词语在不同层级必须接受不同的检验。

因此，整部书既不把婴儿看成孤立的生物容器，也不把他溶解为没有边界的关系总和。没有身体的持续活动，谈“这个婴儿”会失去承载；没有与世界的实际关系，谈他的具体规定性又会变得空洞。需要研究的是：哪些组织在变化中保持连续，哪些组织可以重建，哪些发生已经改变了后续行动能够进入的范围。

三、独特性不等于一串独有属性

设想两个孩子在一张记录表上完全相似：都能抓握，都喜欢某类声音，都在陌生场景里停下来观察。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说他们是同一个“我”。因为记录表只选取了若干显露，没有保存这些显露怎样发生、依靠哪些关系，又将怎样参与下一次活动。

同样的安静，可以是在熟悉关系中放松，也可以只是暂时没有参与条件；同样的伸手，可以延续自己的尝试，也可以紧跟成人的密集提示。这里不是根据外表猜测孩子内心，而是提醒研究者：一项行为与它的形成条件、活动位置、后续后果应当共同记录。缺少这些信息，属性清单就不能承担高阶符号的解释任务。

但不可重复的历史本身也不是充分答案。任何物体都有不可重复的轨迹；不是所有历史细节都在当下继续起作用。本书因而提出一种筛选要求：不要只问“过去发生

过什么”，还要问“什么被当前关系保留，怎样保留，在何种条件下重新发挥作用”发生历史不是无限档案，而是能够进入后续活动的实际组织与痕迹。

一个孩子因为学会拿起物体，开始把物体递向成人；成人由此更多地参与共同游戏；这些共同游戏又改变孩子怎样选择物体。这一构造案例中，抓握不再只是一个里程碑，而成为别的活动发生的条件。高阶“我”的研究由此转向能力之间、关系之间及时间之间的相互规定。

四、三界不能成为三个盛放资料的箱子

现实世界、理念世界与自我世界，在本书中不是三间先后装修的房间。它们指向同一发生过程中的不同组织侧面：实际身体与对象关系、逐渐形成的辨别与预期、不可由他人直接替代的感受及自我相关活动。用这三种侧面观察婴儿，是一种哲学研究安排，不是宣称已经直接测量三个内部实体。

在一次拿杯子的活动中，杯子的重量与身体支撑参与现实条件；“怎样拿会发生什么”的可重复预期可以构成理念侧的研究问题；自主尝试、舒适与受阻则提出自我侧的问题。三者不能被一个成功次数概括，也不能被任意扩张成成人式思想。观察到婴儿改变动作，尚不足以断言他已形成某个明确命题。

出生前后的三界问题尤其需要克制。出生不会抹除此前生命史，但宫内条件也不是出生后生活的缩小版。我们可以研究前期经历怎样成为后续条件，却不能从成人的期待推导胎儿已经理解“母亲爱我”，更不能把有限的听觉学习证据变成提高未来智力的商品承诺。

与本书相关的两部底本已经把感觉活动、教育共同发生和自我生成置于重要位置。[S07][S08]本书沿着这一方向推进，同时明确区分生命早期的独特存在、身体活动中的自我相关组织、后来可反思和可叙述的自我。它们具有联系，但不能被一个“有没有我”的开关代替。

五、三方程怎样进入生活，而不只是写在页眉

本项目统一使用 S 表示显露，D 表示差异序列，E 表示特征纠缠。SIO 中的 S 指主体，和三方程中的 S 不是同一用法；本书需要时写作“主体位”以避免混淆。环境则是能够影响当前 SIO 的相关 SIO 集合，不是字母 E 的另一种拼写。[S05]

三方程 S=F(D,E)、D=G(S,E)、E=H(S,D)，在此首先规定研究方向：显露要放回差异与纠缠解释；新的显露会改变下一步差异推进；实际推进又可能重组既有纠缠。它们尚不是估计好了参数的婴儿发育定律。一个研究者不能先把全部结果塞进函数，再宣称方程预测正确。

凌晨安抚的例子可以从 S 进入：孩子在原本有效的照护中仍持续不适。研究者由此检查 E 是否已经变化，再调整 D，观察新的 S。也可以从 D 进入：照护者改变了活动次序，随后检查显露和关系的改变。六路径在这里是组织追问的不同入口，而不是要求家庭每天按六个流程操作。

三原理进一步要求定位张力：究竟是旧组织承接不了新差异，还是已出现的显露迫使活动路径改变，抑或显露与推进方式的冲突要求重建关系？没有具体不相容之处就没有必要宣布一次“升维”。新的安静也可能只是疲倦，新的动作也可能只是偶然理论要说清楚它如何排除替代解释。

六、为什么爱必须与支持条件一起研究

本书保留对爱的内在情感理解，却不把它当作结果保证。成人的情感、成人采取的行动、婴儿实际经历的关系，以及较长时间内的发展后果，是彼此相关而非相互等同的四层。一个家庭可能非常关爱孩子，却缺少信息、休息、资源或可及服务；不能从孩子遇到困难倒推出父母没有爱。

WHO 关于早期儿童发展的指南把回应式照护、早期学习及照护者心理健康支持放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安排中。[N18]本书据此保留一种基本实践立场：支持婴儿也应支持照护者。不过，本书具体的“看—猜—做—再看”记录法以及保护、稳定、自由的分析，并不因此被 WHO 替我们验证。借用共同问题，不等于借用权威给新理论背书。

保护、稳定、自由不可被分配成固定比例。保护有时为自由提供条件，有时又可能代替孩子行动；稳定有时降低参与成本，有时会变成不得改变的程序；自由有时打开探索，有时需要通过边界获得持续存在的条件。需要判断的不是哪一个词最动听，而是三者在这个具体孩子的活动中怎样相互促进与制约。

这里的正向发生也不是发展速度排名。一个支持安排能否减少不必要的痛苦，能否增加可参与性，能否允许拒绝、恢复和新的尝试，能否保留未来的修订空间，都是需要并列考虑的问题。没有一种单一分数能够自动决定全部价值，更不能用“未来潜能”合理化当下伤害。

七、让最强的其他解释进入书中

依恋理论、气质适配、社会中介、生态心理学及发展动力系统，并不是等待 SDE 来告诉它们“关系很重要”的空白对手。后半部的理论对话把这些近邻放在同一现场比较它们已经能够解释什么，以及 SDE 到底增加了何种问题、边界或预测。

本书愿意承担的风险很具体：若关系组织指标不能提高独立样本中的预测，若高阶分类在不同研究者之间无法复核，若一种支持方案没有带来预期的参与改善，就应修改相应主张。相反，一个局部发现得到支持，也不能直接升级为全部本体论获证。存在论、经验假说与伦理选择，必须保持各自的论证责任。

我们将说明性场景明确作为作者构造，不把它们写成做过的实验。研究设计中的比较也不是家庭操作指令：不为了检验独立性撤去必要支持，不为了观察依恋制造长期分离，不为了理论纯洁拒绝专业帮助。婴儿不能被要求以承受额外风险的方式证明一种思想正确。

八、研究范围：不是把三岁以前写成同一种婴儿

本书沿用项目详纲的“婴儿符号发生学”题名，主要讨论出生前的历史条件及出生后零至三岁的早期发生。这是本书的研究范围约定，不是重新规定医学年龄分类。文中涉及能走、能说或参与假装活动的孩子时，使用“幼儿”“孩子”或具体活动描述；不能把这些表现归给所有新生儿。

同样，本书所谓后天发生，并不把出生以前的一切归给遗传、出生以后的一切归给环境。历史边界、遗传条件、身体成熟与实际经验属于不同划分。把这些划分叠成一道先天与后天的分界墙，会使真实互动被迫站到墙的某一侧。我们更关心的是：在一次具体发生中，哪些条件正在发挥作用，哪些新关系正在成立。

本书对“发现学”的讨论也限定在一种解释倾向：把主体、对象及其属性视为事先充分规定，再研究如何辨认和利用这些属性。它不是给全部现代科学贴一个静态标签。科学研究本身包含过程论、建构论、动态系统和关系取向；本书需要面对这些强近邻，而不能因为采用发生语言就宣布它们已经过时。

发生视角增加的问题，是研究单位自身如何成立。比如，先把“自控能力”当成一项既定内部属性，再考察父母是否发现它，与先考察身体需要、活动要求、支持方式怎样形成可重复的调节组织，具有不同的起点。二者可以联系，差异却不能只靠换词消除。我们需要说明属性测量在什么条件下有效，又在哪些条件下遮蔽形成过程。

九、一段事件需要同时保存三种记录

为了使哲学论证不离开生活，本书采用三个彼此关联的记录层。第一层记录实际发生：谁在何种条件下做了什么，随后有什么变化。第二层记录当事者解释：照护者把这些变化理解为什么，因而作出了什么安排。第三层记录研究者模型：我们依据哪些关系推断符号整体、稳定、独立或重组。

这三层不是质量高低不同的三个故事。成人解释本身会成为实际事件的一部分，研究者模型也会影响后来的观察。但是，正因为它们相互作用，才更需要区别。假如一位父亲说“他现在不需要我了”，这首先是父亲的解释；孩子能独自完成一次动作是观察；形成了跨情境的相对独立组织，则是仍需更多资料支持的判断。

如果三层被压成一句“独立的我已经发生”，理论就失去检查自身的机会。若保留三层，研究者能够发现父亲的解释是否过强，孩子的实际表现是否改变，以及哪种模型最能帮助安排后续支持。发生学的细致性，恰恰体现在不让宏大概念吞掉这些层次。

本书中的说明性场景是为展示关系构造的，不是经过改名的真实访谈。读者可以用它们检查论证是否连贯，却不能把场景中描述的结果视为已经观察到的频率、规律或疗效。经验研究所承担的，是进一步判断这些构造在真实生活中能否成立、在哪里成立，以及哪些部分必须被修改。

十、全书的行进方向

前五编依次建立存在单位、历史连续性、感觉与身体、爱的共同发生，以及粒子、波、场三种模态的研究含义。第六编把语言前的“我”接到“你”“他”和“我们”的关系；第七、八编进入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防止一般模型抹平不同的生命条件。

后四编进一步处理实践、验证、近邻理论与社会意义。这样的顺序并不表示婴儿按书的目录成长。写作需要顺序，发生却包含许多同步、回返和重组。读者可以从日常场景进入，也可以从方法章节进入，但应始终保留同一尺度：解释是否让我们更准确地看见这个孩子，而不是更熟练地重复理论。

本书的目标不是证明每个婴儿都能被某套统一养育程序充分制造，也不是把无法说明的部分一律归给神秘独特性。它要建立的是一种有边界的发生学视野：一个婴儿已经以自身的历史参与世界，同时仍有大量尚未规定的后续可能；社会的责任，是在理解具体条件时支持这些可能，而不是提前宣布这个生命已经是什么。

那个凌晨的房间最后也许安静下来，也许仍需要更多帮助。对这部专著而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故事写成圆满结局，而是不让一个结局取消观察、不让一个标签取消未来。婴儿不是理论的插图。理论应当成为我们重新走近婴儿、并允许婴儿改变我们的一种工作方式。

第一编 / PART 01

符号何以存在：婴儿高阶符号的本体论

第 1—5 章

01 名字之前：婴儿是不是符号

02 SIO 不是 S、I、O 的机械拼盘

03 符号粒子化：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

04 从局部 SIO 到高阶“我”

05 独特性、同一性与可追溯历史

01

第 1 章

名字之前：婴儿是不是符号

返回目录

一、两个问题不能互相代答

一个尚未取名的婴儿被抱进房间。有人问：“我们应该叫他什么？”另一个人注意到孩子正在改变姿势，于是调整支撑。这是一个作者构造的场景。前一句处理公共指称，后一个动作进入实际关系；两者都重要，但回答“叫什么”，并不能回答“怎样存在”。

如果把符号只放在称呼这一层，婴儿就仿佛是先在的、等待语言接管的对象。若反过来把名字产生的一切意义都说成生命本身，又会让成人的解释覆盖孩子。SDE 符号发生学的起点，是把这两层分开之后重新连接：首先研究复合体怎样在互动中成立再研究称呼如何参与后续发生。[S06]

这里的“符号”不是对婴儿的修辞性赞美。说一个孩子“象征未来”不需要细查他的活动；说他是具有相对整体性的高阶生命符号，却必须说明其组成关系、历史边界以及持续改变的方式。前者可以是成人的愿望，后者承担的是存在论与研究任务。

二、存在方式不是新增的一件物品

需要避免一个看似接近 SDE、实际仍然静态的图像：先有一个生物婴儿，再在他身上安装一个名叫“符号”的精神零件。按本书的理论约定，符号不是附着物，而是组织方式。喂养、感觉、身体活动、调节和关系历史如何相互规定，决定我们所研究的整体怎样成立。

这也不意味着只要观察者离开，婴儿便不再存在。婴儿的呼吸、代谢和环境关系不会因为成人暂时没有描述而停止。我们讨论的“显露”，不能简单收缩为“被某个

研究者看见”。观察记录是特定研究活动中的显露，不是所有发生的总和；必须给未记录却仍然起作用的过程留下位置。

主客互动也不只等于两个人交谈。婴儿与温度、重力、布料和声音发生的实际关系，同样参与他的活动。自然对象没有教育意图，不妨碍其成为条件。至于这些条件怎样成为感觉经验、行动关系或后来可调用的概念，需要分别论证，不能用“有影响”一次包办。

三、名字以前，已经有哪些可辨认的问题

在作者构造的日常观察中，照护者发现某种动作组合常伴随孩子逐渐安静，但并不知道哪项条件关键。是声音的熟悉性，身体支撑，活动时机，还是几者的配合？如果只记下“他喜欢这样抱”，就把需要研究的关系提前封装成了一个特质。

把它视为候选符号单位，则要求三个问题。有关活动是否共同组成一个不能任意拆散的调节组织？在适当条件下，这种组织是否会再次出现？它能否以有所变化的形式进入新的活动，而不是只在那一次刺激中短暂发生？这是把整体、稳定、独立三项条件转换成研究问题，不是已经证明它们成立。[S01]

其中“独立”尤其不能理解为脱离生存支持。一个婴儿可以在仍需抱持的情况下，逐渐以不同方式参与调节；动作的可再次调用，与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不是一回事。任何要求他通过失去必要照护来证明符号成立的方案，都混淆了判据的层级。

四、表征可以错误，却仍然产生后果

名字之外，还有性格名称。成人说“他很乖”，可能指向少哭、容易安抚、符合时间安排，或者只是自己此刻的满意。名称形成得很快，实际关系却未必已经被理解我们不能从词语的稳定使用，推断婴儿的稳定特征已经得到证明。

设想一种循环：成人把一次陌生情境中的退缩解释为“胆小”，以后减少给孩子进入新活动的机会；孩子因此少了某些尝试。这里名称不是无力的影子，它通过改变活动机会参与现实。可是参与不等于决定，其他照护者、孩子的新行动及环境变化，都可能改变这条路径。

由此，存在优先并不等于语言无关。它要求我们在追踪表征后果时，找到实际中介：谁听见了这个称呼，怎样修改行动，孩子遭遇了什么不同，再产生什么反馈。只

说“标签塑造人格”，仍然跳过了应当解释的过程。第 29 章将把这一回写问题进一步展开。

五、一个反对意见：把生命叫符号增加了什么

如果 SDE 的回答只有“婴儿本来就是整体”，怀疑者完全有理由说这只是换词。符号这个概念必须帮助区分原本容易混淆的对象。例如，一个人认得某个哭声，并不等于婴儿具有对应概念；一个行为常出现，并不等于它可以跨情境调用；许多活动同时发生，也不等于它们组成一个高阶单位。

本书提出的增量要求，是把这些区别纳入同一研究协议：每当宣布一种符号成立，要同时交代层级、范围、历史、关系判据与失败条件。若这个协议没有改善观察、解释或预测，就应承认其主要价值仍是哲学整理，而不是已经建立一种更强的经验科学。

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个体性可能完全由生物连续性解释。对此不能轻易否定。连续的身体确实是识别婴儿的重要依据；但它不能独自告诉我们为什么同一孩子在不同活动中形成特定的期待、调节与关系组织。本书研究的不是用关系替换身体，而是说明身体怎样通过具体关系成为这个持续变化的生命整体。

六、一个没有姓名的孩子与一个早已被命名的孩子

可以作一个不涉及真实儿童的思想比较。甲在出生前已有名字，家人围绕这个名字形成期待；乙的名字暂未决定，但照护者已经能依据具体活动调整支持。两者在社会表征上不同，却不能由此推出乙的生命组织更晚存在。反过来，甲的名字也不是毫无作用：它可以联结家人的注意，影响他们怎样安排关系。

这个比较把两个“依赖”分开。被社会指称的身份依赖公共符号系统；实际维持生命与形成活动组织，不能完全依赖某个指称是否已经达成。它们可以通过照护行动相连，却不能相互替代。名字没有解决进食困难，进食组织的形成也没有自动完成社会身份登记。

再把名字交换，会发生什么？成人可以暂时误称孩子，但孩子各自承接的身体与互动历史不会随声音一起交换。这个思想实验不是否认标签回写，而是指出表征的可交换性与个体发生的连续性不是同一种规定。正是在这里，“婴儿符号”超出了“代表婴儿的符号”。

七、称为符号以后，研究必须多承担一项任务

如果把婴儿叫作“系统”“生命体”或“符号”，后续仍然只列体重、动作与标签，新增名词就没有改变研究。本书使用符号概念，要求多承担一项任务：解释某个可辨认单位怎样从关系中成立，以及成立以后怎样进入其他活动。

比如，一个动作只在成人完成全部准备时出现，与孩子能够在新的适宜条件中参与重建活动，并不是同一种组织。若符号三项判据能够帮助稳定地区分这些情况，概念就获得分析用途。如果不能区分，就应修改判据，而不是宣称其他研究者尚未领会深意。

这里不需要把所有生命活动都划成整齐符号。有些活动尚处在边界不清的组织中，有些关系仅在特定时刻成立，还有些可能被研究者错误地合在一起。符号发生学的工作也包括辨别尚不能立为单位的变化。它不是给每个瞬间加一个“符号”标签，而是研究单位从何而来、能承接什么以及何时失去原有边界。

八、不把“有我”变成人格资格考试

婴儿的高阶“我”并不以完成某项任务为取得尊严的门槛。一个孩子不能抓握、不能以通常方式听见声音，或无法在实验中给出研究者期待的反应，都不意味着他比较少是一个人。研究可以承认功能差异，但伦理地位不由功能量表逐项发放。

同样，肯定早期的“我”，不等于断言新生儿已经具有成人式反思。存在连续性、自我相关感觉、对自己名字的反应以及能够讲述自身，是不同问题。把它们压缩成一个是或否，既会夸大婴儿能力，也可能使尚不能表征自己者被排除。

名字以前已经有需要被尊重的生命，名字以后仍有大量尚未被理解的发生。婴儿符号学的第一步不是替这个生命选择一个更宏大的标签，而是允许其具体活动纠正我们的标签。当研究者能够说“原先的分类没有解释这个孩子”，符号作为存在方式的优先，才真正进入了研究。

02

第 2 章

SIO 不是 S、I、O 的机械拼盘

返回目录

一、先列三项，再画箭头，还不够

把一个婴儿、一个玩具和一次抓握分别放进三个框，再用线连接，很容易得到一幅 SIO 图。但是，这幅图也可能只是原有主体、动作、对象清单的重新排版。它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项在当前活动中具有这样的规定性，也没有说明它们如何彼此改变。

设想一个孩子伸手拿轻球，球滚走，照护者将地面换成有适宜摩擦的安全垫，孩子再试。此时，“可以抓的球”不是球本身单方面已经完成的意义，“会不会抓”也不是孩子体内单独开关的结果。身体姿势、球的尺寸、接触面、成人是否替代，以及孩子刚才经历的失败，共同规定了这次抓取。

这段场景是分析性构造，不是实验报告。它揭示一个最低要求：SIO 不能只列参与者，还要记录参与者怎样成为这一活动中的参与者。相互规定不否认球的物理性质或孩子的身体条件，而是拒绝用其中任意一项单独代替完整活动。

二、同一现场不只有一个主体位

从婴儿抓球的活动看，婴儿处于主体位，球处于客体位；从照护者判断如何提供帮助的活动看，照护者又处于主体位，孩子及其活动成为关注对象。两种分析并非互相取消，而是说明同一现场能够包含相互交织的 SIO。

必须防止把婴儿叫作客体，就误认为他在现实中被动。主体位与客体位是特定分析关系中的位置，不是给一个生命永久分配等级。婴儿作为成人照护的对象，仍会以自身活动改变照护。反过来，婴儿能主动发起活动，也不代表他拥有成人的理解与责任能力。

因此，研究应说明当前问题从哪一个 SIO 进入，再检查它与其他 SIO 共享什么。照护者调整支撑与孩子重新伸手，共享身体活动及物体条件，但两者的目的与可用信息不完全相同。若不区分这些层次，就可能把成人的计划直接写成婴儿的意图。

三、环境不是房间里所有东西的名单

按照本项目的环境论，当前 SIO 的环境是能够影响它的相关 SIO 集合；这种相关性可以通过共同主体、互动或客体建立。[S05]所以，屋内的书柜未必是此次抓握的关键条件，而照护者刚刚结束的一场紧张工作通话，虽然不在画面中心，却可能改变他等待与介入的方式。

“可能影响”不能成为无限纳入的理由。研究需要给环境变量划定可说明的路径：它怎样改变当前活动的进入条件、资源、时序或可回应性？没有路径的宏大背景，容易变成事后解释一切的储藏室。可疑的联系应保留为假设，而不是立即宣告承重关系。

同样，同一个房间不等于相同环境。一个孩子能伸手触及的边缘，另一个孩子可能需要辅助才能接近；一个孩子熟悉的声音，对另一个并不具有同样历史。这不是取消共同物理空间，而是把“空间相同”和“实际参与条件相同”分开。

四、相互影响与相互规定有什么差别

“声音影响孩子”说明一个方向的变化；“声音在这段互动中成为什么样的声音”则追问其功能位置。照护者的同一句话，可能是熟悉活动的开始提示，也可能只是背景声，还可能打断孩子正在组织的动作。其作用要在具体序列中辨认，不能只由声学存在决定。

相互规定意味着，研究单位本身部分地通过这些关系被确定。拿球活动中的“帮助”，可能在一次尝试里扩大参与，在另一次尝试里则替代参与。两者都包含成人接触孩子的手，但不能仅凭动作外形归为同一种教育输入。需要看它怎样改变孩子的后续活动。

这一点与生态心理学对可供性的关系性理解有可对话之处。[N05]SDE 不应把“对象对不同身体有不同可能”宣布为自己独占的发现。它在此承担的进一步任务，是把

行动条件与表征回写、三界侧面及高阶历史连接起来，并说明这些连接是否产生更清楚的研究判断。

五、由事件到三方程

仍看拿球的构造案例。S 是这次显露的成功、失败及活动组织，D 是尝试、滚离、调整、再尝试的差异序列，E 则是身体、材料、经验与帮助方式之间实际形成的纠缠。把这三项写下来只是分析起点，不能由此宣称机制已经得到证明。

一种 S→E→D 路径从失败进入：不急于给孩子贴“协调差”的标签，先检查哪些关系限制了参与，再改变非必要条件。另一种 E→D→S 路径从材料安排进入：在安全条件内调整支撑，观察活动如何展开、结果怎样显露。两条路径可以面对同一问题，但需要不同记录，不能把观察次序当作因果箭头。

若旧的帮助方式反复产生依赖成人替代的结果，而目标是保留孩子发起行动的空间，显露与原纠缠之间的张力就提示 D 需要变化。这里的“三原理”不是一个词替换另一个词，而是必须交代：改变了哪种帮助，谁作了调整，孩子怎样回应，以及新的安排有没有实现原先目标。

六、改换主体位，不等于改换现场的所有事实

在一次递物活动中，以婴儿为主体位，问题是其动作怎样进入物体与照护者的关系；以照护者为主体位，问题可能是判断怎样随孩子反应改变。两种分析可以使用同一段记录，但问题边界与需要解释的显露并不相同。

不能因此认为哪一方的描述都同样充分。假如研究成人如何判断，却不记录孩子实际反应，关键关系就缺失；假如研究婴儿如何参与，却只记录成人的教学意图，婴儿会被消失在叙述里。主体位是一种有责任的研究取向，不是允许任意解释的通行证。

同一个人也可能在相邻事件中处于不同位置。照护者在调整材料时是积极行动者，在回应婴儿的突然转头时又成为被改变的一方。这种变化不意味着生物个体互换，而是说明主体、互动和客体的规定必须放在具体 SIO 里理解。稳定角色可以存在，却不能先验地占据全部事件。

七、共同变化还不能证明相互规定

> 设想记录显示，孩子安静时成人说话也较少。至少存在几种候选解释：孩子安静改变了成人行动；成人减少声音改变了孩子状态；另一项未记录的活动变化同时影响两者。仅凭共同出现，尚不足以选择其中一条，更不足以证明全部相互规定机制。

为了让 SIO 分析比箭头图更有用，应当追踪改变怎样进入下一步：成人是否依据孩子反馈调整，调整后发生了什么，不同场景能否复现相关次序。研究者还应保留没有调整、调整无效和反向变化的事件。否则相互规定只是挑选成功片段后的名称。

在概念层面，相互规定比相互影响更强：组成项在这一活动中的身份、功能或边界，受到彼此关系的约束。例如“可抓取的物体”不只由物体大小决定，也与身体条件、姿势和支持有关。但这一关系判断仍需具体化，不能从中推出所有属性都是研究者任意创造。物体的实际限制与婴儿的身体条件，同样参与约束。

八、帮助的身份由它接续了哪一步决定

将一种动作称为“帮助”，已经对它在活动中的位置作了判断。成人扶住婴儿的手，既可能使原本不能进入的接触成为可能，也可能把孩子刚刚开始的探索改成成人预定的轨迹。外形相近，关系身份不同。问题不在于成人是否具有善意，而在于这个动作接住了哪一个尚未完成的环节，又把哪些环节从孩子那里移走了。因而，帮助不是一项事先写在成人动作上的固定性质。

可以构造一个分段活动来说明。第一段是发现一个可接近的目标，第二段是使身体朝向目标，第三段是建立接触，第四段是利用接触后的变化调整下一步。成人的支持可以在第二段提供稳定姿势，而把第三、四段留给婴儿；也可以从第一段开始接管全部选择。两个安排可能都产生“手碰到物体”的结果，却只在前一个安排中保留了某些由婴儿反馈决定的转折。这里分析的是活动分工，不是在裁定哪位家长更有爱。

支持的作用还取决于孩子此刻能够承担什么。对一个需要持续姿势支持的婴儿，第二段的共同承担可以成为长期的构成条件；对另一个孩子，同样程度的控制可能已经多余。若把成人参与一律当作外部干扰，我们会把可及支持误认为能力不足的证据

若把所有共同成果都算成婴儿独自完成，又会掩盖应当继续提供的支持。机制分析必须记录贡献的分布，而不能只统计最终的成功。

这使“相互规定”具有比“双向影响”更具体的含义：婴儿当前的活动决定什么样的成人动作才构成支持，成人的组织方式又决定哪些婴儿动作具有发起、试探或接续的地位。两者不是先把各自的身份完整确定，再从外部交换影响；一些活动身份正是在这一段关系里获得确定。当然，成人与婴儿的身体事实不会因此消失，关系身份的形成也不能任意改变身体的限制。

九、一个最小机制链与三个断点

假设孩子的手已经接近目标，成人观察到偏离，改变物体位置，孩子继续接触。对此可以提出一条最小解释链：婴儿的偏离被成人察觉，成人据此选择调整，调整改变可达关系，婴儿利用新的关系继续活动。这四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发生，“双方共同完成”都可能是过强解释。

第一个断点在察觉之前。成人可能没有看见婴儿的偏离，只是按固定节拍移动物体；两人的变化恰好相接，并不证明成人使用了孩子的信息。第二个断点在判断与动作之间。成人已经理解困难，却由于双手被占用或者活动安排不允许而无法改变。第三个断点在环境改变与婴儿接续之间。物体虽然靠近，孩子已经转向别处，没有把这一变化带入自己的活动。三种失败需要不同改进，不能统称为互动不足。

研究这些断点，不必假装能直接看见成人或婴儿的内部状态。对成人察觉，可以结合视线、动作时序与事后说明；对调整，可以记录实际位置变化；对婴儿接续，可以检查新的动作是否对应新的条件。这些材料都不完美，但至少使解释链的每一段有可讨论的依据。若成人事后说“我是在回应他”，而动作始终与孩子变化无关，解释与实际接续就出现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差距。

还可以设计一个不涉及必要照护的比较。在安全的物体探索中，两个安排都提供相近数量的材料移动，一个跟随当下孩子的动作，另一个依据预先设定的合宜节奏进行。比较的不是哪种安排“更有人性”，而是即时依赖关系是否改变孩子后续调整。假如没有差别，就不能把观察到的成功都归功于双向反馈。假如有差别，还须检查注意、接触机会和任务难度是否同时改变。

这种比较也有边界。把时间关系打乱，只能检验某个被指定的时间机制，不会自动移除全部共同历史。孩子在两种条件中仍然可能依靠过去的熟悉经验，成人也仍在保护安全。因此，不应把它宣传为“有关系”和“无关系”的纯粹实验。发生学需要研究关系的具体差别，而不是制造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完全无关系世界。

十、构成关系与因果关系应当分工

“手与物体在这个活动中构成一次抓取”，与“改变物体位置使抓取更容易”，不是同一种陈述。前者规定研究对象的组织边界，后者提出可以比较的因果作用。如果把前者直接作为后者的证据，就会出现循环：因为我们把某因素定义进整体，所以它必然是结果的重要原因。一个组成项可以被纳入描述，却在特定比较中并不解释差异。

相反，因果影响很大也不自动意味着该因素属于同一层级的构成部分。远处的一次工作安排可能改变照护者回家的时间，进而改变游戏机会；它对婴儿活动有实际影响，却不必被放进一次抓握的微观动作单位。把因果来源、当前构成和背景条件分开能够防止 SIO 不断膨胀为包罗全部世界的图。

这里可以采用“边界随问题而明确”的原则，而不是边界随结果任意改变。研究抓握协调时，把姿势、接触与反馈列为直接组织；研究家庭分工时，把工作时间与交接方式列为直接组织。两层可以通过时间和参与者相连，但不必共享完全相同的变量表。所谓高阶，并不是每次分析都要把全部层级同时带进来。

一个反例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假设不同成人采取不同方式维持同一必要支撑，婴儿的活动几乎不受风格差异影响。这并不证明关系不重要，而可能说明特定功能已经由多种实现方式稳定承接。真正被限制的是“某一种风格不可替代”的主张。发生学不应因为重视关系，就要求每项关系变化都产生明显后果；具有组织的系统也能够吸收变化。

十一、把六路径变成不同的证据入口

从 S 进入，研究者首先面对一次异常显露，例如原先顺畅的活动中断。接着检查 E，找出哪些关系与过去不同，再调整 D，形成一次可比较的后续尝试。这条路径善于

发现原解释遗漏的条件，但也容易因已经知道结果而挑选最顺耳的原因。因此，记录中要保留当时提出过却未获支持的解释，不能只保存最后成功的版本。

从 E 进入，则先明确一项可改变的组织关系，例如必要支撑与材料位置的配合，再观察 D 怎样展开以及 S 是否变化。这条路径更接近前瞻比较，却可能忽略婴儿对安排的不同使用。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机会，并不等于孩子接受了这个机会。必须把“提供了什么”与“实际进入了什么”分别记录，否则环境安排就会被错误计作已经发生的学习。

从 D 进入，重点在活动次序的改变。相同材料、相近支持总量，可以因为等待、介入和再次尝试的位置不同而形成不同过程。这里应当记录的是顺序改变了哪个前置条件，而不是把任何顺序差别都当成理论创新。若孩子在两条路径中调用相同组织，结果可能收敛；这种收敛同样能够揭示哪些历史差异不再起决定作用。

由此，六路径不是要求每章列出六支箭头，而是帮助研究者区别自己的证据从哪里开始、哪里最容易遗漏。相互规定最终要在可追踪的活动分工、信息接续和边界变化中获得内容。只有这些内容发生改变，SIO 分析才不只是给既有故事换了名字。

十二、边界怎样设，才能既不切碎也不吞没

一个实用的研究单位可以从“孩子开始接近物体”到“活动转向其他事项”划定，但这个时间窗不能代表全部历史。记录需要保留窗口前的相关条件和窗口后的延续，同时承认看不见的部分。边界是为问题服务的工作决定，不是宣称世界真的按表格分段。

若所有事件都被合并成一个无边的整体，研究便无法比较；若每次手部动作被切成彼此无关的小块，又无法说明调节。可行的办法是保留嵌套层级：微观动作、完整活动、日常重复和较长发展史分别记录，通过明确关系连接，而非一开始全部混写。

本章因此提出一个最低验收标准：任何 SIO 分析都应能回答谁在何种关系中行动，哪些变化由谁接续，哪些背景通过什么路径进入，以及何种观察会使当前边界被修订能回答这些问题，三项才不只是拼盘；不能回答，箭头画得再多，也仍然只是描述性的摆放。

03

第 3 章

符号粒子化：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

返回目录

一、重复出现的动作，未必已经是同一个组织

在说明性场景中，孩子三次伸手碰到一个玩具，成人立即宣布“学会了”。然而，第一次可能是偶然碰到，第二次可能是成人移动玩具迎向手掌，第三次才是孩子根据位置调整手臂。相似的结果可以由不同过程产生，次数本身不能回答单位是否已经成立。

本章的“粒子化”不指身体变成物理微粒，而指特征纠缠取得可辨认单位性的理论过程。[S01]其研究意义在于：不能仅因事件发生，就认为已经有一个能保持、能再次进入活动的符号；也不能因为组织尚未稳定，就认为此前完全没有学习或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稳定、独立不是三个奖章，而是三个相互约束的问题。某个模式可以重复得很稳定，却只依靠外部程序机械推动；某个动作看似能独立完成，却无法与其他活动协调。判断必须说明所分析的单位是什么，以及这些判据在该层级如何适用。

二、整体性：不是多种特征同时在场

房间里同时有灯光、声音、气味与玩具，并不因此组成一个行动整体。整体性要求说明某些关系对共同活动具有组织作用。例如，目光追踪改变伸手方向，接触反馈又改变握持，身体支撑使这些调整可以继续。这里的重点是相互调节，而不是感觉数量。

一种候选检验是比较关系安排，而不只是比较刺激总量。把安全物体放在相似距离，保留相同的可及支持，观察不同姿势或时序是否改变跨通道配合。如果总量相同

而安排不同，结果也随之改变，说明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它还不能证明 SDE 独有，因为其他关系模型同样可能解释。

整体性也不要求每项成分都不可替代。恰恰可能存在替代通道：视觉提示减少时，触觉支撑仍允许活动维持。一个真正有组织的系统可以具有冗余，不必像积木塔一样抽走任何一块就倒塌。所以“删除某项仍成功”不能自动否定整体；要看功能如何被其他路径承接。

研究应优先利用自然变化或非必要条件的安全调整，不能撤去必需照护来寻找承重因素。必要支持属于活动成立的条件，不是为了理论整洁可以任意拆下的实验配件。

三、稳定性：保留的是关系，不是冻结的表情

孩子今天在椅上玩，明天在地垫上玩，动作细节不可能完全一致。若把稳定理解为逐帧重复，任何生命活动都会显得不稳定。更有解释力的问题是：在明确条件范围内，有没有某种组织关系能够维持或恢复?

例如，遇到物体滑动时，孩子能通过放慢动作、改变支撑或重新接近，使探索继续。这些不同动作可能共享“根据接触后果调节下一步”的关系。稳定的不是一个固定姿势，而是活动能够在适当变动中保持某种组织。不过，研究者必须在看结果之前说明这一功能是什么，不能事后把所有不同都解释为同一性。

稳定还有时间尺度。几分钟内重复，不等于隔日保持；家中保持，不等于进入托育环境仍然保持；在精神充足时显露，也不等于疲倦时必然显露。一个诚实的稳定性描述需要带着范围，诸如“在此类材料、支持与状态下可重复”，而不是笼统判定孩子“已经拥有”。

失败同样提供信息。原有活动在换场地后中断，可能说明组织尚依赖某种线索，也可能只是新场地缺少必要条件。若不区分能力、表现条件和观察误差，稳定性测试就容易把环境不合适变成孩子不合格。

四、独立性：从当次触发中获得相对可调用性

独立性最容易被日常“独立育儿”的含义带偏。对于一个局部动作符号，本书暂用它追问：活动是否只存在于唯一刺激或连续提示之中，还是能以适当变式再次调用

对于高阶婴儿符号，则主要涉及个体边界与连续性不被任何单一局部事件完全替代。两种含义有关，但不能直接互换。

孩子换了玩具仍能组织相似的抓取，可以作为局部迁移的候选证据；孩子需要姿势支持才能抓取，并不因此没有局部独立性。若支持解决的是持续存在的身体可及条件，撤去它就相当于改变了任务本身，而非单纯检验是否掌握。

研究可以区分“构成性支持”与“偶然提示”。前者使活动得以发生，后者只是当次出现的额外引导。这个区分并非永远固定：一个过去必要的提示以后可能不再必要，某个原本偶然的线索也可能被孩子纳入自己的活动组织。需要通过历时观察确定而非由成人愿望预先决定。

同样，独立调用不是没有历史。相反，能够在不同情境中活动，可能正依靠过去多次共同活动的保留。把独立当成对关系的摆脱，会看不见关系如何成为能力自身的一部分。

五、三项判据怎样相互制约

整体性加强，可能使活动更协调，也可能使改变一个局部变得困难；稳定性提高，可能让新尝试有可靠基础，也可能使旧方式过分占据活动；独立调用扩大，可能形成迁移，也可能在不合适的情境中机械套用。三项不是越大越好，更不是分别最大化后自动得到理想发展。

设想孩子学会把一个杯子倒扣。若活动只能在成人固定手势下完成，结果虽整齐，却不能据此认定独立调用；若换材料后仍执意倒扣，不管是否适宜，稳定反而可能妨碍进一步辨别；若每次变化都完全打散原来的操作，又很难积累可继续的基础。真正需要的是可保持而又可重组的组织。

这一分析与三方程连接时，应从具体张力出发。既有 E 支撑一种 D，却在新条件下产生不适宜的 S；研究问题不是消灭稳定，而是怎样调整 D 或 E，让新的 S 既保存有效关系，又允许差异进入。这里没有万能顺序，也没有保证成功的比例。

六、三个结果相同的场景，为什么需要不同判断

以下是作者构造的三个抓取场景。甲在成人不断摆正手部、移动物体后碰到目标；乙在熟悉布置中能持续抓取，但换一种仍然适宜的摆放便停止；丙在必要支撑保留的

条件下，能通过调整再次参与。三者最后都碰到物体，但“碰到”这个结果不能单独辨认组织差异。

对甲，要研究哪些协调由成人实际承担，不能把共同完成全部算成婴儿独自掌握；对乙，要研究熟悉布置中哪些关系真正起作用，以及变化为何中断；对丙，要研究调整是否由可再次调用的组织支持，而不只是一次偶然。这不是给三个孩子排等级，而是让支持安排对准不同问题。

同样，丙也不能被自动宣布为“最独立”。若新的安排令其承担不适宜负担，成功次数可能掩盖代价。三项判据用于辨认存在组织，不负责独自决定价值。我们仍须另行考察支持需要、参与质量与活动安全。

七、单位改变时，判据也要重新说明

把一次抓取作为单位，稳定可能指相关协调在适宜变化中持续；把照护关系作为单位，稳定可能涉及回应的可获得性；把整个婴儿作为高阶符号，稳定则需要结合生命史的连续组织。这些意义具有联系，却不能用一个重复次数替代。

独立性也有层级差别。局部动作可以相对脱离最初提示，关系中的一个成员却不能因此被理解成不需要其他成员；高阶个体可以与别人区分，却仍依赖营养、支持和共同生活。若不逐层注明对象，“独立”就会从组织判据滑向某种文化中的理想人格。

因此，研究者在使用判据前，应写清楚三句话：当前要辨认的单位是什么；哪些变化应由这个单位容纳；哪些必要条件没有被要求取消。这个约定让失败结果具有含义。否则每次失败都可以通过改换单位解释掉，三性便不再具有检验作用。

八、先规定允许改变什么

判断一个符号是否稳定，首先需要规定哪一类变化不应被视为更换了研究对象。研究同一取物组织时，改变物体颜色可能仍在比较范围内；改变到孩子根本无法接近的位置，则可能已经换成另一项任务。若把所有变化都算作稳定性考验，任何生命组织都会失败；若只允许毫无影响的变化，又会使稳定性成为没有内容的保证。

本书提出“有条件的等效活动”作为工作概念。两段活动不必动作相同，但在必要支持、目标范围和可参与程度上满足预先约定的可比条件。随后再观察孩子能否用

适当调整维持某种关系。等效不是研究者事后看见成功便宣布相同，而是在结果之前写清楚哪些条件保持、哪些条件改变、怎样的后续行为才构成接续。

例如，研究的是“接触后能够根据物体移动重新调整”，就不应把第一次碰到物体当作全部结果。应当观察接触之后的一段活动，并允许孩子通过不同动作恢复接触若孩子只是保持成人摆好的姿势，表面稳定可能来自外部固定；若他改变姿势却延续相同关系，动作变化反而可能是组织稳定的表现。这种判定把稳定从外形复制转到条件内的关系保持。

九、用一张迁移关系表替代一句“已经会了”

可以在研究设计中交叉安排两类安全物体与两种熟悉照护关系，形成四个活动条件。需要身体支持的孩子，在所有条件中继续获得同样适宜的支持。研究不是让每个孩子通关四项测试，而是用不同条件区分组织依赖的来源：变化来自物体，来自提示来自照护关系，还是来自这些因素的组合。

假如孩子在两位照护者那里都只对物体甲表现出相似调节，候选解释是材料特征仍然关键；假如两种物体只在同一照护者那里支持活动，可能是提示方式或共同历史具有作用；假如四种条件都能维持功能，则可以对迁移范围作更广、但仍有限的判断这里没有必要给四格相加成为人格分数，因为不同格子提供的是不同机制信息。

还应保留混合结果。孩子在第一天能够迁移，第二天却没有参与，可能与状态和任务进入有关；也可能说明原先组织并没有那么稳定。研究不能只保留最好的一次，也不能凭最差的一次取消已有能力。可以记录每种条件中活动被发起、被接续和被中断的机会，再区分没有进入任务与进入以后无法调整。两种零结果不承担相同解释。

这张关系表尤其适用于检查“独立性”的误用。能够从一位成人转到另一位成人，不等于不需要成人；能够更换材料，不等于对所有材料都适用。局部的可调用性应写成带条件的句子，而不是一个去掉关系的形容词。它说明一个组织能够承受哪些改变同时也公开它尚不能承受哪些改变。

十、相似表现可能来自不同的内部组织

设想两段经过构造的活动。甲每次都在铃声以后伸手，物体是否移动并不改变动作；乙依据物体的新位置调整，铃声只作为活动开始的提示。两者在固定布置中可以

拥有相同成功率。若研究只观察原布置，就无法判定哪种解释更合适。需要在保留安全和必要支持的前提下，分别改变铃声与位置的关系。

这一例子给出一种重要的反例：频繁成功既不充分证明整体性，也不充分证明相对独立性。成功可能由单一线索控制，也可能由多个关系联合组织。相反，一次迁移失败也不充分否定整体性，因为新的条件可能超出原先研究范围。符号判据应当与竞争机制一起使用，否则三个漂亮词语仍然只能跟在结果后面作评价。

可以把候选单位理解为一组在特定变化下具有相似后续作用的活动，而不是一组看起来相似的动作。在形式上，若两段历史在指定任务范围内，对后续合宜变化给出近似的参与模式，我们可以暂时把它们归入同一功能类别。这里的近似需要允许观察误差，也要说明哪些差别不能被忽略。这个定义是本书的操作提案，不是婴儿脑内存在这种分类表的断言。

它还带来一个可检验后果：一个类别必须能帮助处理尚未用于分类的新活动。若分类只有回顾作用，研究者总能把所有成功叫作同一种组织，把失败叫作另一种组织只有在新情境中承担判断风险，类别才不只是对已知结果的重新编码。这也是“符号可以再次调用”在研究方法上的对应要求。

十一、构成性支持如何参与独立性

必要支持不是一种与能力相减的量。眼镜、姿势辅助、可及语言或熟悉的空间安排，可以使一个孩子稳定参与某类活动。研究独立调用时，应区分支持是否保证进入条件，还是直接替孩子决定每一步。前者可能与较高的自主参与共存，后者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是否代替了待研究的组织。

这一区分也不完全依赖支持的物理形式。同一块支撑垫，在一种活动中提供身体可及性，在另一种活动中可能将孩子限制在无法转向的位置。因此，不能预先把所有器具列为构成条件，把所有成人动作列为偶然提示。要根据支持在具体任务中的作用来判断，并随着孩子和活动的改变重新检查。

一个有力的机制反例是：撤去某种支持后，孩子无法参与；恢复支持后，原来的调节立刻重新出现。这个结果更接近“表现条件被移除”，未必说明孩子丢失了组织反过来，支持一直存在而孩子仍不能利用新的对象关系，则需要检查学习、任务难度或其他条件。两种失败若被合成同一个“不能独立”，就会产生不合适的训练方向。

十二、三项判据不是同一指标的三个名字

整体性关注哪些关系共同承担活动；稳定性关注这些关系在时间与条件变化中怎样保持；独立性关注其是否只能依附于当次的特定引导。三者可以相关，但不应通过同一成功次数同时宣布成立。否则任何高完成率都将自动成为高整体、高稳定、高独立，理论失去原本应当提供的区分能力。

研究上可以分别提出不同证据。整体性需要分析局部改变如何影响其他环节；稳定性需要重复与恢复的资料；独立性需要在必要支持保留时检查非必要提示或对象变式。每类证据都有替代解释，最终判断应组合而非相互代替。单项很强而其他两项不清楚时，最合适的是报告局部进展，不必急着宣布一个完整的符号粒子已经形成。

这样的标准并不是把符号发生学变成更严格的婴儿考试。它约束的是研究者怎样下结论，而不是要求孩子在任何时刻表现稳定。一个尚未形成可迁移组织的活动仍然可以有当下的价值，一个不愿继续的孩子也不欠研究者一次成功。判据越清楚，越应减少由成人期望制造的过度解释和过度要求。

十三、从判据到研究约定

本书建议每次宣布一种局部符号成立时，留下四项说明：所选单位、有效条件、可重复的组织关系、已知失效情境。这是研究文件的最低要求，不是让家庭把生活改造成实验室。实际照护可以只记一个对下一次有用的差别。

还有一种重要情形：三个判据暂时不能清楚区分。一个活动既可能是新单位，也可能只是旧组织在新材料上的表现。此时最好的结论不是强行分类，而是保留竞争解释，设计下一次安全观察。概念的力量不在于每次都给出确定名称，而在于使不确定之处变得具体。

符号粒子化因此不是成长的终点。它让某种活动取得可以继续的形态，同时使新的变化有了对象。一个婴儿之所以能够不断成为新的自己，不是因为所有模式永远开放，也不是因为所有模式都永久封闭，而是因为保持与重组在不同层级中持续相互规定。

04

第 4 章

从局部 SIO 到高阶“我”

返回目录

一、许多活动，不自动构成一个“我”

一个婴儿能够吸吮、转头、抓握、发声，并不能仅凭列出这些活动，就完成高阶符号的说明。清单可以增加得很长，却仍然没有回答：这些活动怎样属于同一生命组织，又怎样共同改变下一次活动的条件？

本书以作者构造的喂养场景进入问题。孩子在被支撑的姿势里进食，听到熟悉的声音，暂时转头，再重新参与。身体状态的改变会影响注意，注意方向会改变接触，成人又据此调整动作。若把每个动作分别剪成视频，局部描述都可能正确，却会失去连接它们的调节过程。

高阶“我”首先是对这种跨活动组织的研究主张，而不是藏在所有活动背后的微型指挥官。不能因为局部彼此协调，就想象另有一个已经成熟的自我负责统一它们；那样只是把需要解释的统一性提前放进原因。

二、聚合不等于相加，纠缠也不只是连线

设一组候选局部单位为 q_1、q_2、……。若用 Q 表示其高阶组织，Q 不应仅被写成各 q 的数量总和。至少还要交代局部之间的联系、相互调节方式、所保留的历史以及边界条件。这个符号化表达是本书的分析提案，不是已拟合的数学模型。

更重要的是，这些局部通常不是互不重叠的零件。相同的听觉活动可以参与安抚、交流和物体探索；相同的身体支撑可以参与进食和观看。高阶结构因而不必是一棵从小零件向上拼装的树，更可能包含共享成分与跨层连接。若强行分割，反而会丢失实际的共同性。

因此，“无数 SIO 纠缠聚合”不是要求研究者数清所有 SIO。它指出个体不能被一两个突出属性穷尽。经验研究只能选择与问题相关的层级，在局部保留充分细节，并说明选取范围。高阶不等于全知，整体不等于所有变量全部进入一个模型。

三、高阶组织怎样回到局部

说高阶“我”回写局部，很容易听起来像一种神秘的向下力量。必须把它还原为可追踪的实际路径。孩子形成了更稳定的移动组织，便能主动接近不同物体；新接近改变成人摆放材料的方式；摆放改变后，又使抓取、观看和交流的局部活动不同。所谓高阶作用，通过这些具体路径发生。

另一种路径来自整体状态。某段活动后孩子的参与状态改变，原本可持续的游戏暂时停止，成人调整节奏。研究者需要分别记录实际状态指标、成人解释与活动改变不能把“孩子累了”当作不需证据的万能解释。高阶状态只是一个工作性概括，其有效性要由所覆盖关系来支持。

在三方程中，这可以被理解为不同尺度的 S、D、E 相互约束。一个局部的新显露可能成为整体组织的条件，整体组织又改变局部差异推进的可行范围。尺度之间没有必要一一同构：微秒级的生理变化、秒级的回应、日常节律与数月发展的关系，需要不同方法连接。

四、“同一个我”不能由单一通道担保

若把视觉识别能力当成统一性的核心，一个视觉受限的婴儿便容易被错误地描述成缺少“我”；若把口语作为门槛，尚未说话的孩子又被排除。高阶组织不能被某一正常化模板垄断。它需要结合实际身体条件研究不同通道怎样维持参与与连续性。

但这并非说所有通道可以无损替代。身体差异确实可能带来限制，补偿也需要具体条件。尊重不同路径，不等于否认障碍，也不等于承诺任何限制都能由更好的环境消除。本书要求同时保留可及支持和事实边界。

一个孩子在不同照护者处通过不同方式寻求接触，可能保留某种关系功能，却并没有重复相同动作。高阶分析的任务是判断这种跨形式联系是否存在，而不是从一两次相似结果推定全部组织已经统一。对婴儿内部经验的解释尤其应当谦逊，不能把研究者的分类当作孩子自己的叙述。

五、三个层次的“我”

第一层是存在连续性意义上的“我”：这个生命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发展史，其活动与后果由该生命持续承接。第二层是身体行动中的自我相关组织：自身活动、感觉后果及与外界的区分逐渐形成可研究的模式。第三层是可表征、可反思的“我”：名称、代词、叙事和对自己作为对象的理解。

这三层是本书为理论清晰而作的分析区分，不是三个固定月龄的临床阶段。它们可以交织，也不能从其中一层直接推出另一层。早期已有独特存在，不证明成熟反思已经完成；没有成熟反思，也不抹除其独特存在。关于自我意识分层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可对话的材料，但不替本书证明全部高阶符号主张。[R01]

这样也能理解“我”与“我们”的关系。婴儿的独特存在并不以先从所有关系中抽离为条件；家庭共同活动也不必等待所有成员都掌握“我们”这个词。存在上的关系、体验上的区分和语言中的代词，应当分别处理后再寻找联系。

六、高阶解释必须接受压缩检验

一个高阶概念可能只是把许多现象装进一个大袋子。为了避免这一点，本书提出“有效压缩”的研究要求：高阶描述应在保留关键差异的同时，帮助解释或预测多个局部活动；不能只有名称更大，信息却更少。

例如，用同一项关系组织指标解释两个活动的迁移，需要证明它不是事后把成功事件归在一起。可以预先界定指标，再观察新的活动；也需要和拥有同样数据的动态系统模型比较。若局部模型已经充分说明，而高阶概念没有额外作用，就应缩小经验主张，保留其哲学整理价值而不冒称预测优势。

有效压缩也不能牺牲个体边界。家庭作为更高层级组织，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家庭目标替代孩子的需要。层级越高，越要说明哪些成员的感受和权益不能被平均值吞没高阶符号不是道德豁免权。

七、高阶组织不只是相关程度更高

假如观看、伸手和发声常同时出现，可以把它们连成一张网络。但网络中连线多，不等于已经证明高阶“我”。这些行为可能被同一物体吸引，也可能只在某一情境里共现。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活动之间是否保留了可追踪的组织联系。

一个可行的研究提案，是先在活动甲中辨认候选协调方式，再检查它是否帮助解释活动乙中的变化。例如某种通过反馈调整接触的组织，能否在另一种适宜对象关系中继续发挥作用。这里要使用尚未用于建立解释的新资料，否则只是把已经知道的结果换一种方式总结。

若存在跨活动联系，也还需要分辨是共享的身体状态、共同经验，还是局部关系之间的实际传递。高阶并不预先指定唯一机制。它要求我们寻找能够连接多个活动而又保留差异的组织描述；什么连接成立，仍由证据约束。

八、部分重组，为何不必导致整体被替换

在作者构造的场景中，孩子原来通过声音寻求接触，后来更多使用动作。局部表达改变，不必意味着此前的关系历史被清空。熟悉照护者可以把新的动作纳入已有回应，旧组织中的某些联系得以保留，其他联系则调整。

这个例子说明高阶同一性可以依靠关系的交接，而不是每个成分保持不变。研究时应寻找哪些连接把改变前后接起来：共同身体史、持续的照护关系、可辨认的活动后果，以及新旧方式之间的实际转换。不能只因为成人仍叫同一个名字，就省略这些连接。

也不能把“交接”想成全程平滑。某些变化可能暂时使原有协调失效，新的支持才能重新建立参与。高阶组织容纳断续与重建，并不等于任何变化都无关紧要。它要求区别局部困难、广泛失调和生命连续性，而不是只用“还是他”掩盖实际需要。

九、没有总指挥，也可能形成整体约束

高阶组织最容易被误解为隐藏在身体内部的统一指挥者：它先决定要做什么，再让感官和动作服从。可是，用一个已经统一的指挥者解释统一性的形成，只是把问题向后挪了一步。婴儿符号发生学需要说明的是，在没有成熟自我叙述的条件下，多个局部活动如何相互限制，使一些转变更容易发生，另一些转变暂时被排除。

一个构造情境是孩子从观看物体转向接近照护者。头部方向改变可见对象，身体位置改变可接触范围，照护者的回应又改变接下来可以进行的活动。没有必要假设每一步都由同一条内部命令控制；这些变化通过身体、材料与共同活动相接，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对后续行动具有约束力的整体状态。所谓整体状态，并不是额外的一种材料而是这些关系当下如何组织的概括。

但概括有用并不等于概括本身在施加神秘力量。“孩子已经进入求助状态”只有在说明具体实现时才具有机制内容：是否中止原来动作，是否把声音或身体转向熟悉的人，成人怎样承接，新的接触又怎样改变后续活动。缺少这些连接，“状态”就会成为替所有未知代答的词。

十、重叠的局部，比整齐的层级树更接近研究问题

一段声音活动可以同时参与物体探索、亲情调节和后来的语言学习；一个身体姿势也可以同时支持观看、取物与交往。这些局部并不互相排斥，因此高阶符号不能只被想象成一棵由独立零件拼成的树。某个局部改变，可能沿几条关系同时传播，也可能在其中一条被承接，在另一条被吸收。

设想一个孩子获得了更有效的物体保持方式。他在游戏中能持续接触材料，也能把材料带入与成人的交流。若只在动作测验里记录一次进步，便看不见这一组织被两个活动共同利用。反过来，若成人交流方式改变，使孩子更多等待而较少操作，原来的动作使用机会又可能缩小。这种变化不是“心理影响生理”的空泛说法，而是机会分配、姿势持续和动作接续的实际改变。

可以把局部活动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重叠连接：它们共享某些身体资源、对象和历史，却不因此完全相同。研究者应当指出共享的具体部分，不能仅因两个行为发生在同一个孩子身上便认定已经纠缠。真正的连接至少应当能够提出一个关于转变的预期例如改变共同支撑时，两项活动可能同时受影响；改变某项特定提示时，则只影响其中一项。

这一分析也允许功能分离。孩子在物体操作中形成了新的组织，但在与陌生成人互动时没有相应变化，并不自动反驳全部高阶理论。它可能说明我们猜测的共享路径不存在，或者尚未形成。高阶解释的成长应当依靠确认与排除连接，而不是把所有局部一开始就宣布为一个无差别整体。

十一、一个最简宏观描述怎样接受检查

为了说明尺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构造三个微观变量：活动通道是否可及、当前行动是否能够得到接续、孩子是否继续参与。三者不是婴儿发展的全部，也不是临床量表，只是一个分析例。将它们简单相加会掩盖结构：三个条件中任意缺少一个，可能

分别对应“无法开始”“开始后无人承接”或“孩子已经退出”，需要采取的支持并不相同。

一个候选宏观状态可以叫作“可持续的共同探索”。它不是总分达到某个数值，而是要求通道可进入、接续关系可获得、孩子仍有影响后续活动的空间。这个定义提出一种压缩：用较少的语言保留对下一步重要的组合关系。它是否值得保留，要看这种压缩能否在不同具体材料上继续区分可持续与易中断的活动。

假如宏观描述把两种后续明显不同的微观组织合并，就需要拆分。比如两段活动看起来都持续顺畅，一段完全由成人连续推动，另一段允许孩子改变方向。若只预测当前持续时间，二者可能等效；若预测撤除偶然提示后的接续，二者可能不再等效。宏观状态应当随研究任务明确，而不能被当成一张永远正确的全人格地图。

因此，高阶变量的价值有两个限制。它不能只是把结果重新命名，否则没有预测信息；它也不能包含只有结果发生以后才知道的内容，否则在未来任务中无法使用。研究者需要在前一段活动中给出可复核定义，再检验后一段活动。这个顺序使“高阶组织回写局部”有机会成为研究，而不是一段事后讲得圆满的故事。

十二、回写至少有三条不同通路

第一条是身体与活动通路。先前形成的协调改变孩子能够采取的动作，新的动作重新选择感觉输入。这是一种通过可行动范围实现的回写，不必等待成人为能力命名第二条是关系通路。孩子的活动改变他人怎样回应、摆放材料或组织交接，这些改变又进入后续活动。第三条是表征通路。成人或稍大的幼儿对既往经历形成解释，解释改变安排，再对实际活动产生影响。

三条通路可以互相加强，也可以相互抵消。一个孩子的动作已经更灵活，但成人仍依据旧印象限制机会，身体变化便未必立即变成生活自由；成人相信孩子能够尝试也不保证当前身体条件足以承接安排。将通路分开，就能看见“能力存在”“机会开放”“解释更新”并不同步，后天发生的困难有时正发生在它们之间。

这种不同步是高阶理论的重要反例来源。若成人评价已经改变，活动安排却没有改变，便不能说表征已经完成了实际回写；若安排改变而孩子尚未使用，便不能宣称新的高阶结构已经建立。每一个箭头都需要自己的后果，不能以链条中的一个亮点替其余环节作证。

十三、高阶统一并不取消局部的异质性

一个孩子可以在某种活动中高度熟练，在另一种活动中仍需大量支持。高阶统一性并不要求所有局部发展齐步前进。相反，共同身体和共同历史可以承载相当不同的节律。若研究者为了证明统一而只寻找同步变化，就会把真正需要解释的异质性当作噪声排除。

这里可以提出“有限整合”的概念：某些局部已经形成稳定连接，另一些仍相对分离，高阶“我”通过持续生命活动承接这些不均匀的组织。有限整合不是对缺陷的修辞包装，而是避免全有或全无的描述。它允许研究者询问某个连接何时形成、是否能够替代、在哪里会失效，而不必先宣布整个自我已经完整或尚不存在。

同样，家庭作为更高层级组织，也不能把婴儿的局部需要全部解释成家庭目标的功能。一段安排可能提高家庭效率，却减少孩子获得可及交流的机会。高阶层级的存在只说明关系范围扩大，不给任何一层自动授予压倒其他成员的价值权。婴儿的感受不能被“整体很好”这一句评价抵消。

由此，高阶符号的机制解释具有一个清楚方向：寻找能够跨活动保存和重新分配条件的组织，同时指出其具体实现、作用范围及不能覆盖的差异。它既不回到孤立主体，也不把主体稀释成无边关系。那个独特的“我”，就在能够承接变化、又不能被任意一段关系替换的连续生命中获得自己的层级。

十四、统一性仍然容纳矛盾

孩子在熟悉活动中主动，在陌生活动中迟疑，不必被解释成“两个我”。高阶组织可以包含情境差别、尚未协调的局部，以及需要通过新活动重新组织的冲突。统一性不是所有地方表现一致，而是在差异中保留可追溯的连续。

本章不试图寻找一个永远不变的核心属性。它把“我”理解为能够承接过去、参与现在并改变后续可能的组织性存在。其边界不是完全封闭，结构也不是任意流散。正是在这种既保持又开放的关系里，无数局部 SIO 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生命，而不只是被研究者摆在同一页上的许多事件。

05

第 5 章

独特性、同一性与可追溯历史

返回目录

一、不断改变，为什么仍是这个孩子

家庭相册里，新生时蜷缩的身体与后来主动行走的孩子相差很大。许多动作、关系和偏好都改变了，我们却通常不把这些变化理解成原来的孩子消失、另一个孩子取而代之。这里的连续性不能只靠“长得像”解释，也不能只靠某种始终不变的心理属性。

本书区分三个问题：个体怎样在生命活动中持续；我们怎样通过记录识别这种持续；孩子自己怎样逐渐体验和表征自身。第三个问题可以较晚以复杂形式出现，前两个却不能因此被取消。出生登记是社会识别制度的一部分，但不是生命连续性的制造机器。

一个重要后果是：不能以当前能否回忆早期经历，裁定早期是否属于这个“我”。记忆的可报告性与发生史的实际作用不同。某些历史可以通过身体、习惯、关系安排继续起作用，而不以清晰叙事形式出现；具体怎样起作用，仍需要证据，不能任意追溯。

二、同一性不是相似度的最高分

两个孩子可以在某份测验上得到相同结果，仍不是同一个人；同一孩子可以前后得分差异很大，仍保有生命连续性。因此，统计相似度适合比较选定特征，却不能独自承担个体同一性的全部判断。

在符号发生学中，同一性可以被工作性理解为：后一个活动组织如何由此前过程接续而来，并在变化中承接其后果。这不是要求每一步都能被完整录像，也不是保证

所有变化都平缓。出生、疾病、生活迁移等重大转换，可以在连续生命史中形成结构性转折。

“可追溯”并不等于“已全部追溯”。现有资料可能只支持一段关系，而不是完整因果故事。研究者应说明缺口在哪里，不应为了维持一个动人的成长叙事，把未记录部分填成确定事实。

三、独特性也不是全由偶然细节组成

每个孩子经历的天气、光影和偶然声响都不完全相同，但这不能直接证明这些差异全部塑造了稳定人格。不可重复性是背景条件，不是对任何发展结果的充分解释。必须区分曾经发生、留下痕迹、在当前可被调用，以及改变未来路径这几个层次。

设想某次敲击产生特别的声音。它可能很快被其他活动覆盖，也可能在随后重复中成为探索的一部分；即使被保留，其作用也可能局限于某个游戏，而非整个气质。历史研究需要这种选择性，而不是把每个微小事件都升格为命运转折。

本书因此提出“承接链”作为分析用语：记录早期事件怎样通过后续关系被保留或转化，再说明它在哪个活动中重新发挥作用。承接链不是新发现的生物机制，而是一种防止跳跃叙事的工作要求。链条缺一段，就应把相应结论降为可能解释。

四、两个当前相似的组织，未来可以不同吗

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是：两名孩子今天表现相近，是否仍可能因为历史不同而对新情境作出不同反应？逻辑上可以，但不能由“历史不同”直接保证。若我们记录的当前状态已充分包含相关历史，额外历史资料未必还能改善预测。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模型。简化模型只记录当前结果，可能遗漏历史保留的组织；更充分的状态模型则把这些组织纳入当前状态。在后一种模型里，历史的作用已经被当前结构承载。SDE 不能一方面承认所有有效历史都进入当前 E，另一方面又把“历史必然额外有效”当作不受条件限制的定律。

因此，本书的经验问题应当收窄为：在所选任务和资料条件下，增加哪类历史记录，能否改善对后续迁移的解释？若不能，就说明目前记录的历史没有增加信息，或者当前指标已经足够。这样的失败不会否定生命史存在，只会限制某个预测主张。

五、个体历史并非成人的单人传记

婴儿的发生史常由成人讲述：“他从小就这样。”这句话可能包含长期观察，也可能把后来印象倒投回过去。对研究来说，照护者叙事是一类重要材料，但应与当时记录、不同照护者的观察和活动条件对照。

构造一个例子：母亲记得孩子总是不喜欢陌生人，父亲却记得他在熟悉公园会主动接近同伴。两者未必一真一假，可能分别记录了不同条件。如果研究只选最符合理论的叙述，就把多样历史压成一个特质。更合适的是说明这些差别如何被同一个高阶组织容纳。

历史还会被表征重新组织。家人反复讲述某次“勇敢”的经历，可能影响后来怎样安排活动。于是，过去不仅通过原事件留下的关系起作用，也通过对过去的再解释参与现在。两条路径必须分开，否则故事传播就会被误认为原始事件的直接长期效应。

六、稳定与变化都不天然等于进步

一种模式持续很久，不一定有益；一种模式发生改变，也不一定代表升维。孩子可以在更充分支持下获得新的行动机会，也可能因为条件变化失去原本能够参与的活动。发生学不能只研究可喜的变化，必须说明限制、损耗和恢复。

正向评价因此需要明确价值对象与时间范围。某种安排让成人当下轻松，却可能减少孩子参与；另一种安排增加探索，却可能过度消耗家庭。判断不能只用一个短期成功结果，也不能以遥远发展承诺忽视当前负担。保护、稳定、自由必须放在实际生活条件中共同讨论。

尊重独特性不是取消必要的健康与发展支持。相反，只有准确理解这个孩子怎样经历差异，专业支持才可能更合适。个体史应当帮助发现可改变的条件，而不是把任何困难浪漫化为“他自己的道路”。

七、一张完美画像，也不是这个孩子的替身

即便一份记录极为详细，记录仍然属于表征。它可以帮助照护者预测某些活动，却不能承担孩子接下来经历的后果。记录中的“同一”通常是分类一致或相似度较高

生命史中的同一则涉及过程如何被连续承接。两种同一可以互相帮助，却不能被混为一谈。

这使所谓“独特性不可复制”获得较严格的含义。本书不以此宣称数学上证明任何两个完整状态绝不相同，而是强调：相同描述不能转移两条实际发生史。研究者所能取得的有限特征，也不足以把两名婴儿等同为同一个存在者。

反过来，资料不足并非独特性的证据。不能因为无法解释一个孩子，便说“这是不可复制的我，所以不能研究”。独特个体可以参与有规律的比较；比较也可以帮助识别个人需要。需要反对的是用共同指标穷尽个体，而不是共同研究本身。

八、历史的分岔怎样改变眼前相似的表现

在构造情境中，两名孩子都停下探索。甲此前经常通过停顿获得成人调整，乙此前的停顿常被忽略。此时表面动作相同，但下一步互动可能沿不同关系展开。这个假设的重点不是预言必然结果，而是指出需要记录过去怎样进入当前安排。

若后来两人的参与仍然相同，也不能把差异藏到永远不可见的历史里。可以承认在这个任务和观察范围内，前期区别没有显示额外解释价值。历史性不是每段过去都永久有效，而是允许检验哪些历史关系仍有作用。

因此，一部发生史应当容纳影响的增强、减弱和消失。能记录某个早期困难后来不再限定活动，和记录某种经验持续发挥作用，同样重要。只有允许历史松动，才能使发生学区别于把过去不断重述为命运的叙事。

九、发生过、留下来和仍然有效，是三个问题

一段经历可以进入家庭相册，却没有在后来活动中留下可辨别的功能后果；也可以不被任何人记住，却通过持续的生活安排继续发挥作用。历史不能只按是否能够讲述来判断。婴儿符号发生学需要区分事件的实际出现、某种组织的保存，以及保存内容在当前是否被调用。这三个问题分开以后，历史性才不会被写成每个过去都永远支配未来。

可以用一个构造案例说明。孩子曾在某种物体旁听到一段声音，之后没有再经历类似关系。另一个孩子听到相同声音以后，成人持续用它组织一项熟悉活动。两者的

第一次接触可以相似，后续承接却不同。后一段历史的持续作用可能并非来自第一次声音本身多么强烈，而来自它被不断嵌入实际安排。把全部结果归因于“第一次”，会遮蔽维持机制。

这里至少存在三类承载：孩子逐渐形成的辨别与行动组织，照护者持续采用的期待与回应，以及物体、空间和作息形成的可重复条件。它们可以共同保持一段关系，也可以彼此脱开。成人依旧保留某个仪式，而孩子对它的活动意义已经改变；孩子仍能使用某种组织，家中却不再提供相应机会。历史的持续不是一根不断延长的线，而是若干承载方式之间的接力。

十、路径依赖通过机会的重新分配发生

一个具体机制是机会反馈。孩子在活动甲中较容易参与，成人因此更常提供甲；较多的甲又让有关组织更熟悉，孩子接下来更容易从甲进入生活。与此同时，活动乙获得较少机会，于是成人更加相信孩子“不喜欢乙”。这个循环未必起于强烈的先天差异，一次小差别也可能因持续安排而被放大。这里是一个机制假说，不是对所有偏好来源的事实判定。

循环中的关键不在“重复”一个词，而在下一次机会如何由上一次表现选择。若成人不依据表现改变安排，循环的一条边就不存在；若孩子的参与不受机会分布影响另一条边也不存在。相反，若一次新的可及支持让乙变得容易进入，过去的单一路径可能改变。这样，路径依赖就有了明确的维持条件与松动条件，而不是过去不可撤销的另一种说法。

同样，积极循环也可能扩大不同路径。孩子通过一种方式成功表达，照护者由此学会辨认其他较细微的表达，新的回应使孩子不必始终依赖原来最强烈的方式。这里的保留不是把一个信号越练越大，而是把可被理解的关系扩展到更多形式。因此，历史留下的成果有时表现为行为差异减少，有时表现为可选择形式增加，两者不能用同一种“稳定”指标概括。

十一、当前状态相近，为什么仍需记录历史

假如两名孩子今天都完成一次取物，当前结果并没有告诉我们谁承担了活动的关键部分。一名孩子自行调整，另一名依靠连续提示，成功这个显露把两种组织压成了

相同状态。在这种粗粒度记录下，增加先前过程可能改善对下一次活动的解释。历史不是神秘地隔空作用，而是补出了当前摘要遗漏的组织信息。

但是，若当前记录已经充分包含必要支持、反馈使用、提示依赖和身体状态，过去的部分信息可能不再增加预测。这并不削弱发生学；它反而说明某些历史作用已经被当前组织承接。不能为了强调历史，要求旧事件在所有足够完整的当前描述之外再贡献一份独立力量。那会把实际连续性错误地写成两个重复原因。

因此，本书提出一个分层检验：先问粗略当前指标解释了多少，再问增加哪些过程特征有帮助，最后问更早历史是否仍提供新增信息。每一步都需要控制可用资料与模型复杂度。若历史变量只让已知样本更容易拟合，却不能帮助解释新的活动，其贡献就应受到限制。独特历史可以真实存在，而我们选择记录的历史未必具有足够的预测价值。

这个区分也能避免把数据丰富误当作理解充分。记录一万段视频不等于找到了发生机制；一段清楚显示机会如何被改变的事件，可能更直接地定位支持入口。历史研究需要的是有后果的联系，而不是无限增加关于孩子的私人档案。对于生活实践，保存最少而有用的信息往往比全天候监控更符合儿童与家庭的利益。

十二、分岔可以被放大，也可以被吸收

设想两个孩子在第一次接近一种材料时分别停顿与伸手。若成人把停顿解释成永久胆怯，把伸手解释成永久勇敢，并据此长期分配不同机会，初始差异可能获得稳定后果。但如果成人允许两个孩子在适宜条件下反复改变方式，差异也可能减弱。这个构造例提示，分岔之后如何接续，至少和分岔本身同样值得研究。

另一种情况更能挑战简单的历史决定论。两个孩子虽然经由不同早期路线进入活动，后来却在相似的有效条件下形成近似组织。多条路径可以收敛，不同经历不必永远留下可辨识的人格印记。SDE 关于独特存在的判断，不应被误写成所有功能结果都必须永久不同；两条生命史仍不可互换，却完全可能共享许多活动规律。

反过来，同一项支持也可能导致不同结果。一位照护者增加等待，对一个孩子打开了主动发起的空间，对另一个孩子却可能减少了其当下所需的清楚提示。差异并不

证明方法毫无规律，而要求把支持作用放回已有组织。发生学应当提出条件性规律，而不是在“人人一样”与“人人完全不能比较”之间二选一。

十三、同一性依赖承接，不要求每个局部保持不变

从局部方式改变到高阶“我”的连续，需要一个中间层次。孩子以前通过身体趋近参与一项活动，后来更多使用手势或语言，成人则在熟悉关系中承认这些新方式。被保存的可能是活动目标、关系可获得性和反馈的接续，而不是某一种动作外形。新旧组织通过实际转换连接，才有理由说同一生命正在成为新的自己。

这样的承接并不总是顺畅。环境变化、疾病或支持中断可能使原有方式暂时失效。此时，生命连续性仍然存在，但某些能力连续性可能需要重建。不能用“还是同一个孩子”掩盖现实困难，也不能因局部困难就说此前的一切已经消失。存在同一、功能保持和主观自我体验需要各自的证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研究对象。

对于一个不可复制的婴儿，后天发生的积极意义正在这里：尊重来路，不是把来路当成唯一去路。要识别哪些关系应继续保护，哪些安排已经失去作用，哪些新通道可以被安全打开。历史解释只有能够区分这些任务，才真正帮助理解一个“我”，而不是让孩子终身扮演成人已经讲好的故事。

十四、第一编的结论：保持边界，同时开放未来

> 本编建立的不是一张新的人格分类表。它提出了存在优先、相互规定、三项判据、高阶组织及历史承接五个互相连接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要求更多具体观察，而不只是把一个孩子称为“独特”。

同一个婴儿能够不断变化，恰恰因为连续性不必以所有属性不变为代价；两个婴儿不会因属性接近而合并，恰恰因为生命与参与历史并非一份可互换的记录。这样的同一性既不把“我”锁死，也不把“我”稀释成任何关系都可以替代的空位。

接下来的出生史研究将进一步检验这个立场：当互动条件发生重大转换时，什么得到保存，什么必须重组，什么只能暂时不知道。只有能处理这种真实的连续与断裂婴儿符号发生学才不止于一个关于独特性的美好宣言。

第二编 / PART 02

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符号发生的历史转换

第 6—10 章

06 母胎互动不是出生后的空白前奏

07 宫内三界和出生后三界何以不同

08 出生：连续性与断裂性同时成立

09 带着差异出生：早产、双胎与先天障碍

10 生命条件如何成为后续符号历史

06

第 6 章

母胎互动不是出生后的空白前奏

返回目录

一、出生日期不能代替全部发生日期

家庭记录通常从出生的时刻开始：几点几分、体重多少、第一张照片。这个起点方便登记，却不意味着此前的生命过程没有留下后续条件。婴儿不是到达空气中的那一刻，才开始拥有身体活动和与他者相关的历史。

同时，向出生前追溯，也不等于要替胎儿写一部成人式自传。母亲感到胎动，家庭因此产生期待，这一事实属于母亲与家庭的经验；胎儿实际发生的感觉、活动与调节，则需要另一类证据。把前者的丰富语言直接放进后者，便会把关系史误写成一个尚未被证明的思想史。

本章采取两条并行线索：一条研究胎内实际过程怎样承接到出生后，另一条研究家庭表征怎样预先组织出生后的照护。二者可能相互影响，但不能互相代证。期待孩子喜欢音乐，不证明胎儿已经理解音乐；父母准备好支持，也不保证每一次支持都准确。

二、一个有限而重要的声音证据

DeCasper 与 Spence 在 1986 年的研究中考察孕晚期重复听到的语音材料与出生后听觉偏好之间的联系。研究报告认为，产前语音经验可以影响新生儿对声音材料的偏好[B01]这项结果为跨出生事件的经验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具体入口，而不是把出生看成一切学习的绝对零点。

证据的分量也应停在它能够承担的地方。偏好熟悉材料不等于理解故事含义，不等于形成关于母亲的明确观念，更不等于某种胎教课程能保证日后的智力优势。听觉经验被保留，与长远发展价值，是不同问题。

另一项经典研究通过新生儿的非营养性吸吮选择声音，报告了对母亲声音的偏好。[B04]两项研究所用的材料、任务与问题并不相同，不能拼成一句“胎儿已经认识妈妈的一切”。它们提示的是特定经验的连续性，如何解释这种连续性仍需回到具体条件。

三、母胎关系不是一方输入、另一方储存

从 SIO 视角看，母胎互动不应被简化为“母亲提供信息，胎儿积累信息”。母体活动、身体条件、胎儿活动与感官可达性，共同规定某个事件能够怎样发生。母亲说出一句话，与成人在安静房间听见同一句话，并不是相同的听觉事件。

这并不需要把母体仅仅称作环境，更不能把母亲缩减成婴儿发展的工具。母亲同时具有自己的身体、感受、生活与权利。她可以在某个胎儿 SIO 的分析中成为相关条件，却并不因此失去自身主体地位。关系性研究应增加对双方的理解，而不是把全部责任集中压到孕妇身上。

在本书的工作性表述中，母胎系统由许多相互交织的 SIO 构成。某些作用路径可以借助生理记录研究，某些家庭期待要通过访谈与行为资料研究，还有些经验目前只能承认未知。所有线索都被归为 E，并不会自动提高解释力；需要明确各自的通道与限制。

四、前期组织怎样进入后期，而不是被整包搬运

可以设想三种不同的承接方式。第一种是某种辨别或反应倾向在出生后仍可显露；第二种是前期条件改变了出生后哪些活动更容易或更困难；第三种是前期形成的家庭安排在出生后继续影响照护。这个分类属于本书的分析框架，不是三种已确证的统一生物机制。

第一种承接不保证形式不变。声音传播条件改变，测试任务改变，孩子的活动状态也改变，研究者不能期待完全相同的反应。第二种承接不等于最终命运已写好，后

续支持仍可能改变参与条件。第三种承接则尤其需要把成人叙事与孩子实际经历分开记录。

一个作者构造的例子是：家庭在孕期习惯用一段轻声讲话结束一天，出生后继续以类似方式开始安抚。孩子后来对这段活动表现熟悉，可能同时受到产前声音经验、出生后重复以及其他照护关系影响。单凭家庭记忆，不能将全部效果归到胎内。研究必须给不同历史阶段留下独立位置。

五、母胎史不是责备母亲的长清单

一旦承认早期条件有影响，社会很容易把它转化为“你当时每件事都必须做对”。这种结论既不由关系论推出，也可能使家庭把偶然、身体条件、医疗资源与社会压力统统归成母亲个人责任。

在发生学里，更多因素参与，恰恰意味着不能轻率单因归责。即使某种风险与后续结果存在群体关联，也不能倒推一名具体母亲导致了孩子某项困难。观察到前后联系，与识别可改变的因果路径，是两个不同层级的工作。

因此，本书关于出生前历史的实践原则不是增加刺激、增加任务、增加自我审查，而是避免用“出生即空白”掩盖连续性，也避免用“孕期决定一切”冻结未来。必要的孕产与新生儿照护应由专业服务支持，哲学不负责开出个体化胎教或医疗处方。[G07]

六、三条需要并行保存的出生前历史

第一条是可记录的身体与生活条件，第二条是家人对胎儿的解释和期待，第三条是研究者依据资料提出的发生推断。三条历史可能彼此影响，但来源不同。例如，家人把一次活动解释为“他喜欢这首歌”，是值得记录的关系事实，却不自动成为胎儿音乐偏好的直接测量。

这种区分不会使家庭经验失去价值。期待可能改变成人的注意与以后照护，但它的实际作用需要通过行动追踪。生理记录也不是全部意义，指标变化还需放在具体条件中解释。发生学要求的是相互连接，而不是让某一条历史垄断另外两条。

当孩子出生后呈现某种表现时，不能从结果向前挑选最顺耳的一段故事。一个有限的声音偏好研究可以支持某类前期经验与后期选择有关，却不能把母亲每一次喜怒每一首歌曲变成性格来源。越是重视历史，越应抵抗任意补写历史的诱惑。

七、母亲不是符号发生的生产设备

把母胎互动放在理论中心，若写作不慎，会把母亲变成随时优化下一代的工具。她的休息、身体感受、医疗需要和个人生活，会被“为了孩子发生得更好”压成次要变量。这恰恰违背主客互动复合体应当保留各参与者实际地位的要求。

更适宜的理论安排，是承认母胎关系中存在不同身体需要与资源条件，支持方案须经专业判断，也应减少不必要的责任归咎。不能要求母亲用完美情绪和不间断刺激为未来个性担保；没有任何本体论有权把这种担保当作爱的义务。

出生前影响的积极意义，不是增加可责备事项，而是帮助家庭和服务系统了解哪些支持值得提供、哪些商业承诺缺少依据，以及哪些未知应当诚实保留。母胎互动越被认真研究，母亲作为具体生命主体就越不应被研究目标遮蔽。

八、从偏好行为走到脑反应，增加了什么

有关产前经验的讨论常从熟悉声音的偏好出发，但偏好并不能独自告诉我们所有保留机制。Partanen 及同事在二〇一三年报告，接受过特定产前类语音材料的婴儿，出生后对训练材料中的音高变化表现出更强的失匹配反应；研究还考察了暴露量与反应的联系，以及对相似材料的泛化。这为出生前后的听觉经验连续性提供了神经反应层面的证据。[M01]

这项研究与行为偏好研究承担不同的证据任务。行为测量考察孩子在特定安排中选择或持续什么，脑反应测量考察给定刺激变化引起的电活动差别。两者可以互相启发，却不能简单相加成为“胎儿已经理解语言”。失匹配反应不是一句被翻译出来的内心陈述，反应增强也不直接等于长期词汇、智力或人格优势。

对本书而言，证据所打开的是一条有限的机制链：某类前期接触与后期辨别相关组织之间存在联系，出生没有将这种联系全部清空。接下来需要解释，这一组织在新

的声学条件与活动状态中怎样继续发挥作用。它是否进入亲情、语言或更高阶自我，要有额外的后续材料，不能仅凭研究标题中的“学习”二字完成跨层推广。

九、同一个声音，不是同一个听觉事件

成人在空气中听到一句话，胎内经历相应声学变化，出生后再听这句话，这三个事件共享某些来源，却不具有完全相同的传播和身体条件。符号发生学不能把“同一个声源”当成“同一个经验”的充分证明。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哪些特征在转换中得以保留，哪些特征改变以后仍能支持后续辨别。

可以构造两种不同的承接假说。第一种依赖较具体的声音形式，转换条件稍大便难以继续；第二种依赖某类较宽的关系，例如变化模式或节律，因此在一定变式中仍有作用。二者都可能属于学习，但对于符号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含义不同。研究应通过合宜比较确定范围，而不是提前把前期经验称为一个已经成熟、完整可迁移的符号。

还有第三种可能：出生后的重复很快覆盖或重组了前期差异。若在较晚测量中看不到组间差别，不能立刻说产前从未留下任何组织；同样，也不能说差异一定被藏到无法测量的深处。可以明确承认当前任务没有发现持续作用，再研究保留的时间条件机制解释需要允许影响消失，否则“历史”就会成为永远不能被限制的解释资源。

十、两条路径不能混成一种胎教效果

一条路径通过婴儿的前期感觉组织进入后期活动；另一条路径通过成人的期待、投入与安排进入后期照护。家庭在孕期重复某段音乐，可能同时形成一种照护习惯。出生后继续播放并伴随抱持，孩子后来的安静既可能与熟悉声音有关，也可能与当下接触、身体状态及重复关系有关。仅凭家人的经验回忆，无法确定每条路径承担了多少作用。

这一点对商业承诺尤其重要。某个方案声称“胎内学习提高了后天能力”，却可能同时改变父母出生后的陪伴和观察。即使后续出现差别，也不能把全部差别归到胎内刺激。反过来，即使某项生理辨别结果很可靠，也不能直接推出照护方案有整体收益。生理作用、活动收益和家庭负担需要分别评价。

一种更严谨的前瞻记录应当保存不同阶段的实际条件，而不是只给家庭贴“接受过”与“未接受过”的标签。前期材料、后期继续接触、成人期待、后续互动机会，应当尽可能区分。不能全部测量时，就公开哪些混杂仍然存在。研究目标是识别可支持的结论，而不是让一个动人的母胎故事承担所有因果责任。

十一、三界连续性不是三个成熟心灵的搬家

在本书理论中，可以把出生前的三界问题理解为尚在形成的不同关系侧面，而不是胎内已经有完整的现实、理念和自我世界。现实侧关注实际身体与可及刺激的联系理念侧的最低研究入口是某些辨别与预期是否能够保存；自我侧则涉及属于这一生命的身体活动与感受问题。后两项不能因为我们有理论语言就被假定已可直接读取。

出生后的组织不是将三个既成世界整体迁出。新的呼吸、直接接触、喂养与照护关系改变了局部活动如何连接，原有经验可能只提供某些进入条件。一个前期可辨别的节律，可以在出生后不同关系中获得新的作用；同一种先前活动，也可能因为身体与环境条件变化而需要重新组织。连续性保留历史，转换性则解释为何历史不等于现成能力。

由此，三方程可以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 D 的实际通道和 E 的关系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哪些 S 仍然保持，哪些 S 改变？若某种辨别跨转换保持，研究相应承载；若失效，检查条件改变，而不是认定婴儿丢失了一个完整世界。这里的方程帮助分解研究任务，不替代关于感觉、生理与活动的具体证据。

十二、有限证据为什么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对产前学习保持边界，不等于否定它的重要性。它至少阻止两种简单叙事：出生以前只有机械生长，或出生以后的一切差异都必须从当下养育寻找原因。一个婴儿带着身体与互动史来到新的生活，这个判断能够帮助我们更认真地理解他的起点，而不是要求每个孩子从同一张空白表格出发。

积极意义也不要求增加孕妇任务。研究显示某种前期经验可能被保留，并不推出母亲有义务全天进行刺激优化。增加一项活动会占用休息、注意与情绪资源，还可能

伴随不必要压力。关于是否适宜及怎样安排的判断，必须另有健康与安全依据，不能由“经验有作用”直接推导“经验越多越好”。

更适合发生学的实践方向，是把知识用于减少误解。孩子出生后的差异不必马上被当作照护失败；前期熟悉经验也不应被当作必须终身维持的处方。照护者可以在现实关系中观察哪些连接有帮助，哪些需要改变，专业服务则处理需要评估的身体与发展问题。过去为理解提供线索，不为责备提供无限证据。

婴儿符号的出生前历史因此应是一段开放的研究，而不是人格起源的预言。它说明一个生命早已参与变化，却仍需要通过出生后的生活获得新的组织。承认这种早期参与，才可能同时尊重连续性、保留未知，并让后天支持真正对准当前发生的关系。

十三、三方程在跨期研究中的位置

跨出生研究可以从出生后 S 进入，追问此前 D 与 E 有哪些可证据化联系；也可以从明确的前期条件进入，追踪它怎样经由后续活动显示影响。但两条路径都不能省略中间转换。三方程帮助安排问题，不能把缺失的记录自动补成函数。

“旧纠缠如何被新差异重组”是本章的核心。原先的感觉条件不再以同样方式存在，新的呼吸、直接接触与照护渠道同时进入。某些前期组织成为起点，某些需要重建，还有些未能继续。研究这些不同结果，比笼统宣称“胎内已有一切”或“出生后一切从零”都更有内容。

出生前不是空白，出生后也不是预写剧本的执行。母胎史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个生命已经从哪里来，以及当前支持可以在哪些实际关系上发挥作用。它应当打开后续研究，而不应提前替一个孩子写完未来。

07

第 7 章

宫内三界和出生后三界何以不同

返回目录

一、不是三个世界换了一个地址

若把胎内生活想成一间小房间，把出生想成搬入一间大房间，就会遗漏关系结构的转换。改变的不只是空间大小，而是身体维持、感觉可达性、活动边界以及与照护者联系的方式。前期已经形成的组织进入新的条件，需要被重新承接。

在本书的理论范围内，宫内三界与出生后三界既连续又不同。这里的“不同”不指从三个不完整盒子变成三个完整盒子，而指同一生命与世界相互规定的方式发生变化。成熟的语言理念与反思性自我，并没有因为身体离开宫内便一次性出现。

本章将三界用作问题坐标，而不是直接可见的器官。其价值要由能否帮助区别现实关系、经验预期与自我相关组织来判断，不能由词语本身宣告。具体指标的建立将在第 47 章详细讨论。

二、现实界：行动条件如何重新排列

出生前后，重力并不是从无到有。变化的是身体所处介质、支撑、边界与感觉条件；不能把“第一次感受新的承重方式”误写成“第一次遇到重力”。这类小区别决定哲学描述是否尊重实际条件。

同样，声音不再通过完全相同的路径到达，接触也由原来的连续包围转为多种不同表面和照护姿势。进食与身体调节进入新的组织方式。对具体生理过程，仍应由新生儿科学说明；本书关注的是这些变化怎样重组能够发生的 SIO，而不是用“现实界打开”替代医学机制。[N30]

现实界还包含他人行动的可达性。照护者能够直接观察、触摸、回应，婴儿的动作也能更直接改变他们的安排。所谓环境扩大，不是外界刺激总量增加这么简单，而是可发生的关系种类、可进入的行动路径及其约束发生变化。

三、理念界：连续的不是一套成熟概念

出生前后的经验研究可以发现辨别、熟悉性或偏好，但从这些现象推断理念组织时，应清楚区分最低限度的规律保留与成人式概念。一个生命对某种重复条件产生差异反应，不等于已经拥有能用语言表述的“规律”。

本书采用“可预期关系的组织”作为研究早期理念侧面的入口。它询问过去的重复是否在后来活动中形成可观察的差别，而不要求婴儿先说出理由。例如，某种活动开端与后续接触经常相连，孩子是否逐渐改变参与方式，可以成为问题；具体因果仍需排除疲劳、习惯化等替代解释。

这个入口不把所有记忆都直接命名为理念世界实体。它只是让哲学与发展研究拥有一个有限接口：哪些经验可以被保留，怎样被调用，怎样在新的差异中修正。不同理论可能对同一现象给出不同概念，本书应通过具体研究比较，而不是借名称占有现象。

四、自我界：不能从成人代言推导胎儿体验

母亲说“宝宝喜欢这个”，可以是亲密的表达，也可以是对活动的试探性解释；它不等同于直接读取胎儿或新生儿体验。自我世界的重要性，恰在于体验不能由旁观者完全代替，因此研究必须承认推断的边界。

出生后，婴儿逐渐以哭泣、转头、接近、退开等方式参与关系。在一个构造场景中，成人继续某个活动，孩子改变姿势，成人因此停下。我们可以记录双方行为的相互影响，尚不能单凭一次转头证明孩子已经具有成人意义的拒绝意图。但不能确定成熟意图，也不应成为忽略反馈的理由。

早期的独特“我”在本书中是存在与组织意义的判断；自我界的具体体验和反思发展，需要分层研究。这样的区分既避免把婴儿当成毫无自身侧面的客体，也避免把成人内心全部投射进去。

五、同一个事件如何同时牵动三界

设想第一次在新的抱姿中接触熟悉照护者。现实关系包括身体支撑、声音和接触；早期预期研究关注这段序列是否与此前经验建立联系；自我侧则提出舒适、不适与自身活动怎样参与的问题。三方面不是三个互不相关的原因，而是同一次活动可分辨的组织面。

如果姿势改变后孩子的活动更可持续，不能简单说“现实界导致自我界”，就算完成解释。需要说明身体条件怎样改变可行动性，后者怎样改变反馈，反馈又怎样修改照护者行动。三界联结必须通过具体关系体现，不能靠三个箭头完成。

还有一个重要反向作用：成人对孩子的理念可能先变化，随后调整现实安排；新的安排再改变孩子能够经历的活动。这里有两个不同主体的三界，不应把成人的理念界和婴儿的理念界写成同一个容器。共享事件不等于共享全部意义。

六、同一种声音，可以进入不同的三界关系

用一个作者构造的声音场景作比较。出生前，一段声音通过当时的身体与传播条件进入活动；出生后，相似声音可能伴随可见面孔、抱起和直接照护。即使声音形式被认为相似，参与组织的关系也不再相同。

现实侧不只是多了一幅图像，而是声音与身体接触、姿势和活动结果形成了新联系。理念侧的研究问题也随之变化：先前经验是否参与辨别，新的关系怎样形成预期自我侧则不能由“认出来了”直接概括，还需要考察该活动对孩子的调节与参与意味着什么。

这一比较不预先宣布胎儿已经具有何种成熟体验。它说明出生前后的连续性可以发生在部分关系上，而整体组织同时改变。若把连续理解成原样保存，就会漏掉新的耦合；若把差别理解成从零开始，又会漏掉实际保留的历史。

七、三界分析为何不能自动代替机制解释

我们可以把一次活动分别写成现实条件改变、预期改变与自我感改变，但三句同时成立仍不等于解释了它们如何相连。必须指出具体中介：某种行动怎样产生新的反馈，反馈怎样参与下一次行动，成人调整又怎样进入这一过程。

因此，三界分析的最低要求不是每段话出现三个名称，而是至少给出一条可追踪的跨侧面关系。对于资料不足的部分，可以保留空缺。研究者不应为了结构对称，替婴儿填上未经观察的情绪、目的和概念。

这一要求也帮助处理不同步。身体能够完成某项活动，不意味着已能表征它；某种稳定预期存在，也不意味着可以主动调节全部行动。三界纠缠允许发展速度不同，真正需要解释的是差别怎样影响共同组织，而不是强迫每个时刻达到整齐一致。

八、三界不同步，不等于互相分离

某些局部组织可能较快稳定，另一些长期保持开放。孩子已经能在一种活动中协调动作，不代表同样成熟的语言表征也同时出现。三界纠缠不是成熟度相同，更不是每出现一项技能就必须在三界各找到一个对称结果。

研究上可以允许非对称记录：现实行动变化证据较充分，关于预期的判断较弱，关于体验则只能保留谨慎推断。理论整齐不能成为补齐证据的理由。保留这种不对称才可能知道下一步研究缺在哪里。

宫内与出生后的区别，最终应被理解为关系配置的历史转换。连续性使新发生有起点，转换性使过去不能原样支配现在。婴儿的三界不是一次完成的世界建筑，而是随着实际活动持续分化、连接与重组的存在过程。

08

第 8 章

出生：连续性与断裂性同时成立

返回目录

一、一个时刻，几种不同的时间

出生被记为一个时刻，但相关过程并不都按这个时刻同步启动。生命史此前已经展开，社会身份可以在出生前就被期待，直接照护则在出生后形成新的活动组织。把这些时间折叠成一个零点，会让许多连续关系消失。

另一方面，只强调“早已有历史”也可能低估出生的转换。生命维持与感觉活动进入新的条件，照护责任被重新分配，家庭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接触这个孩子。连续不等于没有断裂，断裂也不等于此前全部归零。

本章把出生作为一种结构转换事件来分析。它不是所有存在的绝对起点，却能够改变后续发生的通道和约束。这个概念服务于历史解释，不用于评价某种分娩经历优于另一种，也不推导任何个人的长期预后。

二、怎样理解“结构转换”

在一个构造性的过程描述中，家庭此前主要通过身体感受、检查信息和想象接近胎儿；出生后，抱持、喂养、观察与回应成为新的实际任务。原先的期待没有消失，但它必须面对一个会以自身活动改变安排的生命。

结构转换至少包括三种变化：关系的承载渠道改变，谁能够直接参与改变，以及活动之间的次序与依赖改变。它们未必同时发生，也不必只有一种路径。例如，某些孩子需要医疗支持，家庭的接触方式就要与专业照护相协调，不能按单一家庭故事来评判。

因此，出生的意义不能由“第一次母婴拥抱”独占。直接接触是重要议题，但某个家庭没有经历理想化场景，不意味着关系已经被永久损坏。适宜照护需要结合孩子与母亲的实际情况持续建立，不能从一个仪式性瞬间决定一生。[G07][N30]

三、保存、转译与新建

为了把结构转换讲清楚，本书区分保存、转译、新建三种分析动作。保存，是某些既有组织仍在后续条件中起作用；转译，是同一关系功能通过不同渠道或形式继续新建，则是过去没有的活动机会开始出现。三者是研究用语，不是彼此排斥的三种生理模块。

例如，前期熟悉性可能保存；照护者在新的直接互动中找到承接熟悉性的方式，可以被研究为转译；孩子通过自身声音改变成人行动，则打开此前不同的共同活动。一个现场可以同时包含三者，也可能存在无法继续的组织。

这种分析比“出生后更丰富”更精确。丰富如果只是指刺激更多，并不告诉我们哪些关系能够被孩子进入。研究要问新通道怎样与既有条件连接，是否造成冲突，是否需要缓慢调整。更多不自动意味着更好，转换也不自动意味着进步。

四、一次抱起为什么不是同一个动作的重复

设想两次外形相似的抱起。第一次发生在孩子正在进入新的活动状态时，第二次发生在一段照护后；成人动作接近，孩子的回应却不同。若只把“抱起”编码成同一种输入，就可能把变化全部归为孩子的脾气。

从 SDE 分析看，动作名相同，不等于 D 在同一 E 中展开；先前序列与当下关系改变，S 也可能不同。研究因此需要保留动作之前与之后的条件，而不是只记录动作类别。这里没有必要立即诊断孩子的心理，更没有理由要求家长从一次失败中反省全部爱意。

这个构造例子说明，出生后照护是一项需要持续学习的共同活动。成人的经验不是毫无价值，却要与孩子的反馈相遇；孩子也不是任意反应，而是在自身条件中参与关系逐步成形，往往正发生在原有预想不得不被修改的地方。

五、结构转换与因果解释之间还有距离

一种宏观事件包含许多同时变化的因素，因此“出生后出现某种行为”不能直接证明哪一项改变造成它。成熟、身体状态、直接感觉经验及照护安排可能共同变化。结构描述可以提出问题，因果研究还需要更严格的比较。

本书不主张通过危险或不合伦理的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可以利用既有资料、适宜的自然差异和专业允许的低风险观察，明确每种设计能回答什么。不能为了证明“互动重要”，拿缺乏必要照护作为新制造的对照。

研究还应区分个体过程与群体结果。某个孩子的连续记录有助于理解他，但未必可以概括全部儿童；某种群体关联具有公共卫生意义，也未必能给出这个孩子的确定未来。发生学需要同时容纳这两种尺度。

六、转换的单位，应当小到足以追踪

出生是一项重大事件，但“出生改变了一切”过于宽泛。为了研究，可以选择一个具体关系作为桥梁：某种熟悉声音怎样进入新的照护活动，某种身体支撑怎样在新的接触方式中重新建立。关系选得足够清楚，才有可能分辨保存与重建。

以支撑为例，不能只比较“出生前被支持、出生后也被支持”。两种支持的介质、活动方式与参与者不同。研究者应说明哪些身体约束被改变，哪些调节被成人参与承接，以及孩子的反应怎样影响随后的支持。连续不是两个标签相同，而是具体组织存在可以追溯的连接。

这种分析不要求产后所有关系立即稳定。某些活动需要调整，某些家庭需要更多专业与社会支持。一个过渡期的困难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孩子尚未成为完整符号；已经存在的生命可以经历局部组织的不稳定。

七、出生叙事与出生事件，各有不同后果

家庭会讲述孩子怎样来到世界。这些故事可能成为以后身份与亲情的重要材料，但叙事形成的时间、目的与出生现场不同。有人把过程讲成勇敢，有人讲成险阻，有人希望淡化痛苦。研究者需要尊重叙事，同时区分它和当时能够确认的事件。

故事可能影响后续照护。例如家人不断强调“他很脆弱”，便可能改变活动安排；持续强调“他什么都能克服”，也可能遮蔽实际支持需要。这些是本书提出的可能路径，不是对任何分娩经历作人格预测。

出生符号因而有两条相连的历史：生命组织的转换，及他人随后如何讲述这次转换。后一条可以回写前者之后的生活，却不能倒过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把这两条分开，我们才能既研究存在，又研究表征的实际力量。

八、零点叙事为什么具有诱惑

“从出生开始，一切可以重新安排”让成人感到有控制力；“出生以前，一切已经决定”则提供一种看似清楚的解释。两者都减少了复杂性，却以不同方式取消后续学习。前者忽略来处，后者忽略改变。

SDE 的结构转换观点要求保留更困难的中间位置：既承认已经发生，也承认尚未规定；既尊重身体条件，也寻找现实中可改变的支持。它不是一句折中的口号，而应体现在记录与行动上：哪些历史需要了解，哪些安排可以调整，哪些问题必须交由专业判断，哪些结论仍然未知。

出生因而可以同时是一个明确日期和一段开放过程。它让一个已有历史的生命进入新的关系组织，也让家庭在实际回应中成为新的家庭。婴儿不是被从一个世界搬进另一个固定世界；新的共同生活，正从这场转换中逐渐形成。

09

第 9 章

带着差异出生：早产、双胎与先天障碍

返回目录

一、同一天出生，不意味着从同一处出发

设想一对同日出生的双胞胎，家庭为他们准备了相似的床、衣服和玩具。一个孩子能够较顺利地进入某项日常活动，另一个需要更充分的身体支持。成人若说“我已经给了同样的条件”，这句话可能准确描述物品分配，却没有描述孩子实际能够参与什么。

这个作者构造的场景将平等与相同分开。同样的物体、相同的时长，并不自动形成相同的 SIO；条件是否适宜，要看身体、材料与活动怎样共同工作。差异不是后来才加在统一婴儿模板上的装饰，它从一开始就参与后续通道的形成。

双胎也不是将所有遗传细节绝对固定的自然实验。关于同卵双胎的基因组研究已经指出，早期发育中可以存在遗传差异；这一事实只用于限制“完全相同”的表述，不能直接推出具体人格差别。[R27]更重要的是，遗传接近也不等于两份实际经历相同。

二、早产问题把两种时间分开

日历时间以出生日期起算，发展过程却还涉及不同的身体条件与经历。早产相关的评估需要专业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处理；本书不自行给出校正年龄算法或临床判定。这里要提出的是理论问题：不同的时间指标用于回答不同问题，不能把一张出生后日龄表当作全部发生史。

一个需要专业照护的孩子，其活动机会可能由治疗安排、身体耐受、家庭参与及病区条件共同限定。把这些条件只归为个人能力，就会遗漏服务安排；把所有差别都

归为环境，又会忽略真实生理需要。SDE 要求的是两者的关系，而不是在二者之间选边。

WHO 关于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婴儿照护的建议把适当的临床支持和家庭参与放进照护安排。[B06]本书引用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专业支持与关系参与可以共同讨论，而不是依据发生学自行改变医疗方案，或要求所有家庭复制同一个接触方式。

三、一项身体差异怎样改变整组关系

设想孩子伸手范围受到限制。首先，某个玩具难以接近；其次，成人可能更频繁地代为拿取；再次，孩子表达选择的机会可能改变；久而久之，家庭可能形成“他不喜欢玩”的解释。这里有身体限制、成人行动、参与机会和表征回写四个层次。

其中没有一步是必然的。成人也可以在适当专业建议下调整位置，使孩子用现有能力参与；孩子可能通过目光或其他动作表达选择；家人也可能改变自己对“玩”的判断。因此，身体差异是一项真实条件，却不是已经完成的全部符号规定性。

研究的关键是寻找可改变环节。例如，同样需要持续身体支持，玩具位置是否仍可调整？成人是否把等待误认为没有兴趣？一次活动中，选择权是否完全被替代？这些问题既不否认障碍，也不等待障碍消失后才允许孩子具有丰富生活。

四、支持不是在完整个体之外添加的补丁

日常说法常把辅助看成“正常能力缺少后才加的东西”。然而，对任何婴儿而言，安全支撑、合适材料与成人回应本来就参与活动成立。某些孩子所需支持更加明显，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的能力才具有关系性。

这并非消除一般支持与专业辅助之间的差别，而是改变价值排序。一个孩子借助合适装置完成选择，与另一个孩子用手完成选择，都需要研究实际能动参与；不能预先把有辅助者的行动视为较不真实。具体效果仍要看工具是否合适、负担是否可接受使用是否受专业指导。[G11]

相应地，本书的“独立性”不会被定义为无需一切支持。研究局部符号时，应比较孩子是否能够主动接续、调整和再次参与，而非把辅助用品拆掉看他还能不能做到撤去构成性条件，往往是在制造另一个任务。

五、差异也可能来自成人给出的不同未来

成人对两名孩子的预期可能很早就分开：一个被鼓励探索，另一个被持续保护。适当保护可能必要，但若保护被理解为不再提供任何探索，就会把身体限制扩大为社会性限制。这里的关键并非指责家长，而是辨认他们是否得到足够的信息与服务支持。

同样，过度乐观也会造成压力。宣称只要亲情充足就能克服一切，会让家庭不断追逐没有根据的方案，并在结果不如预期时自责。积极发生不是无限可塑性的承诺，而是在真实边界内持续寻找有益的参与条件。

本书建议把目标从“赶上另一个孩子”转为可观察的改善：这个活动现在是否更可进入，孩子能否影响它的下一步，支持是否可持续，有没有减少不必要的不适。这不是取消群体标准和专业筛查，而是为标准增加一个不能缺少的个体维度。

六、“相同条件”必须问相同到哪一层

双胞胎生活在同一间屋子，可以说明共享某些空间条件；由同一位成人照护，可以说明共享照护者；但同一时刻的身体状态、被回应的次序和可进入的活动，并不因此完全相同。共享背景不等于共享全部具体经历。

这也不意味着所有差异都来自成人不公平。两个孩子当前的需要不同，适宜支持就可能不同。研究应区分必要的差异化照护与缺少根据的标签化安排；前者可能扩大参与，后者可能不必要地缩小机会。单纯要求每件事完全一样，反而可能忽略身体条件。

因此，对双胎的发生分析不应只比较“谁获得更多”。还应比较获得的内容是否可及、时机是否合适、孩子能否影响后续活动，以及不同路径最终承接了什么实际需要。相同数量不能自动代表相同意义，差异数量也不能直接证明谁受到亏待。

七、支持改变的是可参与关系，不是抹去既有事实

在构造案例中，一名运动受限的孩子经过适宜摆放获得接触物体的机会。支持没有使全部身体差异消失，却改变了物体、姿势、成人协助与孩子活动的关系。把这个结果只记成“依然需要帮助”，会漏掉已经发生的新参与。

反过来，若辅助安排没有达到预期，也不能只凭理论乐观断言孩子尚未努力。需要检查支持是否匹配，目标是否合理，记录是否充分，以及当前是否存在无法改变的限制。对可能性的重视，应当与接受边界同时成立。

这使个体差异成为具体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一句“每个人都不同”的终点。我们要知道哪些差异需要保护，哪些障碍可以通过支持减轻，哪些评价来自不适合的标准以及哪些问题仍须交由专业研究与照护处理。

八、差异不是排名，而是研究入口

在三方程中，先天条件并不是独立决定 S 的唯一输入。它通过实际纠缠参与 D，后续显露又影响家庭怎样继续组织关系。若一项旧解释使活动机会持续缩小，S 与 E 的张力便可能提示，需要先改变解释及安排，而不只是要求孩子更努力。

第 31—35 章将把双胎、可及行动、感官差异与长期照护分别展开。本章先确立一个立场：每个婴儿都带着条件进入后续发生；条件不同，值得提供的支持也可能不同承认差异的目的，不是提前认定生命价值，而是更准确地发现这个独特“我”能够怎样继续参与。

10

第 10 章

生命条件如何成为后续符号历史

返回目录

一、从“受过什么影响”到“影响怎样继续”

一个孩子曾经遇到某种声音、某种姿势、某次照护变化，并不足以证明这些经历在今天仍然发挥作用。历史研究需要说明事件怎样被承接。否则，无论后来出现什么结果，成人都可以在过去找到一个似乎合理的故事。

设想一个家庭发现孩子在某种活动开端会安静观察。家人猜测这来自很早以前的一段熟悉照护。要把猜测推进为研究，至少应问：这种联系是否在后来重复出现，是否只存在于某个材料或照护者那里，有无其他同样合理的解释？故事的连贯性不能代替关系的可追踪性。

本章将“条件—事件—保留—再进入”作为一个工作链条。条件决定某次活动的可能范围，事件是实际发生的过程，保留指其中部分关系在后来仍具作用，再进入则指这些关系怎样参与新的活动。这不是四个截然分离的阶段，而是检查历史解释是否跳步的四个问题。

二、同一结果可以有不同来处

两名孩子都能完成一次拿取。一名孩子经过多次不同材料的探索，另一名主要在成人固定提示下完成。当天的成功次数可以相同，但其可迁移条件未必相同。这个构造例子不证明哪种经历必然更好，却说明仅用结果不能还原形成过程。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结果相似、路径不同”。它要求发展记录保存成功之外的过程：谁发起、成人如何介入、孩子遇到变化时怎样调整。若后来换材料时出现差异，研究才可能检查此前路径是否提供了额外解释。

反方向也成立：相似的早期条件，可以在不同后续关系中形成不同结果。一次成功可能被持续重复，也可能因为生活安排变化而没有继续；某次受阻可能促使支持调整，也可能被解释为能力不足。历史不只是事件序列，而是事件被怎样接续。

三、路径依赖不是命运依赖

过去会改变后来哪些行动更容易进入，这可以构成路径依赖；但路径依赖不必意味着所有后续已经锁定。新的支持、身体变化与其他关系，可能改变先前倾向的作用范围。需要研究的是改变的成本、机会与条件，而不是宣称随时都能无限重来。

在一个构造情境中，家庭长期只有一种安抚安排。后来照护者轮换，原安排难以延续。若不同成人共同观察孩子怎样参与，并建立可承接的活动次序，新的组织可能逐步出现。若仅要求新照护者机械模仿原动作，外形接近也未必承接原功能。

由此，本书把历史稳定分成两种值得比较的可能：一种主要依赖固定表面线索，另一种可以在适当变化中维持关系功能。哪一种更适合当前孩子，不能预先用优劣决定；某些时期固定线索本身就是重要支持。研究应说明条件，而不是把所有依赖都当作需要立刻消除的缺点。

四、三条不同的改进路径

从 S 进入，可以先发现一次显露与过去不同，继而检查 E，再调整 D。例如孩子原来能参与的游戏突然不再继续，先了解身体状态、材料和活动安排，而不是直接强化训练。这条路径的价值是以反馈修正解释。

从 E 进入，可以先改善明确的参与条件，再观察 D 与 S。例如将适合的物体放到可达位置，保留必要支撑，观察孩子是否开始新的尝试。这里的改进不以宣称孩子已有某种潜能为前提，而以实际活动能否发生为依据。

从 D 进入，则可以在安全范围内改变活动的顺序或节奏，再观察其是否重新组织关系。例如减少连续提示，保留等待和回应的机会。这不等于一律让成人少参与；有的孩子恰恰需要更明确的支持。六路径提供研究入口，不提供无条件的家庭处方。[S05]

五、一份有历史感的记录应该留下什么

不需要把家庭生活全部量化。一个有用的片段，可以记录活动前的重要条件、实际动作序列、成人解释、随后调整及结果。最重要的不是写得多，而是分清看见了什么与猜测了什么。

例如“孩子转头，成人停下，片刻后孩子再次接近”是行为序列；“孩子希望控制母亲”则是解释。前者可以作为后续比较的基础，后者需要其他证据。记录者可以保留解释，但应允许下一次观察推翻它。

还需要记下没有如预期发生的情况。若只保存成功故事，任何方法都会显得有效。一个原来可用的安排何时失效，往往比第十次成功更能揭示边界。失败记录的目的不是给孩子或成人记过，而是防止同一个无效做法被不断重复。

六、因果比较需要抵抗事后聪明

当研究者已经知道结果，再从大量历史中挑选解释线索，很容易形成漂亮却无法重复的故事。比较应尽可能预先确定问题、记录范围与主要结果，并将后来形成的新解释明确标成探索。第 49、50 章将进一步说明纵向设计和失败判据。

还应警惕共同原因。照护者行为与孩子状态同时变化，可能来自活动任务、生活压力或未记录的身体条件。先后顺序可以支持追踪，却不能单独证明因果。三方程中的互构要求，并不会让这一困难自动消失。

最强的历史研究不一定保存最多信息，而是知道哪些信息与问题相关，哪些缺口限制判断，以及下一次怎样获得更有区分力的观察。对个体而言，能帮助改善实际支持的有限记录，常比庞大而无法解释的数据更有价值。

七、从一次差异到一段历史，中间至少有三个关节

第一个关节是承接：变化是否实际进入婴儿与照护者的活动，而不只是存在于外部安排。第二个关节是保留：变化是否改变某种后续可用的组织。第三个关节是再进入：在新的条件下，这种组织怎样参与活动。三者是本书提出的分析步骤，不是预设的神经机制。

一件新材料放进房间，却从未进入孩子活动，不能直接计作学习经历；孩子有过一次接触，也不能自动视作稳定经验；某种组织已经形成，却暂时没有被调用，也不

意味着它已经消失。分开三个关节，可以减少从“曾经发生”跳到“长期决定”的推断。

它们也帮助定位支持。无法进入活动时，首先检查可及条件；不能保留可持续组织时，检查活动是否适宜及支持是否连贯；不能在新情境重新参与时，检查条件改变与迁移困难。这个分析不能代替诊断，但比把所有困难归结为“能力不足”更具体。

八、反事实要帮助提问，而不是伪造另一段人生

研究者常问：如果当时采取另一种照护，孩子会怎样？这个问题有价值，却不能通过想象直接得到答案。我们只观察到实际发生的一条路径，另一条需要适当比较设计、明确假设与不确定性。

可以用反事实检查机制是否清楚。例如，我们认为交接方式影响活动，就应说明改变交接的什么部分，预期影响什么结果，以及为什么不是同时变化的其他条件造成若这些内容无法说清，所谓因果故事可能只是在事后连接两个事件。

反事实也不应变成家长无尽的后悔计算。历史研究的实践方向，是识别现在仍可改善的关系，而不是要求家庭证明每一个过去选择都最优。一种允许过去影响、又允许新条件重组的发生论，才可能把理解转化为行动，而不是转化为永久自责。

九、把一个长期解释拆成可以逐段失败的连接

> “早期经历影响后来发展”过于宽泛，几乎任何结果都可以被纳入。一个更有内容的解释必须提出中间连接：某种安排怎样进入婴儿的活动，活动怎样改变当下组织，组织怎样被保存，保存又怎样影响后来的选择或参与。每一段都可能成立，也可能中断。把链条分开，才能找到真正值得支持的环节。

设想一个孩子在新材料前经常等待成人。成人开始保留更多由孩子发起的步骤，后来孩子更常主动接近。这个构造例不能直接证明“少帮助形成自主性”。需要至少检查三个变化：成人是否真的减少了替代而非减少必要支持；孩子是否利用了留下的步骤；这种利用是否在不同合宜情境中继续。只看到起点和终点，无法决定中间是哪一条路径起作用。

还可能存在另一条链：成人改变以后更专注观察，因而更早发现孩子已经有的主动行为。记录中的主动性上升，有一部分可能来自观察敏感度，而非孩子实际发生同

等幅度的改变。表征变化本身也很重要，但不应冒充活动变化。记录者、活动组织与孩子都可能改变，研究需要把这三种改变分别处理。

十、保留不只发生在孩子身体内部

第一类保留，是孩子的辨别和行动关系发生改变，使下一次能够更快或以不同方式进入。第二类保留，是成人记住某种有效配合，并在后续活动中重新提供。第三类保留，是空间与材料被重新安排，使某种关系较容易重复。这三类是本书的分析划分不是互不相干的存储器。

一个孩子最初需要成人把物体移到适宜高度，后来成人固定了可及摆放位置。此后活动容易开展，不一定说明全部改变都已经“内化”到孩子身上；环境安排本身仍在承重。若搬到另一场所，活动可能暂时中断。此时不能轻率归为孩子退步，也不能只要求他加强练习。应先检查保留组织的地点是否改变。

反过来，环境恢复原样以后，孩子可能通过新的方式继续活动。这表明关系保留未必只依赖原布置，一部分组织已经可以由其他条件承接。研究应追踪保留方式怎样转移，而不是一开始就把每项成果分配给内部能力或外部环境。高阶符号的历史可以分布在身体、关系和实践中，同时仍由这个具体生命持续经历后果。

这种分布不是把孩子溶解在环境里。空间布置可以帮助参与，却不能代替孩子接触、选择和承受活动；成人经验可以提供支持，却不能成为孩子感受的替身。分布式承接说明原因和条件跨越个体边界，独特的生命承接则说明这些条件不会把两个婴儿合并成同一个“我”。

十一、没有表现，不等于没有保留

一项组织没有在新情境中出现，至少可能有三种原因：相关组织尚未建立，已经建立但缺少可调用条件，或者曾经建立却发生了明显改变。仅凭一次未出现，无法在三者中选择。研究可以比较不同合宜条件下的恢复，但不能为了区分原因而持续施压要求孩子反复证明自己。

一个构造性检验是恢复原来适宜的提示或支撑，观察活动是否重新进入。若能够迅速接续，支持“当前调用条件不同”的解释；若仍然不能接续，问题需要进一步评

估。这个检验也并非决定性，因为熟悉条件本身可能重新帮助建立组织。因此，应结合时间过程和多次自然观察，而不是把一次恢复当作对记忆状态的直接读取。

同样，新的成功不总等于形成了新的结构。有时只是之前不合适的任务被改好，原有组织终于获得显露机会。改善表现条件与促进能力形成都值得做，但二者的机制不同。前者应让我们改进环境，后者还要求追踪保持与迁移；把两者混写，会使支持方案过度宣传自身的训练效果。

十二、中介变量不是把两端相关串起来就成立

研究者可以提出“照护调整先改善参与，参与再促进后续迁移”的候选中介链。即使三个变量按时间顺序相关，也还不能自动说明参与就是作用机制。孩子的身体状态或家庭资源可能同时影响参与与后续表现，记录中未包含的条件也可能改变成人的调整。

为使中介解释更可靠，应明确哪一环可以被安全改变，哪一环只能观察，以及哪些共同原因能够记录。若改变照护安排后，参与没有变化，原先假设的中间路径就缺少支持；若参与变化但迁移没有变化，说明当前参与增多未必足以带来预期的后续作用。每个断点都应被报告，而不是只给成功案例画出完整箭头。

还要保留绕行路径。某项安排可能没有增加操作次数，却改善了孩子表达退出的机会；它的价值不必通过原先预测的运动迁移实现。研究可以承认这种新发现，同时明确它不是对原假说的直接支持。让新价值有位置，与让旧预测承担失败，可以同时成立。

十三、用时间尺度辨认发生机制

几秒钟内的动作调整、一天中机会分配的变化、数周内组织的保持，属于不同时间尺度。一种安排可以立即让活动继续，却没有较长的保留；另一种安排短期看不出完成率变化，却逐渐改变了家庭交接。这些情形不应被单一的“有效或无效”覆盖。

机制叙述应当给出预期发生的尺度。若声称改变即时可达性，就需要观察当次活动；若声称形成稳定组织，就要有跨时段资料；若声称改变高阶“我”的后续可能，则需要说明它怎样进入其他关系。没有时间限定的长期价值最容易逃避检验，因为任何未见结果都可以推迟到更远未来。

同样，不同尺度之间并非自动累积。许多即时成功可以长期不迁移，因为每次都依赖同一个提示；一次偶然改变也可能通过持续的家庭安排获得长期后果，因为之后的机会分配变了。关键不在事件次数，而在某个尺度的变化是否实际成为下一尺度的条件。

十四、承接链如何改变家庭的提问

家庭不需要把每段生活转换成复杂模型。这个分析最实用的结果，是把“为什么他总是这样”改成几个更可行动的问题：活动在哪里难以进入，成人的解释在哪里没有变成适宜行动，已有组织为什么在这里用不上，以及哪些新安排确实改变了下一步这些问题既保留孩子差异，也避免把差异变成永久标签。

一份简短记录只需保存一个可复核的转折：原先怎样，改变了哪项条件，孩子实际怎样回应，之后是否继续。没有效果也值得保存，因为它能阻止无效做法反复增加若出现持续不适或发展担忧，这份记录可以帮助与专业人员沟通，而不承担自行诊断的任务。

所谓后天发生，不是成人随时有能力重写一切，也不是历史一旦形成便不再改变。它是在真实限制之内寻找能够接续、保留和重组的关系。承接链把这种立场变成具体工作：不给一个宏大的结论跳过中间环节，也不给一个失败的环节决定全部未来。

十五、把历史交还给开放的未来

第二编的结论不是“出生前决定出生后”，也不是“后天可以随意重写一切”。它提出的是一种有条件的连续发生：已有关系进入新活动，新活动选择性保留、改变或中断这些关系，再为后续形成新的起点。

婴儿符号的历史因而既不只是过去，也不只是记忆。它活在当前能怎样行动、别人怎样回应、什么机会能够进入之中。理解历史的积极意义，是找到真实可改变的条件；若历史解释只让家庭相信未来已经注定，它便没有完成发生学应有的工作。

第三编 / PART 03

自然环境中的婴儿：感觉、身体和世界

第 11—15 章

11 视觉、听觉、触觉：三条门还是三种纠缠

12 石头、阳光和重力能不能参与意义发生

13 手—眼—口—物：最早的行动网络

14 爬行、站立、行走：空间符号的重组

15 日常物体怎样成为婴儿的“世界”

11

第 11 章

视觉、听觉、触觉：三条门还是三种纠缠

返回目录

一、同一张脸，并不是三份相加的信息

照护者俯身，婴儿看见脸的移动，听见声音，感到手掌接触。若把这段构造场景拆为视觉输入、听觉输入和触觉输入，能够得到有用的局部描述，却还没有说明这些感觉怎样成为同一个活动。

声音可能引导注意，注意方向改变身体姿势，身体姿势又改变接触范围；接触后的变化继续影响发声和观看。感觉不是先各自完成工作，再把成品交给一个已存在的中心。研究必须进入感觉与行动相互选择、相互限制的过程。

底本《SDE 0—3 岁婴儿教育发生学》以视、听、触讨论感觉活动的重要性。[S08]本书沿用这一入口，但不将三通道视为感觉的全部，也不把它们与三界逐项配对。嗅觉、味觉、本体感觉等同样可能参与实际组织；选取三个入口是研究安排，不是对其他通道的取消。

二、共同出现与共同组织之间的距离

Bahrick 与 Lickliter 关于五个月婴儿节律辨别的实验比较了单通道与视听同步等条件，结果支持跨感官冗余和时间同步在特定学习任务中的作用。[B02]研究的重要启发是，感觉组合的关系安排可以影响辨别，不能只统计刺激数量。

这不意味着所有多通道刺激都优于单通道，也不意味着越同步、越密集越有益。实验涉及明确任务、材料与年龄范围。把它变成购买更多声光玩具的理由，恰好遗漏了研究所强调的组织条件。

本书据此提出一个研究性区分：共现只是多种变化同处一个窗口，共同组织则要求这些变化在注意、动作或调节中形成可追踪联系。一个不断闪烁又发声的物体可能引人注意，但注意时间长并不自动等于形成了更丰富的高阶符号。

三、身体在选择自己接收的世界

孩子转头以后，声源位置、可见区域和身体接触都改变；伸手以后，原本只能看见的表面成为可以触碰的对象。这些活动说明，感觉经验并非完全由外部预先提供。身体行动参与选择什么可以被感觉。

在一个构造的物体探索中，孩子先看一个软块，接着接触，再改变朝向。对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不只是他“看过、摸过”，而是接触是否改变了下一次观看，观看又是否改变了新的动作。相互影响的次序，才可能揭示特征纠缠怎样形成。

这也使照护支持更具体。合适的身体位置和材料可达性，可能比增加大量新物体更有研究价值。我们需要问一个对象能否被孩子实际进入，而不是环境中是否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刺激。丰富性不应只按成人眼中的物品种类计算。

四、三个尺度的结合

在短时间尺度上，可以观察一次动作里不同通道怎样协调；在日常重复尺度上，可以观察熟悉活动怎样形成稳定关系；在较长尺度上，则研究某种协调怎样改变其他活动的进入条件。这三个问题相关，却不能用同一个时间窗口回答。

例如，一次准确接触可以来自偶然；多次成功也可能仍依赖固定材料；能够在不同活动中调整感觉与动作，才提出进一步的迁移问题。把不同尺度压缩成“已经整合”，会使证据层级变得模糊。

三方程提供一个可用的追问次序：从显露的协调进入，检查差异序列和既有纠缠；从一次失配进入，观察哪项关系被重新组织。若只把视觉叫 S、听觉叫 D、触觉叫 E，则把理论误作器官分类，反而无法说明同一通道内部的完整发生。

五、感觉差异不等于世界价值的差等

对于听觉或视觉受限的婴儿，现实参与条件会不同，需要适当的专业支持。但“缺少一个通常通道”不能直接等同于“少了一个世界”，更不能据此对人格意义排序。不同条件下的组织，要在实际可用通道、支持与活动中研究。

同样，不能仅凭某一通道受限，就宣称另一通道必然异常敏锐。具体补偿与学习取决于多种条件，不能用温暖的励志故事代替观察。尊重不同路径，要求更精确而不是更浪漫的描述。

一个可研究的问题是：当活动形式改变时，哪些关系功能仍可被保留？例如，通过合适的视觉或触觉提示承接活动次序，孩子是否得到更清楚的参与机会？这里的评价重点不是模仿某个标准婴儿的外形表现，而是实际可及性与主动接续。

六、一张脸不是几个通道简单相加的总分

在作者构造的日常场景中，照护者靠近，孩子转头，随后出现触摸。声音、影像与身体接触既有不同来源，又因时间和活动位置而相关。若把每种刺激各自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可能仍无法说明孩子为何在某个时刻重新参与。

同样数量的声音和触摸，若次序、同步和回应方式不同，组成的活动也可能不同。这是本书的关系假说，不能仅凭一段生动描述认定其因果成立。有关跨感官研究表明在特定任务中，通道之间的关系值得单独研究；但从一个任务推广到全部亲情或全部自我发展，仍然需要更多论证。[B02]

这里的总体不是通道越多越好。某次活动可能需要突出一种可及联系，而让其他刺激暂时退居背景。身体经验的丰富性，不能被等同于同时打开所有输入。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差异能否被当前活动承接，并为后续参与形成关系。

七、缺少某一通道，为什么不等于缺少一个世界

三界与感官不是一一对应，因此听觉受限不意味着理念世界不存在，视觉受限也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不能形成。一个具体孩子能够通过什么身体条件进入活动，需要依据其实际情况研究。理论不能先把某个世界的门只交给一种感官，再用这道门是否开放决定其完整性。

但替代也不是简单换一个输入口。不同方式可能改变活动节奏、空间安排、成人注意和交流规则。支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可及关系，而不是假定另一通道可以无成本复制所有经验。这样的差异正是婴儿符号发生学需要保留的内容。

于是，跨感官纠缠的研究同时具有普遍问题和个别问题。普遍问题是不同活动条件怎样相互规定；个别问题是这个孩子通过哪些方式实际实现了这种规定。共同框架应帮助识别个别路径，而不是让每个孩子都被迫画出同一张感官连接图。

八、更多感觉并不保证看见更多差别

前文引用的节律研究显示，跨感觉同步可以支持某些共同特征的辨别。[B02]但是，不能从这里推出多通道必然优于单通道。Bahrick、Lickliter 与 Flom 关于物体运动朝向的研究发现，三个月和五个月婴儿在纯视觉条件下辨别了朝向变化，在同步视听条件下却没有显示相同结果；八个月婴儿在两种条件下都能辨别。另一个异步条件进一步限定了同步的作用。[M12]

这个反例改变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育儿推论：声光一起出现并非只是给同一内容增加信息量，也可能改变哪种信息首先被组织。对节律这类跨通道共同属性有利的安排未必同样有利于只由视觉提供的朝向区别。这里不是两项研究互相抵消，而是它们指向不同任务所选择的不同信息。

对 SDE 来说，这比“感官互相纠缠”的一般表述更具体。E 中的关系不是越密越好；某些关系取得优先地位，会改变 D 中哪些差异能够显露为 S。增加一条同步关系，可能使一种区别更清楚，同时使另一种区别不再成为当前活动的中心。纠缠因此包含选择与排除，而不只是把所有特征汇聚成总和。

九、信息存在、能够进入与受到使用的三个层次

一段视觉朝向信息可以客观存在于画面中，却未必成为当前注意和活动的依据。研究者从成人角度看见了它，不等于婴儿已经以同样方式使用它。同样，一段声音进入听觉通道，也不意味着其所有性质都得到相同加工。感觉输入清单只能告诉我们可能的材料，不能直接给出实际形成的关系。

可以构造一个简单的选择模型。某个活动同时包含节律与形状两个可区分维度，身体状态和既往经验使其中一个维度更容易影响下一步。加入与节律一致的声音后，节律的相对显著性上升，但形状没有物理消失。若研究只统计总体注视时间，会遗漏孩子主要在追踪哪个维度。这个模型不声称大脑按两个固定权重计算，而是说明“看得更久”与“辨别得更多”不能互相替代。

因此，一个机制研究至少需要相应的选择结果。若声称同步帮助建立事件整体，可以检验哪些时间关系被保留；若声称同步帮助区分对象，则应检验对象之间的相关差异。不能用前一个结果直接证明后一个主张。一个孩子长时间看着声光玩具，并不自动说明已经形成更丰富的物体概念或更稳定的自我。

十、选择性是组织的条件，也是偏差的来源

任何有限活动都不能同时以相同程度处理全部变化。选择性让某些关系获得连续性，也使另一些关系暂时退居背景。由此产生一种发生学上的双重效果：组织得以形成，但组织也会塑造后续更容易看见什么。熟悉线索可以帮助快速进入，也可能让新的差别被原有方式覆盖。

在作者构造的亲子场景中，成人每次都以相同节奏移动物体并发声，孩子逐渐追随节奏。后来成人改变物体的一项特征，仍保留强烈节奏，孩子没有显示出预期的辨别。成人可能以为孩子学习困难，另一种解释却是现有组织持续把活动带回节奏。需要比较的是信息选择，而不是立即增加刺激强度。

一个合宜的研究安排可以保留相同材料，在不同低负担条件中分别突出时间关系或对象关系，再观察孩子利用什么变化。任务不用于训练所有感觉同时达到最大表现而用于检查原来的结论究竟依赖哪项组织。若减弱非必要声响以后出现新的辨别，不能说声音有害；只能说明在该任务与该条件下，它与目标区别存在竞争。

这也提示养育中的适度。安静与丰富不是对立的道德标签。某项活动需要较清楚的单一关系，另一项活动则需要同步线索帮助进入。选择安排要依据当前任务、孩子状态与可及方式，而不依据“刺激越多越先进”的产品逻辑。理论提供的是观察维度不是替所有家庭规定同一感官配方。

十一、跨通道一致不等于已经知道同一个对象

同时出现的声音和影像，可以来自同一个事件，也可以只是偶然重合。婴儿能否把它们组织为一个可持续单位，涉及时间、空间与变化关系。单次同步只能提供线索更强的对象连续性需要面对遮挡、位置改变或形式变化等情形。研究不能从一次同步敏感性跳到成熟的对象概念。

本书提出一个逐层问题序列：首先，孩子是否对关系变化作出区别；其次，这种区别是否依赖某个固定材料；再次，不同变化是否能够被接到同一活动历史中。这三个问题可以用不同任务研究，不必在一个实验里强求全部回答。层次逐步建立，比把每项多感觉结果统称为整体世界形成更有解释力。

反例同样重要。如果孩子只在非常固定的时间配对中表现区别，稍作合宜变化便消失，结论应限定为局部关系敏感，而非否认其一切感知组织。若孩子在纯视觉条件下有效，也不意味着他脱离了其他感觉生活；只说明当前任务不需要那些额外线索。局部测量不能被扩展为三界中某一世界的存在与否。

十二、感觉缺失时，研究应从功能连接重新开始

当某条常见通道难以使用，不能把正常通道的全部任务原样搬到另一通道，再以是否相同完成来评价孩子。不同通道承接时间、空间和接触的方式不同，成人的提示与活动节奏也需要改变。这里的重点不是假定其他感觉必然补偿，而是识别哪种关系功能可以通过实际可及方式建立。

例如，一段共同活动原本依靠声音提示开始，可以考虑适宜的视觉或触觉线索；但改变线索以后，孩子是否能够注意到、是否知道如何接续、成人是否等待相应反馈都要重新观察。辅助改变的不只是输入形式，也包括双方行动的次序。必要的专业评估与语言支持不能被泛泛的多模态乐观代替。

符号整体性的积极含义由此变得更清楚：它不是要求所有感官信息同时齐备，而是研究可用条件怎样形成能够支持这个孩子的协调。整体可以通过不同路径实现，路径又各有真实限制。对婴儿独特性的尊重，不在于赞美所有差异，而在于让支持依据实际关系调整。

多感觉研究最终给发生学的贡献，是把“更多”改写为“怎样组织”。同样的视听触材料，可以因同步、竞争、历史与行动而形成不同结果。感官不是向一个既成自我运送碎片的管道，而是这个生命在选择、接触和重组中逐渐形成自身世界的活动条件。

十三、从感觉关联到高阶符号

一次视听同步的辨别结果，只能说明特定任务中的局部组织。要连接高阶“我”，还需研究这些组织怎样参与关系预期、情绪调节、身体行动及后续学习。不能从一个实验直接跳到整个自我已经形成。

然而，局部也并非无足轻重。婴儿在一次次活动中，把不同感觉与行动后果织成可继续的关系；新的关系又改变下一次他会接近、等待或回避什么。这就是本书所关注的发生方向：不是增加一个被动输入库，而是形成能够改变自身经验条件的活动组织。

感觉之门不只是外界走进婴儿的入口，也是婴儿以身体行动走向世界的路径。门的意义并不由开得多大决定，而由一个具体生命能否通过它进入可承接、可改变并可继续的关系来体现。

12

第 12 章

石头、阳光和重力能不能参与意义发生

返回目录

一、没有意图的对象，仍然可以改变活动

在作者构造的场景里，孩子伸手接近一处光影，自己的手移动以后，影子的形状也改变。他再次移动，新的变化发生。窗外的阳光没有教育意图，影子不会关爱，也不理解孩子，但它们已经参与一段实际的感觉—行动关系。

因此，“意义发生需要自然对象也具有意识”不是本书的要求。需要研究的是：对象的实际作用怎样进入婴儿的活动，怎样与其他经验相互规定，又怎样获得可再次参与的组织。自然物的无意识，并不构成它退出 SIO 的理由。

同时，物理作用不应被立即翻译为成熟意义。光落在皮肤上、感到明暗变化、根据变化调整动作、形成后来能够调用的预期，是不同的描述层次。研究可以连接它们却不能从第一层一步跳到最后一层。

二、“意义”至少有三种需要区分的用法

第一种用法是活动相关性：某种变化对这个生命的活动有什么实际后果。第二种是体验与价值关联：舒适、不适、接近或退开等问题如何进入经验。第三种是指称与表达：一个符号怎样被用来谈论、分类或共享。这是本书为避免混淆作的工作性区分并非声称所有意义理论都能被三分穷尽。

一块适宜的触摸材料可以参与活动相关性，却不必已经被命名；一个对象能够被成人叫出名字，也不意味着婴儿已经形成同样指称。自然互动并不等待第三种意义才开始，前两种也不能被第三种完全替代。

婴儿符号自身首先作为存在方式，同这些意义层次有关而不相同。一个孩子不是因为他已能用符号谈论世界，才取得自身的存在组织；也不是因为成人感到他有意义才从无意义变得有意义。意义发生包含实际关系，不能只属于旁观者的解释。

三、自然条件怎样产生差异，而不是自动授课

设想孩子触碰两种适合其活动的表面。一种较易推动，另一种不易移动；孩子改变手部动作，结果也改变。成人可以在一旁提供安全条件，不必每一次都用词语解释活动是否形成可保持的组织，需要观察后续，而不是由成人是否讲解决定。

这里的差异不是材料清单上的性质自行走进脑中。实际接触的力量、角度、身体支撑与此前活动，共同决定什么差别可以显露。对一个尚不能以同样方式接触的孩子研究需要考虑其他可及路径，而不能说材料已经提供，所以学习理应发生。

自然也会制约。某些对象无法被孩子的动作轻易改变，某些后果不能通过愿望取消。这种制约参与活动边界的形成，却不必被道德化成“自然在教他服从”。对象没有这样的人类目的，研究不需要借拟人化才能承认其作用。

四、无人讲解的活动也可能有社会历史

孩子独自看一件物体，旁边没有成人说话，这一时刻仍可能保留过去共同活动形成的方式；材料的位置、空间安全与时间安排，也往往由他人参与组织。因此，自然互动和社会互动不应被划成互不相通的两条河。

反过来，照护者正在说话的场景也包含物理约束：声音是否可及，身体是否舒适，物体能否接近，都会改变交流。所谓“亲情输入”如果脱离这些条件，很容易成为抽象情感量。SIO 分析应把交织关系记录出来，而不是按有无人声给活动分级。

但社会历史的存在，不等于每一次自然经验都必须由成人赋予才成立。一个新的接触后果可以迫使孩子和成人同时修正先前期待。对象对活动的限制并非任意文化投射，自然关系也不只是社会意义的背景。

五、从可供性走向发生史

生态心理学把对象提供的行动可能放在动物与环境的关系中理解。[N05]这与本章的方向有重要接点：不能单凭物体属性或主体能力的孤立清单，说明一次行动是否可行。

本书进一步追问这种可行关系怎样被保留、跨活动调用，以及如何进入高阶个体史。某项接触经验可能改变后续选择，选择又改变成人提供的材料，材料再改变探索SDE 在这里试图连接自然、社会和自我相关层面，但这项整合是否增加经验解释力，要通过具体研究判断。

例如，可以比较两种安全且适宜的活动安排：材料种类相近，一种允许孩子连续改变动作观察后果，另一种主要由成人展示。若出现不同结果，还需检查活动时长、注意与支持差别。研究不能预先把所有主动活动判为优越，也不能把同一种刺激量当作真正相同的互动。

六、自然没有意图，为什么仍然不是无意义的背景

一只被推动的轻质杯子在不同表面上移动，孩子的动作获得不同后果。这是作者构造的说明场景。表面不需要理解孩子，也不需要有教学意图；它的实际差异仍可进入动作调整。意义的发生不要求双方都先知道这次互动意味着什么。

但不能由此把任何物理变化都直接等同于已经形成的婴儿意义。材料发生变化、变化进入身体活动、活动组织保留新的区别，是不同层次。它们可以相连，也可能在某一层止步。需要研究的恰恰是连接怎样成立，而不是把“参与发生”写成一条自动完成的通道。

这一分析使自然既不被拟人化，也不被降为无关背景。它通过具体限制与可能参与生命活动，婴儿则通过自身组织承接这些差异。主客互动复合体的意义不只属于材料，也不只属于头脑，而需在关系中说明。

七、同一自然对象的意义，可以超出成人给它的用途

成人把一件适宜物体放进活动，可能期待某种抓取；孩子却转动它，关注另一种接触后果。只要保持安全与合宜支持，这种不同不必首先被理解为没有完成任务。物体的成人用途与婴儿当前活动中的意义，可以不同。

这不是说婴儿每次偏离都在创造新知识。研究需要观察偏离是否形成持续区别，是否改变下一次动作，以及它与先前经验有什么联系。对意义开放，不等于给所有行为加上天才解释。

成人能做的不是完全退出，也不是立即把活动拉回唯一用途，而是辨认哪些差异可以被保留。自然对象、成人安排与婴儿活动因此共同决定一个局部世界怎样展开。没有意识的物体可以参与意义，而有意识的成人仍须对安排承担责任。

八、自然参与意义，不等于所有变化都成为稳定符号

一次惊异、一声响动、一处光影，都可能很快过去。不是每次变化都会被保留，也不是每种保留都会形成可迁移单位。整体、稳定、独立的判据在这里提醒我们：描述发生，不等于宣布粒子化已经完成。

不过，短暂活动也不因此没有价值。它可能是当前的感受与探索，也可能成为后续组织的一个条件。研究判据用于辨认层级，而不是给每一刻生活颁发“有用”或“无用”的许可证。

自然环境参与婴儿意义发生的根本方式，正在于它让一个生命遭遇不能完全由他人语言代替的实际关系。阳光不会爱，重力不会教，物体不会理解；但婴儿在与它们的活动中，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辨别、预期与行动世界。亲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这些关系在合适支持下成为可以进入的生活，而不是把全部世界替孩子解释完。

13

第 13 章

手—眼—口—物：最早的行动网络

返回目录

一、把“抓到了”重新展开

孩子把一个适合其年龄与能力的软质物体拿到手中。成年人看见结果，可能说“会抓了”；若把这一刻放慢，会发现此前还有观看、接近、支撑、接触和继续调整任何一项缺少适宜条件，结果都可能不同。

本章使用这一构造场景讨论行动网络，不提供具体玩具或入口探索的安全方案。材料是否适用，需要遵循产品安全要求与专业建议。尤其不能因为书中谈到手、眼、口的关系，就把任意小物体交给婴儿。

“网络”在这里指可追踪的相互影响，不是给所有身体部分画连线。目光是否帮助调整方向，触觉后果是否改变下一次接近，成人是否代替了关键步骤，都需要实际观察。网络只有落到关系，才具有解释内容。

二、动作不是命令之后的单向执行

一种简单图像是：婴儿先完整决定要拿，手再执行决定。这个图像无法说明动作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微调。更适当的研究问题是，目标、感觉与动作怎样在活动中彼此修正。

在构造案例中，物体稍稍转动，孩子原来的接近方式不再合适；接触后物体移动，孩子又改变握持。这里的“目标”并非必须是成人可陈述的明确计划，却可以通过连续趋向与调整提出研究。不能因孩子不会解释，就认为活动完全无组织；也不能因动作看似有方向，就赋予完整成人意图。

发展动力系统关于婴儿伸手的研究已经将身体、任务与历史关系纳入解释。[N06]SDE 与之比较时，不能以“动作不是孤立能力”作为唯一新意。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些组织怎样连接符号层级、自我相关性与表征回写。

三、局部成功怎样进入别的活动

拿住物体之后，新的可能出现：转动、敲击、递出、再次寻找。新的活动既依靠抓握，也反过来改变抓握。递给成人需要不同的方向与时机，敲击产生新的感觉后果再寻找又把空间与期待带入。

因此，一项能力的意义不只在于它能否独立完成，还在于它怎样与其他活动连接。把抓握只记成一个达标日期，会遗漏这个后续展开。高阶符号研究应追踪“成功之后发生了什么”，而不仅仅记录第一次成功。

不过，后续并非必然按照同一顺序出现。孩子的条件、材料与照护安排不同，活动可能以不同方式连接。书的目录可以按逻辑展开，生命的发展却不应被迫复制目录研究要保留路径差异，并说明哪些关系只是可能而非必然。

四、帮助既能搭桥，也能代替过桥

设想成人为了让孩子成功，始终把物体推到手中。孩子得到物体，成人也看到成功结果，但孩子在接近与调整中的参与可能较少。另一种帮助是提供必要的身体支持与可达位置，保留由孩子接续的步骤。两者的外观都叫“帮助”，作用组织却不同。

这里不能简单推出成人介入越少越好。有的孩子需要更多协助才能开始；协助不足同样可能使活动无法发生。判断应当围绕当前参与的关键环节：什么必须由支持承担，什么已经可以交给孩子尝试，以及孩子的反馈是否促使支持改变。

这种帮助的可调整性构成一个研究焦点。可比较的不是粗略的帮助次数，而是帮助是否在恰当环节提供可及条件，是否随着反馈改变，以及是否让孩子能够影响活动后续。第 42、43 章会将其发展为更具体的实践问题。

五、重复与变式怎样共同建立动作单位

若每次对象、位置、成人提示都完全相同，成功可能很稳定，但迁移范围不清楚。若每次条件都大幅改变，又可能难以判断孩子保留了什么。稳定与变式需要在适宜范围内共同存在，不能任意最大化其一。

一个构造性的研究安排可以保留必要支撑，逐步比较不同安全物体或位置，观察孩子能否使用已有组织作适当调整。变化应服务于问题，而非让孩子不断遭受失败。每次改变最好有明确目的，便于判断何种关系发挥作用。

在三方程语言中，已有 E 使某些 D 更容易展开，新的对象差异又可能使 S 暴露旧组织的局限；随后，D 的调整可能形成新的 E。若所谓新 E 仅是研究者事后改名，没有可观察的活动差别，就不应宣称完成结构重组。

六、同一次“拿到了”，可能由三种不同组织完成

在构造场景中，第一位成人把物体放进孩子手中，第二位成人把物体保持在适宜接近的位置，第三位成人与孩子共同改变摆放。三个场景的最终画面都可能是手里有物体，但孩子参与的差异序列并不相同。

第一个场景可以是必要照护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成人参与较多就被判为失败；但它不足以单独证明孩子形成了主动接近的组织。第二个场景给出了另一个问题：孩子怎样调整动作，物体位置的变化是否影响参与。第三个场景则使共同活动本身成为单位，必须分别记录各自承担的部分。

由此，动作分析不是把成人帮助扣成一个负分，而是让贡献路径清楚。必要支持可以保留，偶然提示可以被区分，婴儿提出的差异也能够被看见。这样才能避免一边把共同成果全部归给孩子，另一边又把所有受助活动都说成没有独立意义。

七、从手眼协调到关系组织，需要一个中间桥梁

一个抓取组织怎样进入高阶“我”？不能只说动作成功使孩子自信，因为自信是成人的解释，还需相应证据。更直接的桥梁是后续活动的改变：物体被接近以后，哪些新的动作、回应或共同活动成为可能，哪些旧限制被改变?

例如在构造情境中，孩子能保持接触以后，开始把物体带入另一项共同活动；照护者不再只负责递给，而更多地回应孩子的选择。这里可以观察的是活动边界与参与位置的改变。对于孩子怎样体验这种变化，可以保留有限而可修订的推断。

因此，一项动作不必被夸大成完整人格的转折，才值得研究。它可以通过具体连接成为别的活动条件，进而参与高阶组织。发生学的解释力量，不在把每一步称为革命，而在能够准确说明这些小变化怎样相接。

八、一个直观机制为何仍需检验

让尚不能熟练抓握的婴儿获得更多接触对象的机会，听起来应当促进动作发展。黏性手套研究通过特殊材料使手与物体容易保持连接，因而成为检验早期行动经验的一条研究路径。然而，从“工具让接触发生”到“孩子获得了可迁移的抓握组织”，中间并没有一条逻辑上自动成立的通道。工具完成的连接与孩子形成的协调必须分开。

Needham 及同事二〇一七年的研究比较了短时主动与被动经验，并进一步考察声音反馈条件，报告了在特定任务中关于对象观看和探索的组间差异。[M02]这些结果使研究者有理由关注行动与反馈的组织，而不仅是婴儿看到了多少物体。但观看、接触探索持续和精细抓握并不是同一结果变量，积极结果不能被压成一句“运动能力全面提高”。

一项二〇二二年发表的预注册研究则对这一推断提出限制。van den Berg 及同事研究九十六名约三个月婴儿，设置黏性手套、观察与无训练条件，使用动作追踪和分步任务评估前后变化；结果没有显示主动训练对所测伸手与抓握指标的预期促进作用。[M03]这不是对所有身体学习的否定，却要求停止把该训练效果当成无需限定的事实。

九、两项研究不是一句“成功与失败”能够概括

> 比较研究，首先要对齐它们实际改变和测量了什么。短时实验中的探索变化，与家庭训练后的动作运动学变化，可能具有不同机制；婴儿的年龄、已有接触经验、成人参与及反馈方式也可能不同。指出这些差别，是为了形成下一步可比较的问题，不是为了在任何负面结果出现时都自动保住原结论。

尤其要避免把“文化不同”当成万能补丁。一个结果未推广到另一地区，可以提示样本和实践条件值得研究，但不能只凭地点名称确定原因。家庭的实际活动、材料使用和照护安排，才是可以记录的候选机制。若这些没有测量，就应把文化解释保留为可能，而不是宣布负面结果已经得到解释。

同样，不能将所有积极指标合成一个大胜利，再要求负面研究同时否定全部指标才算有效反驳。若原主张是促进抓握，抓握结果就承担直接判断；对注意或社会知觉可能有其他作用，并不能补偿该主张在当前设计中未获支持。理论需要逐项核算，而不是不断在结果之间移动目标。

十、把训练链条拆成四个机制环节

本书提出四段候选链条。第一段是工具是否真正改变了可行动条件；第二段是孩子是否在这些条件中主动产生了有差异的动作；第三段是动作后果是否被其后续调整利用；第四段是形成的组织能否离开训练工具而在新的合宜任务中发挥作用。这是解释框架，不是对任何一项研究已经完整验证四段的断言。

第一段成立最容易看见：物体能够附着于手套。但这可能减少了通常抓握所需的某些调整，因此不能同时证明第四段。第二段需要区分孩子主动接近、成人把物体送入接触以及二者共同完成。第三段需要观察反馈改变了下一步什么，而不仅是孩子有没有看向物体。第四段则涉及工具不在场时，相关组织是否仍可调用。

由此可以构造几个彼此不同的结果。孩子对对象更感兴趣，却没有形成所测精细动作；动作形式发生变化，但仅在工具条件中有效；或者没有短期运动优势，却增加了某种共同活动机会。每一种都可以成为真实结果，但它们不能互相替代。理论解释的任务是定位变化在哪一段，而不是给训练贴一个整体有效或整体无效的标签。

最重要的反例是：工具让任务容易完成，反而降低了某个原本需要练习的调节需求。这个反例不是指黏性手套必然如此，而是指出一般逻辑：减少任务困难与形成目标能力之间不存在单调关系。对需要辅助的孩子，降低困难可能是必要的可及支持；研究目标应是增加真实参与，而非把撤去工具作为所有发展的最终标准。

十一、没有训练特异优势，仍可能出现年龄相关变化

婴儿在研究期间可以继续发展，因此各组前后都有变化，并不等于训练造成了变化。需要比较的是训练条件是否带来超过相关对照的差异，而不是只看训练组自己是否进步。这一方法要求对任何 SDE 支持方案同样适用：孩子长大以后表现不同，不能自动计入理论的成绩。

另一方面，未发现特异优势也不等于证明两个安排在所有重要结果上完全相同。测量范围、资料精度和不确定性都需要说明。一个有责任的结论应指出哪项预期没有得到支持，哪些效应范围仍无法排除，以及哪些问题尚未被测量。这样既不夸大失败也不利用不确定性宣布成功仍在暗处。

对于本书的整体、稳定、独立判据，训练研究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整体性不能只由接触次数替代，稳定性不能只由一次后测替代，独立性不能只由工具移除后的偶然成功替代。需要按预先定义的功能关系安排相应观察。若这些判据最终没有比常规指标提供额外解释，也应明确承认其在该任务中的局限。

十二、一个更有区分力的后续研究问题

与其再问一遍“主动训练是否更好”，可以把问题收窄为：在接触机会和必要支持相近时，孩子产生的动作与后果之间的依赖关系，是否影响后来的可迁移调整。需要尽可能记录实际活动，而不仅依赖家庭填写的分钟数。因为同样时长可以包含不同程度的成人演示、孩子主动变化与持续接触。

研究还应保留零结果的具体含义。若反馈依赖改变而迁移不变，可能说明这个任务主要由其他条件限制；若当场探索改变而后续不变，则需要限制保留机制；若只在部分起点条件下有效，下一项研究应前瞻检验这种条件，而不是事后不断寻找最有利的子组。每一项修订都应形成新的承诺，不能只成为保护旧主张的语言。

这类工作不应被直接转成家庭训练建议。实验材料、监督方式和适用条件，与日常自制器具不是同一回事。家长不需要为了让孩子“提前发生”而复制研究设备。这里讨论的是如何理解科学证据，以及怎样阻止一个诱人的机制故事在证据不足时变成育儿压力。

黏性手套案例对 SDE 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它不给“互动必然促进”的简单版本留下退路。提供机会、参与活动、形成组织与跨情境使用，是可以彼此分离的过程。发生学若能够在这种分离处说明具体机制，就比一味称赞行动更接近一门可积累的学问。

十三、失败时，先检查任务，而不只检查婴儿

孩子没有完成抓握，可以有多种原因：当前状态、材料可达性、身体条件、支持安排，或者观察者选定的标准不适宜。单次失败无法在这些原因中作出选择。先把任务还原，才可能找到有用的支持。

同样，某个孩子表现出不同的参与方式，不必立即被要求纠正为标准动作。但尊重差异也不等于对发展担忧置之不理。持续困扰或明显功能问题需要专业评估，本书的事件分析只能辅助理解，不能替代评估。[G03]

动作单位的发生，最终是一个具体生命逐渐获得继续活动的组织。手、眼、口与物不是四个预先分工的部门，而是在实际关系里彼此改变的参与条件。一个孩子拿起东西时，改变的不只是物体位置，也可能是他与整个活动世界相遇的方式。

14

第 14 章

爬行、站立、行走：空间符号的重组

返回目录

一、从等待物体到接近物体

在一个构造场景里，孩子原来主要接触成人放到身边的东西；获得新的移动方式后，他开始自己接近某个物体。家庭面对的并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动技能”，而是物体摆放、照护边界、交往距离与活动发起方式一起改变。

新能力让过去的环境成为不同的环境。相同的地面、家具和照护者，在新的可行动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关系位置。因此，移动发展不能只被理解为身体内部程序升级，也涉及实际生活范围的重组。

但本章不把爬行、站立、行走写成每个孩子必须依次通过的哲学关卡。不同身体条件与发展路径需要具体理解。能以其他方式参与空间，同样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发生而不是“尚未真正进入世界”。

二、自然活动不等于走一条标准直线

Adolph 及同事对婴儿自由活动中的移动进行观察，报告了大量、分散且路径多变的行动经验；自然移动并不总是沿规则直线连续进行。[B03]这一研究提醒我们，实验室中便于测量的步态片段，不应自动代表孩子日常移动的全部组织。

本书不把研究中的次数或距离换算成家庭训练指标。观察到活动量，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求每个孩子完成某个配额。对符号发生学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包含停顿、转向、重新开始，以及与物体和他人的不断连接。

因此，记录可以从“走了多远”进一步转向“怎样选择接近，受阻后怎样改换路径，谁参与支持”。量的信息仍然重要，但应与关系信息结合。一次短距离接近，也可能打开一种新的共同活动；较长距离重复，却未必意味着更广泛的参与。

三、移动改变别人怎样回应

关于爬行与行走婴儿的研究曾报告，两种移动条件与母亲不同的言语回应相联系。[N07]这为“孩子的发展也改变成人行为”提供了具体研究入口。它并不证明行走直接造成全部语言进步，也不能忽略年龄、活动类型等相关因素。

本书的构造例子是：孩子能够把一件物体带到成人面前，成人因此更多地接触他自主选择的对象。过去是成人把世界递给孩子，现在孩子也能把自己关注的一部分世界带进共同活动。关系方向因此增加，而不是旧方向完全消失。

这样的变化可被分析为局部能力向高阶组织的回写：移动改变交往，交往改变材料安排，材料又改变下一次移动。若只把成人行为当作固定环境，就会遗漏这一循环若把循环所有结果都归到孩子，也同样过度。

四、保护边界会随着行动范围移动

> 在孩子尚不能接近某处时，一件物品的摆放可能不构成同样问题；行动范围改变后，家庭需要重新评估环境。这里的保护不是突然出现的一项外部限制，而是参与空间组织的持续工作。

保护也可以扩大自由。适宜的安全区域和可达材料，让成人不必每一刻都替代孩子选择；可预期的边界，使尝试能够持续。相反，若保护仅表现为所有行动都被截断孩子可能拥有较少机会以自身活动改变后续。

这不是让家庭在危险与发展之间赌博。安全底线不应作为理论实验变量。可以讨论的是，在已经适宜的范围内，怎样调整空间、支持和成人介入，使孩子既受到保护也保有可参与的步骤。必要支持不因“自主”二字而被撤去。

五、空间经验怎样连接三界

现实侧的变化，是新的接近、支撑和物体关系；理念侧的问题，是可达性、路径及动作后果如何形成可保留的预期；自我侧的问题，是孩子如何通过自身活动参与选择和调节。三者在同一事件中相互牵动，却不能凭一个运动指标同时获得全部证明。

设想孩子反复绕过某个障碍接近玩具。研究可以观察路径是否变化、成人提示是否存在及后续是否迁移；关于孩子是否已经具有成人式空间图像，则需要额外论证。行动显示组织，不等于显示所有相关概念已经明确。

三方程可以从一次失配进入：旧的接近方式遇到新限制，原 E 无法让 D 继续，S 显露为停顿或转向。若新的支持使活动重新展开，应进一步观察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而不是把每次绕行都称为一次宏大的认知革命。

六、空间不是等待能力升级的固定地图

在作者构造的家庭场景中，同一张低桌对尚不能接近的孩子、能够借助适宜支持靠近的孩子和已经能移动接近的孩子，构成不同活动条件。房间平面图相同，不等于他们参与的空间组织相同。

变化也不只发生在孩子一侧。新的接近可能使成人调整物体位置、改变照看方式和重新界定活动边界。于是所谓“孩子获得一项能力”，同时意味着家庭空间被重新安排。这个过程可以带来更多机会，也可能带来新的限制，不能预设所有移动增长都自动转成自主参与。

这里的空间符号不是脑中复制的一张地图，而是与身体、物体、支持和活动规律相连的组织。此定义属于本书的理论提案。它要求观察可接近、可停留、可返回和可共同活动的关系怎样改变，而不是只记录移动距离。

七、从“终于会走”到“怎样继续参与”

里程碑把一项变化标记出来，有助于形成共同观察语言；但发生学的问题并不在标记处结束。孩子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继续，遇到变化怎样调整，成人支持怎样随其活动改变，仍然需要研究。

一项移动技能也不应成为进入共同生活的唯一资格。对不能通过常见方式移动的孩子，适宜支持仍可以改变接近对象与他人的可能。只以“是否独走”记录空间发生会把这些实际变化消失在一个否定答案里。

因此，本章主张同时记录功能表现与参与关系。前者帮助识别专业支持需要，后者说明支持在生活中实际打开了什么。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不因尊重独特性而忽视评估，也不因评估清楚而停止研究孩子怎样生活。

八、行走不直接等于语言增长

运动发展与交流变化可以同时出现，但“同时出现”距离机制解释仍有一段路。Karasik、Tamis-LeMonda 与 Adolph 对爬行和行走婴儿及母亲的研究，把物体交流方式与成人言语回应放在同一观察中，显示移动方式、交流形式与回应机会之间值得追踪的联系。[N07]它为一条发展级联提供入口，不是行走直接造成语言能力的完整因果证明。

可以把候选链条分成几个节点：移动改变接近对象的范围，接近改变把对象带给他人的机会，交流发起改变成人当下回应的对象与方式，回应再为后续学习提供某些条件。任何节点都不保证下一节点自动发生。孩子能到达成人身边，成人可能正在处理其他任务；成人说了话，孩子也未必以同样方式注意或利用。

链条中的身体条件还不只是一项“会不会走”。保持对象、转身、平衡、停止和重新启动，都可能改变某段交流能否继续。对于通过其他方式移动或需要支持的孩子同样应研究其如何接近、展示和影响他人，而不是把一种移动形式规定为社会意义发生的唯一门槛。

九、总次数变化可能隐藏两种不同机制

假设一天中成人关于物体的回应变多。一个解释是孩子发起了更多相关活动，成人面对同类发起的回应方式没有变化；另一个解释是发起数量相近，但成人更容易察觉或更愿意接续。两种机制都可能提高总回应数，却对应不同的改进方向。只统计每天说了多少句话，无法区分机会增加与回应改变。

在研究提案中，可以把总体交流粗略分解为机会数、每次机会被回应的比例，以及回应被后续活动接续的比例。这不是一条普遍发展公式，也不应把比例当作家长考核。它的作用是暴露遗漏：一项支持究竟增加了哪一个环节，哪一个环节仍然限制整个过程？某个环节提高以后，其他环节是否反而受到时间和注意资源的约束？

还需要改变分母。只比较已经发生的成功交流，会遗漏未被看见的发起；只比较孩子靠近成人的次数，又可能把无交流意图的移动计入。研究可以保留几类行为定义再检查结论是否依赖某一种过窄编码。孩子的实际活动不应被迫符合研究者为了统计方便设定的单一路径。

十、一个级联可以在中间被截断

在构造案例甲中，孩子开始把物体带到成人附近，家庭因此设置了更可及的共同活动空间，新的发起得到承接。在案例乙中，相同的移动变化使成人更加担心物品散乱，物体被放到难以接近的位置。两者都出现了新的运动能力，却经由不同的成人安排形成不同后续。能力改变没有预先规定关系后果。

这两个案例不用于给家庭作简单道德排序。乙可能面临真实空间限制，成人也可能需要安全支持。机制分析的积极方向是找出可调整环节：有无适宜的可移动材料，是否能够设立有限安全区域，照护任务能否重新分配。若只告诉家长“多鼓励”，便没有处理形成限制的实际条件。

另一个反例是，孩子获得新移动方式后，探索对象明显增多，但共同注意并未同步增加。这个结果说明物体接近与社会分享之间存在独立研究问题。不能因为二者在理论上可以相连，就在观察上自动合并。高阶符号的形成需要连接证据，不是局部能力越多便自然汇合。

十一、反馈可以改变后来的环境，而不仅改变当次回应

一次孩子主动展示物体，可能使成人重新认识其兴趣，随后调整材料摆放或活动时间。于是，短时交流改变了中期机会分配，中期机会又影响下一次身体行动。这是一条跨尺度回写路径。它不能仅凭一次热情回应得到证明，需要观察安排是否实际改变以及孩子是否利用了新安排。

研究可以把三份记录连接：当次活动中发生了什么，成人随后怎样解释，后续生活安排有什么变化。三份记录有时一致，有时分离。成人可以口头赞赏却不改变安排也可以没有形成明确语言解释，却通过熟练行动持续提供新机会。表征回写因此是一条可能路径，而不是所有环境变化都必须先经过的意识阶段。

婴儿的“我”在这里并非只是接受一个更大的世界。他通过移动、选择和表达，改变别人将哪些对象带入共同生活。可是，他也不拥有对全部环境的控制权。成人责任、物理安全与公共条件持续参与。高阶主体的发生应理解为实际影响范围与承接方式的变化，而不是从依赖走向绝对自足。

十二、怎样避免把年龄当作隐形万能原因

能够行走的孩子与爬行孩子可能还在月龄、经验、身体状态及家庭安排上有所不同。横向比较很难把这些条件完全拆开。更有帮助的是结合个体内的连续观察，记录同一孩子的活动怎样随新移动方式出现而改变，同时保留同期其他变化。即便如此，连续观察也不是随机实验，不能保证所有未测因素都已排除。

可以进一步比较更接近机制的活动条件。例如，在孩子已经能够安全接近的范围内，材料是否便于携带，成人是否处于可交流位置，支持是否允许孩子自主选择目标这样的比较不需要催促更早行走，也不以剥夺必要支持来制造差异。研究对象从里程碑日期转为里程碑通过哪些具体活动产生后果。

一个强反例是，加入物体携带与发起形式以后，移动类别不再提供额外解释。这时应考虑原来的运动差异是否主要通过这些中间关系实现，而不是坚持行走本身拥有独立的神奇作用。相反，若仍有差异，需要继续寻找未记录路径，不能立即用“整体纠缠”填补所有空缺。

十三、级联不是越长越好的成长故事

一项改变能够进入其他领域，并不意味着所有连锁后果都积极。移动扩大机会，也增加需要协调的安全边界；交流增多，也可能提高照护负荷；更丰富的对象选择，未必在疲劳时继续有益。机制分析应记录收益、负担与中断，而不把每次跨领域连接都写成无成本升维。

对于家庭，最有价值的判断不是尽量提前某个日期，而是新能力出现后，关系是否准备好承接。孩子能带来一件物体时，有没有人能够看见；孩子需要停下时，活动是否允许恢复；一种方式受限时，是否存在其他可及路径。这里的积极发生体现为机会能够成为生活，而不是指标能够排在别人前面。

运动发展之所以能够进入婴儿符号发生学，正因为它揭示了局部能力与整体生活之间的中间层。把这层写清楚，我们才可能从“他会走了”进一步理解：哪些世界关系变得不同，谁因此改变了行动，以及这个独特的“我”怎样通过新的身体方式继续参与共同生活。

十四、熟练也会带来新的困难

新移动能力扩大了参与范围，也使孩子遇到更复杂的限制。一个过去有效的动作组织，在新材料或新位置上可能不再有效。发展因此不是稳定地减少所有困难，而是不断进入不同性质的问题。

对照护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也不是永远让孩子成功。可以保留安全范围内的试探、停顿与重新选择，同时帮助他从难以进入的情境中恢复。把每次受阻都理解为需要立即纠正，会使成人不断接管；把所有困难都留给孩子，又可能忽略支持责任。

空间符号的重组说明，高阶“我”不只在头脑中积累描述，也通过新的行动关系改变能够生活的世界。移动不是离开关系成为孤立个体，而是以新的方式进入更多关系，并使原有关系不得不重新安排。

15

第 15 章

日常物体怎样成为婴儿的“世界”

返回目录

一、一个杯子，不只有一种活动身份

在作者构造的生活片段里，一个适宜的杯子先被拿起，再被倒扣，后来进入与成人共同的游戏。成人看到的是同一件用品，孩子参与的却是不同关系：可握持的表面可改变的方向、与其他对象发生联系的容器，以及可在共同活动中使用的东西。

这些关系不是随意赋义。杯子的实际条件限制了它能怎样进入活动，孩子的身体条件也限制可行方式；照护者的安排和语言又增加新的连接。物体之所以成为一个具体世界的组成部分，在于这些关系逐渐取得可保持、可变换的位置。

如果只记录“认识杯子”，我们不知道认识到哪一层；如果只记录“会说杯子”，又可能把名称掌握与实际使用混同。符号存在与表征的区别，在最普通的日常物体上就能得到具体检验。

二、熟悉性不是把所有变化变得无聊

同一物体反复出现，可以使某些关系更容易进入，但熟悉并不等于不再发生。孩子改变握持、位置或与其他物体的组合，便可能使熟悉对象显露新的差异。新意不总来自新购买的东西，也可能来自已有关系的重新组织。

这与单纯重复不同。若活动完全由成人固定演示，物体虽然每天出现，孩子未必有机会改变下一步；若允许安全范围内的变式，同一对象可能成为连续探索的连接点两种安排的区别要看实际参与，不能只按重复次数判断。

因此，家庭材料的丰富性不宜只看数量。一个小而可进入的物体世界，可能比大量暂不可及的物品更支持连续活动。这里提出的是研究与照护的观察方向，不是关于玩具价格与发展结果的现成因果结论。

三、物体把不同关系接到一起

一个物体可以连接身体行动与社会活动。孩子将物体移向成人，成人作出回应，再把它放回新的位置，孩子继续参与。局部抓握、共同注意、空间移动与关系期待由此在一个现场交织。

物体在这里不是中立的背景，也不是唯一原因。它提供某些可行动条件，成人与孩子共同形成活动次序。若换掉物体之后关系仍能继续，可能说明某种组织获得了相对独立性；若立刻中断，也可能提示原物体的某个特征仍在承重。

但是，不能仅凭一次替换决定是否迁移。新物体可能不安全、不合手或不熟悉，失败并非只有一个解释。研究需要保持必要条件相近，同时允许孩子以适当方式接近而不是把替换当作突袭式考试。

四、名字怎样进入已经在发生的关系

成人给物体命名，可以帮助共同关注与语言学习，但名称的作用要放在具体活动中研究。声音不是自动附着在完整概念上的标签，也不是一说就使婴儿理解全部用途名称与对象、动作、注意和关系历史相互连接，作用范围可能逐步变化。

本书不认为表征永远在时间上最后出现。成人可以一开始就边行动边说话，语言与实际活动共同发生。存在优先意味着，不能仅凭成人说了什么就替代孩子实际参与了什么；并不是要求先完成无语言世界，再另建一个语言世界。

在三方程中，命名可以改变 D 的组织，例如把注意引向某个关系；孩子的反馈又可以改变成人怎样说、何时说以及是否继续。词语是实际互动的一部分，不应被当作从理念世界向现实世界单向灌注的内容。

五、世界形成也包含取舍

孩子不会同时进入所有物体和所有用途。注意、身体能力、熟悉关系与生活安排，使一些活动更容易发生，另一些暂时在外。高阶符号的世界因此不是物品目录的复制而是有差异、有边界、又能够改变的活动组织。

这些边界有时具有保护作用，有时体现资源限制，有时来自成人习惯。研究不能把所有未发生都解释为孩子缺乏兴趣。若某个对象从未可达，就没有充分依据说他不喜欢；若某项活动只在成人强提示下出现，也不能直接称为孩子的自主偏好。

反过来，也不应要求每个孩子拥有无限广泛的经验。适宜的休息、熟悉性和可持续生活，同样属于发生条件。正向发展不是所有通道同时最大开放，而是在具体关系中形成能继续、能恢复、能改变的组织。

六、一个杯子的三次出现，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

第一次，孩子可能主要接触杯子的边缘与重量；第二次，杯子进入轮流递送的活动；第三次，它成为某个名称在具体情境中的对象。这是说明性安排，而非每个孩子必经的顺序。三个活动能够共享物体，却各自具有不同的关系结构。

如果只记录“接触杯子三次”，变化就被压平；如果分别把三次活动切成互不相干的单元，连续性又消失。需要追踪哪些先前关系被保留、哪些新关系加入，以及哪次改变影响下一次参与。这使日常物体成为连接局部符号的一个节点，而不是被动接受词语的空容器。

同一名称也可能覆盖不同活动。成人都说“杯子”，不保证孩子正在区分相同的关系。反过来，不同称呼也可能参与相似活动。研究者应把词语、活动和存在单位分别记录，再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不能让命名替代发生分析。

七、材料丰富，不如关系实际能够展开

购买更多物体，可以改变资源条件，却不等于已经增加了可参与经验。物体是否可及，活动是否适宜，成人是否允许反馈改变安排，都可能影响资源怎样进入关系。这是一个需要具体检验的转化问题，而不是对某类产品价格的价值判断。

少量材料同样不天然保证深刻探索。若活动始终锁定一种用途，熟悉也可能只是重复任务。丰富性既涉及材料差异，也涉及关系展开的可能。比较应当同时看到两者而不从“贵”或“简朴”直接推断教育质量。

本书因此把日常世界理解为资源经过身体活动、社会安排和历史经验而成为可进入关系的过程。世界不是物品目录；一个物品进入了目录，也还没有完成它在这个婴儿生活中的发生。

八、第三编的收束：不是外界进入容器，而是世界关系形成

感觉、自然互动、抓握、移动与日常物体，展示的是同一个发生方向：身体活动改变可进入的关系，新的关系又改变身体、预期与自我相关组织。婴儿的世界既受到实际条件约束，也不只是这些条件的静态投影。

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创造了所有物理对象，更不意味着对象随主观愿望任意变化。本书所说的世界发生，指向可参与、可辨认、可继续的具体关系世界；物理事实、身体条件与他人活动都在其中构成真实限制。

接下来的亲情研究将进一步说明，这个世界不只有物体和感觉，也包含他人怎样回应。但亲情不是替代自然与身体的另一条单向输入。它本身会被婴儿的动作、对象选择和活动历史重新组织。一个杯子被孩子递出时，世界关系与爱的关系可能正在同一事件里一起发生。

第四编 / PART 04

爱与关系：婴儿如何参与爱的发生

第 16—20 章

16 爱从内在情感走向可回应的行动

17 喂奶、抱起、安抚：亲情的发生单元

18 保护、稳定、自由：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

19 爱不只来自母亲：家庭中的多主体 SIO

20 婴儿让成年人生成新的“我”

16

第 16 章

爱从内在情感走向可回应的行动

返回目录

一、“我很爱他”与“他经历了什么”

一位照护者真诚地说：“我愿意为这个孩子付出一切。”这句话表达了重要的情感与承诺，却还没有告诉我们，昨天的一次哭泣怎样得到回应，今天的一次探索获得了什么支持，以及孩子的反馈有没有改变下一步行动。

本章不否认爱的内在性。恰恰因为内在情感真实而复杂，才不能用单一行为给它作最终判断。一个疲惫的成人没有及时理解某次信号，不等于没有爱；一次动作温柔也不足以证明长期关系已经充分支持孩子。需要研究的是情感怎样通过实际条件成为可经历的关系。

在本书的分析中，动机、行动、婴儿经历与后续结果构成四个相关层次。它们之间没有自动等号。把爱直接连到理想结果，会让关系中的知识、资源、身体条件与偶然变化全部消失，也会使家庭在遇到困难时背负不合理的道德判断。

二、回应从承认不知道开始

设想孩子哭泣，照护者以为需要接触，抱起后仍未改变，于是重新检查情况。这是一个说明性场景。真正发生作用的，不只是最初的爱意，还包括成人允许第一次解释不完整，并愿意继续调整。

回应因而不是准确翻译每一个信号的神奇能力。哭声、动作、活动前后条件需要结合，某些不适还需要专业评估。一个把自己的解释当成绝对正确的成人，即使情感强烈，也可能拒绝孩子实际反馈带来的修订。

本书把这种可修订性视为爱的发生性问题：孩子是否能够通过现实反应进入成人下一次判断？这不是要求成人无限跟随所有瞬时表现，而是要求限制、引导与照护本身也接受具体反馈。婴儿不需要先会说理由，才有资格让关系有所改变。

三、意图良好，也可能选错作用路径

成人希望孩子安心，于是不停提供新的声音与物体；孩子却逐渐退出活动。成人可能以为需要更强刺激，继续增加。这个构造例子说明，当行动与反馈不匹配时，爱的强度未必是问题，解释路径才可能需要改变。

另一种情形是成人想促进自主，却撤去孩子仍然需要的支撑；还有一种是希望保护，于是替代了孩子已经能够参与的步骤。三种行动都可以来自关爱，但不能因此免于具体分析。真正需要问的是，行动有没有使这个孩子得到适宜的参与条件。

所以，“爱得更多”不是足以指导修订的操作语。可以改变的是活动位置、介入环节、等待方式、资源支持与对信号的理解。将道德评价转成可调整条件，往往比要求父母反复证明爱更有实践意义。

四、婴儿怎样改变爱

一个构造场景中，成人惯用唱歌开始游戏，孩子却持续把注意转向另一件物体。成人最初试图拉回注意，后来转而跟随孩子共同观察。变化不在于突然出现了一份更多的爱，而在于爱的组织从坚持成人方案转向与孩子共同形成活动。

孩子的参与也可能让成人发现新的自己：过去认为自己不擅长照护的人，逐步形成一种可靠的回应方式；过去认为安静才是成功的人，开始容纳发声、活动与不同节奏。这些变化不能被每个家庭必然经历的故事概括，却是可以具体追踪的关系问题。

婴儿的作用不以成熟意图为前提。一个身体反应能够真实改变成人行动，并不要求孩子先计划“我要教育父母”。因果参与与明确意图应当区分；共同发生与责任对等也应当区分。照护质量的责任不会因为孩子也有作用而转交给孩子。

五、日常熟练与有意识关注并不对立

许多照护动作并非每一次都经过完整的语言推理。熟悉活动可以以相对流畅的方式进行，成人也不可能时时将全部注意变成显式观察。问题不在于每个动作是否被深思，而在于熟练是否仍能被新的反馈打断和修订。

一种有价值的熟练，是在常见条件下提供可靠支持，同时能察觉原方式不再适宜；另一种僵化，则是不管孩子怎样变化都维持同一程序。两者可能外表相似，却具有不同的开放性。稳定的爱不是每次动作完全一致，而是关系具有持续承接变化的能力。

这也让“有意识的人参与”与“每个微动作都由明确意识控制”分开。婴儿的符号发生无需等待成人把每次照护概念化；但当新差异出现，成人的反思与求助能力可以成为重组关系的重要条件。

六、爱的强度为什么不能直接充当效果的尺度

可以构造两个场景：甲照护者情感十分强烈，却把孩子每次转头都解释成需要更多刺激；乙也关心孩子，但愿意根据反应调整活动。不能只比较两人宣称有多爱，就推定孩子获得了怎样的支持。中间还存在解释、行动、条件与反馈。

反过来，也不能把一次不合适行动等同于没有爱。照护者可能缺少信息，可能需要休息或帮助，可能误判而后愿意修正。将爱的情感层与实现层分开，既能检查实际结果，也避免以结果反推整个人的内心品质。

本书所谓发生性价值，正是在这个中间地带建立：爱通过哪些实际通道进入孩子生活，哪些通道被资源或错误理解阻断，什么反馈能够使安排改变。它不是把情感排除，而是使情感不再成为无需检查的结果担保。

七、“看见孩子”需要允许原来的理解失效

一位成人可能长期认为孩子喜欢某种游戏，后来孩子的反应改变。若成人坚持“我最懂他”，熟悉经验便会成为拒绝新差异的理由；若立刻把改变解释为关系破裂又可能过度反应。发生学要求在两者之间保留重新辨认。

重新辨认不意味着每次都从零开始。已有经验仍是资源，只是必须允许被当前活动修订。可以先检查身体状态和情境变化，调整安排，再观察新的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给孩子换上另一个人格标签。

因此，爱具有一种时间性：它不仅珍视已经熟悉的孩子，也为尚未熟悉的变化保留回应空间。这个规范判断来自本书的理论立场，不是某项实验已经测出的唯一爱的定义。它的实践检验在于，是否使照护更可持续、更能承接实际需要，而不是使成人不断追求完美解释。

八、同样的回应数量，可以组织出不同学习条件

Goldstein、King 与 West 在二〇〇三年操控母亲对八个月婴儿发声的回应，比较与婴儿发声相依的反馈和不相依的反馈，发现前者促进了特定发声行为向更复杂形式的即时变化，部分变化在操控之后仍然保持。[M04]这一结果提供的不是“爱越多语言越好”的证据，而是回应与当前行为的关系可能改变学习条件的实例。

这一区分对爱的发生学很重要。成人表达同样次数的赞许，可能一段紧接孩子的尝试，另一段主要沿成人自己的节奏发生。两种表达都可以包含真实关爱，却不构成同一种信息关系。把它们统称为积极刺激，会遗漏孩子能否将自己的活动与后果联系起来的问题。研究关注的是实现方式，而不是对内在情感作真假裁决。

同时，这项研究不能被推广为任何时候都要立即回应每次发声。研究任务、年龄和结果都有范围；日常活动还包含安静、独立探索、休息及多人协作。把限定机制变成全天候表现要求，会让科学证据反过来制造照护压力。真正可带走的是一个问题：成人的行动有没有承接孩子正在进行的活动，而不是成人是否无间断地表现热情。

九、爱的实现包含识别、选择、行动与核对

可以将一次具体回应分成四个工作环节。识别，是从当前活动中察觉孩子发起了什么或哪里发生改变；选择，是在几个可能安排中判断哪一种适宜；行动，是把判断变成能够被孩子实际经历的支持；核对，是观察支持之后活动是否按预期改变。这个划分不是照护者每次必须默念的程序，而是供研究者辨认失败位置。

识别失败时，成人可能仍沉浸于自己的计划；选择失败时，已经看见信号却采用不适宜办法；行动失败时，知道怎样做但缺少时间、工具或协作者；核对失败时，第一次解释不再接受反馈。四种情形都可能出现在关爱真实存在的家庭，修订方式却不相同。仅要求“多爱一点”，不能提供这些区别。

以孩子转向另一件安全物体为例，成人可以把它解释为失去兴趣、希望换活动或只是短暂注意变化。不同解释会导出不同安排。关键不在第一次就猜中，而在改变以后是否继续观察：孩子是否接近、是否恢复、是否转向其他方向。婴儿通过这些后果参与成人解释的修订，爱便不再只是从成人内心流出的固定强度。

十、反馈的内容和反馈的时机不能合并

时机相依，说明回应与当前行为有关；内容适宜，说明回应提供了与需要或活动相匹配的后续。两者可以分离。成人非常迅速地继续加大刺激，仍可能没有承接孩子退出的需要；成人隔了一段时间才调整，但调整恰好恢复可及关系，也可能形成有效支持。不能以反应速度代替关系质量。

一个构造的研究矩阵可以分别比较时机与内容，但前提是所有安排都在适宜的低风险活动中，不涉及延迟必要照护。一个维度考察回应是否跟随孩子当下的活动变化另一个维度考察回应是否保留他能够承担的步骤。若只有时机有效，可能表明可预测性起较大作用；若只有内容有效，可能说明进入条件才是主要限制；若两者相互影响就应记录其条件，而不是预先宣布必须存在交互。

这也给 SDE 三原理增加了具体内容。当前显露与既有组织不匹配时，D 的重构可以首先表现为改变回应的时机，而不一定增加新的材料；若时机改变无效，则可能需要检查 E 中的角色分工或身体可及性。不同维度的修订对应不同工作，不是同一句“调整互动”在三个字母之间轮流出现。

十一、修复能力比永不失配更适合成为研究目标

理想化的照护叙事容易设想双方时时协调，任何误判都具有巨大后果。可是，这种要求既难以实践，也会把正常的不确定性道德化。更有内容的研究目标是：当活动

没有按照原安排接续时，能否识别中断、保留必要支持、找到新的进入方式，并将有效经验带入下一次。

修复不能只由最终安静来判定。活动安静下来，可能是条件改善，也可能是孩子不再有参与机会。应该继续观察孩子能否以适宜方式重新影响活动，成人是否修改原先的解释，以及关系是否保留可再次进入的空间。修复因此涉及后续组织，而不只是消除表面波动。

一个反例是成人为了尽快恢复“好气氛”，不断用新刺激覆盖孩子的反应。现场看似重新热闹，却没有解决原来的可及困难。另一个反例是成人暂停后允许孩子选择新的参与方式，原任务没有完成，关系却重新建立。对爱而言，完成成人计划不应成为修复成功的唯一标准。

十二、谁在学习什么，需要分别记录

婴儿可能形成新的活动组织，成人可能形成新的辨认方式，家庭也可能建立更有效的交接。三种学习并不同时达到同样程度。成人已经明白孩子需要怎样的支持，身体变化仍可能较慢；孩子已经能用另一种方式参与，家庭旧安排也可能尚未跟上。共同发生包含这些时间差。

如果把一切进展统称为“亲情更深”，便不容易发现哪一处仍需支持。较清楚的记录应分别说明：孩子获得了什么活动可能，成人改变了哪项判断，环境保存了哪项安排。三者之间的连接越具体，越能把爱从抽象赞美转成可持续的生活实践。

同时，记录不能要求家长把全部情感劳动数据化。科学上可分析的实现环节，不等于爱只能由可计数行为构成。私人的依恋、牵挂和承诺具有不能被单一任务穷尽的意义。发生学的任务是在需要判断时增加清楚度，而不是以一张回应表取代家庭的情感世界。

十三、爱的结构中应当保留照护者的恢复

回应具有时间和身体成本。一个安排若要求成人永不疲惫，便把偶然的高投入误当成可持续制度。爱的实现回路因此也要包含成人的休息、交接、求助和专业支持。

WHO 将照护者心理健康支持与早期发展安排共同讨论，为这一点提供了公共卫生上的依据。[N18]

婴儿改变爱，不等于婴儿需要负责让成人得到恢复。那是家庭、服务与社会组织需要承担的任务。把责任边界写清楚，才能同时承认孩子的真实参与和成人能力的不对称。对婴儿有利的关系，并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断付出，而是必要支持能够通过可靠协作持续到达。

于是，爱的发生性机制可以被更精确地表达：情感与承诺通过识别、行动和修订进入具体生活；孩子的反馈改变这些实现方式；新的方式又被家庭条件保存或阻断。这里没有一个单向灌注的爱之量，只有需要被不断承接的关系。婴儿就在这种关系中成为更加独特的自己，也使成人的爱具有此前未曾有过的形态。

十四、照护者也需要被支持

WHO 早期发展指南将回应式照护、早期学习与照护者心理健康支持一起讨论。[N18]这一公共卫生安排提醒我们，照护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私人能力。家庭需要可用信息、休息、协作与服务，才能较持续地把情感意图转成适宜行动。

如果一种育儿理论只要求成人“更敏感、更耐心”，却不看时间、资源与支持，它容易把系统困难变成个人失败。SDE 环境论在此应当发挥作用：哪些其他 SIO 正在支持或阻碍当前照护？工作安排、家庭协作与专业服务怎样进入这个现场？

爱从情感走向行动，不是把情感贬为无用，而是为它寻找真实的实现条件。一个理论对家庭最有帮助的时刻，未必是赞美他们多么爱孩子，而是帮助他们发现：在哪一处改变关系，孩子与成人都能获得继续生活的空间。

17

第 17 章

喂奶、抱起、安抚：亲情的发生单元

返回目录

一、最熟悉的活动，常常最少被看见

进食、抱起、安抚每天重复，容易被当作教育开始之前的生活杂务。可是，对尚未依靠成熟语言参与世界的孩子而言，这些活动本身就包含身体支持、感觉联系、节律变化以及与他人的相互调节。

本章不是喂养技术指南，不规定奶量、间隔或医疗处理。具体喂养和身体支持应遵循适合孩子情况的专业建议。我们关注的是：同一项照护任务怎样在实际活动中形成关系，又怎样因婴儿反馈而改变。

营养方式也不能被直接用作爱的等级。讨论生理需要与讨论照护价值，是相关而不同的问题。无论具体方案如何，一个孩子是否获得适宜的营养、可靠支持与回应，需要在实际条件中判断，不能由一种道德化名称自动决定。

二、一段活动可以怎样被细读

以下是作者构造的过程片段。成人准备开始喂养，孩子的姿势与注意仍在变化；成人调整支撑，孩子逐渐进入活动；中途孩子转头，成人重新观察，而不是只根据预设任务要求继续；活动结束后，双方进入下一段日常安排。

这段描述并没有解释每个转头的原因，也不将其一律定义为饱足或拒绝。它的分析价值是保留顺序：准备怎样开始，身体条件怎样调整，孩子的反应怎样进入判断，活动怎样转向。若只记录“完成一次喂养”，这些组织差异会被抹去。

在现实界，材料与身体条件参与；在理念侧，成人已有的理解与孩子逐渐形成的活动预期并不相同；在自我侧，成人情绪和婴儿可能的舒适或不适也不能合并为同一种体验。共同活动不是共享一切意义，而是不同位置在实际关系中相互影响。

三、功能相同，动作形式可以不同

不同照护者可能以不同声音、姿势与习惯进入同一项照护。只要符合安全与专业要求，动作外形不必完全一致。值得研究的是，他们是否能够承接孩子的实际状态，并使活动具有可继续性。

这里的稳定可以表现为关系功能的保持，而不是所有人复制同一动作。例如，不同成人都能观察到孩子需要调整的环节，也都允许反馈改变节奏；具体表达方式可以不同。若家庭把一致性理解为每个细节完全相同，就可能让成人彼此监督程序，却忽略孩子的新变化。

反过来，多样性也不自动有益。若基本安排互相冲突、必要信息无法交接，孩子与照护者可能缺少可以接续的条件。需要的是能够互相承接的差异，而不是没有联系的变化。

四、错配与修复怎样进入关系史

任何具体活动都可能出现误判。研究不能要求每次互动都完美同步，也不能把一次错配立即推导为长期损害。更有内容的问题是：误判之后，关系能否被重新调整，成人是否愿意承认原解释不够，孩子是否重新获得参与条件。

设想成人把活动加快，孩子的反馈显示原节奏难以继续，成人随即改变。若后续恢复，值得记录的是怎样恢复，而不是把前一刻抹掉。修复过程可能成为下一次活动的知识来源，但不能仅凭一次恢复就宣称建立了某种稳定心理品质。

这使亲情史不再只是成功次数累积。它也包含不同理解怎样被纠正，哪些关系因此改变，哪些错误持续没有得到处理。正向发生不需要删除所有失误，却需要为修改失误保留实际路径。

五、照护活动中的“自由”不是撤回责任

婴儿在进食与抱持中能够怎样参与，并不等于成人把生存照护交给他自行决定。这里的自由主要指，在安全与必要支持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孩子的动作和反馈是否能真实改变活动的后续。

成人仍需承担判断责任，包括识别发展或健康担忧、在不确定时求助，以及维持适宜支持。婴儿的能动参与与成人的负责并不矛盾。把回应误解为绝对服从瞬时反馈或把负责误解为无须观察的控制，都会破坏这一关系。

在 SDE 方法中，旧安排与新反馈的张力可以促使 D 调整，也可以促使 E 重组。改变不是为了让表面安静达到最大，而是让活动更适宜、更可持续。某次停止哭泣不能单独证明所有需要已满足，某次仍然哭泣也不能单独证明照护失败。

六、亲情单元的边界，不一定与成人动作的边界重合

> 成人可能把喂养、抱起和安抚视作三项分别完成的任务；对一次具体活动而言，它们却可能持续连接。姿势改变影响参与，参与改变使成人暂停，暂停又引出新的接触。若在成人动作完成处就切断记录，孩子后续反应可能被排除在评价之外。

本书提出一个工作性的事件边界：从某种需要或活动变化进入共同注意开始，追踪到一个可辨认的参与安排被暂时建立，或活动被明确转交、终止。这个边界依问题而定，不是给所有照护规定统一时长。

它带来的变化是，完成任务不再自动等于完成关系。成人把某事做完以后，孩子是否能够继续参与，是否还需要调整，仍属于可能的重要后果。这种记录不能变成不必要的家庭监控，却可以帮助研究者避免只看成人意图与操作。

七、修复关系，不是补偿一个永不该发生的错误

照护中的误判不可能靠一种理论彻底消除。研究更需要说明误判之后怎样重新连接：谁先察觉变化，成人如何停止不适宜解释，孩子的新反馈能否改变安排，以及其他支持能否及时进入。

在作者构造的场景中，原先有效的方式没有使活动继续，照护者改用另一种适宜支持，孩子重新参与。不能把这个结果说成证明任何失败都有益；有些错误必须避免有些困难需要专业处理。这里要辨认的是，关系是否具有调整和恢复的实际路径。

因此，亲情的稳定不应等同于从无波动。更有意义的稳定，可能体现在波动中仍有可获得的帮助、能够停止的安排和继续辨认的责任。它不要求婴儿配合成人完成一个圆满故事，而要求成人不把一次失败当成终止回应的理由。

八、小单元怎样成为高阶历史

一次照护结束，许多内容不会以明确记忆被叙述，但活动安排可以在下一次保留：成人调整准备方式，孩子出现新的参与形式，家庭改变交接。局部关系由此进入日常组织，成为高阶符号的实际条件。

这并不是说每次抱起都决定终生，也不是要求成人把全部细节记录下来。研究需要选择与问题相关的片段，家庭则需要保留对下一次有用的差异。把所有生活变成高压训练，反而可能损害原本要保护的共同活动。

亲情的发生单元之所以重要，不因为它们隐藏着某种昂贵技术，而因为它们把生命需要、感觉、行动和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在这些普通活动中取得形态，也在孩子一次次不同的回应中改变自己的形态。

18

第 18 章

保护、稳定、自由：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

返回目录

一、不是在三种养育风格中选一种

保护、稳定与自由常被写成相互竞争的育儿选择：重视安全就少些探索，重视规律就少些变化，重视自主就少些成人介入。这样的三选一图像，无法解释为什么适宜保护可以扩大探索，可靠关系可以帮助进入新活动，而新的活动又能改变保护方式。

本书接受作者在本项目中明确的判断：三者不可分割，既促进又制约。[S06]这一判断不是说任何具体安排都已经协调，也不是说三项只能保持相同比例。它要求我们在同一 SIO 中研究它们怎样共同成立。

“保护”在这里指向安全与基本需要的保障，“稳定”指向可承接、可预期和可恢复的关系，“自由”指向孩子在适宜范围内影响活动并形成新差异的可能。三者的操作含义应随活动层级说明，不能只靠口号互相代换。

二、保护怎样成为自由的条件

在一个安全活动区的构造场景中，适宜边界减少了成人不断截断孩子行动的需要，孩子因此有更多可接续的步骤。保护并没有与自由等量相减，反而改变了自由能够持续的条件。

类似地，必要的身体支持可能让一个原本难以接近物体的孩子开始选择与探索。支持在外形上增加成人参与，在功能上却扩大孩子参与。由此可见，“成人做得多”与“孩子自由少”之间不存在普遍的简单对应。

但保护也可能变成替代。若每次活动都由成人完成关键步骤，孩子只接收结果，风险可能减少了一部分，参与也可能减少。需要比较的是保护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而不是把所有保护安排合成一个数量。

三、稳定怎样容纳差异

稳定不是活动永远按同一秒数和姿势发生。更可靠的稳定，是孩子与照护者在变化后仍有办法接续：活动可以暂停，必要支持仍在，错误解释可以被修订，新方式能够逐步进入。

构造一个例子：熟悉游戏加入了另一件安全物体，孩子先停下来，成人保留熟悉的交往方式并允许重新接近。旧关系提供承接，新材料提供差异。若把稳定理解为禁止新材料，活动就难以展开；若把变化理解为一下替换全部条件，孩子又可能失去可进入的联系。

所以稳定有时通过保持实现，有时通过修复实现，有时通过可理解的变化实现。三种情况不应被同一外形标准评判。真正需要记录的是，哪些关系被保留，孩子怎样参与，变化是否仍可被双方承接。

四、自由怎样反过来修订保护与稳定

孩子能够以新方式移动，原来的空间安排需要改变；孩子开始主动选择物体，成人的活动计划需要留出回应位置。新自由并非只是保护与稳定之后获得的奖品，它也会反过来重新规定二者。

在这个意义上，孩子不是被动等待成人分配自由。其活动持续显露现有安排的不足。成人的责任是辨认这些差异，在保障安全与必要支持的同时，判断哪些规则仍然适宜，哪些只是过去条件下的习惯。

但婴儿反馈并不自动决定最佳安排。孩子可能趋向不安全对象，成人应维持边界。尊重参与意味着解释和安排需要回应真实条件，不意味着让孩子承担判断所有风险的责任。自由必须与照护责任共同理解。

五、三者相互制约，为什么不必变成折中平均

设想两种安全且适宜的活动安排。甲保留更多固定步骤，乙允许更多材料变式。不能在不知道孩子条件与研究目标时，预先判定哪一种更好。某个孩子目前需要较清楚的开端，另一个已能在变式中维持活动；同一孩子不同时间也可能不同。

这提示一种条件性而非比例性的判断：先确认不可牺牲的安全与必要支持，再考察当前参与、关系连续和未来可能如何兼顾。它不是为三者各打分后求平均，也不是把某项成人偏好称为最优解。

作为理论提案，可以把适宜支持看成一组可行安排，而不是一个唯一点。不同安排可能分别改善不同方面，且没有一个在所有方面都占优。研究者应报告权衡和条件家庭则可结合真实资源作选择。数学语言在这里帮助澄清问题，不能凭空制造一个尚未测量的最优比例。

六、怎样将互构命题变成可检验问题

若只说三者都重要，几乎任何结果都能与之相容。更有区分力的假说是：在适宜范围内，某种支持对参与的作用，会随关系熟悉性或孩子影响活动的空间而改变。第 50 章将这种交互主张与单纯加性解释区别开。

比较不能人为制造危险或忽视。可以利用自然存在的适宜情境，或者在专业与伦理允许的范围内调整非必要提示。需要记录短期参与，也观察支持负担、活动持续与孩子的不同反应。一次表面成功不足以证明三者已经和谐。

若交互指标没有稳定证据，应限制相应经验主张，而不是把所有失败说成实践不够纯粹。哲学上的互构立场可以继续提出问题，具体预测却必须接受不被支持的结果两者有联系，但不互相提供免审资格。

七、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有边界的空间表达

> 本书提出一个分析图景：把所有可能的活动安排看作一个集合，其中有些不满足安全与必要支持要求，应先排除；剩余安排仍可能在熟悉性、参与方式和变化空间上不同。研究不是在三个好词之间平均分配，而是在可接受范围内比较不同组织。

保护首先限制不可接受的风险，但保护安排本身也要检查是否无必要地代替孩子行动；稳定使某些关系可依靠，但不要求所有形式永不变化；自由是在可承接条件中影响活动的可能，而不是把风险交给尚无能力承担的人。三者通过同一安排相互规定。

这一图景不是已经建立的优化算法。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把安全、感受与参与通约成单一数值的目标函数。它的用处在于阻止两种错误：用未来发展抵销当前基本保障或以保障为名取消一切可以安全发生的差异。

八、一个“多目标但不可任意交易”的判断例子

在构造情境中，成人有两种安全的材料摆放方式。方式甲更熟悉，但孩子影响活动的机会较少；方式乙保留必要支撑，并允许孩子提出不同接近方式。研究可以比较实际参与及后续变化，而不预先宣布乙总是优越。孩子当前状态、经验和支持条件都可能改变结果。

若两种安排各有益处，也不必强迫形成唯一排序。某时刻需要恢复熟悉参与，另一时刻适合尝试变化，这种动态选择并非理论失败。理论应当说明选择依据如何得到反馈，而不是给每一家庭发放一个永久最佳比例。

由此，促进与制约并非只能靠妥协消解。某项合宜限制可能保护活动继续存在，某种稳定关系可能释放新的尝试，新的尝试又可能要求保护方式改变。关键不是三者谁获胜，而是怎样组织出能够继续发生的关系。

九、同一限制在不同位置上有不同作用

一条保护边界可以减少不可接受的风险，也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中断。它的自由效应不只取决于边界宽窄，还取决于边界以内的活动能否持续。如果一个区域已经适宜，成人仍逐步接管孩子的每次动作，形式上的安全空间便没有转成实际参与。若先改进区域，再减少非必要干预，同一保护目标反而可以支持更自主的活动。

这里存在一个顺序问题。先撤去介入、后处理安全条件，与先建立可承接范围、再调整介入，不是同一种安排。前者可能把尚未解决的责任交给孩子，后者则改变成人能够放手的条件。三者不可分割，不意味着三项必须同一时刻以相同程度变化；它们可以通过不同先后关系形成或破坏相互支持。

稳定也具有这样的顺序性。孩子进入陌生活动时，保留熟悉的开端可以帮助开始；当参与已经持续，成人仍不断把过程拉回开端，又可能阻止新的变化。一个安排在前一阶段提供承接，在后一阶段形成束缚，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它在活动链中的位置已经改变。

十、用状态转换而非固定比例描述支持

本书提出一个供研究的状态图景：活动尚未进入、活动正在被孩子接续、活动需要暂停恢复。这三个状态不是婴儿的三种人格，也不是三态本体论的重新命名，只是

一次具体活动的操作划分。成人的任务应随状态改变，而非用同一介入强度覆盖全部过程。

尚未进入时，要先辨认是可及条件不足、兴趣不在这里，还是身体状态不适合；正在接续时，可以保留必要支持而避免无故代替；需要恢复时，则应让暂停具有真实效力。三种判断都可能错误，因此还需观察转换之后的结果。状态划分的价值在于让不同支持对应不同问题，而不是给孩子再贴三个标签。

这个图景允许一种常被忽略的成功：从正在参与转为适宜休息，而不是不断扩大任务。若只把继续活动视作正向转换，所有退出都会被当成需要纠正的偏离。保护、稳定与自由共同要求尊重恢复，因为不能承接停止的关系，也难以持续承接新的开始。

十一、为什么微小波动不应触发全部安排的反复切换

一个孩子短暂转头，不一定意味着整个活动已经失效；一次新尝试也不保证原有支持可以撤去。若成人对每个瞬时变化都作大幅调整，关系可能变得难以理解。这里需要区别即时信号与持续模式，尤其不能把“敏感回应”理解成没有任何时间整合的机械跟随。

可以借用一种纯粹分析性的原则：进入新支持方式与退出该方式，不必以同一个瞬时表现为依据。对于安全与基本需要，及时回应具有优先性；对于非必要的游戏提示，则可以结合一段连续活动再判断。这个区别不是给家长规定等待秒数，而是指出不同类型的反馈需要不同证据尺度。

构造一个例子：孩子偶尔能够完成某步，成人立即永久撤去支撑；下一次未完成，又完全接管；再下一次短暂成功，又全部撤去。反复切换使孩子难以形成持续参与。另一种安排是保留必要支持，只逐步改变偶然提示，并观察其在合宜条件中的作用。稳定因此不是不改变，而是改变有依据、有承接，且可以修订。

十二、促进与制约具有非单调性

增加成人介入，可能先使活动从无法进入变为可参与；继续增加，则可能使孩子能够承担的步骤被代替。减少介入，也可能先释放空间，继续减少又使必要支持不足这个非单调关系是一个逻辑可能，并非本书已经测得的普遍曲线。它足以说明，不能只用介入多少来预测自由多少。

同样，熟悉性可以降低进入负担，却可能在过度固定的程序中遮蔽新差异。变式可以提供新的学习条件，也可能在支持不足时使活动无法持续。要确定拐点在哪里，必须研究具体孩子、任务与关系，不能从一般机制直接推出一套统一最优强度。

这里的理论进步并不是画一条漂亮的倒 U 曲线。真正需要比较的是：介入增加时首先改变哪个环节，何时开始替代婴儿行动，哪些必要条件仍在限制活动。若数据表明某个安全范围内介入一直有益，应接受该范围内的单调结果，而不是为了维护三者相互制约，硬要找到一个负面端点。

十三、三方程给出不同的调整对象

假如新活动反复中断，S 是可观察的中断方式，D 是实际尝试次序，E 是支撑、材料、关系与已有组织之间的配合。第一种调整是改变 D，例如成人不再提前替代，允许孩子完成尚可承担的转折。第二种调整是改变 E，例如改善可及位置或交接方式。第三种则是重新界定希望出现的 S，不再把一个不适宜目标当作唯一成功。

第三种尤其重要。研究者常把目标设定当成不可变背景，只要求孩子和条件围绕它调整。但若所谓成功本来就是成人完成任务，或者任务超出当前适宜范围，继续优化手段便可能加重压力。重新规定结果不是降低尊重，而是使结果真正反映孩子能够参与的活动。

三原理在这里并非替所有矛盾提供抽象和谐。某些约束无法在当前资源内全部改善，家庭可能需要外部支持；某项安排有真实代价，也可能必须暂时保留。发生学应当帮助区分可调整、需支持与不可接受，而不能以“动态平衡”掩盖基本保障的缺口。

十四、一个反事实审查使价值判断更清楚

当成人说某项限制是为了保护，可以追问：若存在同样安全、但保留更多孩子参与的安排，是否愿意采用？若不愿意，限制可能还包含管理方便或习惯因素。这个反事实不用于指责，而用于把不同理由从一个保护名义中分开。实际有没有这样的替代安排，仍需根据空间、资源与专业要求判断。

当成人说某项改变是为了自由，也可以追问：孩子是否真的获得了影响活动的渠道，还是只是失去原来的支持？当成人说坚持程序是为了稳定，则追问：程序是否仍

帮助关系接续，还是主要保护成人免于修改判断？三种反事实针对安排的实际功能，不以成人口头使用哪个价值词决定结论。

这些审查最终需要回到婴儿反馈，但不能把任何即时偏好当成全部价值。儿童可能被危险物体吸引，成人仍要保护；也可能暂时没有表现出对必要支持的理解，支持仍应继续。反馈参与判断，责任与证据共同限定判断，这才是促进和制约相互贯通的含义。

一个有活力的养育关系，不是三项价值永远没有冲突，而是冲突能够通过具体条件被看见、被讨论并得到合宜调整。独特的“我”不是在保护之外诞生，也不是在稳定结束后才获得自由。它在可进入、可接续、可恢复的生活中，持续改变这些价值怎样成为现实。

十五、爱不是无限增加，而是有判断地共同调整

爱的价值在这里不是单纯多保护、多重复或多放手。一个成人可能因爱而接住孩子，也可能因爱而允许他在安全范围内重新尝试；可能因爱保留熟悉关系，也可能因爱修改已经僵化的规则。

孩子的反馈持续参与这些判断，家庭的资源与支持持续限定这些判断。保护、稳定、自由不是三份独立礼物，而是在具体生活里相互生成的条件。三者真正被连接时独特的“我”不是被放任成任意形状，也不是被固定在成人模板中，而是在可承接的关系里获得继续发生的机会。

19

第 19 章

爱不只来自母亲：家庭中的多主体 SIO

返回目录

一、一个孩子，几个不同的相遇方式

在作者构造的家庭里，父亲擅长跟随孩子的物体探索，祖母熟悉某些日常节律，母亲更容易辨认一类身体反馈，托育照护者则看见孩子在群体活动中的另一面。这些差异不证明某个人更爱孩子，也不保证他们的理解全部正确。

一个婴儿进入多人的生活，同一活动便可能获得不同解释。关键不是消除所有差别，而是让不同观察能够互相修正，并维持必要信息的连续。高阶婴儿符号的发生，不能被缩成一条固定的母婴输入线。

本书也不以血缘或性别预设唯一有效照护者。关系的具体质量需要从持续性、可及支持与实际回应中研究。某些身体和生活条件确有差别，不能因强调多样性就抹去但这些差别不自动构成爱的道德等级。

二、共同照护改变的是网络，而不只是人数

增加照护者不必然增加支持。若彼此无法交接、基本要求冲突或责任不清，多人也可能使活动缺少连续性。反过来，人数较少的家庭也可能通过可靠的外部服务形成可持续支持。网络的组织比简单人数更值得分析。

一个构造例子是，白天照护者发现孩子对新的活动方式有更好的参与，晚间家人却不知道，仍按旧解释处理。问题不是哪一方不够有爱，而是信息没有进入下一段SIO。一次清楚的交接，可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后续安排。

这里的“信息”也不能只是一句“今天很乖”。更有用的是具体条件：什么活动、怎样开始、孩子怎样回应、哪些做法没有如预期。细节不必很多，但应当让接手者知道如何继续观察，而不是只接受一个结论标签。

三、不同形式怎样保留共同功能

多照护者之间不必复制同一声调和每个动作。孩子可能在不同人那里形成不同而可承接的活动。共同功能可以是获得适宜支持、能够表达变化、活动可恢复，而非所有形式相同。

但功能也不能由成人自说自话。若每个人都宣称“我的方法让孩子安心”，却不看具体反馈，就没有共同标准。可以比较的是孩子是否能够持续参与，必要需要是否得到照护，出现受阻时成人怎样修订，以及这些判断在不同记录中能否相互印证。

在符号判据上，这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某种活动组织能否跨不同照护者保持，而哪些部分仍依赖特定关系？这不是要求孩子立刻适应任何人，而是研究稳定性的边界。特定依赖也可能是真实而重要的关系条件。

四、一个跨文化提醒

Hewlett 关于中非阿卡父婴关系的民族志呈现了父亲接近婴儿和直接参与照护的文化情境。[R10][R29]本书不把这一材料变成所有父亲应达到某一小时数的指标，也不将一个社会的实践直接当作普遍演化定律。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提醒研究者不要把自己熟悉的性别分工当成婴儿照护唯一可能的自然形式。谁经常抱持、谁参与日常活动、其他亲属怎样接续，需要结合具体社会组织说明。第 37 章将进一步讨论其材料与边界。

由此，家庭 SIO 研究既要看到亲密关系，也要看到劳动与资源。谁有时间照护，谁能够获得休息，谁在外部服务中具有发言权，都会进入孩子的实际生活。亲情不能被隔离成不受制度影响的纯私人情感。

五、孩子怎样在差异中形成自己的连续性

一个孩子可能在不同成人面前显露不同活动倾向。这不必立即被解释为不稳定人格或故意操纵。不同关系提供不同的进入条件，已有历史也不同；同一个高阶“我”可以包含情境差别。

研究应追踪，哪些跨关系组织正在形成，哪些仍保持局部性。例如，孩子是否以不同动作寻求相似支持，能否把某种新探索带入另一项活动，成人是否识别这种变化表面形式不同，可能存在功能连接；表面一致，也可能由成人程序推动。

这使“统一养育”获得更精确的含义：统一的是尊严、安全、必要支持和愿意修订的责任，不是把孩子在所有关系中的表现压成同一种样子。多样性可以保留，只要它能够被共同生活承接。

六、交接不是把孩子移交，也是在移交理解

在作者构造的家庭场景中，两位照护者轮换。第一位只说“他刚才哭了”，第二位获得的是事件标签；若同时说明当时的活动、已经尝试的调整与孩子随后反应，第二位获得的则是一段可继续辨认的关系史。孩子没有改变，交接组织却不同。

信息越多不一定越好。固定标签可能随交接被反复强化，例如一次迟疑被传成“他一直胆小”。因此，交接需要区分实际观察和解释，保留不知道的部分，使新照护者能够继续观察，而不是只执行旧判断。

多主体照护的连贯性，因而不应建立在每个人都采用完全相同动作上。它可以建立在必要支持不被遗漏、重要反馈可被承接，以及新的差异能够进入下一轮安排上。形式允许变化，责任与关键信息仍应保持可追踪。

七、共同照护怎样既不集中垄断，也不分散到无人负责

照护网络可能出现两种相反困难：一位成人被要求独自理解一切，其他人难以参与；或者每个人都以为别人已经处理，实际需要无人承接。增加参与者数量本身不能解决这两种组织问题。

作为实践分析，可以区分当前承担、协助支持与必要时转交三个位置。它们不是固定性别角色，也不是给家庭新增行政制度，而是使某次活动中谁需要行动、谁能够帮助、遇到困难怎样连接更清楚。婴儿反馈应能改变安排，但不承担协调网络的责任。

这样理解的“我们”，不是许多个体的简单相加。它需要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形成实际连接，同时保留婴儿自己的需要不被成人意见平均掉。高阶家庭符号的整体性，不能靠让最弱的成员适应所有冲突来维持。

八、多人参与不等于无人负责

高阶家庭符号不能成为责任稀释的理由。孩子需要具体的人在具体时刻承担照护，交接不能停留在“大家都在”。当活动出现问题，需要明确谁观察、谁协调、何时求助，而不是让关系网络成为推诿的空间。

同时，也不应把责任全压给最贴近孩子的一个人。分担、休息与可及服务是共同照护能否持续的条件。支持照护者并不是绕开婴儿，而是在改善他所处的实际关系组织。

爱不只来自母亲，并不降低母亲的地位；它让其他参与者的作用得到看见，也让母亲不必被要求成为无所不能的环境。多主体 SIO 研究的目标，是把这个婴儿真实生活中的支持网络组织得更清楚，而不是为家庭再造一套谁最合格的排名。

20

第 20 章

婴儿让成年人生成新的“我”

返回目录

一、成为父母不只是一项称谓变化

孩子出生后，成人获得父亲、母亲或其他照护角色，这是一项社会身份变化。但角色名称本身并不会自动提供具体知识。一个人可以已经被叫作父亲，却仍在学习怎样理解这个孩子；一个没有生育经历的稳定照护者，也可以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独特的照护关系。

本章研究的不是身份授予程序，而是这些角色怎样在实际活动中获得规定性。孩子的身体条件、反馈、活动兴趣与变化，会让成人重新安排时间、修订判断、学习支持，并形成此前没有的生活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成人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教育者，把内容输入尚未完成的婴儿。两者都在变化，但变化方式、能力与责任不相等。共同发生不能被浪漫化成平等的心理互助关系，婴儿不是成人的治疗者。

二、一次失败的安抚可以改变谁

> 在作者构造的场景中，父亲此前习惯用一种方法安抚孩子。某一天原方法不再适宜，他最初感到挫败，后来在观察与求助中找到另一种安排。变化不仅是孩子得到新的支持，也是成人不再把“我会照护”理解为掌握唯一技巧。

这里可以区分三层成人变化：知识的修订，行动习惯的修订，以及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变化。三者可能相互联系，也可能不同步。成人会了一个新动作，不等于已经建立更开放的角色观；自认更有耐心，也不保证行动实际改变。

SDE 分析要找到具体回写路径。孩子的什么反馈进入了成人判断，成人据此怎样修改安排，修改是否影响后续关系？只有这些路径得到说明，才不只是用“孩子教会了我爱”一句话概括复杂过程。

三、婴儿参与了家庭时间的重组

家庭原有的工作、休息和交往节律，在孩子进入后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这里不宜只写温情，也应看见负担与冲突。照护时间由谁承担，改变是否获得支持，角色期待是否公平，都会影响关系怎样继续。

一个构造家庭把所有夜间责任默认给同一人，白天又要求她始终稳定回应。问题不可能仅由更强的个人意志解决。家庭需要重新分担，外部服务与工作条件也可能进入讨论。环境 SIO 集合的研究在此具有实际意义。

孩子以自身需要改变成人时间，但并不因此对成人的制度困境负责。将因果作用与道德责任分开，是本书不可放弃的界限。成人世界应处理自己的协作，而不是期待婴儿通过更安静、更配合来解决全部矛盾。

四、成人的三界怎样被重新连接

现实侧，新的照护活动改变身体劳动与空间安排；理念侧，关于好父母、好孩子和成长的判断接受现实检验；自我侧，成人对能力、脆弱、牵挂与边界的理解可能变化。这些侧面在同一生活事件中交织，但没有一种固定的必然结果。

一个成人可能因此变得更愿意求助，也可能因压力而更坚持旧程序。三界变化不天然正向，不能把亲子关系写成自动使人高尚的机器。发生学既要分析新的能力，也要分析固化和损耗。

三原理可以帮助定位需要调整的环节：旧的自我要求与实际显露冲突，可能需要改变活动路径或资源关系；孩子的变化超出既有解释，则可能需要重组 E，而非只加大原方法力度。具体判断仍须由实际条件支持。

五、共同发生不要求双方拥有相同解释

成人可能把一次活动理解为建立亲情，婴儿主要通过感觉与动作参与。不同层级的意义不妨碍共同活动成立。共同发生不是两个人先达成成熟共识，再开始行动；它可以发生在表达能力不对称的关系中。

这种不对称也要求额外责任。成人拥有更强的命名、记录与决策能力，因此更容易让自己的故事覆盖孩子。承认孩子的独特“我”，需要保留那些不符合成人叙事的反馈，而不是只将孩子当作成人成长史的推动人物。

一个家庭的故事可以温暖，但必须允许孩子后来成为故事之外的人。婴儿参与成人的发生，不等于他的一生必须承担完成父母意义的任务。高阶家庭符号需要容纳成员差异，而不是以整体名义取消个体。

六、成人的变化至少有三条不同轨迹

第一条是知识轨迹：原来如何解释孩子，现在怎样修正。第二条是行动轨迹：解释是否真正进入了安排。第三条是自我理解轨迹：成人怎样认识自己作为照护者的能力、限制和责任。三条轨迹可以相关，也可能不同步。

一个父亲能够说出孩子需要更多等待，却仍因日程压力立即接手，这是知识与行动的距离；一位祖母已经改变操作，却仍把调整理解成自己过去“做错了一切”，这是行动与自我理解的距离。发生学不能只看是否学会正确说法，也不能把一次情绪反应当成整体角色定型。

这些场景是作者构造的分析例。它们提示研究应同时记录解释、行动和关系条件，避免把成人所有变化归结为婴儿单一影响。工作安排、其他家庭成员与服务支持也会进入过程。婴儿是参与者，不是成人发展的一切原因。

七、相互成就不能变成相互索取

说婴儿使人成为父母，可以表达关系身份的生成；若进一步要求孩子以顺从、成绩或情感回报证明父母的人生价值，就改变了命题性质。关系带来的意义，不能自动转成对婴儿的债务。

照护者可以从共同生活中获得喜悦、能力和新的自我理解，也有自己的支持需要。但这些需要应尽可能通过成人与社会资源承担，而不是要求孩子减少表达来维持成人自尊。高阶“我”的共同发生，需要保留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称。

因此，爱的双向性不是交换同等数量的情感。它首先承认双方都可能改变，其次要求在不同承担能力中安排责任。只有把这两层分开，婴儿改变父母才不会被误写成婴儿必须治愈父母。

八、第四编的结论：爱本身也有历史

从内在情感到实际行动，从日常照护到多主体协作，再到成人角色变化，本编展示了爱的发生史。爱不是始终不变的力，孩子也不是始终不变的受体；两者在具体关系中持续改变，而外部支持与身体条件共同参与。

保护、稳定、自由的互构因此不是一套只施加给孩子的规则。成人也需要安全的支持、可持续的生活与修订行动的空间。这样的条件并非与孩子利益对立，很多时候正是可靠照护得以持续的基础。

本书最终希望保留一种双向的尊重：让婴儿不是被塑造的材料，也让照护者不是永远不会疲惫的工具。共同发生的积极意义，在于关系能够支持双方继续改变，同时将更强的保护责任留在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一方。

第五编 / PART 05

符号粒子、波与场：从哭声到可调用的世界

第 21—25 章

21 一声哭如何由事件成为可辨认符号

22 重复不是机械堆积：经验怎样留下结构

23 活动序列中的波态：预期与转折

24 场态：环境 SIO 集合与高阶约束

25 打开旧符号：从稳定到再发生

21

第 21 章

一声哭如何由事件成为可辨认符号

返回目录

一、哭声不是已经翻译好的词

孩子哭了，成人立刻想知道原因。这种寻找是照护的一部分，但若把哭声看成固定编码，每一种声音对应一个唯一需要，就可能过早停止观察。声音、身体状态、活动前后和回应后果，应当共同进入判断。

本章不提供哭声诊断表，也不训练家长依据声音排除健康问题。持续不适或其他令人担忧的表现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任何符号解释都不能成为延迟必要照护的理由。

我们研究的是另一件事：一段身体事件怎样在反复关系中成为能够被辨认、能够引出回应又能够被修订的活动单位。这里至少存在婴儿自身的活动组织，以及成人关于孩子的解释组织，两者不能视为同一个符号。

二、事件、信号、解释与组织

一声哭首先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在某个照护关系中，它能够引起成人行动，因此可以具有信号作用。成人说“他可能饿了”，是对事件的解释。若某类状态、活动与回应在明确条件下形成可重复关系，则进一步提出稳定组织的问题。

这四个层次可以同处一个现场，却不能相互代换。成人解释稳定，不证明原因判断准确；婴儿停止哭泣，也不一定只由成人刚采取的动作造成。若只保留成功回应的故事，符号的稳定性很容易被高估。

在 SDE 框架中，意义不必等待成人正确翻译才存在。孩子的实际身体活动不会因误判而消失。但误判可以通过改变照护进入后续发生，所以存在与表征虽然区分，却始终可以相互影响。

三、一段回应序列怎样逐步形成

以下是作者构造的观察片段：孩子哭泣，成人结合情境提出一个暂时判断，采取适宜行动，再观察身体与声音是否变化；若原解释不充分，就继续检查或求助。这里没有一个步骤能保证正确，关键是后续反馈仍有机会改变判断。

在这段活动中，孩子不仅提供第一个信号，还持续参与后续序列。成人改变姿势后，孩子可能接近、退开或继续表达；这些变化又影响成人。若把哭声仅作为启动按钮，按钮按下后完全由成人程序接管，就会遗漏这种持续参与。

因此，可辨认符号并非只是成人“听懂了”。它也可能是双方在反复活动中形成某种可接续关系：某些开端引出适宜支持，变化得到重新观察，活动能够转入下一步具体是否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仍要按第 3 章的层级标准研究。

四、辨认越熟练，越要保留误判入口

长期照护可以形成丰富经验，但经验也可能变成自动标签。成人记得孩子过去常在某种情况下哭，便把后来所有哭泣都归入同一原因。此时，符号的稳定性可能遮蔽新的差异。

一种开放的辨认应保留“这次与过去哪里不同”。例如活动前后、身体表现或回应后果是否改变。这样的检查不是要求成人永远怀疑一切，而是让熟练不丧失修订能力。旧组织能够继续，是因为它对实际情况仍有解释力，而不是因为过去曾有效。

三原理在这里可以表现为：既有 E 与当前 D 无法产生预期 S，因而需要重建解释或活动方式。若孩子反复提供不一致反馈，成人却只加强同一做法，就没有真正让差异进入理论。符号发生学的开放性必须首先体现在这种普通照护判断中。

五、从“哭得少”到“关系是否更可承接”

若以哭泣次数或时长作为唯一目标，就可能把安静误当作全部需要得到满足。研究可以记录这些指标，但还应结合活动状态、适宜支持与后续参与。一个复杂生命不能被单一外在表现充分概括。

同样，不应把哭泣更多直接解释为父母爱得更少或孩子气质更差。身体条件、活动环境与许多未记录因素都可能参与。个体判断需要专业与长期信息，不能从一次观察作道德结论。

本书提出的研究方向，是比较关系如何承接信号：成人是否结合情境、是否允许解释被反馈修正、必要支持是否及时进入、孩子后续是否有可参与的活动。这些问题并不能直接测量“爱本身”，却能使爱的实际实现更可讨论。

六、同一段声音里，有两种不能混同的符号发生

第一种发生在婴儿自身的活动组织中：身体状态、发声与后续关系怎样连接。第二种发生在照护者的理解中：他怎样把声音与情境联系起来，并据此采取行动。两种组织相互影响，却不必具有同样的内容和边界。

照护者可能正确辨认某种需要，也可能误判；孩子可能因为某项支持而改变活动，也可能由于另一条件变化而暂时安静。不能由安静结果直接证明成人的解释正确，更不能从成人能解释一声哭，推定婴儿已经用同一个概念表达它。

这使哭声研究超出“翻译”的比喻。翻译容易预设两端都已有完整词义，只缺一张对应表；实际照护却可能在反复活动中共同建立新的可辨认关系。符号意义不仅被传递，也可能在后续回应中形成和改变。

七、错误解释怎样获得稳定，又怎样被重新打开

在作者构造的场景中，成人把哭泣理解为不愿参与，于是每次都立即结束活动。活动停止后哭声变化，成人便更加相信原解释。但这个结果也可能与其他条件有关，不能自动排除不适、支持不匹配或活动组织问题。

一个解释可以因为反复得到同一类后果而稳定，却仍然过窄。这不是要求家长进行复杂实验，而是提醒研究者检查解释改变了哪些条件，以及这些改变是否遮蔽了别的可能。不能通过延迟必要照护来区分原因，疑似身体问题仍应依据专业建议处理。

重新打开解释，意味着允许新的反馈进入，而不是把旧经验全部否定。成人可以保留原来有效的支持，同时修正“每次一定如此”的说法。哭声由此显示了表征回写的双刃作用：解释可以帮助关系继续，也可以把活动锁在一种尚未充分检验的意义里。

八、一个输出可以对应多种发生路径

从身体状态、情境与活动到哭声，是一个生成方向；从哭声反推原因，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我们知道某类状态有时伴随某种声音，也不能因此从听见声音直接确定状态。一个输出可能由多条路径产生，同一条路径也可能在不同条件中产生不同输出这是推理结构上的限制，不依赖某种特定哭声分类理论。

为了说明，可以构造两种未命名状态甲、乙，它们都能产生相似的声音表现，但对后续支持的反应不同。仅凭声学记录，甲与乙在这次观察中不可区分；加入活动前后、身体表现和实际回应后果，才可能逐步缩小解释范围。这里故意不用疾病名称，也不给出诊断规则，因为本书讨论的是解释机制而非家庭医疗判断。

逆向推理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成人什么也不能做。照护可以在原因尚未完全确定时提供适宜保护，并根据变化继续核对。需要避免的是两种极端：把任何经验判断当作精确翻译，或因为不能获得绝对确定而推迟必要行动。认识与行动的要求可以不同，二者应在安全底线内共同组织。

九、熟悉经验改变解释起点，不保证解释终点

长期照护会形成关于某些情境的先前预期。孩子在熟悉时段出现某种表现，成人倾向先考虑过去常见的原因，这种经验可以提高判断效率。但如果预期过强，新证据就容易只被用来证明旧判断。符号稳定在此既是资源，也可能变成误判的维持机制。

可以将解释更新理解为三个问题：当前情境让哪些解释更值得先考虑，新的反馈更符合哪一种解释，仍有哪些重要情况不能被排除。这个分析类似概率推理的工作结

构，但不要求家长计算数值，更不主张把婴儿需要缩成一个自动评分。其作用是让“熟悉”保留可修改性。

例如，成人采取一种熟悉安抚方式以后，哭声减弱。这个结果可以支持继续观察，却不自动证明原来的因果解释。与此同时可能发生的姿势、接触、活动中止或时间经过，都可能参与。若一次行动同时改变多项条件，观察到改善只能说明这个组合在当下有作用，不能精确分配每项因素的贡献。

十、为什么安静不能成为唯一正确标签

将“回应正确”定义为“孩子停止哭泣”，会产生一个认识上的陷阱：任何能减少外在表达的安排都被算成正确，其他需要则从判断中消失。声音变化是重要反馈，但它需要与身体状态、后续参与和必要照护一起理解。对一个尚不能充分语言表达的生命，不能让成人方便观察的结果垄断全部评价。

更深的循环发生在成人解释与行动彼此证明时。成人认定孩子不喜欢某活动，每次哭泣便立即取消；取消以后声音改变，原解释获得强化。但取消同时改变了很多条件，因此循环可以稳定，却仍然没有区分真正原因。稳定的解释不等于已经准确把握了婴儿的活动组织。

研究可以通过保留不同自然情境中的资料来检查这一循环，而不是人为延迟照护。某种表现是否只在特定安排中出现，必要支持改善后是否改变，成人的标签是否先于观察影响了记录，都值得考察。尤其应记录不符合惯常解释的片段，因为它们可能指出关系需要修订的入口。

十一、观察记录应保留三个平行栏目

第一栏写实际看见或听见的变化，第二栏写成人当时的暂时解释，第三栏写因此采取的行动与后果。三栏并列，可以防止解释偷偷变成事实。例如，“转头并继续发声”属于观察，“不愿被打扰”属于解释，“停止当前游戏”属于行动。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分析，而不是在一个词里完成。

同一记录也应保留不知道的部分。没有观察到明确原因，不意味着记录失败；能够说明哪些解释尚未分开，本身就帮助下一次判断。相反，如果每一段哭泣都被准确填入一个原因格子，表格可能只是反映成人不允许不确定性，而非实际理解有多精确。

这类记录只宜轻量使用，不要求全天监测，也不作为临床工具。对持续不适或其他发展担忧，应寻求相应专业评估。它对 SDE 研究的意义，在于把婴儿的存在发生与成人的表征发生放在同一时间轴上，却不让任何一方替代另一方。

十二、解释的错误成本并不对称

不同错误可能具有不同后果。把一次短暂的游戏停顿理解得过于复杂，与把需要及时处理的不适轻率归为习惯，不能用同一种准确率评价。对于实际照护，重要的是哪些错误可能阻断必要支持，而不只是分类表总体对了多少。这一原则同样约束使用算法分析声音的工具。

一个模型即使在既有样本中分类良好，也需要面对录音条件、月龄、身体状态、家庭情境和标签来源的变化。若训练标签主要来自成人猜测，模型可能学会复制猜测而不是识别真实原因。这里提出的是测量与建模风险，不是在断言所有工具都失败；但它足以说明技术输出不能直接获得诊断权威。

在本书的发生框架中，工具可以帮助整理记录，却不应取消与孩子实际相遇的过程。声音分类越便利，越需要保留身体、情境与后续回应。否则一个本来为了提高敏感度的工具，可能使成人只听见屏幕上的标签，而忽略眼前新的差异。

十三、哭声符号的生成，不只是成人识别能力提高

研究还应关注婴儿一侧的组织如何变化。某些表达能够较可靠地引出适宜回应，孩子与成人之间就可能形成更可接续的关系；另一种情形中，成人只有在表达变得很强烈时才察觉，活动的开始方式可能因此不同。这里需要纵向证据，不能从一次声音强弱直接推断长期经验，更不能把表达方式归责于孩子。

这条问题线连接局部事件与高阶历史：不是每声哭都成为永久特征，而是哪些表达—承接关系被保留，并在后来活动中重新出现。关系改变以后，原先的表达形式也

可能变化，因此不能用早期一次归类预测整个人格。声音作为符号的稳定性始终包含改变的条件。

从翻译转向解释更新，意味着承认婴儿不是装着固定词典的发声装置。成人也不是站在活动之外读取编码的观察者。他们的理解和行动进入过程，孩子的反馈再改变理解。对这一循环作清楚而有边界的研究，才可能让“听懂孩子”从自信的口号变成能够持续修订的照护能力。

十四、哭声怎样进入高阶“我”的历史

一次回应可以使成人修改下一次判断，也可能使家庭调整照护安排。孩子在新的关系中继续活动，再显露不同反馈。哭声因此不是孤立的声学点，而是有机会进入跨时间组织的一个事件。

但从一次哭声到高阶“我”没有捷径。需要追踪哪些关系被保存，哪些只在当次有效，哪些解释后来被推翻。成人能认出声音，并不证明孩子已经形成对应的语言概念；孩子尚无语言概念，也不意味着他没有参与符号的存在发生。

一声哭最值得被听见的地方，或许不是它能够被归进哪一格，而是它让关系必须暂停预设、重新接近这个孩子。符号的力量既在于辨认，也在于当旧辨认不够时，为新的理解打开入口。

22

第 22 章

重复不是机械堆积：经验怎样留下结构

返回目录

一、又一次，并不等于同一次

孩子把一个安全玩具放下，又拿起，随后改变方向再放下。成人可能觉得“已经玩了很多遍”，但在这个构造场景里，每次活动的起点、动作和后果都可能有差别。重复并非必然缺少新信息，变式也不必来自新的物品。

反过来，活动次数增加，并不自动意味着组织正在发展。若每一步都由成人接管，孩子可能反复得到相同结果，却较少参与结果形成。研究要区分接触次数、行动机会实际调整与后续迁移，不能把它们统称为练习量。

本章的问题是，哪些差异通过重复成为可保留的关系，又有哪些只是不断出现而没有进入更稳定组织。答案不可能由“重复很重要”这一句话给出。

二、重复至少可以改变三种东西

第一，某些活动关系可能变得更容易进入；第二，个体可能更能区分哪些条件适用、哪些不适用；第三，原有活动可能与其他活动建立联系。三种变化并不总是同步熟练度增加，不等于辨别范围一定扩大；连接更多活动，也不等于每个局部都更快完成。

在构造案例中，孩子最初能够拿住一个物体，后来学会根据位置调整，再后来把它递入共同活动。不能只把这些变化描述成同一动作重复得更好。活动之间的组织改变，可能比单项速度更接近本书关心的高阶发生。

不过，阶段顺序只是说明，不是每个孩子的固定轨迹。研究应从真实记录辨认哪些关系已经形成，而不是按故事要求孩子完成下一步。

三、学习可以被观察，不必先由语言报告

Saffran、Aslin 与 Newport 的婴儿统计学习实验，为在明确任务中研究早期序列学习提供了经典材料。[R26]其意义在于，不能把不会言语解释等同于不能学习；但也不能把一项统计辨别任务直接当作成熟语义、自我意识或全部学习能力的证据。

本书借这一类研究提出方法要求：观察到差异反应后，应进一步说明任务、比较条件与可能机制。熟悉性、注意变化、身体活动和关系支持可能分别参与。SDE 若只将任何学习都称为“纠缠”，并未增加解释。

新增解释必须落到更具体的问题，例如某类序列组织是否能迁移到新的活动，或者成人回应的时序是否改变保留条件。这些主张需要另行设计与检验，不由已有实验自动担保。

四、反馈使下一次不再从原处开始

一次尝试后的结果可能改变后续选择。孩子调整方向，成人改变材料位置，家庭修订活动安排；下一次虽然仍叫同一个游戏，起点已经不同。重复因此包含回写，而不是同一输入向同一容器不断累加。

可以用一个概念性记录表示：本次条件 C_t、实际活动 A_t 与显露 R_t，经过可辨认的保留关系进入下一次 C_{t+1}。这个表达只是帮助追踪，不是一个已经量化的学习方程。需要说明哪些改变由身体、孩子活动或成人安排承接，不能把所有差别都交给一个黑箱。

在 SDE 中，E 也不是装满经验的仓库。过去只有通过当前实际组织发挥作用，才成为后续发生的条件。某次经验发生过，并不保证它一直有效；旧联系可以减弱、失效，或在新的关系中被重新组织。

五、保持与变化需要不同的证据

当天更顺利，可能反映短时状态；隔一段时间仍能进入活动，涉及保持；改变材料或场景后仍能作适宜调整，则提出迁移。三者都值得研究，但不能用其中一个替代其他两个。

同样，迁移失败需要具体分析。新任务可能额外增加了身体要求，也可能撤去了必要支持。如果比较条件不公平，失败不能证明旧组织只是机械记忆。独立性测试必须建立在相应层级上，而不是把任何变动都称作等价的新情境。

这种区分也保护家庭免受“多练就会”的单一要求。当活动缺少可及条件，增加次数未必解决问题；当孩子需要休息或专业支持时，反复训练更不能替代必要安排。发生学应帮助识别条件，而不是把责任变成重复次数不足。

六、次数相同，活动历史仍然可以不同

设想两组说明性活动都包含若干次接近、停止和再次参与。甲把相似活动紧密重复，乙在适宜条件变化中展开。若只统计总次数，两者相同；若记录先后次序、间隔与反馈，组织可能不同。本书由此提出序列问题，而非宣称某种安排普遍更优。

所谓重复，需要说明被重复的单位。重复同一动作、重复同一结果、重复一段关系功能，并不相同。孩子用不同动作维持接触，可以在形式变化中保留关系；成人把相同动作逐次完成，也可能尚未让孩子形成可调用组织。

因此，研究可同时保留活动频次与关系次序，而不让一个变量代理全部学习。如果更复杂的序列描述并未提供额外解释，就承认其作用有限；不能因为发生学重视历史，便规定历史指标一定胜过简单指标。

七、熟悉以后发生的新变异，并非对学习的污染

一个组织逐渐可用，孩子可能不再按原来的唯一方式活动。新的转动、停顿或组合，使熟悉关系出现变异。成人若只以准确重复评估，就可能把探索误记为退步；但研究者也不能反过来把每次偏离美化为创造。

需要追踪变异与已有组织的联系。它是否保留某些可依靠的关系？是否产生孩子能够继续承接的后果？是否使新的活动成为可能？这些问题比简单的“对了几次、错了几次”更贴近本章的发生研究。

于是，重复和变异不是先后完成的两个阶段。某些关系可以稳定，其他关系同时变化。学习的组织性恰恰可能在这种局部保留与局部改变中发生，而不是先把所有动作练到完全固定，再由成人宣布开始创新。

八、相同次数可以包含不同的可学习关系

下面是一个纯粹的逻辑例子，不是婴儿实验。序列“甲乙甲乙甲乙甲乙”与“甲甲甲甲乙乙乙乙”，都出现四次甲、四次乙。如果只统计每种事件的频率，两者完全相同；若考察甲之后接着什么，两者便明显不同。第一条序列中，甲之后总是乙；第二条序列中，四次甲之后只有一次转向乙，其余继续为甲。

所以，次数摘要丢失了某些关系，而不是因为数字本身不适合研究。进一步统计转移，便保留了另一层结构。但是转移统计仍可能丢失更长的历史：两条序列可以有相近的相邻转移，却在较长组合上不同。发生学的任务不是无限保留所有细节，而是说明哪一级关系对于当前问题具有后续作用。

Saffran、Aslin 与 Newport 关于八个月婴儿统计学习的研究，为在有限任务中考察语音序列规律提供了经典证据。[R26]然而，研究中表现出序列辨别，不等于孩子已经形成与成人相同的词义。本书将这一证据用作方法入口：学习单位可以在时间关系中形成，但单位的意义层级需要继续研究。

九、成人提供的序列，不一定是孩子经历的序列

设想成人连续展示甲乙甲乙，孩子只在部分时刻看向材料。研究者若把播放清单当成全部经验，就假定孩子完整进入了每个事件。实际活动中，转头、身体调整、被其他声音吸引或与照护者接触，都可能改变可用资料。不是因为孩子不专注，而是学习本身发生在一个多活动共同存在的世界。

因此，有必要区分安排序列与进入序列。安排序列是成人或设备提供了什么，进入序列是有证据表明孩子在什么条件下参与了什么。后者也无法完整读取所有内部加工，但比单纯暴露次数更接近机制问题。两名孩子接受相同材料，仍可能形成不同的实际关系历史。

这一点也影响训练效果解释。某种支持看起来没有改变学习规则，却可能改变孩子能够进入的片段，使实际经验更加清楚。另一种支持虽然增加了展示次数，却同时增加退出，最终没有增加有效进入。若只看总时长，两个机制就被遮蔽。SDE 所说 D 的差异序列，应当尽量指向实际展开，而不是成人事先写好的程序。

十、频率、预测与控制感不能互相替代

一种后果经常出现，孩子可能形成熟悉性；某种开端能够预测后果，涉及序列关系；孩子的行动能够改变后果出现的机会，则又涉及行动—结果关系。三者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分离。例如自动旋转的物体可以高度可预测，却不受孩子行动影响；一个由孩子触碰才发生的变化可以具有控制关系，却在初次活动中尚不熟悉。

如果本书把这些现象都称为“稳定纠缠”，便失去了进一步解释的能力。应该分别问，稳定的是事件出现、前后联系，还是行动改变结果的关系。不同稳定会影响不

同的后续：熟悉性可能帮助进入，预测性可能影响等待，行动关系则可能改变尝试的选择。这些是待检验的机制方向，不是所有婴儿必然遵循的三个固定阶段。

一个具有区分力的构造比较是保留相同后果数量，同时改变后果是否与孩子当前动作有关。若后续尝试随这种关系改变，就有理由进一步研究行动依赖；若没有改变则不能仅因孩子“经历过很多成功”便推断已经形成相应主体感。该比较只适用于适宜游戏，不涉及把基本照护变成奖励条件。

十一、压缩历史不是把所有事件逐一存放

一个能够跨情境使用的组织，通常不要求后来逐项重演全部过去。本书用“历史压缩”指一种操作性理解：若若干实际经历使某些关系更容易被重新使用，那么后续活动可以由较少的组织条件承接，而无需保留每个细节。这里不是关于记忆神经编码的直接命题，而是对行为解释尺度的规定。

压缩也会损失信息。孩子在一种材料上获得的组织若忽略了某项后来重要的差别，迁移就可能受到限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学习失败；任何有限组织都具有适用范围。真正的问题是，遇到不适用的条件时，能否通过新活动修改范围，而不是把原组织当作永远正确的模板。

成人同样会压缩历史。多次照护经验形成一句“他通常这样开始”，帮助快速进入；如果压缩成“他永远就是这种孩子”，就把条件性规律改成身份判决。两种压缩只差几个词，却可能导出不同安排。婴儿符号发生学不仅研究孩子留下什么结构，也研究成人怎样把历史整理成会影响下一次活动的表征。

十二、短时适应、保持和重新学习需要不同解释

在连续活动中反应变化，可能表示对当前材料逐渐熟悉，也可能受到状态或注意改变影响。隔一段时间重新出现相应组织，才增加了关于保持的线索。新条件下很快恢复，则可能涉及保留的调用，也可能涉及重新学习比第一次更容易。不同现象不能仅凭“他又做到了”便合并。

一个研究提案可以保留三段资料：初次组织怎样形成，合宜间隔后怎样再进入，材料变化以后怎样调整。它的目的不是反复测试孩子，而是使已有自然活动的时间结构更清楚。如果只取最顺利的一段，会夸大稳定；如果只取变化最大的困难片段，又可能低估已经形成的组织。

反例尤其能推动理论。假如孩子在旧材料中表现稳定，却完全不能在新材料中使用相关关系，就需要限制独立性主张；假如旧材料表现减弱，但新条件下出现更灵活组织，则不能直接判为退步；假如所有条件都没有可靠变化，就应允许该重复安排并未产生可辨别的学习后果。

十三、变式的价值来自它改变了什么证据

变式不是不断购买新物品。改变一个对象的位置、允许不同接近方式、在熟悉活动中由另一位可靠成人接续，都可以让原有组织遇到不同证据。但变化太多，研究者也难以知道哪项条件起作用。实践与研究虽然目的不同，都需要避免把变化本身当成值得追求的总量。

在一个构造游戏中，孩子已经能用某种方式打开安全盒盖，成人换了盖子的颜色而结构不变，可以考察颜色是否是偶然线索；改变开合关系，则是另一项学习要求。两种变式都叫“换玩具”，却不能承担同一个迁移结论。描述得越具体，越不容易把正常的不适用误写成孩子缺乏能力。

重复的发生性价值，最终在于哪些关系获得了可保留的组织，哪些差别被区分，哪些已有组织开始能够修订。次数可以成为一个必要指标，却不是组织的替身。一个独特的“我”并非由经历总数排列出来，而是在有限经历如何进入、保留、失效和再组织的历史中持续形成。

十四、重复也可能形成限制

一种有效动作被反复使用，可以成为新的基础，也可能在不适宜场景中持续占据活动。成人解释也会这样：过去奏效的办法被认定为唯一正确，新反馈因此难以进入稳定的关系若失去修订能力，就可能限制后续发生。

但打破重复也不是目的本身。熟悉活动可能提供安心与可参与性，任意打断反而增加负担。需要研究什么时候保留有效，什么时候适宜加入小差异，以及变化能否被孩子与照护者承接。

经验留下结构，不是把每次事件完整封存，而是形成选择性的、可继续的关系。一个婴儿的高阶“我”，正是在这些被保持、被修订或被放弃的联系中逐渐取得独特形态。它既不只是次数的总和，也不是脱离实际重复凭空出现的整体。

23

第 23 章

活动序列中的波态：预期与转折

返回目录

一、一段活动的意义常在前后之间

在作者构造的游戏中，成人发出熟悉的开端声，稍作停顿，然后让一件合适物体出现；孩子改变注意和动作，双方继续。若只记录物体出现时的那一帧，就看不见开端、等待和接续怎样共同形成活动。

SDE 符号学以波态讨论特征纠缠序列的相互激发。[S01]本书将这一概念用于婴儿活动时，关注的是单位之间怎样连接、沿何种次序展开、在何处转折，而不是宣称婴儿脑中已经测得对应的物理波。

因此，波态既不是“任何变化都叫波”，也不是把神经振荡与哲学模态直接等同。它需要明确的事件单位、时间尺度和关系指标，否则只是一种富有动感的比喻。

二、轨迹：先后不等于因果，但先后值得保存

同样几个事件，顺序改变，活动可能不同。先接触再听到提示，与先听提示再接触，提供了不同的预测与调整条件。研究应保留实际序列，而不是只统计各类事件出现多少次。

然而，事件甲先于乙，不证明甲造成乙。共同活动状态、成人计划或未记录条件可能同时决定两者。波态描述首先保存时序组织，因果判断仍需要合适比较。把箭头写得连续，不会自动解决因果问题。

一个候选研究可以比较相近安全活动中的自然变式，观察某个开端是否稳定地关联后续参与，同时记录成人是否已经提前引导。若改变非必要线索后关系仍在，说明原先路径可能不是唯一；若关系改变，也应检查新条件是否影响了可及性。

三、速度：不是越快越成熟

从开端到孩子回应之间的间隔，可以成为研究指标，但不能独立排名。较短间隔可能表示熟悉，也可能来自强提示；较长间隔可能表示不熟悉、疲倦或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速度要与任务、状态和关系一起解释。

在亲子活动中，成人等待的方式也会改变序列。连续提示可能让活动表面流畅，却挤占孩子接续的机会；适当停顿可能保留参与，也可能在不合适时让活动失去支持没有一个普遍的等待时长，可以脱离孩子条件直接规定最佳回应。

波态研究因此关注的是节奏关系，而非单人反应速度。谁在什么时候接续，停顿由谁承接，失配后如何恢复，比“反应快就是发展好”的判断更加具体。

四、阻力：旧组织怎样影响新的转折

活动并不总能顺利从一个单位进入下一个。某种熟悉联系可能使新的变化难以进入，身体条件可能限制动作转换，成人也可能坚持原程序。SDE 材料用“粘性”讨论激发与变化的阻力；本书在婴儿研究中把它作为待操作化的关系概念，不当作已测得的材料参数。[S01]

应当区分不同来源的阻力。孩子当前不能完成某步，可能是任务不可及，不应被解释为心理僵化；成人多次重复同一要求，则可能是安排本身缺少开放性。若所有阻力都归给孩子，就会让关系模型重新退回单向人格归责。

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在哪个环节改变支持，活动能够重新接续？这种改变是否只是临时替代，还是让孩子获得新的参与方式？只有路径和后果明确，才有理由讨论旧组织的重构。

五、预期不是成人命题的缩小版

某种开端之后出现变化，孩子的注意与动作也改变，研究可以提出预期问题。但预期的操作证据与语言命题不同。不能因为孩子对熟悉序列作出反应，就替他说出完整的“我知道接下来必定发生什么”。

同样，未按熟悉次序发生时的反应，也不只有一种解释。新奇性、注意转移和其他状态因素可能参与。研究应说明为什么选定解释比替代解释更合适，而不是用一个“惊讶”标签包办全部机制。

在三界分析中，现实活动顺序、逐渐形成的预期组织及自我相关感受可以共同提出问题，但证据强度可能不对称。哲学要求它们相互关联，不等于每种体验都已被直接观察。

六、一个可工作的波态记录

作为本书的研究提案，可把一段活动记录为若干带时间戳的事件：谁发起、采用何种通道、谁接续、何处停顿、怎样恢复。进一步分析某类转移在什么条件下较常出现，是否随新的支持而改变。所有编码都应允许研究者之间复核。

若要建立转移模型，应区分探索分析与预先规定的预测。不能先看完录像，挑出最顺的一条路径，再把它称为婴儿的普遍发展规律。也不能把重复观察同一孩子当成许多相互独立的样本。

波态概念是否有效，要看它能否比单次行为摘要保留更多有用结构，并在公平比较中提供实际增量。若仅换了词语，没有改进观察或预测，就应承认它暂时主要发挥描述作用。

七、活动轨迹不能只画成一条通向成功的线

可以把构造的游戏过程记为几个可辨认位置：发起、等待、回应、转向或停止。箭头表示观察到的转换，箭头旁记录条件和时间。这样的图有助于看见分岔，却不必预设每条轨迹都应回到成人希望的终点。

例如等待之后，孩子可能继续，也可能转向另一个活动；成人的回应也可能进入新的分岔，而非只负责推进原路径。若编码只保留“最终完成”的片段，波态便被人为写成平滑上升。真正的轨迹需要容纳暂停、恢复、未完成与改变目标。

本书所谓波态的黏滞或阻力，若要用于研究，必须落实为限定情境里的可观察关系，例如某种转换反复需要额外支持。它们不是可以直接读取的心理物质。不同机制可能产生相似轨迹，因此轨迹描述仍需与关系分析结合。

八、时间指标不应被变成速度崇拜

成人回应更快，未必在所有活动中更适合；孩子动作更快，也不必等于组织更好。某段停顿可能让孩子继续参与，另一段停顿则可能意味着支持未能及时进入。时间的意义依赖它在关系中的位置，不能脱离情境统一排序。

研究可以预先区分活动类型，再比较某种时序安排与参与之间的关系，避免把所有秒数混在一起。还要区分描述性预测与因果推断：时序有规律，不证明先出现的事件就是唯一原因。

波态分析的贡献，不是把生活变成秒表竞赛，而是恢复属性清单容易遗漏的展开过程。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怎样在时间中被调用、改变、停止或再次进入，才是本章真正需要说明的内容。

九、两类研究不能被压成“越意外越好”

Kidd、Piantadosi 与 Aslin 在七至八个月婴儿的视觉序列任务中，以模型估计事件的复杂程度，发现婴儿更容易离开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的序列事件，对中间范围保持更多注意。[M05]这是一项关于具体任务与模型的结果，不是一张可以给家庭计算最佳刺激强度的通用曲线。

Stahl 与 Feigenson 则在十一月龄婴儿研究中发现，违反某些物体行为预期的事件可以增强对相关对象的学习与探索，探索还与所见违背的类型有关。[M06]它提示意外能够组织信息寻求，却不证明所有突然变化都能促进学习。两项研究考察的年龄、材料指标与任务结构不同，不能只凭“意外”这个共同词语强行合成一个普遍效应。

对符号发生学更有价值的问题是：一个差异进入原有组织时，为什么有时成为可追踪的新问题，有时只是难以接续的变化？“差异越大越能发生”不是足够解释。差异需要能够与已有关系相接，并且存在适宜的后续活动，使它从中断转成新的探索入口。

十、可定位的意外与没有线索的变化不同

可以构造两个场景。甲中，一个熟悉对象产生与预期不同的结果，但对象仍可被安全探索，成人也保留熟悉的活动条件。乙中，对象、场所、声音和成人安排同时改

变，孩子难以找到原来活动的接点。两者都包含新奇，但甲更容易提出一个局部问题乙则可能首先需要恢复基本进入条件。

这里的关键不是研究者认为哪一种更刺激，而是变化能否定位。若孩子能够在某个对象或转折处重新接触，差异就有机会成为后续行动的依据；若所有线索都变动，结果可能难以归入任何可继续的关系。这个分析是本书提出的候选机制，需要观察实际参与，不能仅由场景描述判定孩子的内部体验。

也存在相反情况：某个对成人看来毫不起眼的变化，恰好打断孩子正在利用的关键关系；一个看起来很大的外形变化，却不影响其可调用组织。差异的大小不能只由成人视觉直觉排序。应当检查被改变的究竟是偶然形式，还是活动承重关系。

十一、惊奇、警觉、困惑与兴趣应当分开

注视时间增加可以有多种解释。孩子可能正在比较新旧关系，也可能被显著刺激吸引，或者尚未找到接续方式。把更长注视一律叫作兴趣，会使研究在结论里偷偷加入并未直接观察的体验。更有力的解释应结合后续选择、探索形式及重复条件，而不仅依赖一个时长。

同样，转开注意不总是失败。孩子可能已经获得当前任务所需信息，可能需要恢复，也可能对另一个活动更有兴趣。波态分析必须保留离开、转换和再次进入，而不是把每条轨迹都规定为保持注视直到成人结束。活动能否被孩子改变方向，本身就是主体参与的一个研究侧面。

因此，惊奇的积极意义不能由惊奇强度单独决定。需要观察它是否生成了可参与的下一步，是否保留必要的安全与关系支持，以及新的探索是否与原来的差异有可辨认联系。没有这些接续，所谓惊奇教育可能只是成人不断制造变化，让孩子承担理解负担。

十二、用分岔点识别波态，而不是只画连续曲线

一段活动可以在差异出现以后分成几条路径：继续原方式、调整局部、向成人求助、改换对象或停止。研究者应当事先说明怎样辨认这些转折，并允许同一活动在不同时间进入不同路径。波态的内容因此是转换关系，而不是一条象征成长的起伏线。

可以提出一个限定假说：在保留适宜进入条件时，具有可定位差异的事件比多项条件同时变化，更容易出现与该差异有关的后续调整。这个假说不是现有两项研究的直接结论，也不是 SDE 独占的思想。它的价值在于给“差异能够被承接”一个可比较的形式，并允许数据表明该条件并无预期作用。

若研究观察到孩子主要寻求熟悉接触，而不是探索对象，也不应将其排除为噪声。此时可能先发生关系恢复，之后才有对象探索。波态分析需要容纳不同层级接续，不能把成人希望出现的认知路径当成唯一正向路线。恢复并不低于发现，它可能是下一次发现得以发生的条件。

十三、学习进展与预测正确率并不总是同向

一个总能预测的活动可以提供可靠性，却可能没有新的区别需要建立；一个暂时预测失误的活动，则可能推动原有组织修订。但若失误持续而没有可利用的关系，也可能无法形成新的组织。因此，预测更准确、探索更多与发展更积极，不应被假定为同一个指标。

本书可以借此与预测取向的解释对话。若把目标只设为减少预测误差，可能难以直接说明孩子为何主动进入仍有不确定性的活动；若把目标只设为寻找新奇，又难以解释对熟悉关系的返回。一个较完整的解释需要说明孩子如何在可预期支持与可探索差异之间移动，以及这种移动怎样受身体状态和共同活动约束。

这里不必预设婴儿已经进行成人式的信息价值计算。研究模型可以用误差、信息增益或可学习性描述任务结构，却应区分模型的计算形式与孩子实际采用的机制。模型能够预测某个结果，是解释的一个进步；它并不自动成为婴儿内心算法的直接照片。

十四、不把惊奇变成养育技术的压力

这些研究最不应导出的建议，是不断打破孩子预期或制造惊吓。实验中的对象违背和安全任务，与生活中的突发威胁不是同一回事。必要照护的可靠性不应作为增加差异的代价，熟悉活动也不需要为了追求“更多发生”被随意扰乱。

更合适的实践启示，是在孩子已经能够参与的生活里，留意自然出现的小差异怎样得到接续。一个熟悉物体转了方向，一段游戏出现另一种合宜做法，孩子主动改变

原来的节奏，都可以成为共同探索的机会。成人的作用是保留可进入条件，而不是持续扮演新奇的制造者。

波态因而不是婴儿被外部刺激推着走的波动，而是其已有组织、当下差异与支持条件共同形成的展开。真正值得研究的，不只是何处出现一个峰值，而是峰值之后有没有新的路、谁能够沿这条路继续，以及什么时候停下来同样保护了未来的发生。

十五、粒子、波与场在同一活动中

局部单位取得相对稳定性，使序列可以被辨认；单位间的接续使活动能够展开；更大范围的支持与约束决定哪些路径可行。粒子、波、场在本书中是同一发生的不同分析侧面，不是三个按年龄依次出现的世界。

一段亲子游戏既有可调用的活动单位，也有前后激发，还处于家庭时间与空间安排之中。把三者联系起来，才能说明为什么同一开端在不同场合产生不同后续，以及为什么一次新的接续可能改变以后整段活动的组织。

24

第 24 章

场态：环境 SIO 集合与高阶约束

返回目录

一、同一玩具，为什么不总是同一个机会

在作者构造的比较中，同一玩具位于家庭地垫和托育空间。材料没有改变，但可接近的位置、成人可用时间、其他孩子的活动以及既往熟悉性都不同。若孩子的参与发生变化，只看玩具属性或个人兴趣，便可能遗漏整个活动场的组织。

这里的“场”不是一个神秘外力，而是对关系分布和整体约束的分析。哪些活动能够进入，哪些支持可获得，哪些通道彼此连接，哪些边界限制转换，构成需要具体描述的问题。它不能只作为“环境很复杂”的替代词。

SDE 符号学以场态讨论特征纠缠的整体分布与约束。[S01]本书借此研究婴儿活动，但不将哲学场态直接等同物理场，也不因写出一个场函数就宣称已经找到神经机制。

二、环境与 E 应当分开，才能说明联系

本项目中，E 指特征纠缠；环境是对当前 SIO 有影响的相关 SIO 集合。[S05]环境中的活动可以进入或改变 E，但环境不只是 E 的另一名称。否则我们无法说明外部安排如何通过具体关系被婴儿实际承接。

例如，托育人员的交接活动可能构成婴儿游戏 SIO 的相关环境。交接传递了什么信息，怎样改变随后支持，孩子因此经历什么不同，才是环境进入当前组织的实际路径。只把“机构环境”当作一个总标签，解释仍然不足。

相同的环境条目，对不同孩子也可能具有不同可及性。一本书在架上，未必进入每个婴儿的活动；一次语言提示对不同感觉条件的孩子，也不具有同样关系。场态分析应描述实际连接，而不是把可见资源全部计为已经得到的经验。

三、场的边界由问题决定，但不能任意移动

> 研究一次物体探索，可以先划定活动区、相关成人与时间窗；研究长期发展，则需要纳入更广的家庭与服务关系。两种边界都可能合理，但必须公开说明。不能在结果不利时无限扩大边界，把任何遗漏都当作理论永远正确的理由。

边界是否合适，可以通过新增资料是否改变原判断来检查。若一项重要交接持续影响活动，却不在记录中，边界应修订；若某背景变量没有可说明的路径，则不必为了显得全面强行加入。场不是一张无限展开的原因清单。

同样，场中的高阶约束应有实际承载。例如开放时间、材料位置、支持安排与共同规则，都可以限定活动；“文化气场”若没有具体路径，就难以成为研究变量。文化作用需要通过实践、语言和制度等可分析形式进入。

四、从资源数量到参与机会分布

一个空间拥有很多物体，不代表每个孩子拥有很多可参与机会。机会分布要结合身体条件、支持可用性和活动规则。某种材料只有成人主动提供时才可进入，另一种可以在安全范围内由孩子接近，两者的参与结构不同。

作为研究提案，可以在明确情境中记录各类活动的可进入性、持续性与恢复方式，形成“机会图谱”。这个图谱不是给婴儿打总分，而是帮助识别哪里存在可改变的阻断。指标的定义需要专业与文化适配，不能由研究者单方面决定所有活动价值。

图谱也不应只追求通道数量。过多同时出现的机会可能难以承接，某些熟悉活动则具有组织作用。评价应结合适宜性、可持续性与孩子真实参与，而非把“越多越好”当作场态丰富性的唯一尺度。

五、局部改变怎样重组整个场

在构造情境中，调整一件物体的位置，使孩子能够自行接近。随后他更常把该物体带入与成人的活动，成人改变回应，其他材料也随之重新安排。局部变化通过实际路径影响整体，而不是因为它天然具有无限放大效应。

相反，某个局部改动也可能没有后续作用。材料虽然移近，孩子当时并未参与；成人没有时间接续，新的活动没有持续。场态解释需要容纳这些结果，不能把任何调整都写成结构革命。

在三方程中，一个新的 S 可能提示哪些 D 已经可行，持续活动又可能重组 E；环境的其他 SIO 同时可能支持或中断这条路径。高阶约束既作用于局部，也会被局部历史改变，这正是场不应被当作固定背景的原因。

六、机会之间的连接，比机会的总数更值得追踪

在一个说明性活动图中，可以把几类安全、适宜的参与机会视作节点，把能够从一项活动进入另一项的实际路径视作连接。某个空间可能节点很多，却因支持不足无法转换；另一个空间材料较少，却能让孩子在熟悉关系中提出变化。两者不能只靠物体数量比较。

连接也有条件。一次从观看进入触摸的转换，可能需要身体支撑；从独自活动进入共同活动，可能需要有人能够回应。把这些条件写在连接上，比给整个环境一个笼统“丰富”分数更有解释性。这个图谱是本书提出的工作模型，尚不是经过验证的标准量表。

它的实际用途可以是寻找阻断点：哪些已经适宜的活动因为安排而难以进入，哪些新增材料并未改变参与，哪些支持一旦建立便连接多个活动。若图谱不能帮助辨认这些区别，就需要修订边界与节点，而不是不断增加图形复杂度。

七、环境的共同性与影响性需要同时说明

按本项目的 SIO 环境定义，相关 SIO 与当前 SIO 在主体、互动或客体方面具有共同性，并能对当前过程产生影响。[S05][S06]共同性帮助说明连接在哪里，影响性帮助说明为什么需要纳入。仅仅位于同一城市，尚不足以把所有事件都列为当前活动环境。

例如照护交接可以共享相关成人和婴儿，材料维护可以共享活动对象，某种时间安排可以通过共同照护活动影响当前参与。需要追踪这些连接的具体后果，而不是因为存在一个遥远背景因素就宣布已解释现场。

这样的边界也防止环境无限膨胀。我们可以承认更广条件可能相关，同时只对当前能够说明路径的关系作出判断。环境不是被删去的背景，也不是吞下所有原因的总袋子；它是在具体问题中被辨认、并能够随新证据修订的关联集合。

八、拥有物品，不等于拥有可进入的活动

一间房里可以有许多玩具，却没有一项当前可参与的共同活动；另一间房只有少量适宜材料，却能支持多种探索。这不是对消费多少作道德评价，而是说明资源存在与机会成立之间有组织环节。物体的位置、身体可及性、使用规则、成人时间和活动接续，都可能使同一资源产生不同实际意义。

设想一个作者构造的家庭现场。软球在孩子能够接近的位置，但每当他拿起，成人便迅速收好；旁边一本布书平时由成人保管，却在熟悉活动中能够由孩子翻动、停顿和选择。按资源可见性，球更容易获得；按可持续参与，布书可能提供更多空间。场态研究不能只数物体，必须记录进入和继续的关系。

这也使“丰富环境”的含义变得可检验。增加物品究竟增加了什么，是否增加了孩子实际能进入的路径，还是只增加成人安排与整理的负担？某项资源只有在与身体关系和制度相接以后，才可能成为当前 SIO 的有效条件。环境不是一个储物量，而是被组织出来的行动可能。

九、机会之间需要有可承接的连接

可以把几个活动视为一个简单网络：接近材料、操作材料、将材料带入交流、暂停恢复。网络中的连接表示孩子在适宜支持下能否从一个活动转到另一个。拥有四个活动不等于四者已经连通。若操作必须在成人固定位置完成，孩子就未必能把对象带入交流；若暂停意味着材料永久撤走，恢复之后也可能无法重新进入。

网络分析的价值不在把家庭变成复杂图谱，而在指出某一连接可能成为瓶颈。增加更多操作材料，未必解决操作到交流的断点；延长游戏时间，未必解决退出以后不能返回的问题。找到连接困难以后，支持可以对准具体交接，而不是继续扩大活动总量。

一个反例是，局部新增资源并没有改变任何可进入路径。这样的安排可能仍有其他价值，却不能被算作当前研究任务的机会扩展。另一个反例是，移走一件多余物品反而使已有路径更清楚。场态的积极变化因此不总表现为数量增加，有时表现为冲突减少和连接恢复。

十、时间把静态可及性变成实际可及性

一位照护者有空时，材料尚未准备好；材料准备好时，孩子需要休息。这些条件分别存在，却没有在适宜时段共同出现。静态清单会给出“资源齐备”，时间结构却说明机会没有成立。发生学的场态应当包含这种共同可用性，而不只是一张空间分布图。

在研究中，可以记录某项活动需要的几个条件是否在同一时间窗内得到满足。若成人支持短暂可用，孩子需要更长的进入过程，活动就可能反复在开始前中断。调整的方向也许不是让孩子更快，而是改变时间安排，使其真实节奏能够被承接。这个例子说明制度时间怎样通过日常活动进入高阶符号的发生。

多主体照护也有类似问题。两位成人各自都能很好地开展活动，但交接时没有传递必要信息，孩子仍可能经历不连续。问题不在每个人的能力之和，而在连接是否形成。共同照护的质量需要在交接处研究，不能只比较照护者数量。

十一、规则既能打开机会，也能关闭机会

一种规则可以保障安全和可预期性，例如材料使用以后有清楚的归位方式，使后来能够继续；另一种规则可能把成人偏好固定为唯一做法，例如只允许按照指定顺序操作。两者都具有稳定外形，作用却不同。场态不是没有规则的自由空间，而是要分析规则怎样分配进入、改变和退出的可能。

对尚不能充分语言表达的孩子而言，规则常通过成人动作和材料安排实际出现。孩子不必先理解一条口头规范，才承受它的后果。因此，研究规则不能只访谈成人说了什么，还需观察哪些动作被接续、哪些被中断、哪些改变被允许，以及必要的边界怎样被执行。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反事实问题：在相同安全要求下，是否存在允许更多参与形式的安排？若存在，当前限制就不完全由安全决定；若不存在，也不能以自由之名要求成人承担不适宜风险。把规则理由与实际功能分开，才能避免文化习惯或管理便利不经说明便取得绝对地位。

十二、场态改变的影响可以跨越眼前活动

一个新的可及位置让孩子经常主动接近对象，成人由此改变对他兴趣的判断，随后又提供不同材料。起初的空间变化进入了解释和资源分配，形成跨活动反馈。相反若成人将新的主动行为理解为打乱秩序，可能重新收紧空间。相同局部改变因后续关系不同而进入不同场态。

这正是环境 SIO 集合与 E 的区别所在。环境集合指出哪些相关活动正在影响当前事件；E 则要求说明其中哪些特征如何相互规定。只列出家庭、机构、市场和文化，仍然不是纠缠解释。需要沿具体通路说明，一项制度安排如何改变成人时间，一项时间变化如何改变交接，一次交接怎样进入孩子活动。

远处因素不必在每章都展开到社会全貌。研究可以明确截取层级，同时保留连接到更大系统的接口。若一个家庭困难主要由照护服务缺口形成，就不应只在亲子微动作中寻找答案；若问题是某个物体不便使用，也不必立刻诉诸整个文明。合适尺度能够防止两种逃避：把结构问题个人化，或者用宏大结构遮蔽可修订的局部。

十三、一个可以被反驳的机会网络主张

本书提出一项限定假说：在资源数量和必要支持相近时，活动之间的可接续程度，可能比资源数量本身更好地解释某些自主参与差异。这里必须先定义可接续程度，例如孩子能否在操作、交流与恢复之间以合宜方式转换，而不能等到结果出现以后把成功活动都称为高连通。

若加入连接指标后并未改善解释，就应检查该任务是否主要受局部可及性限制，或者所谓连接没有可靠测量。若只在某类家庭安排中成立，就限制推广。不能因为网络图比清单复杂，就假定它必然更接近真实机制。更好的解释应当付出更少的不必要复杂性，而非增加更多漂亮节点。

对每一个婴儿，场态的实践价值最终落在真实机会，而不是环境评价的高分。孩子能够在哪里开始，能否改变活动，退出后能否回来，需要帮助时是否有通道，这些问题把环境重新还给生活。独特的“我”不是在一座装满资源的容器中自然长成，而是在这些可以通行、需要协作、也能够重新打开的关系中持续发生。

十四、制度距离远，也可以通过近处起作用

工作时间、服务可及性、家庭支持等条件，并不直接表现为某个玩具或一句话，却可能影响谁在何时能够回应。它们通过具体安排进入婴儿生活。理解这一点，可以避免把所有照护差异归为家长态度。

但结构解释也不能取消个人行动责任。制度困难是真实条件，不是忽略孩子安全的理由；个人努力有价值，也不应被用来否认资源支持的需要。场态分析应同时说明可由现场调整的部分和需要更高层协作的部分。

本章由此连接微观事件与较大生活组织。一个婴儿的高阶“我”不位于空白空间中，但也不只是环境的被动投影。场通过实际关系规定可能，婴儿的活动又在这些可能中形成新的差异。研究的任务，是让这种相互改变变得可追踪，而不是用宏大背景遮蔽具体生命。

25

第 25 章

打开旧符号：从稳定到再发生

返回目录

一、已经学会，并不意味着发生已经结束

设想一个已经能够拿起轻质杯子的孩子。他熟悉杯沿的位置，也知道怎样使杯子离开地面。某一天，杯子倒扣着，旁边还有另一只可以套进去的杯子。他先重复旧动作，随后转动杯子，又把两个杯口碰到一起。这个说明性场景没有证明孩子已经具有成人的分类概念，却使一个问题变得清楚：已有的动作组织，既可能帮助新活动，也可能使行动停留在旧办法里。

前几章讨论了符号怎样形成相对整体、稳定和独立的组织。本章转向形成之后：一个符号怎样不因已经成立而关闭其后续可能？如果把稳定理解成永远重复，把独立理解成不再需要新的关系，成长就只剩下保存过去。对婴儿而言，保存某种组织与超出这种组织，往往必须在同一活动中协调。

本书把“再发生”用作一个分析概念：已经成立的关系组织，在新的差异中改变其组成、边界或运行方式，并使改变后的组织参与后续活动。并非每次动作改变都构成再发生；也不能把成人觉得新奇的表现直接称作创造。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可继续承接的新关系，而不只是留下一个不同的瞬间。

二、旧组织既是资源，也是选择的边界

> 杯子能够被拿起以后，孩子不必每次都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开始。熟悉的支撑与抓取关系，为转动、搬运和组合保留了一些可依靠的条件。这种局部稳定使探索不必同时处理所有变化。稳定因而不是创造的敌人，它可以减少某些需要反复处理的困难，让新的差异进入活动。

然而，旧组织也影响什么差异容易进入。若每次杯子出现，成人立即要求“拿给我”，孩子与杯子的关系就可能不断被收束到这一条路径。这里不必指责任何一次要求；需要考察的是这种安排是否长期排除了其他适宜活动。符号一旦只允许一种表现形式，稳定便可能转变成路径垄断。

这两种作用可以同时存在。一个熟悉活动既提供安心的起点，也可能使陌生尝试显得不容易。研究不应在“稳定有益”和“稳定有害”中选择一句永恒口号，而要问稳定了什么，尚可改变什么，改变由谁提出，改变失败后能否返回仍然有效的支持?

由此可以提出“保留点”的概念。保留点不是不得改变的永久核心，而是某次重组中暂时维持的关系。改变材料时保留熟悉的姿势，改变活动次序时保留可辨认的回应，都是可能的分析例子。它们不是通用育儿处方，而是帮助研究者识别：新差异依靠哪些仍在运行的关系才得以进入。

三、三条不同的重组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替换局部而保留关系功能。在构造情境中，孩子不再只能抓取最初那只杯子，而能在身体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另一种材料。物体变了，某些感觉—动作关系仍可参与。如果没有观察具体调整，不能把它简单说成同一技能被搬到新地方所谓迁移本身也可能包含再组织。

第二条路线是保留局部而改变它的关系位置。同一只杯子原来主要与拿取相关，现在进入装放、轮流或组合活动。杯子没有变，原来的动作也可能保留，但它们在更长活动序列中的作用发生变化。这提醒我们，新发生不必意味着添置新物体或训练新动作，也可能来自已有成分之间的新联系。

第三条路线是改变活动的组织边界。原先由成人逐步提示的活动，后来允许孩子以停顿、伸手或选择影响下一步。变化不仅在物体操作，还涉及谁能提出差异、谁来承接差异。高阶符号的重组，因而可能表现为局部活动与共同关系同时改变。

这三条路线可以交织，不能分别等同于三个年龄阶段。它们也不自动证明 SDE 独有解释力。其价值在于把“有进步”拆开为可比较的问题：究竟替换了什么，重新安排了什么，哪一种边界变得不同？只有这些改变与后续参与形成可观察联系，才比笼统称赞更有研究意义。

四、混沌、介生、秩序，不是粒子、波、场的另一套名字

本书的教育底本用混沌态、介生态与秩序态讨论形成过程，同时用粒子、波与场讨论符号组织。[S01][S08]两组三项不能因为数量相同就被强行配对。前者可以帮助辨别某项关系尚未明确、正在探索组织、相对成序的状态；后者关注单位、活动展开与整体分布等不同组织侧面。

一个已经具有相对稳定抓取组织的孩子，在新材料面前可能进入局部探索。不能由此说整个孩子退回混沌，也不能说粒子态已经消失而统一升级为波态。旧的秩序可以继续支撑新的介生；同一活动也可以同时具有可辨认单位、时间轨迹与行动场的约束。

因此，研究单位必须明确。某个动作尚未稳定，不等于整个“我”尚未存在；某项关系已经成序，也不等于三界全部成熟。把局部状态推成整个人的本体判断，是层级混淆，而不是发生学的深刻。

这里也不能从“三态”推出必须制造困惑、挫折或失去安全。若一种新活动可以在清楚而有支持的条件下形成，没有必要为了符合理论图式先人为打乱一切。理论应描述真实变化，不应要求婴儿表演一个预先规定的哲学过程。

五、六路径怎样成为实际的研究工具

对杯子活动，可以从新的显露 S 进入：孩子不再接受原来安排。接着辨认既有纠缠 E 中哪些条件未能承接这一变化，再尝试理解差异序列 D 如何重新展开。这是 S→E→D 的研究次序；它不是宣称三个维度在现实中互不相干地依次启动。

也可以从 E 进入：成人改变材料可及性，使孩子拥有另一种接触关系；观察由此出现的 D，再检查新的 S 是否持续。这是 E→D→S。两条路线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发生过程，但研究者的起点和需要补足的资料不同。[S05]

六路径的实际作用，是防止把任何一个维度当作已经解释其余两者的终点。只看“孩子做出来了”，会漏掉怎样做到和依靠什么；只罗列关系，会漏掉活动如何展开只描述连续动作，又可能遗漏某种可辨认整体是否已经成立。路径应帮助补全证据，而不是让每章增加六遍同义分析。

如果从某个起点得出的解释，与从另一个起点回查的资料不一致，就需要修订。成人以为材料调整带来变化，回看却发现变化在调整前已经出现；这时不能继续把

E→D→S 当成已经证实的因果链。方法的开放性体现在愿意改变判断，而不在箭头画得多少。

六、打开不等于拆毁，返回也不等于失败

在构造情境中，孩子尝试一段新活动后，重新选择熟悉的方式。成人可能失望，觉得“又退回去了”。但返回可以有不同含义：新的安排暂时不适宜，某个必要条件没有保留，或者孩子当前只是选择另一活动。单次返回不足以判定能力消失，更不足以证明缺少探索欲。

更有意义的问题是：熟悉组织是否仍可作为恢复参与的资源？新经验是否在以后的条件中再次被调用？孩子能否影响尝试何时暂停？这些观察允许再发生具有迂回，而不是只承认持续向前的直线。

同时，新的组织也不天然优于旧的组织。一种活动可能更显眼，却更加依赖成人持续操纵；一种表现可能更符合考核，却减少了孩子的主动参与。评价新旧必须说明价值依据，结合安全、舒适、可及参与和后续开放性，不能把变化数量等同发展质量。

必要照护更不属于为求创新可以拆去的旧结构。一个依赖辅助支持才能参与活动的婴儿，不应被要求先失去支持来证明再发生能力。能够在支持关系中形成更丰富的行动，同样可以是组织改变。独立性的对象是对某个偶然组合的绝对锁定，而不是对生命必要关系的合理依赖。

七、如何区分真正重组与成人讲出的成长故事

研究可以先明确旧组织的可观察特征，再描述新差异进入的时间和条件，最后考察后续活动是否改变。若只保留一次成功照片，就无法知道变化是否持续、是否依赖特殊提示，也无法辨别失败经历在其中的位置。

本书提出一个工作性判断：当变化能够改变后续的选择、协调或恢复方式，而不只是改变某次表面结果时，才更有理由讨论关系重组。这仍需与成熟、练习、熟悉性和活动差异等解释比较，不能把所有发展都自动记到 SDE 名下。

研究者还应保留“尚不确定”的结论。某个孩子今天组合了两个物体，现有资料可能只够说明新动作发生，尚不足以判定形成了新的稳定单位。这个限制不会减少现场的价值，反而为继续观察留下准确起点。发生不是只有被理论命名以后才有意义。

八、变化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旧组织

再发生的判断有一个经常被跳过的前提：研究者须先知道被改变的是什么。若旧活动从未被充分描述，任何不同都可能被叫作突破。一个孩子昨天把杯子拿起，今天把杯子推开，不能仅凭动作不同就宣布符号结构升级。推开可能源于疲劳、材料不合适、另一对象吸引，也可能真正开启新的物体关系。起点含混，变化就没有确定的比较对象。

可以把旧组织写成一份有限的关系说明：孩子在何种支持下接近杯子，怎样根据接触后果调整，成人在哪些环节介入，以及拿起以后活动如何继续。这个说明不必把全部身体过程记录下来，却需要覆盖当前主张。如果主张关乎孩子对物体方向的辨别就不能只留下最后拿到杯子的照片；如果关乎共同活动的变化，就不能完全不记录成人。

接下来观察新活动时，应当允许出现四种不同结果：旧组织原样调用，旧组织局部调整，两个已有组织重新组合，以及已有组织暂时无法进入。前两种不必都叫创新后一种也不必都叫退步。把结果分开，是为了找到真正需要解释的变化，而不是降低孩子某次活动的价值。

九、重组可以表现为选择规则改变

设想一个作者构造的场景：幼儿面对开口朝上的杯子，过去总把物体放进去；面对倒扣的杯子，他仍然重复同样动作。后来，他开始先改变杯子方向，再决定放入或敲击。新意不只是多了一次翻转，而是动作选择开始受到杯口状态的调节。原先无论条件如何都采用同一路线，现在不同条件能够导向不同路线。

这给再发生提供了一个比动作数量更具体的对象：关系的选择规则。需要比较的，是同一条件下的活动是否有改变，以及不同条件是否获得了可辨认的区别。研究者可以预先规定少量安全、适宜的材料变式，观察这种区分是否再次出现。若只有成人指着杯口时才发生，还要记录提示究竟承担了哪一段判断。

这样的变化与三方程有明确接口。原 E 支持一种习惯性的 D，新条件使 S 显露为受阻；如果 D 并未只是增加次数，而是依据新的区别重新分支，E 的候选描述就应加入该区别。这里不能用“重组”代替证据，但可以用它准确标明证据应落在何处：不是做得更多，而是哪些条件开始改变接续方式。

十、重新组合不要求每个成分都新生

另一个构造例子中，孩子早已能拿起杯子，也能把物体递给成人。某次他把空杯子递出，成人理解为需要协助，随后二人形成新的共同活动。局部动作未必是新动作组合后的关系却可能不同。若研究只为首次出现的身体动作登记发展，就可能遗漏已有动作进入新功能位置的变化。

但不能把成人理解为请求，直接当作孩子已经具有明确请求意图。应检查孩子在成人误解后是否继续调整表达，活动后果是否与此前重复历史相连，以及在另一种适宜情境中是否再次使用相关组织。一个偶然递杯事件，和能够调动共同活动的表达组织，有不同的证据要求。

从三界看，材料与身体的关系、后果预期以及孩子自身的参与取向，可能在同一组合中改变。三界分析在这里增加的是追踪方向，不是三个成熟内部实体的证明。尤其不能因为出现新组合，就推定孩子已经会用语言概括其目的。关系可以先于清楚的自我叙述而成立，研究描述却不能跳过成立过程。

十一、失效、遗忘与重组需要不同的后续观察

原先有效的组织不再出现，至少存在三个不同问题。第一，组织还在，但当前没有合适调用条件；第二，部分关系的保持减弱；第三，另一种组织暂时获得优先位置这些解释对眼前行为可能相容，却导向不同的后续观察。把它们全部命名为旧符号死亡，等于过早终止了比较。

可以在不增加不适的条件下，寻找原先活动能否在熟悉支持中自然返回，新的活动是否与旧活动交替出现，以及这种交替是否有条件性。若旧方式在合宜场景中仍可出现，新方式又能在不同要求下发挥作用，更可能需要一个容纳两种路线的模型。若所有情境中活动都持续减少，则需要重新检查状态、任务及专业支持需要，而不能只庆祝所谓结构转型。

返回也有区分价值。一次返回可能是恢复资源，反复无法离开唯一方式则可能显示选择范围仍然有限。不能用返回次数直接判断失败，应看返回之后是否有新的进入机会。这个时间性区别，使再发生不被理解为单向替换：有时是扩展可选路线，有时是调整优先次序，有时才是较广泛的重建。

十二、可逆试探与不可随意撤销的照护条件

研究新旧组织的转换时，最适合调整的是非必要的材料与提示，而非生命所需的支持。比如，在安全的游戏中比较不同摆放，可以帮助理解关系；撤去孩子依赖的身体支撑，则可能改变了活动能否存在的前提。前者是在同一可行范围内提问，后者可能直接取消了研究对象。

因此，“保留一个返回点”不能变成训练技巧的口号。返回点应具体说明：哪种熟悉关系在孩子退出时仍然可获得，成人怎样承接停止，以及何种负担出现就终止比较。可逆性是对安排的要求，不是要求婴儿随时展示来回切换的能力。儿童不需要为研究的完整而继续参与。

一种真正有内容的再发生描述，最终应同时写出不变量、变化项和后续后果。哪些支持保持，哪条选择规则改变，改变是否进入新的活动？若答案只有“孩子显得更成熟”，说明论证还没有完成。若答案能够使下一次支持更准确，又保留新观察推翻旧解释的空间，再发生才从赞美变化的词语，成为能够辨认变化的研究工作。

十三、一个能够打开的“我”

从局部符号的再发生回到婴儿自身，高阶“我”并不是必须不断被打碎的旧壳，也不是一经形成就不再改变的核心。它以先前组织参与新的关系，在保留和重组之间维持自身的连续。

这使尊重独特性具有双重含义：既不把孩子当作可以任意改造的材料，也不把早期表现当作必须终身守护的定型。今天需要熟悉支持的孩子，不必被永远命名为依赖今天热衷探索的孩子，也有暂停和寻求帮助的权利。

婴儿符号的未来，并不只在于增加多少新属性，而在于已有组织能否继续承接新的差异。爱在这里不是替孩子指定每一次新发生，而是保护那些使新发生仍有可能的条件。下一章由此回到全书的中心：在名字、代词与反思之前，这个能够承接历史、参与改变的独特“我”，究竟以什么意义已经存在？

第六编 / PART 06

“我、你、他、我们”：婴儿的自我和语言符号

第 26—30 章

26 在说“我”之前已有独特的“我”

27 “你”如何进入婴儿正在形成的世界

28 “他”与“我们”：共同注意的生成

29 命名、解释、规训如何回写婴儿符号

30 语言发生是否改变高阶“我”的结构

26

第 26 章

在说“我”之前已有独特的“我”

返回目录

一、不会自我介绍，不等于还没有自己

设想两位照护者在床边讨论一个尚不会说话的婴儿。一个说，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尚未出现；另一个说，他会拒绝不喜欢的安排，所以已经完全知道自己是谁。这两个判断看似相反，却共享一个问题：把独特生命的存在、行动中的自我相关组织与成熟的自我认识压缩成同一件事。

本书选择另一条路。孩子不必先通过某项语言或镜像任务，才获得其独特存在；但研究者也不能从一次拒绝，推出孩子已经具有成人式的自我概念。我们必须容纳一种并不矛盾的状态：一个独特的“我”已经在发生，而这个“我”对自身的明确认识仍在发展。

这里的“已经”不是宣布找到一个出生时刻的意识开关。“我”的存在连续性带着出生前的历史，出生后又进入新的关系组织。对于经验、意识和表征发展的具体阶段，需要相应证据；本体论上的独特存在，不应替这些经验问题预先给出答案。

二、存在的“我”：后果不能由另一个生命替代承接

一个婴儿的饥饿、舒适、活动与照护经历，属于具体生命的发生史。照护者可以帮助，却不能通过自己吃饱来替代孩子获得营养；研究者可以描述，却不能把自己的解释直接变成孩子已经经历的过程。这里首先显露的是不可替代的承接位置，而非成熟的内省语言。

本书把这一层称为存在连续性意义上的“我”。这个名称不是把孤立主体放回全部关系之前，而是指出：关系并非没有差别地流过所有生命，它们以不同的身体条件

历史和后续影响形成具体的个体连续。独特“我”是这些差别的组织性存在，不是关系之外另加的实体。

但不可替代也不等于永远不能借助别人。恰恰因为每个生命的需要不能由他人替代承受，适宜的照护才具有必要性。依赖关系能够参与维持个体边界，而不是必然消除个体性。将“真正的我”理解为不需要任何关系，反而会把婴儿排除在人的存在讨论之外。

这一层同时需要与权利地位分开论证。无论研究者采用哪一种自我理论，儿童都不应通过表现能力来兑换基本尊重。本书的存在论可以支持一种尊重方向，却不把尊严系在某项高阶组织测试的及格线上。

三、身体行动中的“我”：不是一句隐蔽的内心独白

当研究讨论身体自我相关组织时，可以观察自身动作与感觉后果之间的联系、对活动的调节，以及对不同来源变化的区别。但观察到联系，不意味着已经听见婴儿心中说“这是我的动作”。一种能够指导活动的组织，可以尚未成为语言表达的对象。

Rochat 对早期自我意识提出了分层发展的理论描述，为区分隐含的自我相关经验与较明确的自我认识提供了对话资源。[R01]本书采用的三层分析并不是复制该文的全部分类，也不把其理论概括当作每个婴儿必经的统一时间表。

身体行动中的“我”不必只有一个通道。观看自身动作、触摸、身体位置与运动反馈，都可以在不同条件中成为研究入口。对感觉或运动条件不同的婴儿，需要考察实际可及的组织方式，而不是用一种常见表现形式决定谁更接近拥有自我。

这里最困难的问题是第一人称经验如何被研究。成人能够记录行动、互动与生理指标，却不能直接读取体验本身。较好的做法是建立有限推断：明确哪些观察支持何种解释，保留替代解释，并避免把理论词汇写成婴儿已经会使用的概念。承认这一限制，不等于否认体验，而是避免替孩子发明内心独白。

四、表征的“我”：成为可以被说起的自己

名字、代词、镜像和叙事，让自我相关组织可以进入新的公共活动。一旦某个称呼被使用，家人就能够在孩子不在场时谈论他，能够把不同事件联系到同一个人，也能够通过评价改变后续安排。表征并不是存在之外无足轻重的装饰。

但名字能够指向一个孩子，不代表孩子已经理解整个指称关系；对名字作出反应，也不能单独证明成熟自我概念已经形成。不同表现对应不同解释任务，不能因为它们都与“我”有关，就被当作同一证据的重复确认。

在本书的次序中，表征之“次”是本体论分析上的次层，不是说家人必须等婴儿完成存在之后才能取名。成人在出生前就可能已经使用称呼与期待；这些表征可以进入发生条件，却不能取代婴儿实际承接的生命历史。先存在、其次表征，必须与表征可以很早回写相容。

此后一个孩子开始表达意愿、谈论自身，当然会使高阶“我”的组织更为复杂。但复杂不是价值等级。尚不能采用某种表达方式的孩子，并不因此只拥有较低等的“我”。本书研究的是组织差异及发展条件，不是以语言能力排列生命的资格。

五、怎样理解“先有我，之后才有你、他和我们”

本书讨论的“先有我”，首先强调每一个婴儿并非别人叙述里的空位。他以具体的承接位置参与关系，从这一独特位置显露出与别人的区别。若完全抹去这个位置，只剩成人替他定义“我们”，关系就可能遮蔽其中的生命差异。

但这不要求设想一段完全无关系的孤立时期。照护关系可以早于孩子明确识别“你”，共同活动也可以早于孩子说出“我们”。存在关系、参与经验、对关系的辨认与代词学习，属于不同问题。它们不能被排成一句适用于所有孩子的机械年表。

因此，“我”的逻辑不可替代性与“我—你”的共同发生并不冲突。从婴儿的生命历史看，活动后果有特定的承接者；从关系形成看，这个承接者又不断通过他人和自然对象的参与获得新的可能。个体性不是从共同生活中切下一块孤岛，而是在共同生活里保持无法彼此替换的差异。

这一理解还防止把“我们”美化为自动和谐。父母觉得安排很好，孩子可能无法舒适参与；家庭重视某种成就，孩子当前可能需要另一种支持。一个真实的“我们”必须容纳这些差异，并承担调整关系的责任，而不能用复数代词消除它们。

六、如何与“我最后才长出来”的旧表述建立接口

既有《婴儿-SDE 活体发生学》以“‘我’是最后才长出来的”为相关编名，教育发生学底本也使用了主体逐渐显影的表述。[S07][S08]这些材料提醒我们，成熟主体性

不能被预装在全部发展之前；但若把这些话理解为早期生命完全不存在任何独特“我”，就会与本书明确建立的存在层次冲突。

本书因此作出一项公开的概念修订：不再让一个未分层的“我”同时承担存在连续性、身体行动组织与成熟反思三个任务。“后来显露”可以用于较明确的主体表征与反思组织；“早期已经存在”用于独特生命的发生连续性。二者需要以实际发展史连接，不能相互抵消。

这是一种在新问题中澄清旧表述的工作，不应写成原有每一句话都已毫无歧义地包含本书的三层区分。理论能够发展，恰恰意味着有时需要修改表达范围、放弃过强说法，并说明修改的理由。发生学如果要求自己的词语永不改变，反而会背离所研究的对象。

同样，本书也不把“早期已有我”扩展成已经证明所有新生儿具有相同程度的自觉。存在论立场与具体意识研究仍须分开。如此，既能保护用户所强调的早期独特性也不必用未经证实的成熟能力来支持它。

七、高阶“我”不住在身体内部的某一个小房间

如果把所有局部 SIO 放在身体里，再寻找一个中心把它们统一起来，就会遇到循环：中心为什么能够统一，又由什么统一中心？本书不把高阶“我”当作另一个缩小的成人，而把它理解为跨活动、跨时间、跨三界的组织关系。

一个作者构造的例子可以说明。孩子在活动中学会以某种动作恢复接触，这种方式随后参与不同照护情境；成人的回应使相关预期发生变化；孩子又以新的方式提出要求。局部动作、关系历史与对未来活动的组织并非互不相干，高阶“我”就在它们的相互规定中持续成立。

但高阶不意味着所有局部同时完全统一。身体需要、当前兴趣与关系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张力。疲惫时不愿参与，并不取消此前形成的行动组织；某个场景里的迟疑，也不必定义全部个性。高阶统一性应当容纳不同时刻、不同情境的差异，而不是要求每次表现都复制一个固定人格画像。

现实界涉及实际身体与行动条件，理念界涉及逐渐形成的区别、预期与表征，自我界涉及对该生命而言的感受与价值关联。这是本书的分析框架，不是三种可以分别

从头脑中取出的实体。一次互动可以使三个侧面同时改变，也可能只给其中某些侧面提供足够观察资料。

八、婴儿的主动性，不等于成熟的选择和对等责任

婴儿能够影响互动，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反应都是有计划的策略。哭泣、转头或停顿可能有多种解释，不应轻率地描述为操纵成人。主动性可以先指向参与后果和改变活动的能力，而不必预设完整意图推理。

同样，因果上的双向并不带来责任上的对称。婴儿改变照护者的行动，不能据此要求婴儿负责让成人情绪稳定；孩子暂时难以安抚，也不能成为拒绝必要支持的理由共同发生需要成人更认真地学习，而不是让婴儿替成人承担失败。

另一方面，成人责任也不等于必须无误识别一切信号。可以承认不知道，在必要情况下寻求专业帮助，调整过强解释，并通过可持续的安排继续观察。把婴儿视为独特参与者，不是给照护者增加全知义务，而是使判断保持可修改。

九、一个可研究而不被测量穷尽的“我”

研究高阶符号，需要选择有限指标：跨活动的协调、情境变化后的参与、回应影响下一步安排的路径，以及同一生命随时间改变的轨迹。指标是否有效，应由具体设计、重复观察与竞争模型比较来支持。

本书不主张编制一张“拥有我”的合格表。某项表现没有出现，可能提示支持需要、测量不适配或理论推断不成立，却不取消个体存在。存在主张、研究指标与权利保障不能被捆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次测量得到的整体，只是问题范围内的高阶描述，不是穷尽婴儿全部意义的最终画像。新的活动可能显露此前未知的组织，新的身体与照护条件也可能改变原有模式。测量应该帮助我们更新，而不是给孩子封档。

十、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承受了过多结论

成人伸出舌头，婴儿也伸出舌头。这样的画面很容易被解释为“他在模仿我”，然后进一步被写成已经理解他人、已经认识自己，甚至具有完整的社会心灵。然而，

这几项结论并不处在同一证据层。研究首先需要辨别动作是否真正对应所见示范，而不只是兴奋、注意或自发活动中的变化。

即使存在有选择的动作匹配，也还要继续说明其机制。对看见的动作产生对应反应，与理解对方的意图并不相同；能够把视觉事件与身体动作连接起来，与形成能够反思的自我概念也不相同。把这些层次压缩为一个令人惊喜的瞬间，既夸大了证据，也使后来的失败结果承受过大的哲学意义。

婴儿符号发生学需要做相反的工作：让每一层主张重新获得自己的问题。婴儿作为独特生命是否存在，是本书的存在论判断；某种跨通道对应是否发生，是经验问题孩子怎样体验这种对应，又需要更审慎的解释。三个问题相关，却不能由一张表情照片同时回答。

十一、同一主题中的相反研究判断

Oostenbroek 及同事的纵向研究对 106 名婴儿在多个早期时间点进行观察，比较多种示范条件，未获得支持广泛新生儿模仿的总体证据。[M07]这一结果挑战的是特定模仿主张，而不是证明新生儿没有感觉、没有学习，或只是被动的反射装置。

Meltzoff 及同事随后对这项研究提出方法批评，并对同一资料中的伸舌反应作再分析，主张该部分仍存在模仿证据。[M08]这里必须注意，再分析不是新增一批婴儿的独立重复；同时，针对一种动作的证据也不能自动推广到全部示范动作。两篇文章提示结论取决于问题、对照与分析单位怎样设定。

本书没有理由通过选择更符合自己立场的一篇，把争论宣布结束。更有价值的是从争论提取一个方法要求：一种理论若依靠单一早期表现来证明“我”的存在，就会把本体论置于一个过窄的实验指标上。相反，承认指标可能失效，也不能使任何关于早期能力的经验命题免受检验。

十二、动作对应至少需要排除哪几种解释

以下是方法分析，不是上述研究的完整复述。假如婴儿在所有新奇示范后都增加伸舌，那么“成人伸舌以后婴儿伸舌更多”仍不足以证明动作特异的匹配。需要比较其他示范是否产生相似增加，并检查时间变化、基线差异和编码方式。只选最容易讲成互动故事的两段影像，会使共同发生沦为剪辑结果。

若匹配仅在某个时间窗出现，也应说明时间窗为何被选择。事后尝试许多窗口再保留最显著的一段，与事先规定窗口后获得支持，承担不同的不确定性。这里不是禁止探索，而是要求探索留下版本记录，使下一次研究知道真正需要重复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层级问题：研究组平均存在某种对应，不意味着每个婴儿都必须表现出来。个体状态、可及性和测量噪声可能改变结果；但这些因素不能在任何失败后被无限追加为免责条件。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明确可记录的边界，并承认资料无法区分时只能保留不确定结论。

十三、早期“我”的研究不应只寻找成人的缩小版本

一个孩子可能不会复制成人表情，却能通过自身动作改变感觉后果；也可能对他人动作敏感，却尚不能形成成熟的自我叙述。身体自我相关组织的研究应允许多条入口，而不是规定只有“像我一样做”才是主体性出现的门槛。尤其不能让视觉模仿成为视功能不同婴儿的存在资格考试。

在作者构造的安全活动中，孩子的手部移动使一个可及物体发生变化；活动停止后，变化也停止。研究问题可以从动作与后果的条件关系进入。但即使孩子后来更积极地重复动作，也不宜替他写出“我知道是我造成了变化”的内心句子。可以先讨论可控关系的利用，再寻找它与更明确主体感之间的证据连接。

这里的“我”不是一项额外动作，而是这些活动及其后果由同一生命历史承接的组织位置。具体感知机制可以逐项失败或修订，这一位置并不因此转交给研究者。存在论尊重与经验谦逊能够同时成立，没有必要以夸大的早期天赋来保卫婴儿的独特性。

十四、怎样让反例真正改变理论

> 如果某项被预期的跨通道匹配没有出现，SDE 应先缩小相关机制主张：现有任务不能支持这种组织，或者所提判据尚不充分。不能立即说“深层纠缠仍然存在，只是无法看见”，使检验永远失去作用。若存在论层面的“我”不以这个指标为必要条件，也应在研究开始之前说清，而不是失败后才撤销关联。

反过来，若匹配得到稳健重复，SDE 也只能向前推进有限一步：某种关系组织具有支持证据。它如何进入照护预期、身体边界或高阶连续性，还需要另外的连接研究局部成功不能替整套自我理论完成验证，就像局部失败不能抹去一个婴儿。

这种纪律对养育也有积极意义。成人不必每天诱导孩子复制动作，再据此判断亲子关系是否良好；研究者也不应把可爱的表演转换为父母焦虑的指标。更值得维持的是可回应、可调整、允许不同表现形式的互动。独特的“我”在其中持续参与，但它不是只有成功模仿成人时才被承认的“我”。

十五、从独特“我”走向可共同生活的关系

我们终于可以更精确地说：婴儿的“我”既是一个符号，也是诸多 SIO 在三界中纠缠聚合的高阶符号。它以特定生命史维持连续，又在每次实际参与中改变未来的条件。这是本书的核心理论立场，其经验展开必须逐项接受研究。

“我”不等待语言才获得存在，语言却能够改变“我”的组织；“我”不先于所有关系独立成立，关系却也不能把“我”化成可替换的位置。把这两组区别同时保留下来，婴儿符号发生学才可能既尊重个体，又说明共同发生。

接下来的“你”“他”“我们”并不是把几个词依次塞进已有头脑，而是研究回应、共同注意、称呼与公共活动怎样重新组织关系。婴儿不是在这一过程中才第一次获得值得被善待的资格；他始终是那个正在承接、参与并改变生活的独特生命。

27

第 27 章

“你”如何进入婴儿正在形成的世界

返回目录

一、那个会回来回应的人

设想这样一个说明性场景：婴儿伸手碰到父亲的下巴，父亲低声发出一个拖长的音。婴儿停顿，继续伸手，父亲这一次换了声音。游戏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一方能够独自决定全部进程。婴儿的动作使父亲作出回应，父亲的变化又给婴儿提供下一次活动的条件。我们在这里看见的，首先不是两个代词，而是两种不可互换的参与位置。

墙面也会对触碰产生阻力，玩具也能发出声音。因此，“发生了反应”还不足以区分人际关系。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人能否根据婴儿刚才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能否在不同情境中继续这段关系，能否把婴儿的活动当成需要理解而非仅仅处理的事情。这些关系使“你”不能被简单还原为一个更复杂的刺激源。

不过，成人能够如此解释，并不意味着婴儿已拥有同样明确的理解。本章以“你的发生”命名一组研究问题：婴儿怎样在互动中逐渐组织对特定他者的辨认、期待和参与；这种组织怎样影响独特的“我”；成人又怎样根据婴儿的回应修改自己作为“你”的存在方式。

二、辨认一张脸与建立一段关系

辨认熟悉的人和形成对他的关系预期，并不是同一件事。婴儿可以对某种声音、气味或形象表现不同反应，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断言已经理解了对方的意图。反过来，一段熟悉关系也不必完全依赖一种感觉通道。关系可以通过声音、触摸、体位变化、活动次序以及可及的表达共同维持。

我们可以把辨认看作一个入口，而不把它当作终点。在构造场景中，父亲每晚负责一段安静的共同活动。起初，孩子的变化也许主要与声音和抱姿有关。后来，当照护地点变化时，双方仍能通过其他线索重新组织活动。此时需要研究的，不是孩子是否记住了一张脸，而是哪些关系能够随情境变化继续成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照护者之间不必相互复制。祖母不需要模仿父亲的全部音调，父亲也不必把自己变成母亲的替身。不同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稳定方式，同时属于同一个婴儿的生活。一个独特的“我”能够参与多种“你”，恰恰显示其高阶组织并非只有一条固定通道。

三、回应中的时间：既不是同步，也不是服从

把良好互动想象为永远同步，容易产生误会。现实中的两个人不可能时时动作一致，婴儿与成人也不需要保持同一节奏。停顿、等待、转向、再次开始，都可以属于关系本身。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而在于差异能否被注意、承接，并进入下一次调整。

在前述游戏中，父亲若每次都立即发出同一个声音，活动可能逐渐形成可预期的重复；若声音变化与婴儿的动作毫无关联，活动又可能失去双方共同推进的特征。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全部孩子的最佳延迟。研究必须同时考虑孩子当时的状态可参与方式、活动目的以及对方的具体回应。

这里的稳定不是机械一致，而是一种可修正的可靠性。婴儿的转头可以使成人减缓活动，主动伸手可以使游戏继续；成人也可能因安全需要改变原来的安排。双方不必拥有同样的意图，却能够共同影响后续。这样的过程为“你”提供一种关系规定：你不是只在我面前出现的人，也是能够被我的行动影响、又不能由我完全支配的人。

四、互动中断为什么值得研究

Tronick 等人 1978 年的面对面互动研究，通过改变照护者通常的回应方式，考察婴儿的反应。其报告中的警觉和退出等变化，使互动互惠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成人单方面表达情感的别名。[R25] 这一研究并不证明婴儿已经具有成熟的他心理论，也不能被转化为家庭故意制造冷漠的训练方法。

它为本书提供的启发是：某些组织只有在变化中才会显出承重关系。持续存在的回应可能因为太日常而被忽略，一旦改变，原先依赖它的活动便出现不同走向。但观察到变化仍须寻找竞争解释，包括新奇、注意转移、疲劳或任务设置，而不能直接把一切反应解释成某种完整的关系观念。

在日常养育中，更有意义的不是人为中断，而是注意自然发生的错位及其修复。成人没有立即看懂婴儿，后来通过调整重新建立联系；孩子对原先喜欢的活动不再有兴趣，双方找到新的参与方式。这类场景让我们研究“你”如何保持可辨认性，又如何避免被固定成永远相同的回应程序。

五、“你”不是“我”的附属品

如果只从婴儿的需要出发，照护者容易被写成一种永不疲倦的资源。可是，另一个人也有身体、情绪、责任和生活历史。承认“你”意味着承认他不能被完全占用。婴儿尚不能充分承担这种理解和责任，成年人及社会却有义务为关系设置可持续条件。

因此，照护者的休息、替班、支持和表达困难，不是对婴儿意义的背叛。它们可以成为关系继续发生的条件。一个必须独自完成全部照护的人，未必有足够空间观察和调整；有支持的关系网络则可能使不同的人在合适时刻承接活动。这里讨论的是条件设计，而不是根据某次疲惫判断父母是否有爱。

对婴儿而言，“你”的不可完全支配，也不等于被随意忽视。成人应当承担与能力相称的责任，提供适当照护，同时在安全范围内允许活动有停顿和转换。关系中的边界需要被组织，而不是用冷落证明边界、用无限满足证明亲密。高阶符号之间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同时保护双方而不抹平责任差异。

六、不同感觉条件中的“你”

假设一名婴儿不能依靠通常的听觉渠道获得信息。若成人把“听到我说话并转头”当作唯一正确的回应，就可能把通道不适配误认成关系缺失。更合适的研究入口是检查视觉、触觉、位置、可及语言和行动方式怎样共同构成联系，并结合专业支持作调整。

同样，对于视觉需要支持的孩子，也不能以是否看向成人眼睛作为全部关系质量的尺度。我们需要询问：孩子通过什么方式发现另一个人的接近，怎样参与活动，怎样表达继续或结束，成人有没有学会识别这些不同的反馈。对具体功能限制的认真评估与对关系可能性的开放，并不矛盾。[N29]

在符号发生学中，这些差异不是普通案例之外的例外补丁。它们揭示了一个普遍问题：关系规定性不能被某一种外观垄断。每一段“我—你”关系都有实际的进入条件。可及性改变的，不只是信息传递效率，也包括谁能够影响活动、怎样影响、哪些经验可以继续成为共同历史。

七、“你”的稳定与成人标签的稳定

照护者可能说：“他只认我。”这句话也许描述了某个阶段的真实困难，但也可能把一种局部组织变成固定身份。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展开：在哪些活动中、什么时间怎样的身体状态下，孩子更容易接受某人的回应？换一种进入方式，是否出现新的可能？

如果成人把现有偏好理解成永久排他性，可能减少其他照护者熟悉孩子的机会；若又以“必须独立”为由突然撤掉熟悉支持，则可能把变化变成不必要的负担。这里不存在由一个标签直接推出的正确行动。需要在保护、稳定与自由相互制约的条件下设计可承接的小变化。

一个构造例子是，新的照护者先加入孩子已经能够参与的共同活动，而不是立即要求替代全部关系。熟悉者与新参与者共同观察，保留必要支持，也给孩子影响进程的空间。是否适合、怎样调整，应以实际反馈及专业意见为准。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关系扩展的逻辑，不是一套普遍的适应训练处方。

八、从二人关系到研究模型

把“你”的发生转化为研究对象，可以先记录三类变化：婴儿在不同参与者面前的活动组织，成人对孩子信号的调整，以及两者在后续活动中的共同变化。只统计成人说话次数，容易遗漏婴儿是否能够改变话题或节奏；只统计孩子微笑次数，也可能忽略活动是否由他真正参与。

研究者还要区分辨认与参与。一个孩子可能辨认熟悉声音，却没有足够行动机会；另一个孩子可能通过不同线索顺利进入活动。若我们要解释关系的高阶组织，就应比较跨情境的延续、必要支持的变化、错误理解的修正，以及新的互动路径是否出现，而不是寻找一个能够代表全部“你”的单项指标。

这些指标仍只是对特定关系的操作化，不是对婴儿完整内心的直接读取。应当先明确竞争模型：感觉熟悉性、一般学习、依恋关系、社会互动或动态系统解释，各自能够说明哪些变化。SDE 的责任是提出额外的组织假说，并接受其未能增加解释或预测的结果。

九、三界中的“你”不是三个他人

在现实世界，另一个人的身体、动作、声音和照护劳动实际参与活动；在理念世界的发生中，关于熟悉、顺序、可能回应的组织逐渐形成；在自我世界，舒适、不适趋近、退出与自身相关经验参与其中。三界不是给同一个人套三个标签，而是询问同一段关系怎样在不同侧面共同改变。

例如，照护者改变抱姿，不仅改变身体支撑，也可能改变活动的可预测性和婴儿接下来愿意参与的方式。婴儿的回应又使成人重新理解自己的行动。我们不需要假定双方拥有对称的成熟意识，便可以研究相互规定。复合体的整体性并不要求其组成者具有同样能力。

由此，“你”不是被放入婴儿已经完成的世界。它的发生改变了这个世界能够怎样组织，也改变了“我”可以通过哪些关系继续发生。下一章将进一步讨论：当另一对象进入双方注意时，关系如何不再只是面对面，而开始围绕一个共同活动形成更复杂的“我们”。

28

第 28 章

“他”与“我们”：共同注意的生成

返回目录

一、两个人看见同一只鸟，还不够

一个孩子看见窗外的鸟，成人也恰好看见。两束目光指向同一对象，并不能自动证明已经形成共同注意。也许双方各看各的，彼此并未参与对方的活动。若孩子转向成人、发声或指示，成人据此调整位置和话语，孩子又对这一回应作出变化，研究者便有理由进一步考察注意是否正在被共同组织。

这个说明性场景让我们区分三件容易混合的事：共同处在一个环境中，共同面向一个对象，以及共同参与一段关于对象的活动。它们可能相互支持，却不完全相同。家庭成员同时坐在客厅，未必形成同一活动；两个人都听见声音，也未必已经理解对方在注意什么。

SDE 的切入点不是立刻为第三种情况宣布一个宏大的“我们”，而是追踪新的纠缠关系怎样成立。鸟的移动、孩子的指向、成人的接近、双方的停顿以及既往经验，共同改变后续。原先的“我—物”和“我—你”没有消失，却可能在一个更高阶的组织中互相规定。

二、从二项关联到三方协调

在二人互动中，双方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表情、声音和动作共同调节。第三个对象的进入，增加了新的关系要求：我所关注的对象，是否也是你所关注的对象；你怎样影响我与它的活动；我能否通过你改变对它的接近方式。这里的“第三个”也可以是声音、事件或另一位参与者，并非必定是静止的玩具。

Carpenter、Nagell 和 Tomasello 对 24 名婴儿进行 9 至 15 个月期间的纵向研究，在七次月度访问中考察共同注意、追随目光和指示、手势及语言等多项行为。[R24] 这一

设计的重要价值，是把若干相关能力放到同一发展过程中观察。它不能被简化为所有婴儿到某个准确月龄便突然开启“我们”的证据。

本书据此提出的理论问题是：不同能力之间怎样形成相互支持的组织，而不只是按顺序出现在清单上？孩子已经能指向，不等于每次都在分享；成人作出命名，也不等于孩子把名称与对方所指对象联系起来。必须回到实际事件，检查谁引出了变化，另一方如何承接，以及原活动因此怎样延续或转向。

三方协调也使失败变得富有信息。成人以为孩子在看鸟，孩子实际关注玻璃上的倒影；成人继续解释鸟，孩子却改变动作。这里不是婴儿“没有学会配合”，而是双方对活动对象的组织发生了错位。能否发现和修正错位，比成人是否说出了正确的鸟名更接近本章的研究核心。

三、对象不只是交流的借口

若把共同注意完全写成人际关系，就可能把对象降为装饰。然而，物体和事件会以自己的条件改变活动。鸟会飞走，水会流动，积木会倒下。它们并不服从成人讲解的节奏，也不因双方关系亲密就自动变得容易理解。客体条件是复合体的承重部分。

在构造场景中，孩子把球递给成人，成人又把球放回孩子能够接近的位置。球的大小、表面、运动方式和孩子当下的身体条件，都可能影响这段往返。如果换成难以抓握的物体，原来的“轮流”未必还能用同样方式进行。研究者不能只保留“分享”这个社会标签，却删去让活动可能或困难的物质条件。

反过来，物体的意义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一个球可以被抓住、滚动、放入容器，也可以进入轮流、请求和共同期待的关系。其物理条件没有由思想凭空创造，但可参与的活动结构在互动中发生变化。SDE 所说意义发生，应落实在这种实际重组上，而不是声称世界只靠成人解释才存在。

这让三方关系具有不可约性：只研究孩子与球，会漏掉成人提供的支持；只研究亲子交流，会漏掉物体的阻力与机会；只研究物理运动，又不能说明为什么同一个滚动会在这里成为共同活动。高阶符号的解释任务，正是保留这些相互规定而不把任何一方吞掉。

四、“他”不仅是尚未加入的“你”

“他”可以指暂时不在直接回应位置上的另一个人，也可以指被双方共同谈论或注意的参与者。对幼小儿童而言，这类关系的明确语言表达仍在发展；我们不能把成人的人称语法直接投射到早期经验。不过，第三者进入活动，确实可以改变既有的关系结构。

例如，母亲与孩子正在玩球，祖父走近并伸出手。此时可能出现多种走向：孩子继续与母亲活动，母亲把祖父纳入往返，或者祖父成为孩子新的注意对象。不能仅凭人数增加就认定出现了更高水平的合作。我们要观察各人的行动是否真正改变了彼此能够做什么。

这一分析还能防止把婴儿理解为只属于一个照护者的关系中心。不同参与者可以有不同位置，有些直接照护，有些提供条件，有些只在特定活动中出现。婴儿高阶符号的环境因而不是一张所有成人同等连接的名单，而是带有时间、功能和可及差异的关系结构。

“他”在成为直接互动的“你”时，也不是身份的机械替换。原有熟悉性、共同活动、别人的介绍和身体进入方式，都可能参与转换。对于本书来说，研究这些转换比为每个人称安排一个固定月龄更有解释力。人称意义的发生需要历史，而历史不会被六个代词的排列完整概括。

五、共同活动中的“我们”与概念中的“我们”

一对亲子可以共同完成活动，而孩子还不会说“我们”。这种参与层的共同性，不能等同于已经形成群体身份概念。后来，儿童能够以语言区分我们和他们，又不意味着早期的身体与关系共同性被取消。这里至少存在活动组织、相互期待和语言表征三个层次。

本书把“我们”的发生首先放在活动组织上：某件事需要多个参与者的行动相互承接，结果及下一步又反过来改变各方。这个定义不要求参与者具有对称能力。婴儿不必承担成人的计划与责任，仍可以通过发起、停顿、接受或拒绝实际改变共同活动。

但是，成人说“我们一起”，并不保证孩子已获得参与位置。父母可以替孩子完成全部动作，再把结果称为共同作品；也可以让孩子在安全范围内决定某些方向，即

使最终成果不如预期整齐。两种情境都可能有温柔语言，却构成不同的互动结构。共同性应从实际关系中辨认，不能只听活动的名称。

相应地，“我们”也不是越融合越好。孩子的疲倦、退出或不愿继续，不应被集体目标抹掉。一个能够承认不同节奏和边界的共同体，才可能让独特的“我”继续发生。高阶聚合不是消灭组成者，而是组织其差异，并使这些差异能够重新改变整体。

六、分享、请求与展示并非同一活动

孩子把物体递给成人，可能是希望得到帮助，也可能是继续一段熟悉游戏，或者试图让成人关注某件事。同一种手部动作不能单独决定其全部意义。研究者需要结合活动前后、成人回应和孩子接下来的变化，保留不止一种解释。

设想一个孩子举起盒子。成人立即打开，但孩子把盒子重新合上，又举起来。最初“他需要帮忙”的判断，可能遗漏了孩子正在探索开合或邀请轮流。这个例子并不是关于某个真实儿童的诊断，而是提醒我们：意义不能由一次动作加成人猜测就封闭后续反馈具有修正解释的地位。

若成人总以最快方式满足自己猜测的需要，可能把本可展开的活动压缩成输入和处理；若又刻意不回应来迫使孩子表达，也可能制造不必要的困难。更适合的原则是以清楚、适量和可调整的方式回应，观察孩子是否承接，并在误解时改道。具体支持仍需符合孩子的发展与身体条件。

对研究来说，区分这些活动还有一个作用：它防止把“更多递物”直接当作“更多社会能力”。动作频率与组织性质并不等同。需要观察的是不同关系能否被灵活组织、误解能否被修正、参与机会是否扩展，而不是把一个容易计数的动作变成全部高阶符号的代表。

七、共同注意不是视觉的专利

“共同看一个东西”是容易说明的例子，却不能成为所有共同活动的唯一原型。对一些孩子和情境而言，声音、触觉、动作节律或可及语言可能承担更重要的作用。研究应先识别实际可参与的关系，而不是要求所有人符合一套面对面注视的外观。

例如，在一个说明性活动中，成人与视觉需要支持的孩子共同触摸安全物体，成人根据孩子的动作调整位置和表达，孩子又通过触碰或停顿改变进程。是否形成某种

共同注意或共同参与，需要具体操作定义和观察，不能仅因没有典型目光交替就宣布关系缺席。

这也要求区分概念的功能与常用测量方式。某项经典任务采用目光，并不意味着被研究的全部关系只能通过目光存在。改变测量时当然需要重新验证指标，不能凭哲学理由假定不同形式完全等价。但同样不能把原任务的方便当成所有儿童的本体标准。

可及性在这里不是附加的善意，而是研究有效性的条件。若任务本身阻断了某个孩子通常的参与通道，得到的“低分”可能同时反映任务不适配。只有把身体条件、支持方式和任务要求纳入解释，才有可能判断究竟是哪一层关系尚未形成，哪一层只是没有被恰当显露。

八、家庭的“我们”怎样保护个体

婴儿加入家庭，会改变时间安排、照护责任、资源使用和情绪联系。家庭因此可以被研究为不断重组的高阶符号，但这并不赋予家庭吞没儿童利益的权利。整体性不等于整体可以替每个成员定义一切，和谐也不等于没有不同声音。

在实际讨论中，成人可能以“都是为了我们家”解释过度安排，也可能以“尊重孩子”放弃必要责任。两种说法都需要回到具体后果：孩子的基本需要是否被照顾，能否通过自己的反馈改变安排，家庭成员是否获得可持续的支持。规范判断不能仅由整体概念自动推出。

一个积极的“我们”，应当使各方更有条件参与，而不只是让任务更快完成。例如，多位照护者通过交接了解孩子的活动与需要，可以减少重复误判；同时，交接记录也不应成为永远固定的标签。共同知识需要更新，否则家庭的一致性可能只是共同坚持旧解释。

因此，婴儿符号发生学同时研究聚合与分化。新的共同活动可以加强关系，也需要保留不同经验的不可替代性。父母不能替婴儿感受，婴儿也不应承担维持父母关系的责任。边界不是共同性的敌人，而是使共同性不变成占有的条件。

九、如何检验一种新的共同组织

假设研究者比较两种安全的共同游戏安排。两种安排的玩具、成人参与时长和总体语言量相近，但一种主要由成人预先推进，另一种在预设安全边界内允许孩子的反

馈改变次序。研究问题不应只是后者让孩子笑得更多，而应考察活动是否产生新的可参与路径，并在后续情境中显露。

可能的观察包括：孩子是否能够发起不同方向，成人是否根据这些发起作出与情境相关的调整，双方误解后是否出现修正，活动变化能否在另一种物体或另一位照护者那里以适当方式继续。它们是候选指标，不是已经验证的“我们量表”。必须检验编码一致性、任务适配和竞争解释。

如果效果仅来自成人更热情、孩子更熟悉或物体更容易操作，便不能归因于所提出的高阶组织。若没有跨情境增量，也不能把局部表现扩大为个体全部发展。对 SDE 而言，最重要的检验不是看故事是否动人，而是结构性解释是否比简单计数提供额外可复核的判断。

十、从共同活动走向共同意义

“我、你、他、我们”不是将婴儿逐步装入社会分类的四个盒子。它们指向不断变化的参与位置、关系边界和表征能力。早期共同活动为后来的人称与群体意义提供条件，语言又能把原先局部的关系带入新的场景，甚至使不在场的人进入当前活动。

这样的扩展不是一次完成的。婴儿高阶“我”既在共同活动中形成，也以自己的差异使共同活动改变。另一个人不是单纯的教育来源，物体不是单纯的教学道具，“我们”也不是预先完成的容器。三者相互规定，使原来不可能的活动有机会发生。

下一章将研究这段关系中一种尤其有力量的回写：成年人对婴儿的命名与解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共同意义不只是增加知识。它还会改变谁有权发起活动、什么被视为合理反应、哪些可能性被保留或提前关闭。符号的表征层，正是在这种实际后果中重新进入存在层。

29

第 29 章

命名、解释、规训如何回写婴儿符号

返回目录

一、“胆小”这个词来到孩子身边以后

一位幼儿在陌生房间里暂时没有离开照护者。有人说：“他就是胆小。”这个作者构造的场景并不罕见于我们的经验想象，但本章不把它当成已经收集的观察资料。我们要研究的是，一句话怎样从描述进入行动，又怎样可能改变下一次活动。

命名以前，孩子已经在参与这个场景：感受声音、调整姿势、关注熟悉的人与新的物体。命名以后，成人可能减少介绍材料，也可能提供更多陪伴，还可能向其他人重复这个判断。词语没有凭空制造最初行为，却可能改变随后出现的关系。

因此，符号首先作为存在方式，不表示表征没有作用。恰恰相反，只有把存在与表征分开，我们才看得见表征如何取得实际力量。若把“胆小”直接等同于孩子本身回写过程便消失了，仿佛成人只是读出了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

SDE 在这里提出一个双重问题：孩子实际形成了什么组织，成人关于这个组织的解释又形成了什么后果。两者可能相合，也可能错开；可能互相支持，也可能使原本可以变化的关系被过早固定。

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命名活动

第一种是指称，为了让人能够找到同一个孩子而使用名字。第二种是描述，对某次行为、身体状态或活动特点作说明。第三种是评价或分类，把多个现象归入“乖”“聪明”“难带”等较稳定类别。它们都使用语言，却承担不同任务。

名字能够维持社会识别，但不能概括全部生命史。一次描述可以准确，却未必适用于其他情境。一个分类可能有助于交流，也可能因范围过宽而误导行动。研究者不能把这些不同语言活动统称为“赋予意义”，然后忽略各自的边界。

还有专业用途的名称，例如某项诊断或支持需要。它与日常评价不同，可能连接评估、服务和具体干预。批评标签固化，并不意味着取消有根据的专业命名。需要避免的是让某项专业描述吞掉全部个体身份，或者让非专业判断冒充诊断。

由此，命名的价值取决于它怎样服务理解与行动。一个名称可以帮助获得资源，也可以阻断新的观察。不能只问这个词听起来积极还是消极，还要问它是否准确、是否注明条件、是否能够被修订，以及是否使支持更加可及。

三、词语不必被婴儿理解，也可以改变婴儿的处境

成人常以为，孩子尚未理解某个词，就不会受这个词影响。这个判断遗漏了行动中介。婴儿可能还不了解“胆小”的语义，但成人因这个判断改变材料、节奏和接近方式，这些改变已经进入了他的现实活动。

本章把这条路径称为表征的间接回写：成人表征改变成人行动，行动改变婴儿可以进入的关系，婴儿反馈再影响成人解释。它与孩子直接理解评价、形成自我叙述的过程不同，不能在早期就把两者合并。

一个构造例子是，成人把孩子暂时不伸手理解为不喜欢某类物体，随后不再提供。未来没有相关活动，又被用来证实原判断。这个循环有可能发生，但并不是每次命名都必然造成的自我实现。孩子的新活动、其他照护者和新的环境，都可能打断循环。

因此，研究要记录中间环节，不能从词语与后续表现相关，就直接宣布语言决定了个性。也可能是已有身体状态同时影响成人命名和孩子活动。要辨别回写，至少需要知道名称何时出现，实际安排怎样改变，以及其他解释能否说明结果。

四、当词语逐渐被理解，关系又增加了一个层次

随着语言参与活动，名称不再只通过成人行动间接起作用，也可能进入孩子对物体与关系的组织。关于早期语言与分类的实验研究，例如 Waxman 与 Markow 对十二至十三个月婴儿的研究，考察了词语怎样影响物体分类。[N28]这支持语言能够参与某些认识活动，却不能直接证明成人对孩子的性格标签必然塑造其人格。

这个边界十分重要。给物体相同名称与把一个孩子称为“懒”，不是同一种任务；短时分类结果与长期自我结构，也不是同一层结论。研究之间可以提出启发，但不能省略中间机制，借一项实验替更大的社会主张背书。

本书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当孩子能够在活动中使用名称，名称怎样与身体经验、共同注意和成人回应纠缠。一个词可能帮助恢复共同活动，也可能把多个情境联系起来。它的作用不只在于声音本身，而在于它进入了怎样的使用历史。

因此，语言发生不是给已有“我”贴上更多文字。它可能改变哪些关系能够被重新调用，哪些经历能够被共同谈论，以及孩子后来怎样表达自己的活动。但这种改变的具体形式与时间，需要分别研究，不能由词汇数量直接推出成熟主体性。

五、规训首先要问目标与边界

> 成人需要安排生活、阻止危险、提供引导。将婴儿视为参与者，不表示所有成人要求都不正当。本章所说的规训问题，是这些要求如何定义合宜行为，如何对待差异，以及它们是否允许婴儿反馈改变方式。

例如，安全边界可以明确，进入边界的帮助方式却可以调整。成人阻止孩子接近危险，并不需要等待孩子理解全部理由；但可以在适宜条件下提供替代活动，注意其状态，而不是把不满直接解释为坏性格。必要限制与人格评价应当分开。

另一种情形则是，成人以整齐、安静和快速服从作为唯一成功标准。某项活动越方便管理，越容易被称为教育有方；孩子提出新的差异，反而被当成需要消除的干扰发生学要求检查，这种整齐保存了谁的活动空间，又压低了谁的表达。

规范并不因为来自成人就必然错误，也不因为出于爱就自动正确。它需要说明目的、依据、实施条件和修订方式。对婴儿而言，保护、稳定与自由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判断规范如何进入生活的一个入口。

六、从封闭标签改为带条件的描述

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编辑动作，是把“他就是这样的人”改成“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观察到这些表现”。例如，“胆小”可以先拆为陌生声响出现后靠近照护者、在熟悉陪伴下继续观察、在某些材料面前主动伸手。这样的描述不必否认气质差异，却避免一个词吞掉全部变化。

带条件的描述至少保留时间、情境与关系。今天的表现不自动等于昨天，面对某个人不自动等于面对所有人，在疲劳状态下也不自动代表平时。条件越清楚，照护者越容易知道哪些安排值得调整，哪些需要进一步观察。

它还有一个积极作用：使成人能发现原标签未能容纳的能力。一个被称为“不主动”的孩子，可能在成人减少非必要提示后主动改变材料；一个被称为“固执”的孩子，可能在更可理解的活动转换中表现不同。这里都是候选解释，需要观察，不是新一套万能翻译。

语言由此不再只是把人归类，也成为重新开放关系的工具。好的描述应当能够把人带回现场，让下一位照护者继续看，而不是使下一位照护者不再需要看。表征的独立传播能力，需要受到发生条件的约束。

七、专业名称怎样帮助而不占有儿童

有根据的专业评估可以提供重要支持信息。某个功能描述能够帮助确定可及通道、必要协助或后续评估，这与随意贴标签并不相同。发生学不能以反对对象化为由，使家庭远离需要的专业服务。

但专业信息进入家庭和托育以后，也需要保持范围。诊断名称说明的是特定问题，不是关于兴趣、情感、学习或未来的全部叙述。一个孩子可以在某方面需要长期支持同时在其他方面形成丰富而独特的参与方式。不能从一个名称推导所有能力。

信息交接应当强调实际需要：哪些支持有效，哪些情境需要注意，哪些结果还不确定，什么时候需要复核。名称可以作为入口，却不应成为终点。尤其不应把历史记录中的暂时困难永久复制为当前事实。

对于家庭而言，得到专业名称也可能改变成人的自我理解与关系安排。有人松一口气，有人担忧，有人重新寻找资源。这些变化本身也会进入婴儿的发生环境。研究应允许复杂体验，不把任何单一情绪规定为正确父母的表现。

八、一个可以研究的表征回写过程

可以在自然照护资料中提出一个有限问题：当成人对同一行为采用不同解释时，后续支持是否发生可辨认变化。研究不能主动向家长灌输贬损标签；可以观察已有记录，或比较两种都合宜的专业沟通方式，检查信息是否更准确地进入行动。

一个拟议比较是，单独提供概括词与提供具体条件化描述，是否导致照护者注意到不同线索。评价不应只看家长记住了多少术语，而应看他能否辨认需要、避免过度泛化，并在新反馈出现时修订判断。孩子的实际经历仍需单独观察。

还要保留反例。名称变化以后行为没有变化，说明语言未必在该情境中承担关键作用；行为变化却没有改善儿童参与，说明沟通效果不等于发展收益；不同名称产生相同有效支持，则可能表明关键在于行动而非词语选择。

这个研究路线使 SDE 的存在—表征区分获得可检验的接口。它不要求否认语言的重要性，而是要求准确说明语言通过什么路径参与发生。表征越有力量，越需要对其实际后果负责。

九、一份描述怎样在两位照护者之间改变

设想甲照护者交接时说：“他今天不愿意玩。”乙听见的是一个范围很大的结论，可能因此取消全部材料。如果甲改为：“刚才在那件材料面前转头，后来对旁边的声音有反应”，乙就获得了一段可以继续观察的关系。两种说法并非只差语气，而是提供了不同的后续行动空间。

这个例子使表征的粒子化出现了一个张力。为了容易传递，语言需要把复杂经验压缩成相对稳定单位；压缩过度，又会丢掉成立条件。越是简洁有力的标签，越可能在传播中获得超出原观察的独立性。因此，表征的整体性、稳定性与独立性，也需要受到证据范围的约束。

这里的独立性不是坏事。有效知识当然需要离开原场景被调用，否则无法交接与合作。问题在于，它应携带什么最小条件，才能在重新调用时不被误用。对于婴儿记录，时间、当时状态、具体活动与成人回应，往往比一个人格化形容词更有助于保持意义。

还可以给记录保留一个明确的修订入口：“这是我们目前的理解，不排除其他原因。”这不是在所有句子后机械加免责声明，而是让下一位照护者知道哪些是观察、哪些是推断。新的不同表现出现时，修改的应是解释，而不是要求孩子重新符合已经传播的名称。

在 SDE 中，表征本身也是发生过程的一部分。成人对婴儿形成的概念，可以作为另一个符号进入新的 SIO；它与孩子的存在有关，却并非孩子本身。这种层级区分使我们能够同时研究两段历史：婴儿怎样变化，以及关于婴儿的知识怎样变化。两者不一致，正是重要的研究线索。

例如，孩子已经能够在适宜条件下参与，家庭仍沿用早期“不能”的说法，后续机会可能没有及时打开；相反，成人过早传播“已经会了”，其他人可能撤掉仍然需要的帮助。两种错误方向相反，却都来自表征脱离了实际关系。准确更新比永远使用积极词汇更重要。

因此，一份好的成长记录可以保存版本。不是把昨天的判断删除得不留痕迹，而是说明当时看见了什么，后来什么新证据促使修订。这样的历史使家庭理解知识为何改变，也避免把改变意见当成不可靠。对正在发生的孩子保持可靠，有时恰恰需要改变意见。

这一原则还可用于教育沟通。与其向家长交付一个孩子的固定类型，不如提供有根据的关系描述、适用条件和下一步观察问题。家长因而不是被动接收一个权威标签而能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修订。知识传播由单向定性，转为可追溯的共同理解。

如果这种沟通方式仍然没有改善行动，研究也应承认它的限制。文字写得更谨慎，并不自动使服务更可及；家庭可能仍缺少时间、资源或专业支持。表征回写需要实际路径，不能把改了说法当成全部问题已经解决。

十、让名字成为通向孩子的入口

名字可以是亲密的呼唤，专业术语可以是获得支持的通道，日常描述也可以保存共同经验。我们不需要从婴儿身边撤走语言。需要撤走的，是语言对生命的垄断：以为一个词已经说完了这个孩子，以为一次判断足以规定未来。

本章的积极原则是，任何表征都应当为再次观察留出空间。它能够指向存在，却不替代存在；能够帮助协调，却不取消反馈；能够保存过去，却不封闭后续变化。这样的语言才与符号发生学相容。

孩子将逐渐参与命名，也会在以后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成人的描述。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不让那些尚未经过他参与的判断变成不可更改的边界。婴儿首先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独特“我”，然后才是我们能够说出的各种称谓。

30

第 30 章

语言发生是否改变高阶“我”的结构

返回目录

一、第一句话以前，生活已经有了关系

在孩子说出一个可以辨认的词以前，喂养、触摸、寻找、拒绝、等待和共同活动已经持续发生。语言不是从一片毫无意义的空白中升起，也不是给原先没有个体性的生命颁发证书。它进入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高阶符号，并可能重新组织其中已有的关系。

设想孩子伸手指向杯子，成人递过杯子。后来，孩子能够使用一个声音或手势语言表达同样的需要。表面上看，只是多了一种传递方式；实际上，需要研究的是表达能否跨越新的距离、引出不同回应、进入不同照护者之间的交接，以及帮助孩子改变共同活动。语言的作用不应仅用词汇数量来概括。

本章的核心命题是：语言为高阶“我”增加了新的可组织关系，但不取代身体与行动。其发生依赖可及的语言经验、感觉运动条件、社会互动及具体学习过程；反过来，它又可能扩大婴幼儿参与和重组这些条件的能力。这里的“可能”必须通过具体发展研究加以区分，不能把语言写成万能发动机。

二、声音之间的规律，与话语中的关系

语言研究首先提醒我们，不应把学习者理解为只能被动模仿的容器。Saffran、Aslin 和 Newport 在 1996 年的实验中，研究 8 个月婴儿对连续人工语流中统计规律的利用，结果支持他们能够在该任务条件下分辨由不同序列关系形成的声音单位。[R26] 这为早期学习机制提供了具体证据，却不是完整语义或语法已经形成的证明。

对 SDE 而言，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区分：可辨认单位怎样形成，与这个单位在生活中具有何种意义，并非同一问题。某段声音可以因重复关系而获得可识别性，但要成为请求、称呼、拒绝或共同谈论的一部分，还需要考察它进入了哪些活动。粒子化的语言形式与更高阶的生活符号之间，需要建立桥梁。

反过来，社会关系也不能替代所有学习机制。两个人亲密，并不直接说明孩子怎样分辨语音、组织词序或形成类别。若 SDE 只说“语言来自互动”，却不分析互动中的差异与可学习结构，就没有解释语言发生。高阶理论应当连接已有机制，而不是用一个大词把它们全部覆盖。

因此，本书把语言材料、身体通道、共同活动和历史反馈放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研究。不同研究可以在其中选择不同层次，但必须说明本次解释到哪里为止。一个关于声音单位的结果，不应被包装成对全部自我发生的直接证实；一个关于亲子互动的发现，也不能抹掉语言自身的组织问题。

三、为什么同样的材料可能形成不同的学习条件

Kuhl、Tsao 和 Liu 在 2003 年的研究中，比较了特定月龄婴儿接触外语的不同条件：研究中的现场互动条件产生了相应语音学习效果，而所比较的录制呈现条件未显示同样效果。[R04] 这一结果针对具体任务、年龄和材料，不能扩张为所有屏幕经验在所有发展阶段均无学习作用。

它对本书的启示不是“真人天然神奇”，而是材料相同不等于 SIO 相同。现场参与者可能根据孩子的注意与动作调整，声音、目光、物体和节奏也在不同组织中出现究竟哪些因素承担作用，需要进一步实验拆分；单凭现场与录制的差异，不能认定某一个因素已被单独证明。

我们可以据此提出一个研究原则：评估语言环境时，不应只计输入总量，还应检查输入怎样进入孩子可参与的活动。一个词在背景中反复出现，与它在孩子发起、成人回应、物体变化和后续反馈中出现，可能构成不同关系。是否带来不同结果、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仍需用合适设计判断。

这也使家长从“必须不断说话”的机械压力中得到一个更有用的问题：当前的交流是否可及，是否与孩子正在参与的事情相关，是否容许孩子改变进程？它不是减少语言支持的理由，而是把支持从单纯剂量转向组织质量。对于存在语言发展担忧的孩子，这种日常观察应与专业评估并行。

四、语言不只是给物体贴名字

“杯子”可以指一个物体，但在实际活动中，它可能出现在请求、寻找、拒绝、回忆或游戏里。一个孩子能够在图片上指出杯子，与他能在需要时用语言改变共同活动，是不同的能力显露。词的指称关系重要，却不能穷尽其生命中的用途。

以作者构造的场景为例，孩子先在喝水活动中接触一个词，后来把它用于空杯子，再用于寻找不在眼前的杯子。我们不把这个顺序规定为所有儿童的发展阶梯，而用它展示几类不同的关系要求：眼前对象与声音的联系、跨情境辨认、以及让不在场对象进入当前互动的能力。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语言可能扩展活动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孩子不再只能直接抓取或指向眼前之物，而可以借可及表达请求别人协助寻找。成人的回应也因此改变。这样的变化不是给一个固定世界添加标签，而是让某些原先难以实现的共同活动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物体的实际条件仍然具有约束。说出“水”不会自动满足身体需要，表达“再来”也不能取消安全界限。语言的创造性存在于具体关系的重组，而非对现实的任意支配。高阶符号的发生必须保留语言与身体、行动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连接。

五、“我不要”为什么既是表达，也是关系事件

当幼儿开始用语言或可及的符号表达拒绝时，成人有时只看见行为管理问题。符号发生学则首先询问：这种表达给共同活动带来了什么新的信息与位置？它可能让成人更清楚地知道孩子不愿继续，也可能成为协商次序、材料和参与方式的入口。

不过，尊重表达不意味着每一个要求都要实现。安全、健康和他人的需要仍然构成界限。关键是界限怎样进入关系：成人可以承担必要决定，同时尽可能说明和调整

也可以把所有拒绝都解释为坏脾气，从而关闭理解。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限制而在于限制是否仍承认孩子是参与者。

在说明性场景中，孩子拒绝某项日常活动。成人先观察身体状态和活动条件，区分不适、疲劳、材料不合适、需要转换等可能，再决定怎样承接。语言在这里不是对内心的完全透明窗口，却是不可忽略的新反馈。它需要与其他行为及情境相互校验。

这种变化也会回写孩子的高阶“我”。当表达能够适当地影响互动时，语言不只是记住的词，而是参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当表达经常被误读或完全忽略时，研究者也应考察其后续作用。具体发展后果不能由单个场景推断，但表达通道是否具有实际效力，可以成为研究问题。

六、手语与可及语言不是次等替代品

讨论语言时，若默认只有可听见的口语，就会把一部分儿童排除在理论之外。对于听觉条件不同的婴幼儿，关键问题是能否及时进入适合其需要的、可及的语言与交流支持，而不是先要求所有儿童沿同一通道前进。相关选择应结合专业评估与家庭实际，不能由本书替代个体化意见。[N26]

从 SDE 角度看，通道差异改变实际纠缠的组织，却不构成人的价值等级。视觉语言、触觉支持、表情与动作在具体关系中怎样结合，需要按其自身条件研究。我们不能把与典型口语路径不同的历史直接命名为缺少意义，也不能用尊重差异来淡化真实的语言可及风险。

这里尤其需要区分沟通意愿与语言接入条件。一个成人可能极其关爱孩子，却缺少适合其感官条件的表达资源；一个孩子可能积极参与，却无法从现有方式中获得足够信息。将困难全部归咎于爱不足或孩子不努力，都会遮蔽可以改变的条件。

积极支持的目标，应是扩大孩子真实可参与的语言关系，并持续观察其发展，而不是让家庭在某种抽象的“正常形式”面前独自承受压力。高阶“我”的独特性并不排斥公共支持；相反，正因为每个孩子不可替代，社会才需要为不同通道提供可及资源。

七、语言怎样把不在场的关系带进现在

前语言活动往往与眼前身体和情境紧密关联，但不能因此断言它完全没有记忆或预期。语言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改变这些关系被调用的方式：一个名称可以让不在场的人进入当前交流，一段简短叙述可以把先前事件与现在的行动联系起来。具体能力的出现仍需按发展层次区分。

对高阶符号而言，这种变化涉及历史的重新组织。过去的经历不仅以身体习惯或活动倾向影响现在，还可能被语言选择、排列和共同讨论。成人也会通过讲述，为孩子提供关于自己和家庭的解释。语言因此既扩大参与，也带来新的误读风险。

例如，家人反复讲述“你小时候很怕……”的故事，可能把一段局部经历组织成稳定的个人形象。随着孩子能够参与叙述，他可能接受、修改或反对这种说法。这里的变化不是过去事实被随意创造，而是过去在当前关系中以何种方式被解释和使用。存在历史与历史叙述需要保持区分。

婴儿符号发生学研究早期过程时，不应把后来叙述能力倒灌到新生阶段；但也不能因早期不会叙述，就忽视成人叙述已经在安排其生活。语言的回写可以先由他人发起，后来才逐渐成为孩子自己能够参与的活动。

八、语言增加了自由，也增加了规范

会表达使某些活动更容易展开，也使孩子进入新的规则与期待。词语可以帮助请求和解释，亦可以成为评价和规训工具。一个高阶“我”获得语言，并不是从此脱离限制，而是在新的关系中拥有更多行动可能，同时面对新的组织要求。

因此，语言教育不能只问孩子说了多少，还应问这些表达在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能否被听见，能否得到适当回应，能否用于探索而不仅用于回答成人提问，能否保留不同意见与停止活动的方式，都属于值得研究的关系条件。它们不能替代专业语言评估，却可以补充对日常参与的理解。

同样，成人不必把每次互动都变成语言考试。连续要求孩子命名、重复或表演，可能使原先具有多种用途的活动被单一目标占据。这里不是否定适当教学，而是提醒

教学安排应与实际参与相容，不能为了得到一个可展示的词而忽略孩子正在经历的完整事件。

保护、稳定与自由在语言发生中仍然不可分割。保护包括避免羞辱和不适配的压力，稳定包括持续可及的交流，自由则表现为孩子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活动方向。三者如何实现，要在具体关系中判断，而不是用固定话量或表演次数来替代。

九、SDE 对语言研究的增量应当在哪里

统计学习、社会语用、感觉运动、语言结构及神经发展等研究，已经提出多种有证据约束的解释。SDE 不能仅因为使用“纠缠”一词，就宣称已经超越它们。其潜在增量应体现在跨层连接：怎样把一个局部语言单位的形成，与活动组织、关系变化和高阶“我”的持续发生联系起来。

一个候选研究可以比较：在单项词汇或声音辨别表现相近的孩子中，互动结构指标能否进一步解释跨情境使用、发起活动和修正误解的差异。必须控制任务可及性、已有能力、环境条件和其他竞争解释，并检验模型在新样本中的表现。若没有增量，就应明确承认，而不是把所有结果改写为理论成功。

另一项研究可以关注支持改变之后的路径：某种更可及的语言安排，是否只改善当下任务，还是也改变了孩子与不同照护者的参与组织。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制造统一的语言成绩，而在于识别新的关系怎样成立、何时保持、何时需要不同支持。理论预测需要具体到这些条件。

十、两个看似冲突的结果，可能回答不同问题

Smith 与 Yu 的研究发现，12 个月与 14 个月婴儿能够在各次指称都有歧义的材料中，利用跨情境共同出现的规律形成词与对象的联系。[M09]这个结果与前文现场外语接触研究并不直接冲突：一个主要考察词物对应，另一个考察特定语音学习；年龄、材料任务和支持条件均不相同。[R04]

若把前者写成“语言不需要社会互动”，把后者写成“没有真人就没有学习”，两个过强结论当然互相矛盾。但是，研究并没有要求我们作这种选择。局部实验可以

把某些条件固定，从而突出一种过程；被固定的生活史并未因此从婴儿身上消失，另一个实验中的必要条件也未必在所有任务中具有同样地位。

SDE 在这里有一个实质任务：不是把两种解释都改名为纠缠，而是说明它们怎样在不同位置接合。社会互动可以改变孩子接触哪些样本，统计过程可以帮助从样本中保存区别，已经保存的区别又能改变下一次共同注意。每一段连接都需要单独证据，不能用“共同作用”掩盖中间空白。

十一、歧义如何在多次活动之间缩小

设想一个仅用于推理的微型世界。某个声音第一次出现时，孩子面前有软球与布盒；第二次出现时，有软球与圆环；第三次出现时，只有布盒，没有这个声音。逐次看，每次事件仍可能有许多解释；合起来看，某些对应比其他对应更有支持。这个构造例子并非原实验的材料复制，也不说明孩子在心中进行成人式逻辑推演。

其中至少有三个待解释环节：孩子实际注意了哪些对象，前一次接触留下了什么，以及新接触怎样改变已有联系。外部安排具有统计规律，只是第一个条件。假如孩子每次都转向别处，研究者计算得再准确，也不等于这些规律已经成为孩子的经验。提供的资料与被活动选取的资料不能混同。

同样，正确选择也不能唯一识别学习算法。它可能来自逐步调整关联，也可能来自保留并修订候选对应，或者来自不同过程的配合。Smith 与 Yu 在讨论中也明确承认，其结果不能单独区分若干可能机制。[M09]这恰好提醒 SDE：一个符合预测的显露，并不会让产生它的全部纠缠自动变得可见。

十二、社会中介可能改变的是样本的构成

在日常活动中，成人可能在孩子已经拿起对象时命名，可能根据孩子的转头暂停，也可能把对象移到更可及的位置。这些行为不仅增加语词数量，还改变一个词与哪些实际经验共同出现。若只统计成人总共说了多少遍，就会把很不相同的学习条件压成相同剂量。

这个机制可以进一步分解。孩子发起活动，使某一对象突出；成人承接，使声音与该活动相连；孩子的反应使成人决定继续、调整或停止。由此形成的样本分布，是

双方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语料库自然投放的副本。统计学习与社会互动在这个解释中不是两条争夺全部因果的路线，而是可能处在同一循环的不同位置。

但成人的承接也可能误导。孩子看向杯子后方的影子，成人以为他关注杯子，于是不断命名杯子。社会互动并非天然减少歧义。应记录孩子后续关注、实际使用与误解修正，才能判断哪种对应正在形成。爱的动机不保证语言信息总是准确，实时互动也不保证每个反馈都被正确理解。

十三、区分两种理论，需要让它们冒不同的风险

可以提出一个作者设计的比较：在安全、适龄的研究情境里，使材料中的词物共同出现次数尽量相当，但改变材料是否围绕孩子当前可记录的注意来安排。若后续差异完全由实际观看时间解释，优先支持的可能是经验选择机制，而非某种额外社会理解。若控制这一层后仍有差异，才需要继续寻找更具体的中介过程。

另一种比较是保持成人承接方式相近，而改变跨事件歧义能否逐步消除。若两种材料都产生相同表现，可能是任务不敏感，也可能说明所设统计区别没有被利用。不能把相同结果预先定义为更高阶的整合，也不能把任何差异都自动归给社会性。理论比较必须先声明哪项结果对哪段机制构成支持。

这些设计仍然不足以立即分开所有理论。社会语用取向可以承认统计过程，关联模型也可以纳入注意选择；一个足够灵活的模型甚至能够模仿多个机制。此时应比较预测的具体形状、需要的参数与新情境表现，而不是依据学派名称判定胜负。无法区分时报告兼容，是研究结论，不是研究失败。

十四、从识别一个词，到用它改变关系

词物对应形成之后，语言怎样进入高阶“我”，还有一段不可省略的桥梁。孩子在实验中更久地观看目标，与在生活中主动请求、指出缺失对象或修正成人误解，并不是同一项显露。前者可以是后者的条件之一，却不是后者已经完成的证明。

本书提出两个分开的追踪问题：新单位是否能在改变材料、人物或活动后被调用；被调用以后，是否实际改变了共同活动的组织。一个词在不同图片上都能被辨认，却

从未进入请求，说明某种迁移成立而另一种用途尚不清楚。一个孩子借手势有效改变照护，即使口语形式尚未出现，也已经提供了关系参与的另一类证据。

因此，语言的发生性价值不能只由词汇表的增长表示。值得研究的是声音或可及视觉语言怎样与身体需要、活动选择、共同注意和历史调用建立新连接。统计规律解释某些单位怎样形成，社会中介解释某些经验怎样被组织，高阶符号研究则要求把这些过程与独特生命的后续参与连接起来。连接可以逐段建立，也可以在某段被反例阻断；它不需要一个包办全部语言发生的万能原因。

十五、语言让“我”获得新的发生通道

语言不是婴儿符号的起点，也不是全部发展的终点。它以新的形式连接身体、物体、他人、时间与自我表征，使一些原先难以进行的活动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它也把评价、叙述和规范带入更复杂的互动，因此既能打开，也可能关闭某些发生路径。

我们不应把语言能力当作人格价值的刻度。一个表达需要支持的孩子，仍是独特的高阶“我”；一个词汇丰富的孩子，也不能因此被认定已经获得完整的关系自由。研究与养育的任务，是理解其真实可参与的世界，并为后续发生提供适当条件。

至此，第六编把“我、你、他、我们”从代词排列还原为存在、活动和表征的相互组织。下一编将进一步面对个体差异：当身体条件、出生历史和参与通道不同时，高阶符号怎样以不同方式发生；我们又如何避免把这些不同压缩成同一标准上的高低位置。

第七编 / PART 07

每个婴儿都不同：双胞胎、残障与发生自由

第 31—35 章

31 同卵双胞胎：基因相近不意味着 SIO 相同

32 同一个物体，不同的行动可能

33 听觉与视觉障碍：多模态路径的改变

34 先天疾病和长期照护中的生命符号

35 个体独特性：不是标准差的装饰

31

第 31 章

同卵双胞胎：基因相近不意味着 SIO 相同

返回目录

一、“几乎一样”的两个人

两名婴儿躺在相邻的位置，衣服相似，出生日期相同，家庭也相同。成人很容易以“一模一样”表达惊讶。但这个日常说法不能代替研究判断：相似的是哪些条件，不同的是哪些过程，我们又根据什么认为这些条件已经充分解释了他们的发展？

同卵双胞胎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比较，却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生命实验副本。Jónsson 等人的基因组研究显示，同卵双胞胎之间也可能存在早期发育过程中形成的遗传变异差异。[R27] 本书不以此推导某种性格或能力差异，只借它纠正“所有遗传细节绝对相同”的过度表述。

更根本的是，即使暂时假定某些身体条件非常接近，两个生命也不会占据同一段实际互动历史。一个孩子的伸手发生时，另一个可能正在休息；同一个成人无法在每个时刻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回应两个人。这里的差异并不是研究失败的噪声，而是独特高阶符号需要解释的材料。

二、同一家庭不是同一环境的充分描述

“环境相同”通常意味着共享家庭住址、经济条件、父母或某些制度。它是一种有用的概括，但并不穷尽每个孩子实际参与的 SIO。共用一个房间，不等于能够接近相同物体；同样听见一段声音，不等于声音进入了相同的活动和身体状态。

在说明性场景中，成人给两名婴儿提供相同玩具。甲正试图抓取，乙则在观察照护者的动作。成人据此作出不同回应，随后孩子又各自改变活动。我们可以说玩具和

成人相同，却不能说整个互动复合体相同。主体位置、当前活动和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不同组织。

这种区分与非共享环境研究形成对话。Plomin 与 Daniels 关于同一家庭儿童差异的讨论，强调家庭内差异不能简单被“共同养育”概括。[R28] 但“非共享环境”这一统计或理论类别，并不自动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SDE 需要进一步进入事件，找到可观察的参与条件与反馈路径。

也应防止反向夸大：并非每一处微小差异都会形成长期影响。某些差异很快消失，某些在后续互动中被放大，还有一些只有在特定任务中显露。独特历史的不可复制性不能直接替代关于稳定个体差异的机制解释。我们必须研究哪些差异得以承接，以及为什么。

三、孩子也改变自己所遇到的回应

如果把环境写成父母提供的一组固定输入，就容易遗漏婴儿本身的作用。孩子的活动、敏感性和当下状态会影响成人接下来做什么。成人并非只根据养育理念行动，也根据他们实际遇到的反馈进行调整。于是，孩子参与了自身后续环境的形成。

设想甲对某种游戏持续发起动作，乙则更快转向别的对象。父母可能为甲保留更多这类游戏，为乙寻找其他活动。后来，两人的经验组织进一步不同。这个场景不能证明最初差异全部来自先天，也不能证明父母随后安排是唯一原因；它展示的是双向路径，而非一个方向的决定链。

研究需要区分引发、选择和改变。某种已有倾向可能引发成人不同回应；孩子也可能在可接近的活动中表现不同选择；反复参与又可能改变原有倾向。三者经常交织但不能在分析时随意互换。尤其不能用后来的结果倒推最初一定具有同样性质。

在 SDE 语言中，显露 S 不是全部原因的终点，它也会成为下一轮 D 与 E 重组的条件。这个循环应由时间明确的事件支持，而不是仅仅画成一个圆。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据此调整了什么、下一次活动怎样不同，是循环解释具有研究价值的最低要求。

四、双胞胎彼此也是环境

双胞胎研究容易把两名孩子分别放在同一个家庭背景前，却忽视他们也可能参与彼此的发生。一个人的声音、动作、注意方向和所获得的成人回应，都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活动条件。家庭不是父母分别向两个独立容器提供输入的装置。

在作者构造的例子中，甲正在使用一个物体，乙因此接近；成人为了组织安全的共同活动改变材料位置。随后，两个孩子各自参与的关系同时改变。即使他们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理解，彼此的存在也已经可能影响空间、时间和成人分配注意的方式。

这意味着，以一名双胞胎作为另一名的“对照”时，需要谨慎考虑相互影响。对甲提供某种支持，可能通过父母安排或共享活动改变乙的条件。若把两人当作完全互不干扰的单位，分析就可能低估这种溢出。共同生活本身是研究设计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忽略的背景。

它也带来积极启示：照护不必在完全相同与完全分开之间二选一。可以保留共同活动，也提供各自可参与的空间；可以共享材料，又允许不同支持。具体安排应根据安全和实际需要调整。公平不是把每一秒切成一样，而是让两个独特生命都得到适合其参与的条件。

五、一名孩子有功能限制时，比较应怎样改变

假设一对双胞胎中，一名需要额外的运动支持。若研究只问谁更快触到玩具，便会把任务要求与身体差异混在一个结果里。这个结果可能有临床或功能意义，却不足以描述双方的全部探索，更不能成为人格价值的排序。

一种更完整的比较，应同时记录任务所需动作、孩子现有可行动条件、提供的支持、是否能够发起与改变活动，以及支持之后出现的关系。必要辅助不是污染“纯粹能力”的东西，它可能正是现实参与的组成部分。我们仍可以研究不同支持的效果，但不能先撤去必要支持，再把困难归为孩子自身全部能力。

另一方面，尊重独特性也不能把实际功能限制写成无关紧要。某些困难需要专业评估与持续支持。符号发生学的积极意义，是把“目前受限在哪里”与“整个人只有

这些限制”分开。支持应当针对真实需要，并观察新的参与路径如何形成，而不是用哲学赞美代替服务。[G08]

在家庭中，还要防止另一名孩子被默认永远不需要关注。不同支持强度并不意味着不同价值，但这种区别需要成人共同承担和解释。两个孩子都应作为独特生命被看见，而不是一个被缩成诊断，另一个被缩成参照标准。

六、遗传率不能直接解释一个孩子

群体研究中的方差分解，与解释某一个体的具体历史，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即使某项指标在某个群体中显示较高遗传相关贡献，也不能据此把某个孩子的表现拆成固定比例的先天与后天，更不能推出环境支持没有作用。这是统计层级与个体机制必须分开的基本逻辑。

同样，观察到家庭内差异，也不等于已经识别了导致差异的具体环境因素。未测量条件、测量误差、身体变化和相互影响，都可能进入结果。SDE 不能利用一个尚未解释的差额，直接宣布那就是“独特纠缠”。理论需要提出比未解释部分更具体的内容。

一个合格的个体发生分析，应说明研究者实际知道什么：某次支持变化是否在时间上先于活动改变，是否存在同样能够解释变化的条件，结果能否在适当的重复观察中继续出现。没有这些材料，“基因决定”与“互动决定”都可能只是不同风格的过度概括。

本书因此采用层级互补而非层级吞并。遗传、临床、发展与日常关系研究各有问题和尺度；高阶符号框架尝试组织它们的接口，但不能替代其具体证据。它的价值最终应体现在能否帮助研究者提出更清楚的比较，并帮助照护者找到可改变而又重要的条件。

七、相同结果可以来自不同路径

两名婴儿在某项任务中都完成抓握，结果相同，却可能依靠不同的支撑、动作次序和成人提示。若只记录成功与否，我们看不见这些路径。反过来，表面结果不同，也可能是任务对两人的可及性不同，而不是整体发展能力存在简单高低。

路径分析应关注至少三个问题：活动怎样开始，在哪些条件下保持，遇到变化时怎样调整。一个孩子可能需要熟悉声音进入活动，另一个依靠物体运动；一名孩子在新材料中仍能组织动作，另一名需要不同支持。这些差异不自动构成优劣，却决定后续支持怎样更有针对性。

“同结果、异路径”还提醒我们慎用平均方案。某项安排对一名孩子有效，不能仅因两人是双胞胎就照搬；对一人无效，也不代表该安排对另一人没有价值。应当共享观察方法，而不是复制结论。个体化并非放弃规律，而是明确规律在什么条件下适用。

对于 SDE 研究，真正有分量的问题是：记录关系路径以后，是否比只记录任务结果更能预测下一次活动中的需要与变化？这是可检验的增量命题。若路径记录没有提供额外信息，研究者应当考虑指标是否冗余、观察是否可靠，或理论预期是否过强。

八、家庭中的比较语言也是发生条件

“哥哥胆大，弟弟胆小”可能只是成人方便叙述的方式，但反复使用后，也可能改变活动安排与各自期待。双胞胎尤其容易被放进成对的对照语言：一个安静，一个活泼；一个会带头，一个总跟随。这样的互补故事有时会遮蔽同一个孩子在不同情境中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比较改成情境化描述，而不是否认差异。例如：“今天在这个活动中，甲先接近，乙在观察后加入。”这种表达既保留不同，也没有把它升级为永久身份。以后角色变化时，记录仍能容纳新事实，而不需要把孩子解释为突然违背自己的本性。

成人也需要允许两名孩子拥有不成对的经验。某些兴趣可以共同发展，某些活动则只对其中一人重要。独特性不要求每件事都不同，更不要求刻意制造差异；它要求不把相似或不同本身变成家庭必须完成的目标。孩子不是为了证明“双胞胎多么神奇”而存在。

九、一个谨慎的纵向研究方案

本书提出的方案以共同生活中的自然差异为材料，不人为制造照护剥夺。先为每名孩子建立独立记录，再记录共同事件和相互影响。固定若干日常活动窗口，描述身

体支持、参与者、材料、发起、回应、修正与结束方式，同时保留家庭认为重要而研究表未预设的信息。

分析时，既比较同一孩子跨时间的变化，也比较两名孩子在相近条件下的不同；同时把家庭作为更高层级，而不是把大量短视频当成大量独立婴儿。训练与验证资料应按家庭或个体合理分开，防止模型只是识别同一家庭的外观和习惯。

所有推断都需要回到可改变的关系。如果某个指标只是很好地区分两名孩子，却无法帮助理解参与、迁移或支持，它可能只是统计指纹，而非有用的发生解释。研究目标不是制作越来越精细的差异标签，而是理解差异怎样进入未来，并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被积极承接。

十、两个“我”不需要彼此证明

双胞胎使我们看见，相似条件并不取消独特历史；独特历史也不意味着每一项可测特征都必须不同。两个孩子可以非常相像，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差异明显，二者都不改变他们各自不可替代的存在。

因此，婴儿符号发生学不是从双胞胎身上寻找一个反基因或反环境的胜利案例。它研究的是，身体条件、活动、照护与共同生活怎样不断相互规定，使每个“我”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发生。所谓积极意义，正是让支持依据实际关系，而不是依据“他们本应一样”或“他们必须不同”的预设。

下一章将把这个问题集中到一个更具体的场景：同一个物体，为什么会对不同婴儿呈现不同的行动可能；怎样改变关系，才能让原先被挡在活动之外的孩子获得真实的参与位置。

32

第 32 章

同一个物体，不同的行动可能

返回目录

一、同一件玩具为什么不是同一个活动

两名婴儿面对同一件悬挂的玩具。一名能够改变姿势，伸手碰触；另一名需要适当支持，才能在合宜位置参与。成人可以说他们拥有相同材料，却不能据此断言他们处于相同的学习条件。身体、支撑、注意、材料位置与互动历史，已经使活动的可进入性不同。

这个作者构造的场景不用于诊断任何孩子，也不提供具体康复操作。它提出一个存在论问题：物体的名称相同，为何不能保证意义相同？如果意义只是物体内部已有属性的清单，两个孩子似乎只是在接收同一份内容；若意义在 SIO 复合体中发生，就需要研究各自形成的实际关系。

尤其不能把第二名婴儿写成第一名婴儿的“不完整版本”。他可能以观看、声音、触摸或求助形成不同参与。具体能力仍需评估，但评价应当知道自己测量的是哪一种活动，不能用一种动作的缺席推导全部意义世界的贫乏。

本章的研究对象，就是物体、身体与支持怎样共同规定行动可能，以及这种可能如何在活动中变为实际发生。它为双胞胎差异提供进一步解释，也为后面的感觉通道与长期照护讨论建立基础。

二、可供性不是物体标签的另一种说法

吉布森以可供性讨论环境对行动者提供的可能，强调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N05]这提醒我们，一张平面是否能够支撑某种动作，一件物体是否适合抓握，不能脱离具体身体条件来判断。SDE 不能把这一关系视角宣布为自己的独有发现。

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一种可能怎样进入这个婴儿的实际历史？材料在几何上可接近，不等于孩子当下能够使用；成人提供支持，不等于支持时机适宜；一次碰触成功，也不等于形成稳定的行动组织。可能、实现与可再次调用，是不同层次。

因此，可供性分析和符号发生分析可以相互衔接。前者提醒我们不要把用法封闭在物体一方，后者要求追踪关系怎样形成可辨认的整体、如何稳定，以及如何摆脱某个偶然条件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是否产生不同预测，需要在具体研究中比较。

这也避免另一种误解：不是婴儿想怎样，物体就能怎样。重量、形状、摩擦、距离与身体状态会实际限制活动。发生不是取消条件，而是研究条件怎样进入关系，以及哪些条件可以被改变。

三、把一次伸手拆成能够重新连接的问题

在一个安全活动中，伸手看似一个动作，却可以包含目光定向、姿势支撑、身体调整、手臂移动、接触反馈与成人回应。分开描述这些方面，是为了寻找关键关系，而不是宣布婴儿由几个互不相干的零件组成。

例如，手没有到达材料，可能与目标距离有关，也可能与姿势不便、疲劳、兴趣变化或其他需要评估的条件有关。仅凭终点失败，无法判断是哪一环造成。若成人立即把物体放进手里，当前结果可能完成，原来的困难却未被理解。

SIO 分析要求把成人的行动也纳入。成人移动材料、扶稳支撑、不断发出提示或提前代替，都可能改变接下来发生什么。观察不能只盯住孩子，把成人当作透明背景。恰恰是这些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帮助，可能构成活动的重要条件。

随后需要重新连接：哪些条件共同成立时，孩子可以参与？哪些变化只影响完成速度，哪些改变参与方式？哪些支持不可缺少，哪些提示只是最初一次的偶然安排？这些问题比简单列出“运动、认知、情感”更接近具体符号的形成。

四、帮助可以打开行动，也可以替代行动

帮助不是一个只有多少的问题。相同时间的协助，可能承担不同功能。有的使材料可及，有的减少不必要负担，有的提供信息，有的则直接完成本应观察的动作。讨论支持，首先要说明它帮助的是哪一部分。

对于需要长期身体支持的婴儿，支持可以成为主动参与的持续条件。不能因为工具或他人仍在场，就宣布没有独立性。这里需要区分对必要基础的依赖与对某个偶然提示的绑缚。所有人都在条件中行动，个体差异只使这些条件更容易被看见。

但也不能把任何辅助都解释为有益。若成人的操作使孩子无法选择方向、无法改变节奏，或者掩盖了不适，就需要重新检查。评价不应只看动作是否完成，还要看孩子实际参与了什么，以及这种参与是否值得继续。

本书将支持的目标表达为“使关系可进入，而非替对方穷尽关系”。这是一项需要在具体活动中解释的原则，不是撤除帮助的口令。必要支持应由合适的专业判断保障，研究只在安全边界内考察其他可调整因素。

五、相同表现可以隐藏不同的发生

设想两次活动最后都得到“拿到玩具”的记录。第一次，成人把物体放入掌心；第二次，孩子借助适宜支撑改变方向并接触物体。结果名称相同，但不能据此认为同一种行动组织已经成立。

反过来，两次外观不同的活动也可能实现相近功能。一名孩子用伸手邀请成人，一名孩子用目光与声音参与同样的共同活动。是否构成功能等价，需要看其使用历史与后续作用，而不是只凭成人觉得“差不多”。

这种双向区分非常重要。若只看外观，可能漏掉不同路径上的参与；若只讲功能，又可能把具体身体困难抹平。研究需要保留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同功能未必同体验，同动作未必同意义，具体差异仍值得观察。

高阶符号也不由某一个漂亮终点决定。局部成功怎样进入后续活动，孩子是否更能够表达、调整和选择，成人是否因此改变支持安排，才使我们逐渐看到局部关系与整体发生之间的连接。

六、从一个新的入口进入三界

当材料位置与支持方式改变，现实侧的可行动关系首先得到重新组织。孩子能够接触到此前难以接触的东西，这是一个具体差异。接下来是否形成新的预期、熟悉或自身活动体验，需要通过谨慎观察提出层级不同的判断。

不能因为一次动作改善，就声称孩子已经建立了成熟自信；也不能因为他尚未说明体验，就把自我相关问题全部排除。三界框架在这里要求我们同时关注身体活动、意义组织与个体感受的可能变化，并承认各自证据的不同。

在 SDE 的分析路径中，可以从 E 进入：调整已经明确的关系条件，观察 D 中的过程变化，再记录 S。也可以从 S 进入：发现同一材料在两种情境中表现不同，回到 E 寻找重要差异，再提出新的 D 安排。这些是工作的入口，不是保证成功的配方。

若新的支持让孩子能够影响成人的行动，意义变化还会跨入共同体。成人发现原先被理解为“不能”的活动，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进行，于是修订判断和安排。婴儿符号与成人表征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作用，但不应被合并为同一件事。

七、材料替换怎样检验而不制造危险

本书提出一个研究设计方向：保持必要支持，在低风险范围内比较功能相近、表面略有不同的材料，观察行动组织是否能够继续。目的不是证明孩子不需要任何条件而是辨别组织是否被某个偶然特征完全绑住。

研究应预先明确材料安全、身体适宜、参与时长与停止规则。具体操作需要伦理和专业审查，不能把书中概念直接当作家庭试验指令。儿童不愿继续或出现不适时，数据完整性不能优先于照护。

如果只在原玩具上成功，可能提示关系尚较情境化，也可能说明新材料增加了未控制的难度。若不同玩具都能使用，则支持某种迁移，但仍需区分熟悉性、练习量与成人提示。不能把单次变化直接写成三项符号条件全部成立。

一个值得比较的指标，是孩子在新情境中是否能够使用不同但有效的参与方式。它可能比动作复制更接近本书所说的相对独立性。然而，这个指标的可靠性与价值仍需研究，不能因为符合理论就提前定为标准。

八、把评估结果重新送回实际生活

某项评估若显示孩子在特定支持下能够参与，其价值不应停留在报告里。需要讨论家庭、托育或其他日常场所是否能够提供相应条件，谁来帮助，怎样交接，以及这些安排是否给孩子或照护者带来额外负担。

这一步常常决定理论是否真正有用。一个精致的实验任务可以揭示能力，却未必自动变成生活支持。材料成本、空间、语言与照护时间都可能影响落实。发生学不能只赞美“潜能被发现”，还要追踪潜能怎样获得持续实现的条件。

同时，应保存孩子改变兴趣和方式的自由。曾经有效的材料不必每天强制重复，曾经有用的支持也需要复核。稳定是能够持续承接，而不是永远保持最初方案。一个新的“我”会提出新的活动要求。

实践记录因而最好同时写明已知有效条件与尚未确定部分。它帮助后来的人继续观察，而不是用一次测验锁定未来。评估应成为重新进入生活的桥梁，不是给孩子划定永久边界的终点。

九、机会、实现与保留下来的组织

同一物体的行动可能，可以分成三个需要连接的判断。第一，活动在当前条件下是否可进入；第二，孩子是否实际参与并形成某种结果；第三，这次参与是否留下能够影响后续活动的组织。把三者分开，可以避免从“给过机会”直接推断“已经学会”。

设想成人把安全材料放在可接近位置，但孩子当时更关注另一件事。机会存在，却没有发生预定活动。这不是失败儿童的证据，也不必把材料不断推近。相反，如果孩子参与了却只在成人连续指令下完成，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哪些关系由孩子实际使用哪些只是外部程序的结果。

第三层尤其需要时间。一次成功可能来自偶然条件，也可能成为后续组织的起点。换到适宜的新材料后，孩子是否能够调整形式；面对小变化，是否出现新的求助或尝试；成人是否因观察到这些变化而重新安排活动，都能帮助说明一次事件怎样进入更长历史。

这个分析不会把三层强行排成所有活动必经的课程。现实可能反复往返：已有组织在某种条件下暂时不能实现，新的机会使它再次显露；一次未完成的尝试也可能改变后来如何进入活动。我们所划分的是问题层次，而不是人为规定的成长阶段。

还可以研究同一材料的不同组织。一个安全容器可以进入拿起、转向、共同观看或其他适宜活动，具体方式由年龄、身体条件和安全要求限制。成人若只承认其中一

种“正确用法”，就可能漏掉孩子正在形成的关系；若毫无边界，又可能忽略危险与负担。开放必须有条件。

材料更新也可以由孩子反馈推动。原先很有吸引力的物体不再被关注，不必立即解释为注意力有问题；也许活动已经变化，需要另一种合宜入口。反过来，反复选择同一材料，也不必立刻被解释为缺乏创造。需要观察重复中是否存在新的差异与组织。

这就形成一种双向材料设计：成人依据知识提供安全条件，孩子的实际参与又改变材料的组织方式。设计不是先完成一个完美环境，再把婴儿放进去；环境中的相关 SIO 会随着活动继续重构。设计的好坏，要在真实使用而非成人设想中接受检验。

研究者还应保留资源维度。一种需要昂贵设备、复杂场地和密集人员的方案，即使在特定任务中有效，也未必适合所有家庭。可以比较功能相近而负担不同的支持方式，但不能在没有证据时承诺低成本替代完全等效。可行性与效果同样需要具体研究。

最后，行动可能不是一份终身额度。身体与关系变化，会使某些路径打开、另一些路径暂时受限。发生学要求既不把当前限制写成全部未来，也不把暂时机会夸大为无限潜能。它让我们更准确地知道，哪一种条件值得现在改变，哪一种结果需要继续观察。

十、同一个世界，不同而真实的进入方式

日常语言中的“同一个物体”，不能替代各自实际发生的 SIO。身体不同、历史不同、支持不同，使可行动关系具有差异。认识这些差异，并不是把人隔在互不相通的世界，而是寻找能够使共同活动成立的具体连接。

共享世界的形成，往往需要改变我们怎样提供材料、怎样理解表达、怎样组织帮助。平等不总是每个人获得完全一样的安排，也可以是每个人获得与其需要相应的参与条件。这是本书提出的规范方向，而非对任何具体方案有效性的预先保证。

婴儿的独特性因此不是标准路线旁边的例外。它就是符号发生的具体方式。研究一个孩子怎样伸手，最终不是为了把所有手变成同一条轨迹，而是为了理解：这个生命通过什么关系，能够把一次可能变成属于自己的活动。

33

第 33 章

听觉与视觉障碍：多模态路径的改变

返回目录

一、先问能否进入，而不是先问缺少什么

成人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感官方式与婴儿互动：呼唤名字、展示表情、把物体放在视线里。若孩子没有按预期回应，问题不一定只是意愿或理解，也可能是信息没有通过可及的通道进入活动。对感觉差异的研究，应从这种具体关系开始。

一个作者构造的场景是，成人在孩子身后反复说话，没有得到回应，便判断“他不关注我”。另一个场景是，成人不断用眼神引导一位有视觉障碍的孩子，又把没有跟随目光解释为缺少社会兴趣。两种判断都可能把通道问题误作关系问题，但具体原因仍需专业评估。

本章不将听觉或视觉差异统称为同一种情况。差异程度、起因、其他身体条件与可获得支持都可能不同，不能仅凭一个名称推断每个孩子怎样感受世界。我们所研究的是，具体条件怎样改变可以形成的互动，以及怎样提供合宜的语言和生活接入。

符号发生学的积极任务不是把困难改称优点，而是避免一种缺席吞掉全部存在。某条通道受限，不等于没有意义世界；承认意义仍可发生，也不等于可以推迟必要评估和支持。两项责任需要同时承担。

二、语言可及性不同于声音数量

听见更多声音，并不自动等于获得可以使用的语言。语言进入需要与孩子的实际感知、交流和支持条件相适合。成人投入很多，也可能仍需专业帮助来判断哪些信息真正可及。这个问题不能用“多说一点”包办。

联合婴儿听力委员会 2019 年立场声明把早期识别、诊断、适宜干预和家庭支持连接起来，强调口语、手语或两者的语言与沟通发展目标。[N26]这里援引的是该声明的

方向，不提供设备选择、治疗或个体预后建议；具体路径需要听力与相关专业人员共同评估。

手语也不应被缩成暂时替代口语的简单动作。美国国家耳聋及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明确说明，美国手语是一种完整的自然语言，而且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通用手语。[N27]因此，实际语言支持必须考虑家庭所在地、语言社群和可获得的合格资源。

从 SDE 角度，语言可及性改变的不是一个孤立输入端，而是孩子参与共同注意、日常交流、预期形成与后续表达的关系条件。它的价值不能仅用发声次数评价。我们需要关注孩子实际能否进入有意义、可持续的交流，并在活动中形成自己的使用方式。

三、辅助技术不是关系的替身

设备可能改善某些条件，但它不会自动完成所有共同活动。设备如何适配、是否按专业要求使用、家庭怎样理解信息、孩子怎样参与，都属于后续关系。不能把获得设备当作语言与社会支持已经完成，也不能把设备的不确定效果归责于家庭不够努力。

反过来，强调关系也不能成为拒绝有根据技术支持的理由。符号发生学不应站在技术与人际照护之间制造虚假二选一。恰当的问题是：技术改变了哪条通道，哪些关系还需要共同建立，怎样检验实际收益与负担。

一个构造案例可以说明区别。孩子在某种支持下更容易接收到信息，但成人仍只要求机械重复，不允许他主动改变话题；另一个场景中，成人根据孩子注意与行动组织沟通。即使技术条件相似，交流结构也可能不同。这个比较是研究提案，不是对设备效果的临床推断。

必要支持与相对独立性也必须分开。孩子依靠设备或其他辅助进入活动，不表示他的“我”更不独立。我们所研究的独立调用，是在适宜条件中能否不被某次偶然提示完全限制，而不是证明他可以脱离一切支持。

四、视觉差异使共同活动需要另一种组织

对于有视觉障碍的婴儿，物体展示、表情和目光指引的作用不能照搬。成人需要根据专业评估了解实际视觉功能及其他需要，并研究哪些声音、触觉、姿势与活动安排能够构成可及互动。世界卫生组织把眼病处理与视觉康复都纳入眼健康工作。[N29]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宣布“听觉会补偿视觉”，而是具体研究哪些关系确实形成。其他感官不会因为某条通道受限，就在所有任务中自动变得更强。使用何种通道需要看孩子的身体条件、经验与支持，不能把补偿写成无需建立的神奇能力。

在一个作者构造的活动中，成人先让孩子以适宜方式接触一件安全材料，再配合声音和共同操作。材料的意义不是先完整存在于视觉中，随后被翻译成触觉；它可以在这个孩子实际可进入的活动中形成自己的组织。这正体现符号首先作为存在方式的立场。

这样的组织与有视觉参与的活动可能共享部分功能，却不必拥有完全相同的体验结构。研究既可以寻找共同性，也应尊重不宜等同的差异。不同路径并不自动意味着低等路径，具体困难又不能因为这种价值平等而被忽略。

五、共同注意不能被一种表面动作垄断

若一个研究工具只把目光往返作为共同关注的唯一指标，就可能无法完整覆盖某些感觉条件下的活动。本书提出的操作化问题是：能否通过其他可观察的协调，判断两方正在围绕一个对象互相调整，而不是仅仅同时在场。

例如，成人与孩子在触摸某件物体时，孩子的停顿改变了成人动作，成人发出提示后孩子又改变接触方式。这个构造情境可能提示共同组织，但还不足以证明成熟共享意图。需要排除机械同步、单向引导和研究者的过度解释。

因此，指标应同时保留功能与证据要求。不能因为没有熟悉形式就否定关系，也不能因为希望看见关系就把任何动作都算进去。研究者应与相关专业人员、家庭和熟悉该沟通方式的人共同制定编码，检查其可靠性。

这对 SDE 是一次重要考验。三界与高阶符号若只在一种感官形式下才能被描述，就可能把某类身体经验误当成普遍模板。真正的多模态理论，应说明不同通道怎样组织相似或不同的功能，并清楚标明无法判断的部分。

六、多个通道相遇，不等于信息越多越好

多模态支持不是同时增加一切声音、触摸、光线和动作。不同信号可能互相帮助，也可能竞争或造成不适。具体安排需要根据孩子状态与专业建议判断，不能把丰富刺激当成无条件的善。

从 SDE 看，整体性关心的是各部分能否形成相互承接的关系，而不是通道数量。稳定性关心合宜条件下的可重复组织，而不是刺激不断持续。独立性关心后续使用的灵活性，而不是孩子能够忍受越来越强的输入。

一段共同活动也需要节奏。成人提供信息以后，孩子是否有时间作出变化；孩子转向或停止以后，成人是否能够调整；重复是否保留了变奏机会。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关系，而不需要先假设婴儿具有成熟的语言性理解。

如果一项支持使孩子更能参与，却又难以持续，方案仍需修订。一个家庭无法每天完成复杂流程，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孩子。有效支持应考虑实际生活条件，尽可能把合宜互动组织进日常，而不是让家庭永久围绕一套繁重任务运行。

七、家庭学习与儿童学习同时发生

当孩子需要不同语言或感觉支持，成人也可能需要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使用工具、理解专业信息与寻找社群资源。这不是家长已经完成教育、只剩孩子需要适应的单向过程。支持体系应当承认成人也有学习与休息的需要。

在本书的理论解释中，孩子的新反馈可以改变成人对交流的理解。原先只把回答声音当作沟通，后来开始注意其他有效表达；原先把辅助视为失败的标志，后来理解其作为参与条件的作用。这样的改变又会进入后续活动。

不过，不能把成人学习的全部责任交给孩子。儿童不应承担证明某种方法价值的任务，也不应为成人对新方式的不适承担道德压力。专业人员、家庭与社区资源需要共同支持这一过程。

文化与语言身份也值得尊重。家庭可能希望保留自己的语言，孩子可能在不同社群中获得不同交流资源。具体选择需要充分信息与专业支持，不能由一本哲学书替所有家庭规定唯一道路。核心是可及、及时、有质量且能够持续的语言与关系机会。

八、怎样记录改变，而不是只记录缺席

记录可以从孩子实际使用的通道开始：在什么条件下注意改变，以什么方式邀请或拒绝，成人怎样回应，活动是否因此继续或转换。这样得到的是一段参与历史，而不只是一张“没有看、没有听、没有说”的清单。

缺席信息仍可能具有专业意义，不能全部删除。关键在于与可观察能力、身体条件和支持安排并列，让评估知道自己比较的是什么。某个行为没有出现，可能提示需要进一步评估，也可能提示任务不可及，不能只保留一种解释。

跨情境观察尤其重要。同一种表达在家中得到理解，在服务机构未被识别，问题可能涉及沟通交接。研究可以追踪有效信息如何传递，哪些表征帮助他人准确回应，哪些标签反而遮蔽了孩子的实际方式。

对于发展变化，本书建议把新的活动入口、表达清晰度、关系连续性与必要支持分别记录。它们不必同时变化，也不能相互抵消。一个局部进步是真实的，但不能据此宣布全部困难已经解决；一项持续困难也不应抹去其他参与的意义。

九、一场不以单一感官为裁判的共同活动

可以构造一个小型观察场景：孩子与熟悉照护者围绕一件经过安全与适宜性判断的材料活动。研究者不先规定必须看向哪里或发出什么声音，而是记录双方怎样开始、继续、暂停和改变活动。通道的选择依据孩子实际条件，而不是为了让不同孩子在镜头里呈现相同动作。

若孩子通过触摸停顿使成人等待，成人的等待又让孩子继续探索，这可能是一条值得研究的协调。若成人只是按固定节奏动作，孩子虽在场却没有影响过程，就需要另作描述。使用不同感官并不自动证明共同性，功能上的判断仍需明确证据。

接下来可以关注形式变化中的连续性。同一关系是否只能由一个熟悉的人辨认，另一位具备相关沟通能力的照护者能否在适宜条件下理解？若不能，原因可能是共同经验不足，也可能是描述没有把重要线索传递出去。不能把沟通不成功全部归给孩子。

这里需要区别个体习惯与可共享语言。一家人可能熟悉孩子某种动作的用途，这种熟悉很有价值，却不必然等同于完整语言接入。对于语言支持的需要，仍应提供合适的专业与社群资源，而不能以“家里人都懂”取消更广泛交流的机会。

反过来，可共享的语言形式也需要进入具体生活。只在训练时重复某些表达，而日常需要仍无法被理解，不能被视为沟通支持已经完成。研究可以追踪孩子是否有机会在真实活动中发起、改变和结束交流，而不只统计模仿正确次数。

多模态路径的积极目标，因而不是把孩子训练成最容易被成人识别的信号源，而是建立可以扩大参与的关系。成人要学习新的辨认方式，环境要提供必要条件，孩子则在自己的活动中逐渐形成使用历史。三方共同改变，才有理由谈论关系的重组。

在记录中，还应标明观察者的能力边界。不会相关手语或缺乏特定感觉支持知识的人，不能仅凭影像判断交流没有意义。可以邀请具备相应知识的人员参与分析，并检查不同解释之间的依据。研究者本身也是知识发生的参与者，不是无条件透明的观察窗口。

这种方法有助于把平等与差异同时保留。平等要求儿童的参与被认真对待，差异要求观察工具随通道与活动调整。相同测量形式不总是公平，完全不同且无法比较的描述也不总是有用；需要寻找功能、证据与具体体验之间合宜的连接。

当一种新的通道让孩子能够影响更广的共同活动，我们可以具体说它打开了什么，而不必宣称它替代了所有受限功能。这样形成的希望更可靠：它来自可看见的参与改变，也为尚未解决的困难保留真实位置。

十、不同通道中的同一个独特生命

听觉与视觉差异迫使我们重新理解“认识世界”这句话。婴儿不是用同一种标准设备读取同一个已经完成的意义清单，而是在实际可进入的身体与关系中形成世界。其三界发生具有差异，仍然可以与他人建立丰富而真实的共同活动。

这种理解不否认医学事实，也不代替专业支持。它改变的是我们如何把事实放进一个人的完整生活：功能描述是重要信息，但不是人格价值；辅助是参与条件，而非主体性失败；不同表达需要理解，而非被迫模仿唯一形式。

符号发生学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把问题从“少了哪项标准表现”推进到“这个孩子怎样实际发生，以及还能够打开哪些合宜路径”。每一条路径都需要具体建立，不能靠口号自动出现。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准确回应、每一项可及支持，都可能成为那个独特“我”新的生命条件。

34

第 34 章

先天疾病和长期照护中的生命符号

返回目录

一、病历不是这个孩子的全部

一份病历需要准确记录问题、处理和风险。这种准确非常重要，却不应使一个孩子在生活中只剩诊断名称。婴儿还在以自己的身体和活动参与关系，可能对声音作出变化，可能在某种合宜安排中更舒适，也可能不断提出成人尚未理解的反馈。

本章讨论先天疾病与长期照护，不提供疾病诊断、治疗或预后指导。不同疾病、病程和身体状态差异很大，不能凭一个总体发生学框架代替专业判断。我们要研究的是：在必要医疗照护之中，怎样仍然看见一个独特生命的参与，以及照护组织如何进入其后续历史。

一个作者构造的场景可以作为起点。医护人员关注监测与治疗，家人关注孩子熟悉的回应，照护交接关注下一项安排。三方看到的并非必然冲突，却也不自动构成完整整体。信息怎样连接，谁注意到新的不适，谁解释并调整，是实际发生的问题。

如果只说“先治病，其他以后再说”，可能把生活意义无限推迟；如果只说“关系能够疗愈”，又可能忽略必须处理的身体事实。SDE 应帮助连接这两类责任，而不是在医学与人文之间制造选择。

二、身体条件真实地规定可进行的互动

疾病和治疗可以使某些活动受到限制，能够承受的时长、姿势、接触方式和休息安排都可能需要专业判断。尊重婴儿的活动，不意味着让他承担超过当前条件的任务保护并不是自由的敌人，它往往是自由得以存在的前提。

另一方面，某项限制不能自动扩展为一切活动都不可能。需要分别讨论哪些是当前不可改变的条件，哪些可以在专业建议下调整，哪些只是照护习惯或机构安排造成的额外障碍。这个区分应依据实际证据，不由理论预先决定。

本书将此称为条件分层：身体的限制、治疗的要求、环境的安排和成人的解释，需要分辨。它们相互影响，却未必具有相同的可改变性。将全部困难都写成疾病后果可能遗漏改进机会；将全部困难都写成环境问题，又可能低估身体负担。

这种分层也帮助家庭提出更清楚的问题：哪些活动可以安全继续，哪些需要暂停，何种反馈值得报告，哪些支持应由专业人员提供。发生学的作用是组织问题，而不是以宏观语言越过临床边界。

三、治疗过程本身也是婴儿生活的一部分

从婴儿的实际经历看，治疗与生活并不是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必要操作、接触、声音、等待和人员变化，都可能成为他正在参与的事件。研究其体验与关系，不是否认治疗必要性，而是追问治疗如何在尽可能合宜的条件下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 2020 年小体重及患病新生儿照护质量标准，将尊严、有效沟通、家庭参与、发展性支持、疼痛与不适的适当管理以及后续照护纳入质量要求。[N30]这些要求为医学与关系照护的连接提供了正式参照，但不能被解释为某种 SDE 方案已得到临床验证。

本书由此提出自己的分析：技术操作的完成与婴儿获得的照护体验，应当同时被看见。两者可能互相支持，也可能在具体安排中出现张力。若只记录操作结果，不记录不适、沟通和支持条件，我们便难以说明完整的照护过程。

对于家人，参与并不意味着承担未经训练的医疗任务；对于医护人员，重视家庭知识也不意味着放弃专业责任。合宜合作需要明确各自角色、信息范围与安全边界。共同发生不能被误读为专业分工失效。

四、照护连续性不是每次动作完全相同

长期照护中，人员、场所和安排可能发生变化。连续性并不要求每位成人声音相同、动作相同，而要求必要信息与支持能够衔接。什么让孩子不适，哪些条件有助于活动，哪些变化需要报告，应当在合理权限内传递。

一个构造案例是，家人注意到某类活动后孩子更容易疲劳，专业人员据此进一步评估并调整安排。若信息没有进入交接，后一位照护者可能重复原来的过程。这里的困难不仅是个人敏感性，也涉及记录和协作结构。

家庭的经验值得重视，但也可能需要检验。时间上的相邻不一定表示因果，某个变化可能与其他条件有关。有效协作不是一方永远正确，而是让不同观察能够在适当程序中相互校正，并形成可执行的决定。

在 SDE 分析中，稳定表现为关键关系可以跨人员和事件持续，而非形式冻结。独立性在此不意味着孩子不再需要支持，而是某些有效关系不被一位个人或一个偶然提示完全绑住。保持具体关系与建立可接续组织，需要同时考虑。

五、微小变化怎样获得适当的意义

在复杂照护中，一次更清楚的回应、一个较舒适的活动时段或一种更有效的信息交接，可能具有实际价值。但研究者应避免把每一次微笑都写成重大康复，把任何波动都解释为理论奏效。意义可以真实而有限。

可以把变化分为三个层次。即时变化说明此刻发生了什么；在适宜条件下重复出现，才逐渐支持某种稳定；进入其他活动并改变后续组织，则涉及更广的发生。不同层次需要不同证据，不能因为希望看见进步便跳过中间过程。

也要允许没有改善的记录存在。它可以帮助停止无效尝试，重新检查目标，或者把精力转向更合适的支持。一个方法没有达到预期，不表示家庭没有尽力，更不表示孩子拒绝成长。失败首先需要回到方法与条件中理解。

高阶符号的独特性因此不是只由成功经历组成。困难、暂停、恢复与新的尝试，同样属于生命史。我们可以研究这些经历怎样作用于后续生活，却不必把每种痛苦都解释成有益磨炼。能够发生不等于应当承受。

六、舒适与生活质量不是能力竞赛之外的次要事项

当照护围绕某项功能目标组织时，容易把所有价值压在可量化进步上。对长期需要支持的婴儿，舒适、适宜休息、关系接近与可理解的活动，同样应得到认真对待。具体照护目标需要由家庭与专业团队结合情况确定。

这不是降低期待，而是避免单一期待遮蔽其他真实需要。一个方案可能改善某项表现，却带来过大负担；另一个方案未改变某个分数，却使生活更可持续。评价应说明收益与代价，不能只选择最便于展示的指标。

尤其不能把痛苦作为证明坚持的必要过程。疼痛和持续不适需要适当评估与管理，而非被哲学化为张力越大成长越大。SDE 三原理中的张力是结构分析概念，不能直接转换成增加身体或心理负担的处方。

对于严重疾病，照护还可能涉及不同阶段目标的讨论。这些判断应由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团队与家庭共同进行，本书不提供个体决策。发生学能贡献的，是始终把那个具体生命的体验与尊严保留在讨论里，而不是让技术目标替代全部价值。

七、照护者也在长期关系中发生

持续照护可能改变家庭时间、工作与合作。这里不宜把一个理想化的家长形象当作默认条件，仿佛只要爱就能够无限承担。支持体系需要认真面对休息、信息、心理与实际资源问题，而不是在家长疲惫时追加道德要求。

一个发生学分析可以追踪：孩子的需要怎样改变成人安排，成人获得或缺少支持又怎样改变照护条件。这是双向过程，却不意味着孩子应为成人困难负责。责任应依据能力与权力分配，不能依据谁产生了影响就由谁承担。

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允许不同感受。有人倾向主动寻找资料，有人需要时间理解，有人承担大量日常劳动。差异不必立即被评价为更爱或少爱，而应转化为可以协商的任务与支持。共同体的整体性来自协作，不来自感受完全相同。

研究者与服务人员在这里同样参与 SIO。解释方式、信息量和沟通节奏，会改变家庭接下来的行动。提供知识不仅要正确，还要能被使用；提供希望也要与证据相称。把理论说得很完整，却让家庭无从行动，仍是需要修订的传播。

八、从机构到家庭，关系怎样继续

离开一个照护场所，不表示之前的知识会自动进入下一个场所。必要设备、后续评估、日常安排与风险信息，需要合适的交接。家庭可以理解什么、能够承担什么、遇到困难联系谁，都应在实际服务中得到澄清。

本书提出一个研究方向：把交接看作符号再发生，而不是资料简单搬运。同一专业说明进入家庭，需要转换为可理解、可执行又不失真的活动知识；家庭反馈返回专业系统，也需要被认真辨认，而不是视为无关主观感受。

可以观察某项支持在不同场所是否保持功能，哪些信息在传递中丢失，哪些安排需要改写。这样的研究不必向孩子增加额外负担，却可能发现影响生活的重要环节。它把高阶组织的作用落实到具体路径，而不是停留在“系统要合作”的口号。

当然，交接质量不是全部结果的解释。疾病变化、资源与其他条件仍然重要。研究应保留这些边界，避免把一次不良结果全部归咎于某个人没有沟通好。结构性分析的目的，是发现改进位置，而不是寻找最容易承担责任的人。

九、疾病的时间与生活的时间

长期照护容易形成两套并行的时间。一套围绕检查、治疗、复核和风险安排，另一套围绕休息、熟悉、共同活动与家庭生活展开。二者都是真实需要，不能简单让一套吞掉另一套。如何衔接，应在专业要求与家庭条件中具体讨论。

一个构造例子是，某项必要服务的时段与孩子的日常状态发生冲突。家庭可以向专业团队提供观察，共同判断是否存在合宜调整；若因安全原因不能改变，就需要说明理由并考虑其他支持。这里不是要求医疗顺从所有日常习惯，而是避免把日常体验视为完全无关的信息。

这种时间分析也改变了对发展速度的理解。治疗阶段可能需要暂停某些活动，恢复以后又重新进入；某项功能表现可能波动，而生活参与以不同方式持续。不能把所有变化画成一条永远向上的线，也不能把暂停解释为整个生命停止发生。

对婴儿而言，一段需要等待的时期仍有关系生活。适宜的熟悉接触、可理解的活动与照护连续性，可以成为值得专业团队和家庭共同关注的方面。具体允许什么必须根据病情判断，本书不规定操作，但坚持这些问题不应被无条件推迟到完全康复之后。

可以把长期照护画成一张可修订的关系图：当前需要哪些专业支持，哪些信息由家庭最容易观察，哪些日常安排需要协商，哪些人能够在照护者疲惫时提供帮助。图的作用不是增加文书，而是使无人承担或重复冲突的环节更容易被看见。

关系图还应明确无法由家庭独自解决的条件。例如服务间信息不通、必要资源难以获得或交通安排冲突，需要在相应层级寻求改善，而不是要求某个成人通过更强的

意志解决。发生学所说的共同体，不应只是把责任交给家人，也应检查支持系统如何参与。

与此同时，家庭并不是只负责执行。家人可以提出新的观察、表达实际负担、参与目标讨论。专业人员也有责任解释不确定性和判断依据。双方不是相互替代，而是把不同知识放在同一个孩子的具体生活中协作。

研究可以从这张图中提出有限问题：一次信息交接改善是否减少了重复误解，一项轮替支持是否使日常照护更可持续，某种活动安排是否在专业安全范围内更合宜。每个问题都有具体路径，比笼统宣称“整体护理有效”更容易检验与改进。

这样的组织让长期支持不只是无尽坚持，也能够形成可学习的历史。有效方法被保存，无效安排被修订，新需要有入口，家庭不必每次从零说明。婴儿的高阶符号就在这些不断变化的真实关系中继续存在，而不是在某个理想健康状态到来以后才开始拥有自己的世界。

十、一个需要长期支持的“我”，仍然完整地值得尊重

本章所说的完整，不是功能没有限制，而是人格价值不因限制而折损。一个婴儿可以依赖复杂照护，仍然是独特的高阶符号；可以无法完成某项活动，仍然有需要被理解的实际经历；可以面对不确定未来，仍然值得当下的适宜支持。

符号发生学不承诺所有身体问题都能通过关系解决。它要求的是，不把身体问题与关系生活割裂，不把治疗记录等同于生命，不把成人的解释置于孩子的反馈之上。医学知识、家庭经验与发生分析应当合作，而不是互相取代。

当我们能够同时认真对待疾病与这个孩子，照护才不只是处理一个问题，也是在承接一个人。每一项准确的专业行动、每一次恰当的信息传递、每一种可持续的关系支持，都可能成为他继续发生的条件。那个“我”并不在疾病之外等候被发现，他就在这段真实生活之中。

35

第 35 章

个体独特性：不是标准差的装饰

返回目录

一、平均婴儿从来不是眼前这个婴儿

群体研究需要汇总，临床与教育也需要发展参照。没有这些工具，我们难以发现普遍风险、比较支持效果或识别需要进一步评估的情况。但平均值是一种关于样本的统计表达，不是一个真实生活着、会哭会笑的孩子。它能够帮助认识个体，却不能替代个体。

眼前的婴儿拥有具体身体、关系与历史。他在某项指标上接近平均，不意味着发生方式也接近某种平均模式；偏离平均，也不意味着其全部生活只能被写成不足或超常。独特性不是在标准图表旁加一句“每个孩子都不同”，而是让研究真的能够记录不同如何发生。

本章试图建立群体规律与个体历史之间的接口。我们既不废除发展筛查，也不把个体差异神秘化为无法研究。需要的是一套能同时回答“是否需要支持”与“这个孩子怎样参与”的方法，使规范用于守护生命，而不是让生命成为规范的注脚。[G03]

二、相同均值可能隐藏不同组织

考虑一个完全假设的例子。两名孩子在若干相同类型的安全活动中，成功完成某项动作的比例相同。甲的成功主要出现在一种熟悉支撑条件下，乙则在不同条件中都偶有成功。单一平均比例无法区分这种组织差异，而下一次支持安排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信息。

再设想同一孩子在四次观察中的结果为成功、失败、成功、失败。这个序列可以来自疲倦与恢复，也可以来自材料交替、成人提示变化或随机波动。仅凭序列本身不能决定机制。历史数据只有与事件条件相连接，才能超出记录表面。

所以，SDE 所说不可重复历史，并不是要求把所有经历无限保存。它要求识别与当前问题有关的承重关系：哪些条件改变了可参与性，哪些反馈进入了下一次活动，哪些差异只有短暂影响。没有这个筛选，历史越长，研究未必越清楚。

相同均值而关系不同，是一个逻辑事实；具体关系是否具有预测价值，则是经验问题。本书不会把前者直接当作后者的证据。真正的检验应比较：加入关系历史之后对新情境的判断是否更准确、更可解释，或者对支持选择是否更有帮助。

三、差异应当在哪里被记录

传统的特质描述通常把某种倾向归于个体，如活动水平、情绪反应或适应方式。这样的概括具有用途，但需要与情境和发展时间连接。一个孩子在熟悉环境中主动，在陌生任务中谨慎，未必存在需要被消除的矛盾；差异可能正是其关系组织的一部分。

本书建议把记录分为身体条件、活动条件、关系过程与显露结果四个层次。身体条件不是完整诊断，只记录与活动相关且适当授权的信息；活动条件描述材料、空间和任务；关系过程记录发起、承接与修正；结果则说明发生了什么，以及观察仍不知道什么。

这样的记录并不否定个体倾向，而是给它增加证据约束。如果某种方式跨情境反复出现，可以讨论相对稳定性；若只在特定条件下出现，就应保留条件。特质不是禁止使用的词，而是需要解释其适用范围的概括。

对于照护者，记录不应成为沉重的日常作业。研究可以精细，家庭实践则可以选择少量真正影响安排的问题。理论的严密性不等于要求每位父母成为全天候观察员。能持续帮助判断的轻量记录，往往比无法坚持的完美档案更有价值。

四、一个人的变化，不能只用群体关系推断

在群体中，某个指标较高的儿童可能平均表现不同；这不意味着同一孩子在该指标增加时，就必定发生同样变化。个体之间的差异与个体内部的变化，是不同统计层次。把前者直接当作后者，会让干预推论超出证据。

例如，即使某类活动时间与某项能力在样本中相关，也不能直接推出给一个孩子增加同样时长便会改善能力。可能存在身体条件、家庭资源、已有兴趣或其他因素共同影响二者；也可能能力本身使孩子更容易进入活动。发生学强调双向关系，更应严守这一区分。

研究个体轨迹，可以观察同一孩子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的变化，并结合适当对照与设计。然而，时间追踪也不是自动因果证明。成熟、同时发生的其他支持以及测量熟悉性，都需要考虑。记录得久不等于已经控制了所有替代解释。

这使 SDE 的“历史性”必须与因果纪律相结合。历史提供关系的连续线索，设计与比较帮助识别哪些解释更有根据。若没有后者，历史叙述很容易变成结果已知后的故事，把所有细节都安排成通向当前状态的必然道路。

五、独特性不是拒绝比较

有人可能担心：既然每个孩子不可替代，是否就无法比较、无法建立一般知识？并非如此。不可替代的是完整生命与实际历史，而不是所有局部关系都毫无共同性。我们仍可比较某些明确条件下的活动、支持需求和变化方式。

关键是比较的范围。比较“在保持必要支持时，哪种呈现更容易让孩子参与”，不同于比较“谁是更好的孩子”。前者针对可改变的关系，后者把整体价值压进单一排序。研究应尽可能使用前一种比较，并明确其不能推出的结论。

跨个体比较也可以帮助发现规律：不同孩子是否在某类条件变化后出现相似组织，哪些孩子不符合这一模式，差异与什么有关。反例不应被简单清除，因为它们可能揭示规律的边界。个体化与一般化的关系，是不断修订的相互支持，而非彼此取消。

因此，本书主张“有边界的可比性”。先明确比较目标、活动功能和必要支持，再判断哪些指标可以共同使用。若任务对某些孩子不适配，就应报告限制或采用经过验证的替代方式，而不是为了统一表格牺牲解释有效性。

六、发展里程碑与发生轨迹各自回答什么

发展监测和筛查帮助识别值得进一步评估的情况。它们不等于最终诊断，也不能仅凭一次观察决定全部发展。[G03] 个体发生轨迹则更关注某种活动怎样在具体关系中形成、保持和改变。两者的问题不同，可以互相补充。

当一个孩子出现发展担忧时，发生学不应以“他有自己的节奏”阻止专业评估。尊重差异不能成为延误支持的理由。另一方面，完成筛查之后，也不应只剩一个分数家庭仍需要理解日常参与、适合的支持以及可以观察的变化。

可以把两类信息放在同一个协作过程中：专业评估说明需要关注的功能与风险，日常记录说明这些问题怎样进入生活；后续支持同时观察标准化指标与真实参与。这样既保留公共知识，也保留个体的具体性。

它还能够减少两种相反焦虑。一种是把每个偏离都当成失败，另一种是因害怕标签而拒绝任何评估。更稳妥的立场是：评估用于打开理解和支持，不用于给生命定价独特性用于细化支持，不用于否认真实困难。

七、气质描述如何保持开放

当成人发现孩子对声音、陌生活动或节奏变化表现出某种相对稳定倾向时，可以把它作为理解关系的线索。但倾向不是全部命运。它可能影响成人回应，又在后续活动中得到强化、修正或新的组织。研究应当追踪这类双向变化，而不是在第一次命名后停止。

一个积极的气质描述，应包含适配条件。例如，不只是“敏感”，还要说明哪些刺激或安排更容易引起变化，哪些支持有助于参与，哪些情况尚未观察。它把概括转化为行动问题，而不是把孩子变成固定类别的代表。

与此同时，家庭不能被要求消除孩子所有困难反应。适配不是让生活永远没有差异，也不是让成人完全围绕某种倾向安排一切。保护、稳定与自由仍需共同考虑。可以在安全范围内逐步探索新的关系，同时承认身体与当前能力的真实边界。

这里的目标不是制造一种“理想气质”，而是让孩子能够以实际条件更好地参与生活。安静与活跃、谨慎与接近，都不能脱离情境直接成为好坏等级。符号发生学的价值判断，应落在安全、尊严、可持续参与和继续发生的机会，而不是成人偏好的性格模板。

八、为一个孩子建立可修订的发生画像

“画像”一词容易让人想到永久档案，本书所说的画像却应当具有明确时间和修订机制。它不是给孩子贴一张最终标签，而是在某一阶段整理有助于支持的知识：哪些活动适合，哪些条件需要调整，哪些反馈能够被可靠识别，哪些问题仍未知。

一份可用画像可以围绕三个核心问题组织。第一，孩子目前能够怎样主动参与；第二，参与依赖哪些必要支持；第三，近期有哪些新关系正在形成或原有关系正在改变。每项内容都应连接实际观察，而不是只列形容词。

画像还应包含“不要据此推断”的边界。例如，一次在陌生场景中的退出不代表普遍社交困难；某种材料中的成功不代表所有物体任务均已掌握；当前需要支持不代表未来永远没有变化。把边界写进记录，是防止资料在传播中逐渐变成命运判断的重要办法。

当孩子进入新的照护环境时，这份画像可以作为沟通起点，但不能要求新参与者只验证旧结论。新的观察应当能够修改它。一个真正服务发生的档案，必须允许自己过时；否则它可能从帮助理解的工具，变成遮蔽新变化的屏障。

九、个体预测的伦理与技术限制

随着数据积累，人们可能希望预测孩子将来的能力、性格或风险。预测在某些专业场景中有价值，但必须区分概率判断与个人命运。模型在群体上的准确性，也不意味着对每个孩子都同样可靠，更不自动说明预测变量就是可干预原因。

婴儿符号发生研究尤其不应把独特历史变成过早筛选的工具。若一个模型主要用于减少对某些孩子的投入，便可能通过资源分配使预测更容易实现。研究者应当考察模型怎样进入制度，而不只关注统计指标。

更合适的应用方向，是帮助识别需要进一步理解与支持的关系，同时保留人的判断、申诉与修订空间。预测应说明适用样本、误差和限制，不应向家庭输出无法解释的“未来人格分数”。孩子持续发生的可能性，不能被早期资料提前封闭。

十、独特性成为方法，而不只是一句安慰

本章最终要把“每个孩子不同”从礼貌性的声明变成研究纪律：比较时保留条件，解释时区分层级，支持时观察真实参与，预测时承认误差，记录时允许更新。只有做到这些，独特性才真正改变方法。

婴儿高阶符号的独特，不在于必须拥有别人没有的某个特征，而在于特征之间怎样在这条生命历史中组织。群体规律能够照亮其中一部分，个体观察又能修订规律的适用边界。两者共同构成一种既有公共责任、又不抹平生命差异的知识实践。

下一编将把这一原则带入跨文化讨论。不同社会中的婴儿并不是民族性格的微型样本；他们生活在具体家庭、制度和活动之中。文化比较的任务，是理解这些关系怎样组织，而不是把国家或族群变成更大的性格标签。

第八编 / PART 08

不同文化中的婴儿符号

第 36—40 章

36 独立与依赖：美日亲子文化的局部差异

37 阿卡父亲与共同照护的生命世界

38 古西人的触觉敏感回应

39 Beng 婴儿的精神身份

40 中国坐月子与新加坡多元城市家庭

36

第 36 章

独立与依赖：美日亲子文化的局部差异

返回目录

一、把一个球递出去，可以发生什么

同一只软球放在两个家庭的地板上，照护者都与婴儿坐在旁边。在第一个场景中，成人指着球，缓慢地说出它的名字，等待孩子伸手，再为他的动作作出回应。在第二个场景中，成人把球递给孩子，伸出手等待孩子递回来，并把谢谢、轮流和微笑连在同一次活动里。这两个场景是作者构造的分析例，不分别代表美国和日本，更不能据此预测两个婴儿成年后的性格。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看清：物体相同，言语、动作和回应的组织可以不同；即使每个人都说是在陪孩子玩，实际形成的关系也未必相同。

第一个场景并非没有人际关系。命名需要成人与婴儿的共同关注，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回应。第二个场景也并非没有物体知识。递球必须辨认物体的位置、形状和可抓取性。所谓强调对象或强调关系，是某些活动组织的相对差别，不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心智。把前者说成只有独立，把后者说成只有依赖，会在解释开始之前就把真实生活切坏。

本章不试图替两个国家画出性格画像。我们只研究一个有限而重要的问题：当某些照护惯例反复选择不同的注意目标、行动顺序和回应方式时，它们怎样参与婴儿高阶符号的发生？从一个局部研究到这个问题，需要经过清楚的推理，而不能把文化名称当成因果机制。

二、回到一项具体研究，而不是文化传说

Fernald 与 Morikawa 于 1993 年发表的研究，比较了六十组日本和美国母婴在家庭玩具活动中的交谈，样本分布于三个年龄组。研究发现共同的言语简化、重复等特点

也发现部分活动侧重点不同：美国样本中物体命名较突出，日本样本中社会例行活动较突出。这是特定样本、语言与任务中的比较，不是关于所有日本家庭和美国家庭的普遍结论。[R08]

这个事实给我们的启发，主要不在于替“西方重个人、东方重集体”再添一个例证，而在于改变观察单位。若只统计母亲说了多少词，我们可能漏掉这些词正在组织什么活动；若只记录婴儿碰了几次玩具，也可能不知道某次触碰是自主探索、应邀递交，还是成人将玩具放进他的手里。数量相近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发生结构。

不过，研究中的文化差异并不自动等于发展结果差异。照护者较常命名，不等于其孩子以后必然更加独立；较常安排社会惯例，不等于其孩子不能独立探索。还需要追踪婴儿如何回应，哪些模式延续，哪些被新的经验改变。这里尤其不能省略婴儿自身的作用：一个持续抛球的孩子可能让成人从命名转向追逐，一个等待别人接球的孩子也可能使成人逐渐建立轮流游戏。

因此，文献支持的是比较的入口，而不是本书全部理论的结论。从研究中发现一种活动分布，到解释一个独特“我”的形成，中间还隔着实际互动的序列、跨情境的变化和长期的历史。

三、独立不是距离，依赖也不是没有“我”

讨论独立与依赖时，最容易把空间位置当成心理结构。婴儿离照护者远一些，便被认为更独立；靠在照护者身上，便被认为更依赖。可是，一个离得很远、不断等待成人命令才行动的孩子，不一定比一个坐在成人怀里、能够主动改变游戏的孩子拥有更多行动空间。空间接近与主体参与之间，没有可以凭直觉确立的一一对应。

在婴儿符号发生学中，需要把独立拆成更具体的问题：婴儿能否发起行动，能否对不合适的互动表示停止，能否在必要支持下改变路径，能否把已有组织带到新的对象和场景。这些可能性不要求孩子脱离所有照护。符号的独立性，是相对不被某个当次提示锁死，而不是生命与关系的断联。[S01]

依赖同样有不同结构。一种依赖使婴儿只能等待固定成人完成全部活动；另一种依赖则使他获得可靠支撑，因而可以尝试此前无法进入的活动。两者都存在他人的帮

助，却对后续发生产生不同作用。于是，真正应当比较的不是帮助次数多还是少，而是帮助怎样与婴儿的主动反馈相连。

这也使文化比较摆脱了高低排序。我们不应先把独立规定为唯一终点，再把接近性养育列为落后；也不应反过来把亲密看成唯一美德，认为自主活动必然意味着疏离不同文化实践中的保护、稳定与自由，都需要在具体事件里检查。三者相互促进与制约，不能凭国籍替孩子提前算好比例。

四、语言的形式与活动的意义不能直接互译

一句话的语法形式，不一定等于它在互动中的功能。成人说“你能把球给我吗”，表面上是问句，实际可能是邀请、要求，也可能只是陪伴动作的说话；“打开门”可以是命令，也可以是在描述孩子已经开始的动作。离开时序、目光、手势和接下来的回应，仅凭转录文字，很难判断成人是在引导还是在追随。

这对 SDE 尤其重要。S 显露不是研究者剪下的一句词语，而是某个分析层级上实际出现的规定性；D 包含先后变化；E 涉及言语、身体、对象和既往惯例的相互规定。若把语言转录当成完整的互动，就可能在进入模型之前丢掉最需要解释的部分。文本资料仍有价值，但它必须承认自己的观察范围。

设想同一句“给妈妈”，在三个说明性场景中出现。第一次，孩子已经递出玩具，成人随势接住；第二次，孩子没有反应，成人等待并重复邀请；第三次，孩子明确转身，成人仍抓住他的手完成递交。字面完全一样，婴儿参与的实际空间却不同。词频表无法单独告诉我们，哪一种经历正在形成。

同样，婴儿不回应一句话，也有多种可能。他可能没有听清，可能正在观察别的变化，也可能已经理解邀请却暂时不愿参与。将所有未回应计为理解失败，会把注意动机、感觉接入和任务组织混在一起。跨文化比较如果忽略这种差别，所谓民族差异可能部分来自编码习惯，而不是婴儿真正具有的结构。

五、一项没有按预期发展的新分析

Fitch 及同事在 2024 年在线发表、2025 年刊出的研究，重新分析了上述历史语料中的部分亲子互动，检验日语照护者的动词使用是否更容易让儿童把词与可见事件联系

起来。结果未支持简单的预期：按不同指标，有的比较没有显著差异，有的方向与假设相反。这里的新发表不是新采集了一个当代全国样本，而是对既有资料提出新的问题。[R31]

这个研究的价值，不是证明文化不重要，也不是推翻所有关于日美亲子交流的发现。它提示我们，一条听起来顺畅的推理链可能断开：更多关系活动，不必然意味着每个动词都处于更清楚的指称环境；成人文化目标、语言结构、活动安排和具体学习线索，也不必然朝同一方向变化。

对 SDE 而言，这是一种有益的约束。我们不能因为“多重纠缠”听起来比单一解释丰富，就允许理论容纳任何结果。若提出某种活动结构能够改善特定迁移能力，就必须说明哪种结构、哪种迁移、在什么条件下。观察结果不符合时，应当修改具体机制，而不是宣称反向结果也恰好证明纠缠复杂。

同时，这个例子说明资料可以在新问题下重新发生研究意义。早年的录像并不会因为发表年代较久便失去全部价值；但是它能回答的仍然是当时被记录的活动。把重新编码后的结果称作今天两国育儿现状，便混淆了资料发生的时间与研究解释发生的时间。这种区分应成为本书所有跨文化章节的共同纪律。

六、文化怎样进入一次具体 SIO

文化不是一种从天而降、直接写进婴儿身体的力量。它需要经由可辨认的渠道进入活动：什么物品可以给孩子，谁有权安排时间，哪类行为被赞许，哭泣应由谁回应成人怎样理解礼貌与自主，公共制度又怎样分配照护资源。本书把这些视作可能的作用路径，而不是声称每条路径都已在两个国家中得到同样验证。

在构造的递球场景里，家庭关于“孩子应当自己尝试”的期待，可能使成人多等待一会儿；关于“应当学会照顾别人”的期待，可能使成人增加轮流环节。然而，疲惫、时间紧张、孩子的兴趣和玩具的形状也会改变结果。同一个成人在不同晚上可能作出不同安排。文化脚本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才能产生作用，行动又会受到婴儿反馈的修正。

于是，我们可以把研究路径写成一个不封闭的过程：文化解释参与成人判断，判断改变行动条件，婴儿以身体和活动作出回应，回应又可能调整成人解释。每一步都可能出现阻力和转向。成人口头赞成自主，却在孩子弄乱房间时接管活动；成人重视合作，却发现孩子更愿意先独自观察。这些不一致不是要从数据中清除的噪声，恰恰可能是发生的关键位置。

高阶符号的独特性就在这种具体历史中形成。同处一种文化的两个孩子，不必获得同一套活动；即使活动形式近似，进入活动时的身体状态、既有预期和反馈也未必相同。文化影响可以很深，却不构成把每个个体压成同一模具的充分理由。

七、怎样比较，而不把人放进国家盒子

一个可行的研究设计，应当同时保留跨群体差异与群体内部差异。研究者可以选取相似年龄范围和可比任务，记录照护者的语言、手势、等待、协助和婴儿主动变化还要了解家庭的语言背景、日常照护安排与活动习惯。不能只把国家作为一个变量，然后把其余未解释部分全部叫作文化。

尤其需要分开三个问题：两组平均活动分布是否不同；同一个家庭在不同活动中是否改变；某种具体互动组织是否与这个婴儿后续的表现有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不能代替后两个。群体间某项均值较高，并不说明所有家庭都如此，也不说明在每个家庭内部增加这一项就会产生同样结果。

还应允许当地研究者和照护者修订编码。一个成人降低声音、停止逗弄，可能是在回应孩子的疲倦，而不是缺少积极性；另一个成人不断提问，可能使孩子兴奋，也可能打断他正在进行的探索。编码应把前后的变化连起来，而不是预先规定笑容、词数、身体距离中的某一项就是优质照护的全部。

本书提出的比较重点，是关系的功能与成立条件：婴儿是否能够进入活动、维持参与、改变后续，并在适当情况下重新调用某种组织。不同文化中，实现这些功能的形式可以不同；但不能因为形式不同，就放弃评价实际的安全、可及性和回应质量。文化谦逊并不要求对一切实践停止判断。

八、回到家庭：不必选择成为“哪国父母”

一个家庭读到跨文化研究后，可能急于决定应该更像美国父母，还是更像日本父母。这个问题很容易把研究变成新的模仿清单。真正需要理解的，是自己的婴儿正在怎样参与。一次玩球，可以有命名，也可以有轮流；可以有成人示范，也可以有孩子突然发起的新玩法。活动的组织应当跟随实际变化，而不是忠实表演一种文化印象。

在作者构造的家庭练习中，成人先观察孩子怎样接近球，再选择一个很小的变化：换一个位置，增加一次等待，或接住孩子主动递出的球。观察的重点不是哪一种做法更有国际先进性，而是这个变化是否让孩子获得新的可参与机会。若孩子转开或疲倦就需要调整，而不是为了完成某个教育目标坚持下去。

独特的“我”不会因为处在亲密关系中便消失，也不会因为被单独放置就自动成长。它在有边界、有支持、也允许反馈的关系中持续发生。美日比较的真正贡献，是帮助我们看见习以为常的做法并非唯一可能；它不应被用来给婴儿增加一个比姓名更难摆脱的文化标签。

37

第 37 章

阿卡父亲与共同照护的生命世界

返回目录

一、父亲的手，不只用来把孩子举高

当我们说起父亲与婴儿的关系，脑中可能浮现一个熟悉的图像：父亲把孩子举起来，做夸张的表情，负责短暂而热烈的游戏；日常细碎的身体照护，则似乎属于另一个人。这个图像可以来自某些家庭经验，也可以来自广告和叙事，却不能因此成为父爱的生物学定义。要理解一个角色如何发生，我们必须去看这个角色在不同生活组织中实际做了什么。

Barry Hewlett 关于中非阿卡人的研究，为这种比较提供了重要材料。他记录的父婴关系中，父亲会参与亲密而直接的身体照护；在其关于父婴联结的讨论里，拥抱、照料与日常接近，不被限于一次次高强度游戏。作者同时把这些活动放在劳动、家庭和群体关系中解释，而不是只列出一份父亲行为清单。[R10][R29]

本章不把这个案例写成“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竞赛。民族志描述的时代、地点和生活条件，与今天任何一个城市家庭都不完全相同。值得带走的，不是一项未经核实的抱娃时间百分比，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父亲成为怎样的父亲，是否与他能够进入哪些实际照护活动密切相关？婴儿又怎样通过自己的反应，参与这一父亲角色的形成？

对 SDE 符号发生学而言，父亲不是一个先已完成、只等着向婴儿输出影响的属性集合。父婴关系也不是在母婴关系旁边增加一条可有可无的线。它可能构成有自身历史的互动组织，并进一步改变婴儿能够参与的照护网络。

二、从角色称谓转向可进入的活动

“父亲”这个称谓可以在出生登记时获得，实际照护能力却需要在活动中形成。一个人知道自己应当关心孩子，与他能够辨认孩子的疲倦、调整抱姿、接住新的动作是不同层次的事情。将身份直接等同于能力，会同时遮蔽学习与排除：一方面，缺少经验的人可能被要求立即熟练；另一方面，被认为天生不擅长的人又可能始终没有参与机会。

设想一个说明性家庭场景。父亲准备抱起孩子，另一位照护者因为担心他不熟练而立即接手。一次接手可能出于合理的安全判断；但若此后每一次尝试都被提前替代父亲便很难获得在适当指导下学习的机会。下一次的不熟练，又被用来证明最初的排除正确。这里形成了一个可以研究的循环，而不是“男性没有耐心”的本质说明。

相反，提供安全的示范、允许父亲观察孩子的反应，并在必要时协助，可能打开另一条路径。婴儿的舒适、不适、趋近或转开，不只是被动接受照护后的结果，也成为成人修正动作的依据。照护技能因此不是单独储存在成人头脑里的一套指令，而是在这个身体、这个孩子和这些具体条件之间逐渐建立的适配。

这一分析并不意味着所有父亲都必须使用同一种抱法，也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必须由父亲承担完全相同的任务。它提出的是参与原则：不应仅依据性别预先决定谁能够成为细致的照护者；实际分工应当考虑安全、能力、资源和当事者的生活条件，并保留学习与调整的空间。

三、共同照护不是把婴儿平均分给所有人

共同照护有时被想象成人人随时抱一下孩子，照护责任因此自然充分。这种理解忽略了网络的组织。一个网络可以有很多成员，却在孩子需要回应时无人实际承担；也可以成员不多，却具有清楚的衔接。对于婴儿，人数并不等于可靠性，频繁交接也不自动等于关系丰富。

我们可以用一个作者构造的交接来说明。母亲准备休息，父亲接过婴儿，祖母在旁边说孩子刚刚喝过奶、正在变得困倦。父亲根据当前反应调整活动，而不是机械重

复上一位照护者的全部动作。这个交接的关键，不是三个人都出现了，而是有关孩子状态的信息、照护责任和可继续的回应被实际接续。

如果交接只有“轮到你了”，却没有确认对方是否准备好、孩子正在经历什么、必要物品在哪里，那么形式上的轮流可能掩盖关系断裂。反过来，若上一位照护者不断纠正、拒绝任何不同做法，接替者也无法建立自己的有效互动。共同照护需要连续性，也需要允许不同成人形成各自可被婴儿辨认的回应方式。

因此，本书提出一种“可接续的多样性”。它不要求所有照护者完全一致，而要求重要的安全信息、必要支持和孩子的反馈能够穿过交接。多样性提供不同经验，接续性使这些经验不至于成为互相取消的片段。婴儿高阶符号的整体性，不能靠所有成人表演同一个人来维护。

四、身体接近与关系可用性

民族志中的父婴接近，提醒我们重新观察身体在关系中的作用。不过，接近不是一个自动产生关爱的按钮。抱着孩子的成人可能专注回应，也可能无视孩子持续的不适；暂时离开视线的成人，可能通过可靠的交接保留照护连续性。身体距离是重要条件，却不是关系质量的全部定义。

我们可以区分“在场”“可用”和“可改变”。在场指成人处在能够参与的范围；可用指他能够对需要作出实际回应；可改变则指孩子的反馈能够影响他的下一步。三者是本书提出的分析区分，不是新的临床量表。它们帮助研究者避免只记录谁在房间里，却不知道谁真正承担了互动。

比如，父亲在一旁工作，孩子发出声音后，他短暂回应并在适当时机转入游戏，这与父亲始终面对孩子、却只按自己安排反复逗弄，是两种不同的组织。不能仅凭持续面对面的时间，就判断哪一种更有利。还需要看孩子的状态、活动是否适宜、回应是否到达，以及这种安排在较长时间里是否可靠。

从 SDE 角度，照护者的在场可以是环境 SIO 集合中的一个条件；只有进入具体的活动关系，这种条件才以某种方式参与当前 E 的重组。研究不应把“父亲在家”直接

写成“父婴纠缠充分”，正如不能把“玩具很多”直接写成“探索机会丰富”。条件的存在与条件被有效进入，需要分别说明。

五、劳动安排怎样成为婴儿的发生条件

父母的照护并不发生在社会之外。时间从哪里来，家庭靠什么维持生活，照护者能否休息，工作能否与孩子所在空间衔接，都会限制实际可选择的活动。本章不据一个民族志案例推导普遍经济规律，而是提出一种研究要求：解释父婴关系时，应当把这些约束纳入，而不是把所有差别归结为个人意愿。

假设两个父亲都希望每天参与照护，一个能稳定在晚间回家，另一个的工作班次不断变化。即便他们对孩子的情感相近，可形成的活动惯例也可能不同。这并不允许我们提前判断谁更爱孩子，却要求我们研究如何在不同条件下建立可靠衔接。一个可执行的交接安排，有时比抽象地要求“增加陪伴”更接近实际问题。

还要警惕把共同照护的成本转移给某一位不被看见的人。父亲能够参与游戏，可能依赖另一位照护者已完成喂养、清洁、物品准备和情绪安抚。若研究只拍摄最轻松的几分钟，便可能把可见的亲密归功于一个人，而把维持亲密条件的劳动从解释中删去。

婴儿符号的环境因此不只包括与婴儿直接接触的人，也包括那些通过共同对象、共同活动或资源安排影响当前互动的 SIO。这里需要明确影响链条：工作安排如何改变交接，交接如何改变活动可用性，活动又怎样影响孩子的后续参与。只有指出这些中间环节，才能避免把“社会环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却无法研究的词。

六、婴儿不是网络里的包裹

共同照护的讨论很容易只剩下成人之间的排班。谁抱多久，谁负责哪一顿，谁夜里起床，看似已经描述了整个系统。但婴儿并不是在成人节点之间被传递的固定包裹他对声音、姿势、节奏和活动的反应，会改变交接能否顺利，以及不同关系怎样逐渐稳定。

在一个构造的场景里，孩子由祖母抱着时正在安静观察；父亲接手后立即开始热烈逗玩，孩子转头、紧张、哭泣。成人可以把它解释为“孩子不喜欢爸爸”，也可以

检查活动转换是否过快。后一种解释不保证立即找到原因，却为修订提供了入口。若父亲先延续安静观察，再等待孩子发出新的信号，可能形成另一种交接经验。

这并不是要求成人完全服从婴儿的每一个当下反应。成人仍承担保护、安排必要活动和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关键在于，孩子的反应是否被当作有意义的反馈，而不是一律被视为需要压制的阻碍。共同发生也不意味着共同承担同等责任：婴儿可以影响网络，却不能负责网络中的劳动公平和照护安全。

当一个婴儿逐渐熟悉不同照护者时，可能形成的不是几个互不相关的自我，而是一个能够在多种关系中转换、保持连续性又允许差异的高阶“我”。这是本书的理论解释。它要求我们进一步观察：哪些关系能够互相接续，哪些转换造成困难，困难是否能通过具体安排得到缓解。不能从“很多人爱他”直接跳到“高阶结构必然更完善”。

七、怎样研究共同照护的结构

若要把这一解释变成研究，应当从实际照护事件出发，而不只询问家庭成员的理想分工。可以记录谁发起交接、交接前后的活动是什么、婴儿的状态如何改变、信息是否传递、下一位照护者是否调整行为。研究者还应记录没有顺利接续的时刻，因为失败往往更能显示某条关系是否具有组织作用。

一个重要比较是：在总照护时间相近时，交接清晰、反馈可传递的家庭，是否比交接模糊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活动连续性。这个问题必须控制或描述实际资源差异，不能把经济压力、疾病负担或工作时间的影响悄悄转成父母能力评价。更不能为了制造对照，故意使婴儿经历无人回应的间隙。

网络图可以帮助表示谁与谁交接，却不能单独代表婴儿的体验。两条连线数量相同的网络，可能一个允许孩子改变活动，另一个只允许成人之间调度。因而图中的边至少需要有方向、时间和活动内容；某些边还要区分直接照护、信息传递与资源支持把所有关系画成同一种粗线，会失去本来希望发现的结构。

对于 SDE 的新增解释，检验重点不应只是网络越密越好。更有价值的问题是：某些关键交接关系能否帮助已经建立的局部符号在新照护者那里继续发生；某个节点的

负担降低，是否通过可观察的活动变化影响孩子参与。若普通时间分配模型已能同样解释结果，就应承认高阶符号语言尚未显示额外预测力。

八、阿卡案例留下的不是一种可复制生活

从阿卡父亲的研究中，城市家庭没有必要复制另一种社会的全部劳动与居住方式。文化实践不能像商品一样从原有关系中拆出，放到任何家庭都期待同一效果。真正可借鉴的，是对自身假设的松动：细致的身体照护不必天然归属于一种性别；父亲与婴儿的联结，也不必只能靠刺激性游戏来表达。[R10][R29]

这种松动可以带来具体而有限的改变。一个家庭可以检查谁始终没有学习机会，谁承担了不可见的准备劳动，交接时孩子的反馈是否被听见，以及每个人能否获得必要休息。这不是给父母增加一套竞争指标，而是让照护系统不再依赖某一个人无限承受。

婴儿的独特性也不会因此被共同体吞没。恰恰是在多个人能够辨认并回应他的不同表达时，这个孩子才不必被压缩成某一位成人的单独解释。与此同时，多主体参与又需要保护他的安全、连续性与逐渐出现的偏好，而不是把“大家都可以管”当作集体照护的充分定义。

父亲、母亲、祖辈及其他照护者，都在与这个婴儿的关系中形成新的规定性。共同照护的积极意义，是让这些变化能够彼此支持，而不是互相抵消。一个独特的“我”在网络中发生，网络也因这个“我”的到来而重组；这才是阿卡案例对婴儿符号发生学提出的更深问题。

38

第 38 章

古西人的触觉敏感回应

返回目录

一、没有看着孩子，是否就没有回应孩子

一位成人正在处理手边的事情，婴儿靠近她的身体。孩子轻微扭动，成人调整支撑的位置，稍后继续原来的活动。她没有马上微笑，没有说一句专门对孩子说的话，也没有停下来做面对面的游戏。这个作者构造的场景，可以发生在许多地方，并不是一份古西家庭的观察记录。它提出的问题是：录像编码员会把刚才的调整记作回应，还是记作没有互动？

答案取决于我们先看见了什么。如果只以言语和目光交流为指标，那一次身体调整可能从资料里消失；如果只看调整是否发生，又可能忽略它是否真正承接孩子的状态。研究需要同时面对两种误判：把不熟悉的回应当作缺席，以及把任何身体接触都当作敏感照护。

这正是古西人相关研究对于婴儿符号发生学的价值。它迫使我们检查自己的观察工具：工具是否只擅长发现某一种城市家庭里常见的互动形式？我们说婴儿缺少什么时，究竟是在描述儿童的生活，还是在描述研究者的视野边界？

二、两个时期的研究，不能揉成一个故事

Richman、Miller 与 LeVine 在 1992 年的论文中，比较了肯尼亚古西与波士顿部分家庭的母婴回应，也讨论了另一地区教育经历与回应方式的关系。用于古西—波士顿比较的是各较大样本中的十二组与九组亲子；古西资料来自 1975—1976 年，波士顿资料来自 1979—1980 年。研究显示，回应的通道和对象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化交往惯例中理解。[R30]

多年后，Mesman、Basweti 与 Misati 的研究观察了七个古西家庭中七至二十三个月的婴幼儿。研究使用较长的自然情境录像，重视身体与非语言回应，同时也观察不敏感或严厉的互动，并未把当地照护一概美化。论文 2020 年在线发表，2021 年刊出。[R09]

这两项研究不构成一条可以直接拼接的文化时间序列。样本、任务、工具和研究问题都不同，不能据此说整个古西社会从不敏感变得敏感。较合理的解释是：研究者在不同问题和方法下，能够看见不同层面的活动。对于某些以语言互动为主的评价，后来的观察提供了需要重新审视的材料。

本章不从七个家庭推断所有肯尼亚家庭，也不将历史资料当作今天社区生活的完整地图。有限资料仍然可以产生重要作用：只要它足以表明某种“普遍标准”遗漏了有意义的回应方式，我们就有理由修订观察，而不必先证明另一种文化在所有方面更优越。

三、回应的通道与回应的功能

可以把回应暂时分成两个分析面向。通道是它通过什么实现：语言、目光、触摸、体位调整、物品移动或活动停止。功能是它在具体事件中改变了什么：减轻不适、维持参与、回应邀请、限制危险，或帮助进入另一项活动。通道容易被看见和计数，功能则必须结合前后条件加以判断。

同一个通道可能承担不同功能。抱起孩子可以帮助调节，也可能打断他正在进行的安全探索；一段热情说话可以回应他的发声，也可能盖住他希望休息的表达。同一功能也可以通过不同通道实现。例如让孩子知道成人已注意到他，不必永远使用完全相同的声音和面部动作。

但功能等效不能靠理论先行宣布。两种活动都被成人称为安抚，不代表婴儿实际经历相同，更不代表长期结果一定相同。需要观察孩子的变化、活动的后续和不同情境中的稳定性。SDE 强调关系，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都可以通过一句“关系不同”免于检验。

因此，跨文化研究应避免两种极端。第一种把某一通道的频率当成普遍质量；第二种因为通道不同就拒绝所有比较。更可行的办法，是对共同关心的功能提出可观察问题，再与当地照护者共同确认哪些行为能够承担这些功能，最后检验这些判断是否经得起具体资料。

四、身体知识并不低于语言知识

在照护中，成人有时能够通过孩子的姿势变化及时调整，却未必能立即说清自己的全部依据。这种实际熟练不应因缺少精确叙述而被视为没有知识。与此同时，会说出一套丰富育儿术语，也不保证动作能够与这个婴儿的当前需要适配。语言报告与身体活动，是不同但可以互相校正的证据来源。

设想两位照护者都说“我知道他困了”。第一位仍继续快速逗玩，第二位则降低活动强度，观察孩子是否逐渐转入休息。我们不能仅凭一句自我报告确定二者相同，也不能仅凭第二位的动作就断言判断正确。孩子可能并非困倦，或还有其他不适；实际反馈仍然需要进入判断。

对于婴儿，这种身体性的相互调整可能先于成熟语言。一个轻微转头、手部收回或身体放松，能够参与改变活动的后续，而不必首先被翻译成完整句子。符号作为存在方式在这里显示其研究意义：可重复的关系组织，不以成年人已经给它命名为前提。

但我们也不能把身体知识浪漫化为不会犯错的直觉。熟悉的人会误判，长期形成的抱法也可能不再适合变化中的孩子。真正有发生能力的照护，不是永远坚持原有手感，而是允许新的差异使已有组织重新打开。身体熟练与反思修订，应当被看作互相支持，而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

五、敏感性存在于时间关系中

回应是否适宜，不能只看某一个动作的截图。婴儿发出变化、成人注意到变化、成人采取行动、孩子再次改变，这些环节之间的时间组织同样重要。不过，时间短也不必然更好：过早接管可能切断自主尝试，等待过久又可能没有承接真实需要。不能用一个统一秒数代替情境判断。

在一个作者构造的探索场景中，婴儿伸手接近软玩具，成人立即替他拿到。成人的反应很快，却可能取消孩子自己调整的机会。另一个场景中，婴儿已经明显疲惫，成人仍以“让他自己试试”为由继续等待。同样是等待，其意义因活动、身体状态和安全条件而不同。

于是，研究可以把时间分成若干可观察的关系，而不是只算平均延迟：成人是否在孩子改变之前就预先接管；回应是否与孩子的行动相连；孩子出现新的反馈后，成人是否再次调整。这样的记录能够保留方向性，也能发现看似积极的回应何时成为固定程序。

SDE 的 D 在这里不是简单钟表时间，而是可区分变化的次序及其相互承接。E 则包括身体位置、活动惯例、照护者注意和孩子既有经验之间的组织。最终显露的安静抗拒或继续探索，是需要解释的 S，而不是证明某种文化永远正确的印章。

六、不同通道之间可以接力，也可以互相抵消

照护并不是各通道独立完成任务后再相加。成人的声音可能与触摸一致地提示活动变化，也可能说着温柔的话却用动作强行打断孩子；面部表情可能邀请参与，身体姿势却使孩子无法接近对象。研究需要看通道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统计每条通道的活动量。

一个构造的洗脸场景中，成人先让婴儿看见软布，以熟悉声音提示接下来的接触，观察孩子转头后调整角度。另一个场景中，成人虽然说话更多，却不理会孩子的身体变化。这里不能直接凭语言量评定质量；也不能把第一种做法宣布为适合所有孩子的固定程序。具体感觉条件、疲倦状态与既往经验都可能改变活动。

这种分析使“触觉敏感回应”不再只是给触觉增加赞美。真正值得研究的是，触觉如何与行动、注意和其他通道组织在一起；当视觉或听觉接入受限时，怎样建立新的可辨认关系；当孩子的反应发生变化时，既有组织是否能够调整。

如果多个通道只是同时出现，却没有共同组织后续活动，称其为高阶纠缠仍然过早。相反，若某个低强度的身体调整持续改变孩子可参与的方向，即使没有丰富语言

它也可能是承重关系。承重与否要从实际作用判断，而不是从成人文化中哪种表现更容易获得赞赏来判断。

七、尊重文化，不等于停止保护儿童

承认身体回应的价值，不能推导出所有本地实践都不可批评。一个社会中可以同时存在细致照护与伤害性行为，同一个照护者也可能在不同事件中表现不同。研究若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只保留温暖片段，仍然是在用自己的理论需要遮蔽儿童实际生活。

对不适当行为的评价，也不能仅凭外来者的惊讶。应当明确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伤害风险、儿童能否获得必要保护，以及当事者怎样理解和调整。这要求把文化解释与实际后果分开：一种做法拥有传统理由，并不自动证明安全；一种做法形式陌生，也不自动证明有害。

在本书的规范立场中，婴儿的生存、安全、尊严和可及发展支持，不因文化归属而减少。与此同时，改善照护不能被简化成训诫母亲“多微笑、多说话”。若真正的困难是劳动负担、照护资源不足或必要支持无法获得，只改变面部表现便可能掩盖问题。[N18][N19]

这也意味着，不应把群体贫困直接解释为亲情贫乏。资源条件可能限制可行的活动，但照护者的具体回应仍应被认真观察；反过来，丰富物质资源也不能保证反馈真正被接住。文化、经济、身体与关系之间，需要逐条分析，而不是用一个等级取代另一个等级。

八、让观察工具接受当地生活的检验

研究者可以先保留一份较宽的事件记录，而不急于把每个动作塞进既有量表。例如记录孩子的身体变化、成人正在做的事、接触位置、言语和目光，以及随后活动如何继续。之后，再由不同背景的编码者独立判断哪些事件可能构成回应，比较分歧出在哪里。

分歧不应只被当作需要消除的技术问题。若当地观察者认为某次轻微姿势调整回应了婴儿，而外来观察者没有注意，这可能揭示工具遗漏；若当地观察者把一种惯常

强制称为正常，外来者提出风险，则需要检查具体事实，而不是用文化归属决定谁必然正确。共同编码的目的，是增加可检验的描述，而不是制造礼貌的一致。

本书建议把“看到了动作”“推断了功能”“评价了质量”分为三栏。动作可以较直接记录；功能需要结合前后；质量还包含安全与价值判断。三栏分开，能够避免把研究者的评价伪装成纯粹观察。之后若出现新证据，修订也有明确位置，不必推倒全部资料。

最终还需要检验这些编码是否对后续活动有解释力。某种被认定为敏感的回应，能否在相似条件下支持孩子继续参与？其作用是否只限于一个对象或一位照护者？若不同编码体系都不能产生稳定判断，就应承认研究仍处于探索，而不急着给家庭打分。

九、被看见的，不只是另一种母爱

古西案例的意义，不止是告诉读者“少说话也可以爱孩子”。这句话虽然纠正一种偏见，却仍然把研究停在成人情感的评价上。更深的问题是，婴儿如何在不同形式的回应中形成可辨认的活动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如何进入他独特的高阶符号历史。

身体接触不是语言的低级替代品，语言也不是可以随意省去的装饰。它们在不同发展条件中具有不同作用，需要通过具体活动组织来理解。我们既不应要求所有家庭表演同一种亲密，也不应因为差异存在，就拒绝研究哪些关系能够真正支持孩子的后续发生。

一个未被研究者注意的轻微动作，可能在婴儿的世界中拥有实际作用；一个被成人热烈赞美的互动，也可能没有承接孩子当前的需要。婴儿符号发生学要求我们持续把目光返回这里：不是关爱看起来像什么，而是这个孩子在其中怎样存在、怎样回应怎样获得下一次发生的可能。

39

第 39 章

Beng 婴儿的精神身份

返回目录

一、婴儿不是所有社会里的“新来者”

在某些熟悉的育儿叙事中，婴儿被描述为刚刚进入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生命；成人的任务，是逐渐把知识与规则教给他。但这种叙事并不是人类理解婴儿的唯一方式。Alma Gottlieb 关于科特迪瓦 Beng 人的民族志，记录了另一种文化解释：婴儿被认为与出生前的另一个世界保持联系，带着某种精神知识来到此处。[R11]

这一材料首先告诉我们，不同社会可能对婴儿“已经是什么”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它并不证明转世真实，也不意味着当地所有人的信念完全一致。民族志研究的是信念如何进入生活，而非替信念中的超自然对象提供科学认证。

对于婴儿符号发生学，这个案例格外重要。因为我们刚刚确立，婴儿首先作为主客互动复合体的一种存在方式而成立，随后才成为被解释和表征的对象。Beng 案例则让我们进一步追问：当成人已经用某种宇宙观理解婴儿时，这些表征怎样回到实际照护，参与婴儿自身的继续发生?

这里不能把两条路混为一谈。成人相信婴儿拥有某种知识，是成人的解释；婴儿实际具有怎样的感觉、预期和行动组织，需要另行研究。前者可以真实地影响后者，却不因这种影响而自动变成后者的准确描述。

二、身体照护中的宇宙观

Gottlieb 在 2005 年关于婴儿沐浴与记忆的论文中，进一步讨论 Beng 有关出生前世界的信念如何与身体照护相连。论文描述了当地人用反复的身体照料帮助婴儿留在此世的文化理解，并明确将婴儿记忆的相关论述置于解释与推测的范围。[R32]

本书不把这些具体惯例当作可直接照搬的育儿方法。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更一般的机制：看似抽象的“婴儿从哪里来”，能够影响成人怎样解释哭泣、怎样安排身体接触、怎样理解生病与恢复。理念并非只停留在话语里，它可以通过活动次序、材料和责任安排进入现实关系。

然而，信念与行动之间仍有距离。一个人可能相信某种解释，却因资源不足而无法遵循相关实践；也可能按照惯例做事，而并不完整认同其解释。民族志所说的文化不能被压缩成人人共享的一份头脑程序。对于具体家庭，需要分别记录说法、行动及其条件。

这使 SDE 三界的分析获得一个清楚入口。成人的理念世界参与组织活动，活动改变婴儿可以接触的现实条件，婴儿的身体反应又被成人赋予新的意义。但成人三界与婴儿三界不是同一个系统，不能把成人表达的世界观直接搬入婴儿的内部体验。

三、首先是存在方式，不等于表征无足轻重

在本书的逻辑里，符号作为存在方式优先于表征，并不是说名字、故事和信仰都只是无效附属物。表征一旦进入判断与行动，就成为新的互动条件。比如，把孩子看成完全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与把孩子看成值得倾听的参与者，可能导向不同的等待、解释和回应。

但“可能导向”不是“必然造成”。相信婴儿拥有丰富精神知识的人，未必在每一次活动中都尊重婴儿反馈；认为婴儿认知尚未成熟的人，也可以非常细致地照护。单凭观念的庄严程度，不能推定关系质量。必须回到行动，检查这种观念实际改变了什么。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说明性的分析链条：关于婴儿身份的叙事，影响成人如何选择解释；解释影响他愿意尝试哪一种回应；回应改变婴儿当下的状态与后续活动；婴儿的反馈再被理解为支持、修正或挑战原有叙事。每个箭头都需要证据，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中断。

这条链也显示表征回写的力量。一个解释即使不准确，也可能产生真实后果；一个解释有积极的道德愿望，也不保证后果有利。SDE 若要认真讨论符号，就必须区分

表征内容的真实性、表征引发行动的效力，以及行动对婴儿的价值。这三项评价不能互相代替。

四、把婴儿看作已有知识者，会发生什么

“婴儿已经知道很多”与“婴儿什么都不知道”，都可能成为成人行动的起点。前者或许促使成人尊重孩子，也可能使成人高估其理解能力；后者或许使成人注意提供支持，也可能使成人忽视孩子正在发起的活动。这些是本书的条件性推论，不是对 Beng 家庭实际行为的统一判断。

设想一个构造场景：婴儿对某项活动转头。成人若相信孩子能够表达偏好，可能暂停并重新尝试；若相信孩子懂得成人所有要求，又可能把转头理解为故意违抗。两种回应都可以从“孩子有自己的意思”出发，却沿着不同方向发展。因此，一个看似尊重主体性的信念，还需要与发展能力的准确理解相配合。

反过来，成人知道婴儿尚不能理解复杂语言，也不意味着只能把他当成无意义的身体。可以通过动作、触摸、物体提示和活动节律，让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参与。存在层面的独特“我”，不以拥有成人知识为条件；支持婴儿，也无需先夸大他的认知成熟度。

这个区分对于本书自身尤其重要。我们提出婴儿已有独特高阶符号“我”，不是把某种完整人格剧本放进新生儿，也不是宣称他拥有成年人的反思意识。若为了强调尊严而夸大能力，仍可能造成不适当期待。尊严不需要以成熟作为交换条件。

五、研究婴儿的世界，不应让成人替他说完

民族志常能获得成人丰富的解释，却很难直接获得尚不会说话的婴儿对这些解释的评价。这种资料不对称必须被保留。成人说婴儿正在思念另一个世界，是一项文化陈述；婴儿哭泣、转身、安静或靠近，则是可观察的活动；研究者把两者相连，已经进入解释层。

如果省略这一层次，婴儿便可能在研究中被再次沉默。书里虽然处处谈论婴儿的灵魂、记忆和身份，实际发言的却始终只有成人。SDE 强调婴儿参与发生，因此需要把身体反馈及活动变化纳入，而不是只收集关于婴儿的动人叙事。

这并不要求研究者声称能够直接读取婴儿内心。更诚实的做法，是保留多种解释，记录它们各自预期什么，观察后续活动是否符合。对于某些无法经验判定的宗教内容研究可以说明其社会作用，而不假装已证明或反驳全部形上主张。

婴儿的自我世界因此不能被成人的语言报告完全替代。我们可以从行为、身体条件和互动历史推断某些可能的感受与预期，却必须承认推断边界。这种克制不是否认婴儿有世界，而是拒绝把研究者自己的世界冒充成他的世界。

六、贫困与文化不能互相遮蔽

Gottlieb 的专著同时关注物质匮乏如何限制照护实践。[R11]这一点具有方法上的意义：不能把每一种看起来具有文化特色的安排，都解释为人们自由选择了某种理念。资源、劳动与医疗接入等条件，也可能限制可行的行动。反过来，也不能把物质困难当作解释一切的唯一原因，使当地人的理解和主动安排完全消失。

对于婴儿符号发生学，需要同时保留条件与实践。一项照护活动未被实施，可能是成人不认同，也可能是没有时间、材料或可获得的支持。活动表面相同，也可能来自不同原因。研究若只看结果，再用文化名称补上动机，就会把发生史写成事后的故事。

可以用一个不指向特定社区的构造例说明：两位照护者都没有带孩子参加某项活动，一位认为不适合，一位希望参加却无法到达。行为记录中的“未参加”相同，后续支持方案却应不同。前者需要讨论目标和适宜性，后者需要检查可及性。把两者都称为传统观念阻碍，会产生错误干预。

由此，文化研究与社会支持不应互相排斥。理解意义，使支持不至于粗暴；理解资源，使尊重不至于停留在赞美。对婴儿而言，积极发生需要的是实际可以进入的生活关系，而不仅是一套被外来研究者欣赏的文化解释。

七、四层资料，应当分别记录

本书建议在涉及婴儿文化身份的研究中，区分四类资料。第一类是当事者说了什么，尽量保留语境和说话者差异；第二类是照护活动实际怎样进行；第三类是婴儿在

活动前后怎样变化；第四类是研究者据此作出的理论解释。它们可以互相支持，但不能互相冒名。

例如，“孩子不愿留在这里”属于成人的解释；“成人改变了洗护活动的次序”属于行为描述；“婴儿在某个环节转头、随后安静”属于观察；“身份叙事经由身体活动回写高阶符号”则属于本书的理论建构。四层都重要，区分之后才可以检验箭头而不是让一句文化陈述直接承担全部因果。

还应保留同一家庭内部的分歧。祖辈、父母、其他照护者未必持有完全一样的解释；同一个人也可能随经历改变看法。研究若只选最符合某种文化形象的话，便会把活动中的变化冻结成群体本质。所谓传统，并不意味着每次互动都只能重复同一条路径。

在此基础上，SDE 可以提出一个较窄的假说：当身份解释实际改变了照护安排，并持续影响婴儿可进入的活动时，它对后续发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独的口头认同更大。这不是关于任何特定宗教优劣的判断，而是有关表征如何经由行动发生效力的可研究命题。

八、文化保护与身体安全的双重要求

研究者不能把文化理解当作医学建议。某种身体惯例的象征意义，与其在具体条件下是否安全，是不同的问题。支持家庭时，可以认真倾听其解释，同时依据适当专业评估讨论风险与替代方式。尊重文化不意味着需要模仿所有具体做法，也不意味着家长必须在文化身份与儿童安全之间作绝对选择。

本书更关心一种协商路径：首先理解家庭希望通过活动实现什么，例如保护、亲近或身份确认；其次识别其中哪些具体环节存在需要评估的问题；再寻找能够保留有价值关系、同时改善安全与可及性的替代安排。这是一个规范性的工作思路，不是未经检验的医疗干预方案。

婴儿的反馈也应当被纳入协商，但不能由他承担判断复杂风险的责任。成人仍需提供保护，而保护又不应成为完全取消文化表达或个体参与的借口。保护、稳定与自

由在这里同样相互制约：没有安全，活动可能伤害未来机会；没有连续性，支持可能破坏原有信任；没有调整空间，惯例又可能无法回应变化。

跨文化工作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说一句“尊重差异”，而是在差异中保持具体判断。哪些内容属于无法由本研究裁决的信仰，哪些属于可观察的活动，哪些涉及必须认真处理的风险，需要逐层说明。这样才能既不轻慢当事者，也不让婴儿隐没在文化辩论背后。

九、从精神身份回到独特的“我”

Beng 案例并不能直接验证 SDE 符号发生学。它提供的，是一个能够让表征与存在的关系变得清楚的现场：婴儿已经以身体和活动参与生活，成人又用一套意义体系理解他；意义体系进入实际行动，行动被婴儿反馈改变，新的经验继续组织后续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婴儿既不是完全被文化书写的空白，也不是不受文化影响的封闭本体。身体条件、活动、照护解释与资源环境共同参与，而具体的纠缠历史并不等于任何一项的单独结果。文化赋予的身份可能非常厚重，但这个孩子仍然不能被那一身份完全穷尽。

当我们说“婴儿有自己的我”，首先是在承认这种不可被他人解释完全取代的存在。它可以在尚无成熟叙述时参与回应，也可以在他人的叙事中被误解、被支持或被限制。婴儿符号发生学的任务，不是为他再写一套永远正确的解释，而是让解释保持对实际发生开放。

因此，这一章以一个方法上的反转结束：最值得研究的，不仅是一个社会认为婴儿来自哪里，还包括这个婴儿怎样以自己的活动，让成人关于他的理解继续改变。文化不是故事的最后一句；婴儿仍在其中发生。

40

第 40 章

中国坐月子与新加坡多元城市家庭

返回目录

一、一扇门后，几个世界正在相遇

婴儿出生后的一个早晨，祖母端来食物，父亲查看当天的安排，母亲尝试休息，另一位照护者准备更换用品。有人关心身体恢复，有人担心喂养是否顺利，有人希望尽快建立规律。大家围绕的是同一个孩子，心中却未必有同一个“怎样才算照顾好”的答案。这个场景是作者构造的城市家庭例，不对应某个真实家庭，也不代表所有中国或新加坡家庭。

婴儿一声哭，使这些解释暂时汇聚。谁先起身，谁有权判断原因，谁的经验被采纳，谁负责执行，又会把不同解释转成实际关系。由此可以看见，婴儿并非在一个笼统的“中国文化”或“现代城市”里成长，而是在具体的代际协商、身体照护和生活安排中发生。

坐月子与多元城市照护，是研究这一过程的重要入口。它们把产妇恢复、亲属责任、专业支持、家庭经济和文化认同放到同一时期。但本章不提供月子饮食、疾病处理或喂养处方；我们研究的是这些安排怎样组织主客互动，以及婴儿与照护者如何共同改变它们。

二、传统不是一份永远不变的操作表

Tan 及同事 2022 年的一项质性研究，访谈了从新加坡同一家三级医院的两所产科门诊招募的十六位初为人母者，涉及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背景。研究显示，受访者并非只是机械遵循传统，也会因实际困难、个人判断等调整或放弃某些做法；一些人同时经历支持与约束。这是小样本经验研究，不代表所有家庭的比例分布。[R33]

Fok 及同事 2016 年发表的出生队列研究，则比较了新加坡不同族群母亲报告的产后习俗，显示传统实践既有持续，也有差异。[R34]两类研究回答的问题不同：一类帮助理解人们怎样解释与协商，一类描述样本中的实践分布。它们不能被简单合成“某个族群最重传统”的排名。

这些材料提示我们，文化惯例本身也在发生。同一种做法可能因代际关系、住房条件、工作安排和专业建议而改变；同一位母亲也可能在不同阶段作不同选择。把传统理解成固定输入，会看不见人们在其中的判断和创造。

对于婴儿符号发生学，更有价值的问题是：一个惯例被保留时，究竟保留了什么功能？被改变时，又有哪些关系得到接续？例如，家庭可能改变具体活动的时间，却仍维持对产妇休息的支持；也可能保留形式，却把全部执行负担留给最疲惫的人。形式的延续与支持的延续，需要分别评价。

三、照护母亲，不是通过母亲间接照护婴儿那么简单

讨论婴儿时，母亲常被当作影响孩子的一项环境变量：她休息得好，所以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情绪稳定，所以有利于孩子发展。这些联系可以研究，但不能穷尽母亲自身的地位。产妇的恢复、感受和自主决定，不应只因为对婴儿有益才值得重视[G07]

在 SDE 框架下，母亲与婴儿是相互纠缠而不相互吞没的存在。共同发生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利益可以完全被另一个人的目标替代。家庭若把“都是为了孩子”当作取消产妇意愿的理由，便可能在宣称关爱的同时，压缩另一位主体的参与空间。

设想一个构造例：祖母坚持某种照护安排，理由是过去一直如此；母亲觉得难以承受，却不敢表达。争论表面涉及一项习俗，实际还包含谁可以提出差异、谁能改变规则。即使所有人都真心关心婴儿，这种参与结构仍然需要调整。内在善意不会自动解决行动中的权力分配。

较有建设性的做法，是把共同目标与具体手段分开。大家可能同意需要休息、保护与适当支持，却不必因此坚持唯一方法。涉及健康的事项由适当专业意见帮助澄清

涉及时间与责任的事项则需要实际协商。婴儿符号的正向发生，不应建立在某一位照护者长期失去表达权的基础上。

四、祖辈经验怎样成为可修订的资源

祖辈经验既不是过时障碍的同义词，也不是不可质疑的权威。它包含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观察、身体熟练和关系记忆，也可能包含不适合当前条件的习惯。研究应当问经验如何被调用、如何接受反馈，而不只是问它来自哪一代。

例如，祖母能够很快察觉孩子在某种活动中开始疲倦，这是值得认真听取的实际知识；但若她坚持所有孩子都应当遵循自己熟悉的同一节奏，就可能忽视这个婴儿的差异。年轻父母同样如此：他们可能掌握新的信息，也可能把网络上的一句建议变成不容讨论的规则。年龄并不自动决定谁更开放。

可以建立一种双向的经验核对：先描述当下看见了什么，再说明各自的解释，尝试一个安全且有限的调整，随后一起观察。这不是把家庭变成实验室，而是让争论不只围绕身份权威。若一次调整没有达到预期，就修改判断，不必把它解释为某一代人的失败。

这样，祖辈经验可以作为已有符号被重新调用，又在新差异中重组。年轻父母的知识也经历同样过程。真正的代际共同发生，不是新知识战胜旧知识，或旧经验压住新意见，而是让这个具体婴儿的反馈能够改变所有人的理解。

五、多语言家庭中的同一个婴儿

在作者构造的多语言城市家庭里，不同照护者可能用不同语言、方言或手势与孩子互动。同一个杯子，在不同活动中被不同声音指称；同一位成人，也可能在安抚、游戏和交接时使用不同表达。这个例子用于分析语言与活动的关系，不据此作任何关于多语言发展速度的普遍判断。

从表征层看，研究者容易关注孩子听到了多少词、哪种语言更多。从存在层看，还要看这些表达发生在什么活动里，是否与可参与的动作相连，孩子的反馈是否被回应。一个词的声音并不独自携带全部意义；它在递交、饮用、寻找或拒绝中获得不同的关系位置。

多语言并不意味着婴儿被分成几个独立的“我”。本书的解释是，不同表达可以在共同的身体历史、对象活动和关系预期中聚合，也可能因接入不连续而形成需要支持的困难。具体怎样发生，应由实际观察和适当发展评估来判断，而不能凭成人的语言偏好预先决定。

家庭需要避免把每一次互动都变成语言产出任务。照护者若只关心孩子是否说对，可能忽略他是在请求帮助、表达拒绝还是邀请共同活动。语言教育的积极意义，应当包括让孩子能够参与更多关系，而不仅是让成人获得更多可记录的正确词语。

六、有偿照护者也是关系参与者

在某些城市家庭中，专业托育人员、家政照护者或其他有偿工作人员会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本章不推定所有家庭都采用这类安排，也不讨论特定雇佣制度的法律细节。需要强调的是，劳动关系与情感互动可以同时存在；领取报酬并不会使实际照护自动失去关系意义。

但把有偿照护者说成“像家人一样”，也不能成为忽视劳动边界的理由。持续可用的照护需要合理安排、休息、信息与必要支持，而不是依赖一个人无限在场。婴儿的关系连续性，与照护者自身的生活条件并非互不相干。

在一个构造的交接中，家长只要求“今天一定要让他学会这个动作”，却没有听取照护者关于孩子疲倦和兴趣的记录，便可能把活动变成执行指标。相反，若照护者能够报告具体变化，家长又愿意据此调整安排，婴儿的反馈就有机会跨越不同成人之间的权力层级。

这使共同照护成为一个高阶组织问题：谁能够提出观察，谁有权修改计划，谁承担后果，孩子的变化能否到达决策者。研究若只记录亲生父母的看法，可能漏掉大量实际发生；若只记录工作人员的执行，也可能忽略家庭目标与资源约束。两端都需要进入分析。

七、家庭与托育之间，需要什么样的连续性

新加坡的《早期发展框架》2023 版面向出生至三岁儿童的中心式照护与教育，为这一年龄段的专业实践提供指导。[G13]这里引用的是框架的对象与用途，而不是声称

它已经验证 SDE 理论。对本书而言，家庭与托育之间的转换，提供了观察局部符号如何跨情境继续发生的机会。

连续性不意味着托育机构必须复制家庭全部习惯。空间、人数、材料与活动安排本来就可能不同。关键是必要信息和支持能够接续，同时让孩子逐渐进入新的活动。若把一切不同都视为威胁，新的探索会被关闭；若忽略原有关系，转换又可能缺少可辨认的依托。

本书提出一种“最小必要衔接”的思路：传递与安全、身体需要、可及沟通及近期变化相关的信息，保留对孩子反馈的观察，再允许新场景形成自己的稳定组织。这比要求所有人使用同一套动作更灵活，也比只交一张固定作息表更接近实际发生。

与此同时，信息共享不等于无限记录。孩子的影像、家庭矛盾与健康资料，应当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并尊重适当授权和保护要求。本章提出的是伦理原则；具体制度实施需要遵循所在地适用规定。一个为了发展支持建立的档案，不应无声地变成永久评价孩子和家庭的标签库。

八、文化冲突可以成为修订的入口

当不同照护者意见不一致时，家庭可能急于找一个绝对正确的人。可是许多争论并非单纯知识错误，而是关注点不同：有人优先保证休息，有人希望活动规律，有人担心孩子缺少探索。把这些目标说清，才能判断冲突究竟发生在哪里。

可以把一个争论拆成三层。第一层是共同底线，例如必要安全和健康支持；第二层是可协商目标，例如活动如何安排；第三层是具体手段，例如由谁、在何时、用什么材料实施。底线不能被随意交易，目标可以讨论，手段则应根据反馈调整。三层混在一起，任何小修改都可能被体验为对亲情或文化身份的否定。

在一个说明性案例中，祖母希望孩子安静，父亲希望孩子自由探索。若只争论“管得多还是少”，很难推进；若改问当前环境是否安全、孩子是否疲倦、怎样保留探索又不破坏必要休息，就可能找到具体安排。保护、稳定与自由在这里不再是三面互相竞争的旗帜，而是同一次活动中的互构条件。

冲突并不天然有益。长期争执、羞辱或让婴儿承担成人矛盾，不能被美化为差异发生。积极意义在于冲突能够被转成可讨论、可调整的行动问题，使新的规定性出现并回写原有关系。没有这种转化，差异也可能只是持续消耗。

九、从一个家庭看到一座城市

婴儿的生活窗口很小，参与其发生的条件却可能很广。住房空间、交通安排、照护服务、工作时间和公共信息，都可能通过具体路径进入家庭。研究这些条件，不是把婴儿无限扩大成社会的一切，而是追踪哪些外部 SIO 确实通过共同对象、活动或参与者影响当前事件。

例如，一次托育接送是否可行，可能决定父母如何分配早晨时间；一个可及的专业支持渠道，可能改变家庭对某种发展差异的理解；稳定的照护安排，可能使成人有机会休息并在下一次互动中重新投入。这些是待研究的作用链，而不是一项政策必然产生某种人格结果的承诺。

城市支持的价值，也不应只用家庭购买了多少服务衡量。服务能否被实际进入，是否理解具体孩子，是否减轻不必要负担，是否允许家庭提出反馈，才与发生质量直接相关。越多项目不必然越好，过度安排可能挤压日常生活中本来有价值的活动。

这一章把跨文化讨论带回我们身边。传统与现代、家庭与机构、亲情与劳动，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个世界。它们在一个婴儿的日常生活中交汇，产生保护，也产生限制；形成稳定，也打开变化。婴儿的独特“我”，就在这些不能简单复制的关系中持续发生。

第九编 / PART 09

养育与教育：促进婴儿符号的正向发生

第 41—45 章

41 从“培养什么”改问“正在发生什么”

42 保护、稳定、自由的三重互构工艺

43 亲情不是单一输入：回应式照护的操作

44 评估婴儿，不应把婴儿缩成分数

45 AI 和辅助技术：新的符号环境与边界

41

第 41 章

从“培养什么”改问“正在发生什么”

返回目录

一、倒扣的杯子，不一定是一个错误

孩子把一个适合其当前活动的安全杯子倒扣，再翻过来，又倒扣。成人原本想教他认识颜色，几次把杯子扶正，指着杯身重复词语。孩子很快转向别处。成人可能认为注意力不够，孩子也可能只是失去了原先正在探索的变化。这个场景是作者构造，不是对某个家庭的诊断。它让我们看到，教育目标与实际发生可以不在同一条线上。

“培养什么”并非不重要。没有目标，成人也可能把日常照护交给惯性。但目标若完全先于观察，就容易把婴儿的活动当成通向成人计划的材料。于是，倒扣被视为偏离，转头被视为不配合，新的玩法被视为浪费时间。我们虽然不断教，却没有看见这个孩子究竟在与什么发生关系。

“正在发生什么”并不是要求成人停止引导，而是把引导放回具体的主客互动。孩子在比较方向、声音、接触效果，还是在重复一个熟悉动作？他是在邀请成人，还是暂时希望自己操作？这些都只能作为待修订的解释。观察先于接管，可以使教育的下一步更接近实际问题。

二、教育目标需要两层结构

本书建议把目标分为方向性目标与当前活动目标。前者涉及安全、尊严、可参与的生活和持续发展机会，不因孩子某次表现而取消；后者涉及眼前活动，例如能否接近物体、能否表达选择、能否把一个动作组织到新的情境。方向性目标较稳定，当前目标则应随反馈调整。

例如，希望孩子获得更多自主参与，是一个方向；希望他今天必须把杯子按成人指定方式放好，是一个具体任务。若任务压缩了参与，不能因为它原本被称作教育，就免于重新考虑。方向与手段之间需要持续核对，而不是用方向的正当性替每一种手段背书。

这也帮助我们界定“正向发生”。本书并不把变化更多、动作更快、词汇更多直接等同于正向。正向首先不能以损害必要安全与尊严为代价；在此基础上，考察孩子能否更实际地参与、表达、调节，并使已有组织可以被调用和适当重开。这是本书提出的规范与研究框架，不是一项已经建立常模的综合评分。

因此，一个更安静的孩子不必然比活动更多的孩子发展得好；一个今天需要更多支持的孩子，也不因此发生倒退。目标需要联系具体条件和时间范围。真正值得保护的，是这个独特生命继续参与和改变关系的可能，而不是一张始终向上的表现曲线。

三、先写事实，再写解释

回到杯子的场景，可以先记录一段很短的事实：孩子握住杯边，翻转，杯口接触垫面，停顿，再翻回；成人扶正后，孩子再次倒扣。这样的记录虽然朴素，却比“孩子故意捣乱”更有用。后一句已经把动机、规则和评价压缩成一个结论，而前者保留了多种解释的入口。

随后可以写出不止一个假设。孩子也许关注不同接触面的声音，也许在练习翻转，也许发现成人每次都会回应。三个解释对应不同的观察重点。如果只想证明自己的第一猜测，任何后续变化都可能被纳入同一个故事；保留替代解释，则有助于发现真正需要调整的地方。

家庭不必为每次活动写长篇记录。简短地分开“看见什么”和“我猜什么”，已经能够减少一些过早标签。专业研究则需要更严格的时间窗、编码和重复观察，不能把家庭笔记直接当作科学证据。两者服务不同目的：前者帮助下一次照护，后者检验一般性命题。

这种区分也使 SDE 的 S 显露不至于被成人解释取代。看见的动作属于观察材料，“他在研究声音”属于推断，“他具有某种稳定倾向”则需要更长历史。层次清楚之后，D 与 E 的分析才有基础；否则三方程只是把同一个未经检验的判断写三遍。

四、一次只改变足以学习的条件

为了了解活动，可以在安全和适宜范围内作很小的调整。例如保留杯子与姿势，只改变放置位置；或者保留位置，提供另一件同样适合当前活动的物品。这里的重点不是要求家庭进行严格实验，而是避免同时改变太多条件，以至于不知道孩子回应了什么。

成人若在一次活动中换玩具、换声音、换姿势、换目标，再把孩子的新反应归因于其中一项，就很容易误判。较小的改变使反馈更容易被理解，也给孩子保留熟悉关系。稳定在这里不是阻止新变化，而是为辨认变化提供可接续的背景。

不过，“一次只变一项”不是不可违背的临床规则。当孩子不适或存在安全问题时，必要调整应立即进行，不应为保持观察条件而延迟照护。家庭活动的目的首先是支持孩子，而非获取一份漂亮资料。研究设计也必须在伦理审查和适当专业条件下进行。

在 SDE 语言中，小调整提供一个可进入的 D，但其作用取决于 E 能否承接。新的位置可能打开探索，也可能超出孩子当前可行动范围。最终 S 怎样改变，需要观察，而不是由成人事先宣布。失败不必意味着孩子能力不足，也可能说明调整本身不合适。

五、等待，不是停止承担责任

成人给予等待，可能为婴儿保留发起行动的时间；但等待必须与观察相连。若成人已经看到孩子需要帮助，却把不介入当作培养独立的原则，便可能把自由变成放任反过来，若每次微小困难都被立即解决，孩子也难以形成自己的调整路径。

在构造的取物场景中，孩子正在改变手的位置，成人可以留出尝试空间；当物体明显不可及、孩子持续无法进入活动时，则可以调整环境或提供必要支持。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成人是否“心软”，而在于当前困难是否仍然构成可参与的探索。

这提示我们区分生产性困难与不可进入的障碍。前者允许孩子在支持条件下提出新的变化；后者可能只让失败重复，并没有真实选择。本书把这一划分作为观察问题不把它变成一张凭月龄即可使用的固定表。具体判断需要考虑身体状态、任务要求与反馈。

等待之后还要回看。孩子是否出现了新的动作？是否维持兴趣？是否需要改变支持？若成人只以“最终有没有完成”评价活动，就会漏掉路径中的学习。一个没有完成既定任务的尝试，也可能揭示孩子已经能够更清楚地请求帮助或改变策略。

六、六路径不是六套育儿动作

SDE 六路径提供从 S、D、E 进入问题的不同研究顺序，而不是给每个家庭规定六个操作步骤。[S05]在杯子的活动里，可以从显露进入：先注意孩子反复倒扣，再寻找变化序列与承重关系；也可以从差异进入：提供一个小变化，观察它怎样与既有组织结合并显露结果；还可以从纠缠进入：先理解姿势、物体和回应惯例，再安排适当变化。

每个进入点又可以先关注另两个维度中的不同一项。这样的排列帮助思考者避免只沿一条习惯路径解释问题，但不意味着真实生活只有六种轨迹。活动会循环、回退并行和中断；孩子的反馈也可能使原计划立即失去意义。

实践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没有记住六个缩写，而是始终从成人目标出发，却把目标当作婴儿已经显露的需要。六路径的价值，是允许我们更换入口：从孩子的实际动作重新看，从阻碍活动的关系重新看，从一个尚未尝试的安全差异重新看。

当某条路径不能带来新的可辨认判断时，没有必要为了理论完整硬套一遍。方法应帮助看清现场，而不是让现场成为术语的例句。对于家庭，能够据反馈修正一次误判，往往比准确说出路径名称更接近方法的实际价值。

七、三个不同活动，同一个发生原则

第一个构造场景是穿衣。成人需要完成必要照护，孩子不断转身。除了把转身当作抗拒，也可以检查活动是否过快、身体位置是否合适、孩子是否需要一个可辨认的

提示。在安全条件内，让孩子的动作影响次序，并不意味着取消成人责任，而是使必要活动成为可以参与的关系。

第二个场景是共同看书。孩子停留在一幅图上，成人急于翻到下一页。此时教育目标若只是看完，会与孩子正在形成的注意关系冲突。成人可以描述当前图像、等待孩子的指向，也可以在其兴趣转移时改变活动。书不是必须依序完成的测验，而是能够组织共同意义的对象。

第三个场景是收拾活动结束后的物品。较大的婴幼儿也许只能参与一个小动作，成人不必把全部任务压给他，也不必完全替代。一个可完成的参与位置，可以使孩子逐渐进入共同活动的结构。这里强调的是适宜参与，不是把家务表现当作道德评价。

三个场景的具体做法不同，共同点是让婴儿反馈进入组织。保护提供底线，稳定使活动可辨认，自由保留改变路径的机会。它们不是轮流出现的三个阶段，而是在同一事件中相互规定。

八、家庭记录的价值与限度

世界卫生组织及儿童发展支持材料强调回应式照护与早期学习机会。[N18][N25]本书提出的记录方式，是与这一方向对话的实践提案，并非另建一套替代专业评估的诊断工具。家庭只需要记录对实际支持有用的少量信息，不必把每一次哭泣、微笑和抓握都变成数据任务。

一份轻量记录可以包含四句话：今天看见什么；暂时怎样理解；尝试了什么合宜调整；下一次准备保留或改变什么。记录的重点是成人如何学习，而不是给孩子每日打分。若记录使照护者越来越紧张，或使互动不断被拍摄打断，就需要减少或停止。

同样，家庭不应为了资料完整而追求持续监控。影像中的孩子、照护者和其他家人都具有隐私利益。收集什么、保存多久、谁能够看、是否真正有必要，应当先于技术便利被考虑。最有价值的记录，可能只是一段帮助交接的准确描述，而不是整天的视频。

记录还应保留“没有看清”和“暂时不知道”。这不是照护失败，而是避免过度解释的能力。婴儿符号的历史比任何日志丰富，家庭不需要把全部生活写完，才有资格给予良好照护。

九、教育者也在发生

当成人从“我要教会什么”转向“这个孩子正在发生什么”，改变的不只是活动设计，也包括成人自身的知识结构。他可能发现原以为无用的重复具有可研究的次序原以为不配合的转身是在改变活动，原以为必须加强的刺激反而需要减少。孩子因此成为成人修订理解的参与者。

但这种共同发生不应被浪漫化为成人总能从每次互动获得成长。照护会疲惫，会误判，也需要他人的支持。一个可持续的教育系统，不能建立在每位家长永远耐心、永远观察准确的假设上。它应允许交接、求助、修复和休息。

本章提出的转向，最终不是把目标全部取消，而是让目标接受存在的检验。婴儿不是成人计划中的空位置，而是已经以独特方式参与世界的高阶符号。教育的工作，是在必要边界内帮助这个“我”获得更可进入、更可表达、更可继续的关系，而不是把他加工成一张事先画好的完成图。

42

第 42 章

保护、稳定、自由的三重互构工艺

返回目录

一、不是把三杯水调成一个比例

保护、稳定与自由不可分割，并不意味着把三者各取三分之一，就能得到理想养育。它们不是能够独立称量的材料。一次活动中的保护方式，会改变孩子能够获得的稳定与自由；孩子新的行动，又会使原先合适的保护不再足够，或变得过度。三者始终在互相规定。

因此，本章讨论的“工艺”，不是一套无须判断的操作程序，而是把关系调整做得更具体。成人需要知道自己在保护什么，稳定什么，又把什么行动可能交还给孩子若这些问题没有明确，一句“既要安全，又要自由”仍然只是正确而空泛的愿望。

这里的三重互构，也不能与 SDE 三方程或三原理一一对号。保护、稳定、自由属于本书分析照护关系的三个面向；S、D、E 则用于解释显露、变化序列和特征纠缠的互构。前者是需要研究的关系内容，后者是研究内容的一种方法框架。混同它们，会使所有三元结构都看起来相同，反而丢掉解释力。

二、保护首先要说明对象

“我是在保护孩子”可能指向不同对象：防止身体伤害，避免过度疲惫，维持必要支持，或保护一段正在形成的信任。也可能暗中指向成人自己的便利、面子与焦虑动机常常混合，不能只凭一句自我声明判断其作用。

在构造的地板游戏中，移开明显不适合婴儿接触的物品，是为安全提供条件；因为担心地面被弄乱而禁止所有移动，则需要与前者区分。两者都表现为限制，理由和后果却不同。研究不应把所有限制统一编码为保护，也不应把所有限制都看成压迫。

保护还涉及未来参与条件。某些边界限制了眼前动作，却为持续探索保留了可能；另一些边界则不断扩大，最后使孩子没有任何可尝试的空间。判断需要看限制是否与实际风险相称，是否存在更可参与的替代安排，以及是否在条件改变后重新评估。

这并不要求家长自行承担复杂的医学判断。涉及健康、特殊身体支持或发展担忧时，需要适当专业意见。SDE 分析的作用，是帮助分清活动中的关系与目标，而不是把所有风险转化成哲学上可以自由协商的事项。

三、稳定不是要求孩子永远重复昨天

稳定的积极作用，是使某些关系可以被辨认和预期。熟悉的人、可接续的活动次序、可靠的必要支持，能够构成下一次变化的基础。但若稳定被理解为一切必须保持不变，孩子新出现的能力和需要便只能以“破坏规律”的形式被看见。

在作者构造的游戏中，孩子过去只能等待成人把物体递到手边，现在开始主动改变位置。如果成人坚持原来的递交程序，曾经有效的稳定就可能限制新的参与。相反保留熟悉的开场与回应，同时允许孩子改变取物路径，能够使稳定与变化同时存在。

因此，需要区分关系稳定与形式固定。关系稳定可以表现为成人持续关注反馈，即使具体动作改变；形式固定则可能在孩子已经不适时仍然照旧执行。两者表面上都具有重复，实际组织不同。

符号稳定性也应这样理解。它不是所有特征永久冻结，而是在适当范围内保持可辨认的组织，并能够在新条件中调整。[S01]研究中若只追求重复成功率，可能把僵化误认为成熟；还应观察孩子面对合理变化时是否仍有可进入的路径。

四、自由是可实际进入的可能

给婴儿十种物品，不一定比给两种物品提供更多自由。若材料超出其可接近范围，或成人不允许改变活动，选择数量只是表面丰富。自由首先涉及孩子能否进入、维持发起和改变活动，而不是成人摆出了多少选项。

同样，撤去帮助也不自动增加自由。对需要特定支持的孩子，必要支撑可能正是行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把支持取消后留下的空白称为独立，会混淆自由与孤立。需要逐项区分：哪些帮助构成可及基础，哪些临时提示可以随着能力变化适度调整。

在本书的框架中，婴儿自由还包含能够以适合其能力的方式影响互动后续。例如转头使成人暂停，伸手使物体被放到更可及的位置，新的动作使游戏改变。这里并不要求婴儿拥有成熟选择概念，而是承认他已经可以参与差异的发生。

成人仍需决定许多必要事项。自由不是把不具备判断能力的风险交给孩子，而是在成人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真实参与。保护与自由因此并非天然零和；适宜保护可以扩大自由，失去边界的所谓自由也可能破坏后续参与。

五、先建立可行范围，再讨论怎样选择

可以用一个有限的形式化思路帮助理解。设一次活动的可选安排为 u，孩子当前状态、必要支持与环境条件组成观察背景 x。先根据适当专业要求和家庭实际条件，确定可接受安排的集合 A(x)；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比较不同安排怎样支持参与和连续性。

这里的 A(x)不是一张由本书给出的医学清单，也不是声称安全可以被一个公式完全计算。它表达一个顺序：不能为了提高探索指标，把明显不适宜的安排纳入优化；也不能把所有不确定性一概排除，最后只剩下完全替代孩子行动的选择。

在可行范围内，成人可以选择一个较小、可撤回的调整，观察孩子反馈，再决定是否保留。可撤回意味着若不适合，可以回到已知较稳妥的安排，而不是让一次尝试变成不可逆的承诺。对于研究，这种可逆性还需要明确的停止条件和伦理保障。

这样的形式化只用于澄清决策结构，不构成已验证算法。它不能替代照护经验，也不能把孩子的价值压缩成一个收益函数。它提醒我们，底线、目标和手段应有不同地位，而不是把安全损失与多一次动作简单加减。

六、学步场景里的三个不同问题

想象一个已经进入尝试移动阶段的孩子，在适宜环境中向熟悉照护者靠近。成人可以准备提供必要支持，同时让孩子自己组织动作。这个说明性场景中，保护涉及环境与身体安全，稳定涉及可辨认的关系和活动条件，自由涉及孩子能够选择、尝试和调整的部分。

如果孩子迟迟没有迈步，可能的问题并不只有“胆量不足”。活动距离、疲倦、兴趣、身体条件或成人的安排，都可能相关。把所有迟疑解释为心理不独立，便会忽

视具体的可行动条件。适当发展评估与实际观察应当共同参与，而不是以理论标签代替。

假如成人稍微改变位置，孩子开始尝试，也不能立即得出“减少保护促进成长”的结论。位置改变可能使目标更可及，也可能改变注意与动作组织。研究需要说明哪条关系改变，而非把所有积极结果归给自由，把所有困难归给保护。

这个例子显示三者的非对称性：某一时刻，必要保护可能占据决策优先位置；另一时刻，过多代替操作可能成为主要限制。不可分割不意味着每个时刻作用等量。我们追踪的是关系怎样转换，而不是寻找永久最佳配方。

七、日常转换中的小型修复

三重互构不仅发生在学习新动作时，也发生在结束活动、换场景和更换照护者时。一个孩子正专注于对象，成人突然抱走，他可能出现强烈反应。这里需要完成的生活安排也许是必要的，但活动转换仍可以有不同组织方式。

在一个构造的例子里，成人先提供可辨认的提示，允许一个短暂的收束动作，再进入下一项活动。若孩子仍难以适应，成人继续观察原因，而不是把一次提示当成万能技巧。保护不变，转换的稳定性与参与空间却可以被重新设计。

所谓修复，也不是每次都要立刻消除所有不悦。孩子可能对必要结束感到不满，成人仍需承担边界；关键是边界是否可理解、回应是否持续、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强制不能用“孩子最后没哭”作为唯一成功标准，因为安静可能来自不同过程。

修复使稳定具有时间厚度。关系不必从未出现失配，才值得信任；重要的是失配之后能否重新承接活动。这个命题在本书中属于待研究的组织假说，不能被扩张成任何反复伤害都能靠事后安抚抵消。

八、辅助支持怎样同时保护与开放

对具有感觉或运动差异的婴儿，三重互构尤其容易被误解为二选一：要么保持严密保护，要么为了自主而撤去支持。更有价值的问题是，怎样通过适宜支持改变活动的可及性，使孩子拥有更多实际参与，而不是只在成人帮助下完成一个外观相同的动作。

例如，构造场景中的某项物体活动，可以通过调整物品位置、沟通方式或必要支撑来重新组织。具体方案须与专业评估及孩子反馈相配合。本书不指定设备或姿势，而强调支持的评价标准：它是否让孩子更能够发起、维持或改变活动，是否增加了对反馈的可见性。

若某种支持让成人更容易控制孩子，却没有扩大孩子的参与，就需要重新评价其目标；若某种支持对安全和接入必不可少，则不能为了证明符号独立性而撤除。必要支持与临时提示的区别，是研究与实践共同的伦理边界。

这里也不应预设所有支持都必须最终消失。某些工具和关系可以长期构成个体自由的条件。高阶符号的独立，不是从关系中逃离，而是在真实可用的关系中形成能够持续调用与修订的组织。

九、什么证据能说明三者在互相促进

若成人说“保护使孩子更敢探索”，研究应当进一步问：保护如何被记录，探索如何定义，是否存在其他同时变化的条件。不能仅凭一次成功就确立因果，更不能通过撤除必要保护制造危险对照。

可以在本来就安全可行的安排之间，观察不同支持方式与活动结果的关系。例如比较成人直接代替操作与保留孩子发起空间的两种适宜做法，记录后续参与、调整和跨场景调用。研究仍需考虑身体成熟、既往经验、顺序效应和照护者差异。

三者互构的一个可检验方向是：某项支持的作用是否依赖稳定关系与实际行动机会。若同样的支持只在某些组织中有效，便提示不能把它看成独立输入。但这仍不是 SDE 独有证据，发展动力系统与其他关系模型也可能提出相似预测。需要进一步比较模型的约束和新增解释。

负面结果同样重要。如果增加某项自认为保护的安排后，孩子可参与的活动减少，而安全并未获得相应改善，就应检讨安排；如果增加变化只造成混乱，没有形成可调用组织，也不能把它包装成自由。理论必须允许实际反馈否定成人的良好意图。

十、照护者不能成为被遗漏的第四个条件

保护、稳定与自由的维持需要成人投入。若一套方案要求照护者始终高度注意、永不疲倦、随时作出精细判断，它就可能在真实生活里无法持续。对孩子有益的安排也需要考虑执行者的能力、休息和可获得支持。

这不是用成人便利取代婴儿需要，而是承认照护本身处于更大的主客互动系统。一个持续耗尽的照护者，可能需要交接与帮助，而不是再被要求增加一种精巧技巧。家庭和机构都应检查方案的成本由谁承担，以及成本是否被公平看见。

可以把实践评价分成两条并行线：孩子是否获得实际支持，照护安排是否可持续。两条线不能简单互相抵消，但需要共同讨论。若某项方案有效却无法维持，应寻找替代支持，而不是责备家庭不够爱；若方案方便却不断压缩孩子参与，也应调整。

三重互构工艺因此不是家长个人的完美主义工程。它是一种能够被讨论、接续和修订的共同实践。婴儿以自己的反馈参与，成人承担更大的判断与保护责任，社会条件则需要为这种责任提供现实空间。

十一、好的边界会随着发生而改变

> 一个好的边界，不仅在当下阻止不适宜活动，也应当允许条件改变后重新判断。孩子的身体、能力、兴趣和关系经验都在发展，昨日必要的限制可能需要调整，昨日足够的支持也可能需要增加。边界的正当性来自具体作用，而非设立之后永不变动。

因此，实践可以定期回到三个问题：我们仍在保护同一个真实需要吗？目前的稳定是否帮助孩子进入新活动？所谓自由是否已经成为可实际使用的可能？这些问题不要求频繁推翻全部安排，而是让已有秩序保持对差异开放。

保护、稳定、自由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这一命题的力量，不在于同时赞美三个好词，而在于迫使我们研究每一次具体组织。婴儿符号的积极发生，不是从保护走向无保护，从稳定走向无规律，而是在更适宜的关系中获得新的参与能力，并使关系本身随之改变。

43

第 43 章

亲情不是单一输入：回应式照护的操作

返回目录

一、同一句“我很爱他”，背后有不同生活

照护者说自己非常爱孩子，这句话可以真实而重要；但研究婴儿的经历，还需要看爱通过什么进入生活。一次抱起是否承接了当前需要，一次陪伴是否允许孩子改变活动，一次限制是否有合适理由，不能单由情感强度推导。爱作为动机、爱作为行动婴儿实际经历的关系，以及后来的发展结果，应当分别描述。

回应式照护为这种区分提供了实践入口。相关国际指导强调注意儿童信号并作出适宜回应。[N18][N25]本书在此基础上追问：回应如何成为能够继续学习的循环，而不是一套成人执行完就算完成的动作？婴儿的反馈又如何真正改变下一次安排？

本章不提供哭声翻译表，也不把某种固定程序称作对所有家庭有效。它提出的是一个可修订的观察与行动方法。方法的目标，是增加双方相互理解与参与的机会，不是让家长以为每一次不适都必须立即被自己准确解释。

二、信号不是装好意义的包裹

婴儿的转头、发声、动作和表情，为照护者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它们不总是对应唯一原因。相似动作可能出现在不同状态，同一需要也可能以不同方式显露。若把线索当作已解码的语言，成人容易过早停止观察。

例如，作者构造的场景中，孩子在活动中转头。成人可以先考虑是否需要休息，也可以检查是否有别的对象吸引注意、姿势是否合适、活动是否过强。提出多个可能不是让照护变得犹豫不决，而是避免把“他故意不理人”这样的评价提前塞进事实。

回应不必等待全部原因完全确定。成人可以先采取安全、合宜、可调整的行动，同时继续观察。如果出现健康或发展方面的担忧，应及时寻求适当专业支持，而不是反复用家庭试探替代评估。本书的方法不能把不确定性变成延迟必要照护的理由。

这里的关键是把解释保持为解释。成人可以说“我猜他需要降低活动强度”，而不是“我已经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前者为反馈保留入口，后者则可能把一次状态固定成人格。

三、看、猜、做、再看：一个开放循环

“看”是尽量描述当前实际发生；“猜”是提出暂时解释；“做”是选择合宜回应；“再看”是允许婴儿的变化修订前面的判断。这四个词是本书为家庭实践提出的简明工作语，不是 SDE 六路径的另一个名称，也不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独立疗法。

它的最重要部分，往往是最后一个“再看”。没有再看，成人会把自己的行动当作答案：抱了就是安抚，讲了就是教育，放手了就是自由。再看则要求检查这些行动在这个孩子身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是否需要改变。

在构造的游戏场景中，孩子连续发声，成人猜测他希望继续，便增加了动作；孩子随后转开并收回手，成人就需要考虑原猜测是否不完整。或许孩子是在对刚才的变化作出反应，而不是邀请更强刺激。一次修订并不否定成人的关心，它使关心获得更具体的形式。

循环也可能停下来。孩子需要休息，照护者需要交接，或当前问题需要专业帮助，都可以使观察转入其他安排。开放循环不是要求永不停止分析，而是让停止本身也有清楚依据。

四、把回应分成接住、调整与交还

为了分析一次活动，本书进一步区分三个动作关系。接住，是承认孩子的变化已经进入成人注意；调整，是对活动或环境作适宜改变；交还，是在可能范围内让孩子继续影响后续，而不是由成人永久接管。这三者可以交错，并非固定三步。

比如孩子伸向一个物体，成人先注意到这个方向，再把物体放到适合当前活动的位置，随后等待孩子如何接近。这里成人没有完全退出，也没有替孩子完成全部动作

若孩子不再感兴趣，活动可以改变；若仍需支持，成人继续提供。交还指向参与，不等于撤除必要帮助。

在另一个构造场景中，孩子因活动转换出现不满，成人可以接住其情绪表达，同时保持必要边界，并在下一项活动中保留可选择的部分。接住不意味着所有要求都必须被满足；调整也不意味着成人放弃责任。回应与边界可以共同成立。

这一分析帮助我们识别一种常见失配：成人能够及时接住，也愿意努力调整，却没有交还。每次都由成人决定最终路径，婴儿只能接受越来越精巧的安排。高质量回应需要关注这个孩子是否仍然拥有能够改变活动的实际位置。

五、一周记录，不是七天训练计划

为了使方法具体，本书构造一个七天观察示例。它不是已经实施的研究，也不要求家庭照表执行。每天只选一段原本就会发生的短活动，记录最有用的一处变化；若没有必要，完全可以不记录。

第一天只写事实，练习把“任性”“懒”“不专心”暂时拿掉。第二天为同一类事件写出两个可能解释。第三天观察自己在孩子反馈之前是否习惯性接管。第四天尝试一个安全且很小的调整。第五天记录未按预期发展的结果。第六天与另一位照护者交流各自看见的差异。第七天决定哪些安排值得保留，哪些判断需要撤回。

这个示例把学习任务主要放在成人身上，而不是要求婴儿每天进步。记录中可以出现“今天没有找到合适解释”，也可以出现“原来不需要改变”。如果一套日志只能接受积极结果，它就不是学习工具，而是自我证明的仪式。

也不必为了完成七天而维持一个不合适活动。孩子的安全、舒适与必要生活安排始终优先。家庭记录应当减轻误判，而非增加负担；当记录开始占据相处本身，就需要缩减。

六、误判之后，怎样恢复关系

照护者不可能每次都准确。误判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有益，而在于成人能否在发现不适配后调整。若孩子反应与预期不同，成人首先可以停止为原解释辩护，重新检查当前条件；必要时寻求另一位照护者或专业人员的帮助。

例如，成人把孩子的发声理解为邀请，持续增加游戏强度，后来发现孩子已转开。修订可以很具体：降低强度，恢复较熟悉的活动，观察是否需要结束。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扩张成“我不会带孩子”的总体评价，也不应反过来责备孩子表达不清。

关系修复并不需要婴儿理解成人完整的道歉叙事。对尚不能理解复杂语言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后续活动是否真正改变，回应是否重新适宜。语言可以参与，但不能以一句温柔的话替代实际调整。

同时，本书不把修复概念用于淡化严重或持续伤害。反复出现的危险、忽视或暴力需要适当保护和干预，不能用“关系总有失配”加以正常化。共同发生的理论不能成为成人免责的修辞。

七、回应的质量不是速度竞赛

及时性重要，却不能被简化成越快越好。孩子正在安全地尝试时，成人立即替代，可能取消新动作；孩子有明确需要时，成人长期等待，又可能没有提供必要支持。回应需要与事件性质相配，而非服从统一反应时标准。

本书建议观察三个时间关系：成人是否留给孩子表达与尝试的空间；必要回应是否实际到达；新的反馈出现后，成人是否继续更新。它们比单一平均延迟更能说明关系组织，但仍需在研究中建立可靠编码。

还应注意，照护者可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一次没有立刻回应，不足以定义其全部关爱；长期无法获得可靠回应，也不能被一段偶尔热情的活动抵消。评估需要适当时间尺度，并理解实际资源条件。

对家庭来说，追求完美同步容易制造不必要的警觉。更可持续的目标，是让重要需要能够被接住，让日常活动有修订空间，让照护者在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回应式照护不是永不分心的人格考试。

八、多人照护时，反馈怎样被保存

当孩子由多位成人照护时，一次有效调整如果只停留在某个人的记忆里，可能无法进入下一次活动。但保存经验也不等于把它变成永远适用的规则。可以传递“今天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安排似乎有帮助”，而不是“他只接受这一种方式”。

这样的交接保留了条件、效果与不确定性。下一位照护者可以据此开始观察，又不必机械复制。孩子状态改变时，旧经验仍能被重新评估。符号的稳定与开放，在照护者之间获得实际表达。

对于某些必要安全与健康信息，交接应当准确清楚，不能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为由模糊。对于游戏节奏、喜好和暂时有效的安抚，则应允许差异与更新。不同信息需要不同稳定程度，不能放在同一张不加区分的清单里。

这使照护知识成为共同可修订的资产，而不是某个人维持权威的秘密。婴儿的反馈通过记录、交流与实践继续回写网络，成人也可以在其中互相学习，而非争夺谁最懂孩子。

九、照护者自己的状态也需要回应

回应式照护不能只要求成人不断识别婴儿，却不允许成人承认疲惫、困惑和需要休息。一个可持续系统，应当让照护者有机会求助、交接和恢复。亲情的强度不能替代睡眠、资源与必要支持。[N18]

这也要求改变评价语气。面对困难，不应立即推断家长缺少爱或方法不对。可以先问哪些活动最难维持，哪些支持尚未获得，家庭分工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需要专业协助的问题。把全部责任压回一个人，可能使他更难如实报告。

婴儿可以改变成人的行为，却不能成为成人情绪稳定的责任承担者。不能要求孩子为了证明关系良好而少哭、配合或安慰父母。共同发生存在真实双向影响，责任却保持不对称：成人和社会需要承担更大的保护义务。

因此，本章方法的终点不是一位无所不知的家长，而是一个能够继续学习的照护关系。爱不再被看作从成人流向婴儿的固定输入；它通过接住、调整、交还和修复，随着这个独特孩子的发生而改变自身形式。

44

第 44 章

评估婴儿，不应把婴儿缩成分数

返回目录

一、一个分数回答了什么

评估能够帮助发现需要支持的儿童，也能够帮助家庭理解下一步。但一个结果总是在某种工具、条件和目的下产生。它可以回答特定问题，却不因此成为婴儿全部存在的缩影。把分数看得过轻，可能错过必要支持；把分数看得过重，又可能让一个暂时结果变成终身身份。

设想两个作者构造的孩子，在同一项活动中都完成了三次取物。一个依赖成人连续提示，另一个能主动开始却在更换物体后停下。若只看次数，二者相同；若研究支持条件和跨情境变化，差别便出现。次数没有错误，只是它没有回答全部问题。

婴儿符号发生学并不反对测量。相反，它要求更准确地说明测量对象：测的是某次表现、某类能力、活动机会，还是更长时期的关系组织？当问题不同，指标就不能被随意互换。一个有用的数字，需要知道自己没有包含什么。

二、监测、筛查与进一步评估

CDC 的公开指导区分日常发展监测与使用规范工具的发展筛查，并指出发现担忧后可能需要进一步评估与支持。里程碑记录可以帮助沟通，但不是诊断本身。[G03]本书沿用这一基本区分，不把 SDE 观察表包装成新的临床筛查工具。

日常监测关注孩子怎样玩、学习、交流和行动，家庭与照护者都可以提供重要信息；规范筛查则需要适用工具与相应训练；进一步专业评估还要综合更具体的资料。三者能够合作，但不是同一项工作。一个家长记录到某种变化，并不因此需要自行作出诊断。

尊重独特性不能成为拒绝筛查的理由。每个孩子路径不同，与某些困难值得及时关注，可以同时成立。若把所有担忧都解释成独特发生，理论反而可能妨碍孩子获得支持。另一方面，筛查提示风险，也不等于已经为孩子的未来写好结局。

因此，SDE 在这里承担补充任务：帮助描述具体活动及历史，使支持更接近这个孩子；它不取消经过验证的专业工具，也不越权替代诊断。哲学尊重与医学支持没有必要被摆成对立选项。

三、表现、机会与支持应当同时记录

一次活动没有完成，可能与能力有关，也可能与孩子没有获得适当接入有关。物体不在可及位置、沟通方式不适合、活动发生在疲倦时，都会改变可观察表现。研究需要区分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没有进入活动，以及暂时没有表现出来。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低表现都能用环境解释。身体条件和发展困难是真实的，不能为了维护理论而淡化。更合理的做法是同时记录相关条件，再判断哪些解释得到支持把所有问题归给孩子，与把所有问题归给环境，是对称的简化。

支持的类型也需要清楚。必要的感官或身体接入，不应被计作孩子“不够独立”的扣分项；成人替代完成关键动作，则应与孩子自主组织区分。否则，同一个“帮助过”标签会把完全不同的关系混在一起。

本书建议每项重要表现至少附上一个条件说明：在什么活动里、有哪些支持、由谁发起、能否在适当变化后继续。不是每次都要填写复杂表格，而是在解释结果时不把这些条件删除。数字之外的几句话，可能决定支持方案是否适宜。

四、纵向变化比一次排名更接近发生

发生具有历史性，因此单次评估需要放回时间。一个孩子今天完成某项活动，不说明他在所有情境中都能完成；今天没有完成，也不必然意味着此前建立的组织已经消失。状态波动、任务变化和观察误差都需要考虑。

纵向记录的价值，是帮助区分短暂变化与较稳定趋势。但记录更多次也不自动产生可靠结论。若每次材料、提示和编码都改变，曲线可能主要反映测量变化；若只保留表现最好的一次，又会制造虚假的连续进步。

因此，研究可以保留一部分可比较条件，同时记录合理的情境变动。某些项目用于观察同类活动是否稳定，另一些用于观察新条件下如何调整。稳定性与适应性分开记录，能够避免把重复成功误当成全部发展。

同样，不应把一条平缓曲线解释为没有发生。某个孩子可能在表现次数不变时，减少了不必要提示，增加了主动发起，或更清楚地表达停止。是否具有发展意义，需要联系具体目标，而不是只看总分向上多少。

五、同一指标，在不同关系中可能不同义

一个常见例子是目光。研究者可能记录孩子看成人的次数，但这些目光可能承担不同功能：寻求帮助、分享对象、检查反应，或只是被声音吸引。次数相同并不保证功能相同，次数不同也不必然表示关系能力的高低。

文化与感觉条件使这个问题更复杂。某些照护形式更多通过身体接近实现，某些孩子需要可及的视觉、触觉或其他沟通方式。若工具把某一形式当作唯一入口，比较便可能失去公平性。第三十八章的讨论说明了为什么需要检查通道与功能，而不只是套用熟悉形式。[R09]

但公平也不能通过随意更改标准来获得。若改变了工具的材料或施测方式，就应说明哪些原有解释仍适用，哪些不再能够直接比较。为了照顾差异而悄悄改动，却继续使用原来的常模，可能制造新的误导。

本书的立场是双重透明：既透明呈现工具对谁、在何种条件下适用，也透明呈现为可及性作了什么调整。必要时保留定性描述，不强求一个看似统一却失去含义的分数。

六、三项符号条件不是三张人格量表

整体性、稳定性与独立性，是 SDE 符号发生学的理论规定。[S01]要将它们用于研究，需要把对象限定到具体活动组织，而不是直接给整个婴儿打三个分数。一个孩子在某类活动中表现出较稳定的跨情境调用，不意味着他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具有同等组织。

整体性可以通过不同要素是否共同组织活动来研究，但不能仅凭变量相关便宣布成立；稳定性需要说明在多长时间、哪些条件下重复；独立性则需要区分对某个偶然提示的依赖与对必要支持的依赖。三个维度都包含边界。

如果最终把它们合成一个“婴儿符号指数”，就必须额外说明权重、信度、效度、适用范围与可能误用。当前本书没有提供这样的验证，因此不发布综合指数，也不把家庭观察表称作标准测量。概念新颖不构成量表合法性的替代物。

更稳妥的用途，是作为研究问题清单：哪些关系承担组织作用，哪些表现能够接续，哪些改变仍可进入。它帮助扩大观察，而不是为一个孩子增加新的抽象标签。

七、把能力描述写成可行动的支持说明

一份评估若只说“表现较弱”，家庭往往仍不知道下一步。可行动描述需要把活动、条件与支持连接起来。例如，在作者构造的说明中，可以写“在熟悉物体和适当位置下能够主动接近，换物体后需要更多观察时间”，而不是直接写“缺乏探索精神”。

这样的描述没有否认困难，却保留了可以调整的入口。支持者可以检查新物体是否可辨认、活动转换是否过快、必要沟通是否充分。也可以在专业指导下进一步评估身体或感觉条件，而不把所有变化都归结为动机。

描述还应说明已有能力。若只记录未完成项目，孩子就容易在成人眼中成为一组缺口；若只记录优势，又可能掩盖需要支持的部分。完整并不等于面面俱到，而是同时呈现实际可用的关系与当前阻碍。

最重要的是，支持说明应当允许更新。一个曾经需要较多提示的活动，在新的条件下可能变化；一个暂时有效的方法，也可能不再适合。档案应保留修订日期和适用情境，而不是让早期判断永远跟随孩子。

八、评估结果会回到生活中

评估不是在生活之外完成的中性描述。它可能改变成人的期待、服务接入、活动安排和对孩子行为的解释。因此，研究者需要关注评估的回写效应：一项判断被怎样理解，又怎样改变了后续关系。

若成人听到“发展较慢”便停止提供探索机会，判断可能参与制造新的限制；若同一信息帮助家庭获得适宜支持，便可能打开活动。标签本身不决定全部结果，制度和实践怎样接住它同样重要。这也是第二十九章关于命名回写的具体延伸。

沟通时可以把结果、限制和下一步分开。说明当前资料支持什么，不能支持什么，哪些地方需要复查，现阶段可以如何寻求帮助。避免用一个过度确定的总体形容词代替复杂解释，也避免用模糊安慰让家庭失去行动方向。

儿童的尊严不应随评估结果升降。一个工具发现困难，意味着需要更合适的支持，而不是发现了一个较低价值的人。SDE 的存在论立场，在这里转成非常具体的表达责任。

九、怎样评价评估本身

我们还需要反过来问：这项评估是否真的改善了支持？它是否帮助识别重要问题，减少误解，提供可执行的下一步？是否给家庭造成不必要负担，或把本来可以通过环境调整解决的困难固定成人格缺陷？这些是评估工作的后续质量问题。

在研究中，可以比较不同报告方式如何影响成人理解与活动安排，但不能为了检验标签效应而向家庭提供虚假或伤害性结论。所有信息需要真实、适当，并在必要专业监督下使用。方法上的兴趣不能超越儿童与家庭的保护要求。

评估还应接受工具层面的审查：观察者是否一致，重复测量是否可靠，样本是否覆盖目标人群，预测是否在新家庭中成立。一个在熟悉样本中表现漂亮的指标，不必然适合另一种语言、文化或身体条件。

最终，评估婴儿的目的，是让这个具体孩子获得更清楚的理解与更适宜的支持。分数可以成为工具，却不能成为存在的替身。我们需要看见发展中的困难，也需要看见困难之外仍在发生的独特“我”。

45

第 45 章

AI 和辅助技术：新的符号环境与边界

返回目录

一、一个屏幕上的判断怎样进入婴儿的生活

下面是一段作者构造的照护场景。夜里，父亲把婴儿的一段哭声交给一个应用程序分析。程序显示“可能困倦”，父亲于是准备按过去的方式安抚。母亲却注意到孩子的姿势与平时不同，决定先重新观察身体状况。程序给出的几个字并没有直接接触婴儿，却已经进入家庭的注意分配：什么被先看见，什么被暂时忽略，谁的观察获得优先，下一步准备做什么，都可能因此改变。

这正是技术进入婴儿符号发生的第一道门。它不必成为婴儿能够认识的对象，也能够通过照护者的判断，改变婴儿实际参与的互动。研究者如果只问“婴儿看了多长时间屏幕”，就可能漏掉另一条更隐蔽的路径：婴儿没有看屏幕，成人却开始通过屏幕上的分类看婴儿。

从 SDE 环境论说，应用程序的设计、数据分类、输出显示和成人使用方式，只有在与当前照护活动具有具体联系并产生影响时，才进入相关环境 SIO。不能因为一项技术存在于社会上，就把它抽象地列为每个婴儿的环境因素；同样，也不能因为孩子没有亲自操作，就认定它与孩子无关。需要追踪的，是判断如何经过可识别的路径进入行动。

本章不对某个产品作有效性背书，也不提供自动诊断办法。它要建立的是一种判断纪律：技术可以帮助成人记录和组织信息，但关于这个婴儿的结论，必须继续接受这个婴儿实际显露的检验。

二、三个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效性层次

一项识别技术能否分辨音频中的某种模式，是第一个问题；成人依据输出作出的判断是否更恰当，是第二个问题；改变后的照护是否真正改善了婴儿的生活，是第三个问题。这三个层次相关，却不是同一个研究终点。

即使算法在某个数据集上表现良好，也不能直接推出它能够理解家庭中的全部情境。测试数据怎样采集，包含哪些年龄、语言、身体条件与设备噪声，都会限定结果的适用范围。更重要的是，分类所指向的标签本身可能来自成人判断，而不是对婴儿体验的直接读取。模型学会重现标签，不能因此被描述为“终于听懂了婴儿内心”。

再设想一个条件性例子。某项提醒帮助照护者更规律地记录观察，但提醒过于频繁，使成人每次都中断正在进行的游戏。记录质量可能提高，共同活动却可能变碎。反过来，一项功能未增加任何发展评分，只减少了交接时反复核对信息的负担，让照护者更容易保持注意，也可能具有实际价值。这些都是需要比较的假设，不能只根据技术是否先进作判断。

因此，评估至少应同时保留工具表现、成人决策和婴儿经历三个窗口。不能把点击率、使用时长、预测准确率或家长满意度单独当作婴儿发展的替代指标。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大型多模态模型用于健康的治理讨论也提醒人们注意错误输出、偏差与自动化偏见；这些风险并不因使用者怀有善意而消失。[G15]

三、辅助技术可以改变可参与的世界

与记录和分析工具不同，有些技术直接参与婴儿的感觉与行动条件。适当的姿势支持、交流材料、听觉或视觉相关辅助，以及为特定需要设计的接触方式，都可能改变一项活动是否可进入、可维持、可调整。具体选择与使用须结合专业评估，而不是依据一般哲学结论决定。

这里应延续前面关于独立性的区分：必要支持不等于临时提示。一名儿童借助适合的工具参与活动，并不因此失去活动中的主动性。相反，工具可能使他的选择第一次能够影响互动后续。如果成人把“不用工具”当成唯一成功标准，就可能以独立之名，重新关闭刚刚打开的参与通道。

WHO 与 UNICEF 的辅助技术报告把可获得适宜辅助技术作为扩大参与的重要议题。[G11]本书在此进一步提出一个分析问题：辅助究竟只帮助完成了同一个外在结果，还

是改变了儿童能够提出差异、影响他人和重新组织活动的方式？两种作用都可能有价值，但必须分别观察。

假设一名儿童在合适的支撑下能够更稳定地触碰玩具。第一次变化是动作较容易完成；进一步的变化可能是，他开始自己选择触碰哪个部分，照护者不再每次代为决定，游戏的往复因此重新分配。此时，技术的作用不能只用“成功触碰次数增加”概括，它还可能改变婴儿与成人之间的行动关系。不过，这些后续变化仍是待观察的结果，不能从工具的设计目的直接推定。

四、从数据到照护的每一步都要能够回查

一种负责任的技术流程，应当保留从原始情境到最终行动之间的连接。成人先记录看到了什么，系统可以帮助整理时间、寻找重复情境或提醒缺失信息；成人再根据孩子当时的状态决定是否采取行动；行动以后继续观察。模型输出不应悄悄取代原始记录，也不应让“推测”在多次转述中变成“事实”。

例如，“十五点十分转头两次”是一个观察描述；“可能不想继续”是解释；“今天不喜欢所有声音活动”则是更大的概括。如果软件把三者存入同一栏，后来的照护者便很难知道结论从哪里来。技术看似增加了信息量，却降低了信息的可辨别性。

本书主张把时间、情境、观察、解释、行动和反馈分开保存，并允许纠正。系统对某次记录的归类被成人否定以后，原来的标签应能被撤回或标为不确定，不能继续在后台影响后续画像。这个要求不仅属于数据管理，也属于婴儿符号发生：错误表征一旦反复进入照护，就可能真实地改变婴儿遇到的世界。

对研究者而言，还应记录技术在什么时候被使用、什么时候被忽略、谁有权改写输出。否则，“使用 AI 的家庭”只是一个粗糙类别，无法说明技术如何发生作用。真正的单位仍是具体 SIO，而不是产品名称。

五、不能替尚未说话的孩子制造一种确定的声音

成人容易被拟人化输出吸引。一个程序写道：“宝宝在说，妈妈你不够关心我。”这句话可能非常打动人，却把系统的推断伪装成婴儿本人的表达。即使其目的在于促进照护，也跨过了一条重要界限：不会说话不意味着别人可以无限代言。

婴儿当然能够通过身体、声音、表情和活动参与关系。本书从来不把语言能力作为主体地位的门槛。但承认这些表达有意义，不等于允许系统为每一个信号指定完整

的心理叙事。“观察到的转头”与“他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之间，存在需要证据填补的距离。

一种更克制的输出可以提示成人复查情境、考虑其他解释、注意持续异常应寻求专业支持，而不是宣布已经知道婴儿的全部需要。技术在这里最有价值的能力，可能不是替人给出最后答案，而是帮助人保留尚未弄清的问题。

由此也可以理解，所谓“人类在回路中”不能只是界面上增加一个确认按钮。如果成人没有时间查看依据，无法修改结论，或担心不接受系统建议就要承担额外责任那么形式上的确认仍可能是被动服从。真正的判断权包括理解依据、提出异议、暂缓决定和改变方案的实际条件。

六、婴儿没有同意能力，不等于数据可以无限收集

日常照护资料可能包含影像、哭声、健康信息、居住空间、家庭作息，以及其他照护者的谈话。为了研究婴儿而记录，也可能同时记录了母亲、父亲、祖辈、兄姐和有偿照护者的私生活。不能把“为了孩子好”当成消除所有边界的理由。

UNICEF 于 2025 年发布的儿童与 AI 指导第三版强调儿童权利、安全、隐私、公平与问责等要求。[G14]在本书的实践框架中，这意味着先问清楚：完成当前任务真正需要什么，哪些内容无需采集，哪些人能够看到，保存多久，如何删除，错误怎样纠正这里提出的是设计与伦理原则，不替代特定地区的法律判断。

持续记录也可能改变被记录的生活。成人知道每一次互动都将评分，可能更关注“看起来是否像好父母”，而不是孩子当下的变化；有偿照护者若没有表达异议的机会，记录则可能成为单向监控。这样的反作用需要进入评估，而不是被当成数据之外的杂音。

特别应避免把短期观察变成永久身份。例如，一次系统推断的“低互动倾向”，不应未经验证就成为随孩子迁移的标签。婴儿正在发生，信息系统却可能把过去的一次分类冻结为未来的通行证或障碍。保留修订、删除和情境说明，不是对知识的损害而是对发展时间性的尊重。

七、节省下来的时间有没有回到关系中

技术常以“减轻父母负担”作为目标。这个目标值得认真对待，因为照护者的时间、休息与支持条件，确实构成婴儿活动得以持续的现实条件。但节省时间是过程指标，时间后来去了哪里，仍需观察。

如果工具减少重复填表，却增加更多通知、比较和绩效要求，家庭的总负担未必下降。如果它使不同照护者更容易交接，减少误解，并保留孩子当下偏好可以改变安排的余地，那么它可能改善共同照护。两种情况都不能只从软件功能表判断。

本书提出“判断回到孩子”的原则：技术组织信息以后，最终要帮助成人重新看见眼前这个具体婴儿，而不是使他更快地被归入系统已有的类别。这里的“回到”不是拒绝专业知识和群体证据，而是让一般知识在个体情境中接受检验、调整和限制。

对于 AI 自动生成的活动建议，也应如此。一个建议无论措辞多么温柔，只有在材料安全、身体条件适宜、照护资源允许、婴儿能够参与的情况下，才具有实际意义。活动没有发生，不能首先归责于父母执行不力；还要检查建议是否误判了生活条件。

八、技术应成为可修订的关系，而不是新的权威中心

从三方程看，技术提供的分类和建议可以进入 S 显露，也可以改变 D 的推进顺序，并通过成人行动重组 E 中的部分关系。但这不意味着算法已经成为所有发生的中心。婴儿的身体状况、照护者的观察、材料的限制和专业支持，都可能修正技术输出。

从六路径看，可以从某个不合适的输出追查它依赖的关系，也可以从已有照护困难寻找更合适的工具；可以先改变记录方式再观察显露，也可以先比较实际结果再调整工具。不同进入点服务不同问题，不能把软件默认的操作顺序当成唯一正确的发生顺序。

本章最终要求的，是技术在婴儿符号发生中保持可解释、可质疑、可退出和可重组。退出不意味着撤除儿童赖以参与的必要辅助，而是避免被某个封闭产品或未经验证的判断锁定。好的辅助关系，应当扩大孩子与照护者能够共同改变生活的能力，而不是把他们共同交给一个不可讨论的答案。

〔本章证据边界〕家庭场景和工具流程为作者构造的说明与设计建议，未进行产品效果试验。所引 WHO、UNICEF 文件提供治理或可及性原则，不证明某个 AI 系统能够诊断婴儿、读取内心或促进特定发展结果。有关健康与辅助技术的个别选择，仍须依据相应专业评估。

第十编 / PART 10

科学验证：婴儿高阶符号怎样成为研究对象

第 46—50 章

46 SIO 事件切片：怎样记录而不切碎婴儿

47 三界与高阶结构的操作化

48 整体、稳定、独立的三项实证测试

49 个案、双胎与跨文化纵向设计

50 什么结果能够反驳 SDE 婴儿符号假说

46

第 46 章

SIO 事件切片：怎样记录而不切碎婴儿

返回目录

一、研究必须划界，但不能把划界当成生命本身

婴儿的生活连续发生，研究却必须决定从哪里开始、在哪里停止。一次伸手，可以被切成几十个动作时刻，也可以被放进十分钟游戏，还可以被放进几个月的抓握发展。三种尺度都可能有用，但它们回答不同问题。若不公开时间尺度，所谓“同一次互动”很容易在论证中悄悄变换。

本书把“SIO 事件切片”定义为：为了回答一个明确问题，从连续生活中选取的、具有可说明起止规则和关系范围的观察单位。它不是宣称生活天然由同样长度的小格组成，而是一种可以修改、比较和审计的研究约定。切片应当保留进入条件、过程和后续影响，不能只截取最符合理论的一瞬间。

例如，要研究婴儿怎样再次尝试触碰，可以把物体进入可参与范围作为起点，把活动明确转移或达到预定观察窗口作为终点。要研究交接，则起点可能是另一位照护者开始承担回应，终点是新的照护安排相对建立。二者不能使用完全相同的事件边界却可以共享记录纪律。

这里的关键不是找到绝对正确的切法，而是使不同研究者知道自己切掉了什么。如果某个结论只有在一种特殊切片长度下出现，就必须检查它究竟反映了真实的时间组织，还是分析边界制造的效果。

二、先写可观察事件，再写 SIO 解释

设想一段作者构造的玩具活动：成人把一个安全软球放在婴儿能够参与的范围，婴儿伸手，球移动，成人等待，婴儿调整身体，成人提供适当支撑，婴儿再次接触。观察记录首先应保存这些动作及其时间关系。随后才讨论哪一个关系承担了什么功能。

不能把“婴儿主动学习”作为最初编码，因为它已包含目的解释；也不能把“成人破坏自主性”当作没有中介的事实。更稳妥的记录是：成人在婴儿动作开始后多久移动了物体，移动方向是什么，婴儿随后继续、改变还是停止原来动作。功能判断可以建立在这些材料上，但应另设位置保存。

因此，本书建议使用三层记录。第一层是可复核描述，尽量说明谁在什么条件下做了什么；第二层是关系解释，例如某个动作是否为对前一信号的回应；第三层是理论判断，例如这段关系是否支持一个可重复调用的整体。三个层次可以彼此连接，却不能相互覆盖。

这样处理并不是把理论排除在观察之外。研究问题本来就影响注意什么，但理论必须允许原始材料提出不同意见。一个编码者认为“回应及时”，另一人认为“过早代替”，首先应查看他们是否同意动作时序，再讨论功能条件，而不是直接争论谁更理解 SDE。

三、一份可实施的事件记录结构

每个事件需要稳定的匿名编号，并记录它所属的婴儿、家庭、观察场次和活动类型。编号只用于连接研究资料，不应成为公开识别儿童的线索。时间记录应能连接音频、视频和现场笔记；若设备不同步，需要明确可接受的误差，不能事后假定所有记录完全对齐。

情境字段应包括当时可见的身体状态、材料、照护者位置和必要支持。无法确认的内容写为未知，而不是用常识补齐。活动入口要记“婴儿能否接触或影响对象”，不能只写“玩具在场”。一件物品处于房间中，与它实际进入婴儿行动范围，是两种不同条件。

动作字段记录可见变化，例如转头、伸手、触碰、移开、发声、成人移动材料或调整支撑。功能字段则记录研究者的条件性解释，并说明依据。结果字段不只保存成功与否，还应记活动继续、转换、暂停或无法判定。后续字段连接下一次相关事件，使一次活动不被误当成没有历史的孤岛。

最后还需要记录观察过程本身：是否有遮挡，是否有人进入房间，摄像设备是否引起注意，记录在哪些时刻中断。缺失不是研究失败的污点，而是结论边界的一部分婴儿在关键时刻转出镜头，不能因为研究者相信他通常会怎样，就补成符合预期的动作。

这些字段构成研究建议，不是一张已经标准化的临床量表。不同研究可以删减，但删减时必须说明哪些问题因此不再能够回答。

四、主体位置与对象位置可以转换，但不能随意变换

SIO 不是把人永远放在主体栏、把物永远放在客体栏。研究婴儿抓球时，可以以婴儿的行动关系为焦点；研究成人怎样学习理解婴儿时，婴儿的反应又可能成为成人认识活动中的对象。两种切入都合法，但同一段分析必须标清当前焦点，不能为了让解释顺畅而不断无声换位。

还应避免把“对象”误读成没有主体地位。婴儿可以成为医疗观察或照护判断的对象，同时仍然是具有独特存在与尊严的参与者。研究中的位置不等于伦理上的等级一个人被观察，并不意味着他的反馈可以被忽略。

对多人活动，不能把所有关系都塞进一个三元组。母亲、父亲和婴儿共同玩耍时，可能存在婴儿—物体、父亲—婴儿、母亲—父亲等多个相互影响的 SIO。研究者应说明哪些关系属于当前焦点，哪些作为环境 SIO 进入，哪些暂时不作分析。环境的选择须依据共同性与实际影响，而不是把所有在场者机械列入。

这种分层有助于区分“同时发生”与“相互规定”。两个成人同时说话，不足以证明两段活动已经形成整体；需要查看其中一人的变化是否进入另一人的行动条件，以及这种连接是否与研究结果有关。

五、时间顺序能够排除一些解释，却不能自动证明因果

成人动作发生在婴儿动作之后，是研究回应关系的一项线索，但并非充分证据。两者可能共同受到第三个事件影响，也可能只是日常节律造成的接近。研究者不能把所有短时相邻事件都叫作互动回路。

因此，分析应保留可比较的时间窗口。假设我们关心婴儿发声后成人是否调整活动，就需要说明“之后”指多长时间，并比较没有发声时相近条件下的成人动作。窗口太短可能漏掉较慢回应，太长则可能把无关变化连在一起。窗口的选择应先依据问题和观察条件说明，再进行敏感性分析。

对连续活动，还可以记录转移关系：某类婴儿行动以后，哪些成人行动更容易出现；成人采取不同动作以后，婴儿后续是否呈现不同分布。这样的结果描述条件关联只有在设计进一步控制混杂、或通过安全且合乎伦理的比较获得支持时，才能作更强因果推断。

SDE 的价值不能靠忽略这些限制获得。若高阶符号意味着真实的组织关系，那么它应当帮助我们提出更清楚的时间与条件要求，而不是用“纠缠”免除因果辨别。

六、编码一致，不等于理论正确

两名研究者对同一段录像给出相同编码，说明规则可能具有可重复性，但不自动证明规则抓住了婴儿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反过来，意见不一致也未必意味着其中一人不专业，可能是规则混同了观察与解释，或者忽略了不同通道的信息。

试点阶段应先共同讨论少量材料，明确正例、近邻反例和无法判定的情形，然后在新的材料上独立编码。不能把训练时反复讨论过的同一段录像当作独立一致性检验对容易受理论期待影响的字段，尽可能让编码者不知道研究假设或组别信息。

一致性报告也应分项。动作是否发生、时间起点在哪里、是否构成回应、是否具有某种功能，是不同难度的问题。一个笼统的“编码可靠”会遮蔽真正不确定的部分样本中的某类事件极少时，还要解释一致率为何可能被大量“没有发生”抬高，而不是只展示一个好看的数值。

更重要的是保存分歧。若双方对成人是否接住婴儿信号存在系统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揭示研究者对语言、触摸或等待的文化偏好。复核不是把所有人训练成只会说同一种话，而是使判断条件公开。

七、从事件到历史，需要建立连接而不是只增加记录量

一千条事件可以仍然是一千个孤岛。要研究高阶符号，必须说明哪些事件通过什么关系连接起来。是相同材料、相似动作、同一照护者，还是某种调节方式在不同活动中被重新调用？连接依据不同，得到的结构也不同。

例如，婴儿在抓握和翻书中都使用某种等待成人回应的方式，这可能提示跨活动组织，但也可能仅仅因为两段记录都发生在同一位成人面前。研究需要区分“跨活动保持”与“同一照护者维持”。如果换一个安全熟悉的活动条件，关系怎样变化，才是下一步问题。

可以把事件视为节点，把事先定义的关系视为连接，但图画本身不是高阶符号的证明。边很多不等于整体更丰富，网络更密也不天然意味着更好的发展。研究者必须指出哪些连接承担解释或预测作用，哪些只是同一观察场次带来的技术性相邻。

历史还有未被记录的部分。家庭研究无法拍下生活每一分钟。因此，关于“此前没有发生过”的判断应特别谨慎。没有记录到，不等于没有经历；研究应使用“在本观察范围内首次出现”等表达，避免把采样起点冒充生命起点。

八、尺度检验：让结论接受不同切片方式的挑战

如果我们把一次活动切得太细，每个片段可能只剩一个动作，关系因此消失；切得太粗，多个不同机制又可能混在一起。一个可取的方案，是先确定主要分析尺度，再设置少量有理论依据的替代尺度，检查结论是否依赖任意边界。

例如，以一次完整接触活动为主要单位，同时检查前后短时间窗与整段游戏。若所谓成人反馈只在很长窗口中出现，而在具体动作转换处没有对应，就应考虑它是不是家庭总体风格，而非事件级回应。若局部关系存在，却完全不能预测下一次活动，也不应立即宣布它已经构成稳定高阶组织。

这不是要求每个结论在所有尺度上都相同。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规律，但层级之间的转换需要说明。局部协调能够进入更大组织，是一项待证命题；不能因为使用了“高阶”一词，就自动跨过证据缺口。

三方程在这里提供的是追问顺序：当前显露依赖哪些差异与纠缠；改变显露以后，下一轮差异和关系是否随之改变。真正的研究材料必须回答具体变化，不能只在每张表格最后加上 S、D、E 三个字母。

九、观察权不能凌驾于被观察者的生活

婴儿无法理解研究协议，因而研究者更有责任降低侵入、尊重照护判断并明确停止规则。成人同意研究，不意味着婴儿的不适可以无限延长。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完成一个事件窗口而延迟必要照护，也不能为了获得“纯粹独立”的数据撤除必要支持。

家庭还需要知道资料将如何使用、谁能够访问、退出以后哪些资料仍可能被依法或依协议保留。录影中的第三方也有隐私利益。研究者不能把一段亲密生活的授权自动扩大为公开展示，更不能把儿童影像当作理论宣传材料。

本章建立的事件切片，是为了使发生过程能够被认真讨论，而不是把孩子变成无休止的数据生产者。最好的记录并非最多的记录，而是在足够回答问题的同时，对生活造成尽可能小的干扰。研究所守护的，正是它试图理解的那个仍在发生的独特“我”。

〔研究实施说明〕本章给出待试点的编码框架，不是已经验证的测量工具。正式研究须经相应伦理审查，完成编码手册、试点可靠性评估和数据管理方案；未在本书中报告任何真实婴儿样本或结果。

47

第 47 章

三界与高阶结构的操作化

返回目录

一、三界不是三台可以分别读取的仪器

当我们说婴儿的现实世界、理念世界和自我世界相互纠缠，首先提出的是一种存在与意义的解释框架。摄像机可以记录动作，传感器可以记录某些身体变化，研究者可以分析活动顺序；但没有一台仪器直接显示“理念世界现在增加了多少”。如果把这些层次混淆，哲学概念就会被伪装成未经验证的测量实体。

操作化不是把宏大概念换成一个数字，而是说明：为了研究某个具体问题，什么观察将支持哪一种解释，什么观察与它不相容，还有哪些替代解释需要保留。一个概念可以有多个操作方案，每个方案只覆盖其中一部分。覆盖有限不等于概念毫无意义但研究必须公开这种有限性。

例如，婴儿在某个熟悉动作之后提前转向物体，可能与预期有关，也可能受成人刚刚发出的线索影响。我们可以研究“提前转向”出现的条件，却不能直接宣布已经测到了一个完整理念。类似地，活动中断以后继续尝试，可能反映行动组织，也可能与材料的新奇性或身体状态有关。它不能独自证明婴儿已具有反思性的“我能够”。

本章因此采用一条双重纪律：三界解释引导我们寻找关系，观察结果则限制三界解释能够说到哪里。理论不能代替数据，数据也不会不经解释就自动排列成三个世界。

二、现实世界：不是对象清单，而是可参与关系

现实层的操作首先涉及具体物体、身体、空间、材料和行动条件。研究者应当记录婴儿实际能够看到、接触、改变或避开的关系，而不只是成人认为房间里“有什么”。同一物体的距离、朝向、表面和成人持握方式不同，参与条件也可能不同。

以抓握为例，可以记录物体相对于婴儿的位置、身体支撑、接触机会、成人协助以及动作结果。这里没有哪一个指标单独等同于现实世界，它们共同帮助说明活动在什么条件下成立。若研究只测到“抓住了”，却没有记录成人是否已经把物体放进手中，就无法区分不同的发生路径。

现实层还包括制度和关系的物质承接。游戏区是否允许活动，照护者是否能靠近，交接记录是否可用，都可能改变眼前行动。它们不能因为较难量化就被排除，也不能因为理论重视环境就全部无差别纳入。每一项都应说明与当前活动的实际连接。

一个重要的操作问题是机会分母。两名婴儿完成同样次数的动作，如果一人获得更多可参与机会，次数便不能被直接比较。分母可能是适宜情境的次数、可观察的活动时间，或具体接触机会，必须依据研究问题事先定义。否则，所谓能力差异可能只是机会差异。

三、理念世界：从可辨别预期到可修订的关系组织

本书在婴儿研究中使用“理念世界”，不意味着赋予婴儿成人式命题语言。我们关注的是，某些关系怎样在经验中获得可保持、可预期、可迁移和可重新组合的组织它们是否构成某种表征，以及怎样构成，需要具体理论与证据进一步说明。

可以先提出一个较窄的假设：在熟悉序列中，婴儿的行动会随特定关系变化，而不是只随某个表面刺激变化。为了研究它，需要区分关系保留但外观改变的条件，与外观类似但关系改变的条件。如果两者始终混在一起，便无法知道婴儿所依赖的究竟是什么。

这里的“改变”应在安全、适宜且经伦理认可的活动范围内进行。例如，替换安全材料的颜色与位置，或比较自然生活中已有的不同例行活动；不能为了制造预期违背而让孩子长时间陷入不适。一次惊讶反应也不是完整概念的证明，仍需观察后续调整和其他解释。

理念层的关键不是“脑内有没有一个东西”，而是某种关系能否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组织行动。即便如此，研究仍只能据行为推断其部分功能。不能从迁移成功直接读出婴儿的主观内容，也不能把迁移失败等同于没有任何经验组织，因为新的身体、注意或活动要求可能阻止了表现。

四、自我世界：承认第一人称边界而不制造心灵读数

> 婴儿以自身不可替代的身体位置参与活动，这是本书存在意义上“我”的出发点。但研究者观察的是他在特定条件中的反应，不能替他完整叙述内心。身体自我相关行为、行动控制、舒适调节与反思性自我，必须保持层级区分。Rochat 关于早期自我意识层次的讨论可作为对话资源，却不能直接被移作 SDE 全部三界的实验证明。[R01]

操作时，可以关注婴儿的行动是否能够改变后续事件，他是否在变化后重新组织动作，以及在不同支持条件下是否保留某种主动参与。也可以观察趋近、退开、暂停重新开始等可见变化，但这些动作的意义取决于情境。退开可能是选择，也可能是疲劳、不适或动作限制。

因此，本书不把“坚持更久”预设为更强自我，也不把“接受帮助”预设为自我较弱。一个能够通过转头使活动暂停的婴儿，可能比一个始终被成人带着完成任务的婴儿更能影响互动，但这仍然是对活动控制关系的判断，不是人格价值排名。

自我层尤其需要保留不可知部分。研究者可以说“这一设计扩大了孩子影响活动走向的机会”，却不应轻易说“孩子因此体验到了自由幸福”。后者涉及体验与价值需要更谨慎的推断。承认边界并不降低婴儿的重要性，恰恰避免用成人语言覆盖他的实际存在。

五、三界如何在同一事件中获得分析上的连接

一个可操作的分析不是给每段录像贴三个颜色标签，而是提出跨层连接。例如，现实层的支撑改变是否扩大了动作机会；这种变化是否使某种关系在重复活动中更可预期；婴儿是否因此能够更多地改变活动方向。三项变化若按可说明的顺序相互关联才有理由进一步讨论三界互构。

然而，“同时改善”仍不等于互构已被证明。可能存在共同原因，比如孩子整体状态改变或照护者投入更多注意。研究应比较哪些连接在控制这些条件后仍有意义，或在安全的设计中改变其中某一可调整关系，观察其他层面是否按预测变化。

还应允许非对称结果：某项辅助提高动作成功率，却暂未改变跨情境迁移；某种关系预期更稳定，却没有增加自主发起。这样的结果不是理论必须掩盖的尴尬，而是区分不同层次的重要机会。三界不可分割，不意味着每个指标每次都同步上升。

本书提出的“共同发生”因此是关于关系与条件的命题，不是关于所有好结果必然一起出现的许诺。若某项操作只影响局部层面，我们应当说明局部作用，而不是用整体语言夸大成全面发展。

六、给高阶结构一个比“联系很多”更严格的要求

高阶符号的经验研究至少要跨越三个门槛。首先，候选组织应有清楚边界，能区别于随意选择的一组事件；其次，它应在允许变化的条件下保持某种可辨认关系；再次，这种关系应能够帮助解释或预测新的活动，而不只是事后归纳已经看到的材料。

例如，研究者提出一个“请求—等待—共同调整”的候选组织。若它只在一个照护者、一个玩具、一个下午出现，证据仍很局部。若它在不同活动中以不同动作形式继续出现，并能预测孩子怎样进入新活动，才更接近高阶组织的研究要求。即使如此也要与简单的熟悉度、成人提示和既有动作能力模型比较。

高阶并不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独立的中央控制器。整体可以通过多条具体反馈路径改变局部：成人根据先前经验调整等待，材料安排使某些动作更容易发生，孩子的当前状态改变他对熟悉线索的回应。所谓回写必须落到这些路径上，不能成为没有承接过程的神秘力量。

因此，高阶结构研究不必先证明一个“整体实体”藏在某处，而应证明关系组织具有超出孤立特征清单的分析价值。若相同预测完全可以由更简单模型给出，就要承认目前没有展示所声称的增量。

七、一个透明的形式框架及其限度

为避免把符号混成一个变量，可以将研究记录写成下列概念框架。令 X_t 表示在时刻或事件 t 观察到的行为与条件，C_t 表示已记录的情境，H_t 表示截至此前的可用历史。研究者提出一个关系组织 R_t，由明确规则从这些资料中估计；再用它预测后续结果 Y，而不是把结果先放进 R_t 再宣布预测成功。

可以比较两类模型：基线模型用 X_t、C_t 和既往结果作预测；候选模型在同样信息基础上增加预先规定的关系特征 R_t。两者使用相同训练资料、同样的评价窗口与合理的复杂度控制。只有这样，增加的表现才可能与关系组织有关，而不是因为候选模型偷偷获得了更多信息。

形式上可记为：M_0 预测 Y＝f(X，C，H)，M_1 预测 Y＝g(X，C，H，R)。这个写法是模型比较的安排，不是已经估计的婴儿发展定律。若 R 完全由 X、C、H 计算而来，它并不增加原始信息，却可能通过有用的组织方式改善有限样本下的学习；是否改善必须实际检验。

S、D、E 则是对发生关系的理论定位，不能直接等同于上述统计变量。S 显露可能涉及多个观测量，D 需要时间或条件上的差异序列，E 需要说明哪些特征相互规定。把它们分别填成“动作分数、变化分数、环境分数”，只是重新命名三个数字，并未完成操作化。

八、关系指标也可能制造自己的盲点

研究者常希望找到一个综合指数，以便比较不同婴儿。但把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加总为“高阶符号指数”，会产生至少两个问题：不同维度的高低可能被互相抵消；同一个总分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组织。某项能力很稳定但依赖特定提示，与另一项能力可迁移但尚不稳定，不应被迫得到同一种解释。

更适宜的早期做法，是保留分项证据与条件说明。整体性报告哪些连接有作用，稳定性报告对哪些变化保持，独立性报告脱离了哪些偶然提示、仍需要哪些支持。这样的结果不如单个排名醒目，却更接近实际发生。

指标还可能被成人训练反过来改变。若机构只奖赏儿童主动发起次数，成人可能不断制造需要发起的情境，却没有改善儿童真正选择活动的空间。测量目标进入生活以后，本身成为新的环境 SIO。因此研究既要分析指标描述了什么，也要分析指标被使用以后改变了什么。

九、测量可靠，不等于解释已经唯一

假设两位编码者都准确记录某个孩子在十次机会中接近了六次。他们的一致性很好，资料仍然没有自动告诉我们接近为何发生。六次可能集中在成人提示以后，也可能集中在身体支撑较合适的情境，还可能均匀分布于几种情境。可靠地数出六次，与辨认六次背后的关系，是两个不同问题。

本书将后一个困难称为机制的可辨识性问题：已有观察是否足以区分我们正在比较的解释。如果两个机制在全部已测条件中都预期相同表现，单凭增加同一种观察，

可能只是使这个共同结果更精确，却仍不能选出唯一机制。需要寻找它们预测不同的条件，而不只是扩大一个没有区分力的样本。

因此，三界操作化不应从寻找三个最方便的分数开始。应先写出候选解释，再问哪些可观察差别可以区分这些解释。一个行为同时涉及身体、预期与自我相关活动，不等于任何一种记录都能分别测量三者。哲学框架越强调相互纠缠，经验方案越需要交代怎样避免把同一数据反复当成三份证据。

十、一个纯粹演示性的数值例子

以下数字完全由作者设定，不是婴儿实验资料。设某种适龄游戏中，模型甲认为孩子在所有合宜情境中的接近概率都是零点六；模型乙则认为，在两类等量情境中，概率分别为零点九和零点三。只比较总体接近比例，两者的期望值相同。再精确地估计总体平均，也不能单独区分两种组织。

若记录情境类别，两种模型才产生不同预期：甲预期两类相近，乙预期存在明显条件差别。若情境本身不是随机安排，观察到差别仍不自动证明该条件的因果作用，但已经指出平均值遗漏了哪种结构。这一例子说明，测量设计需要让理论的差异有机会显露，而不是把全部资料压成理论无法分开的总分。

还可以出现另一种情况：研究者事后把成功片段分成一类、失败片段分成另一类，于是得到一个看似完美的条件模型。这不是发现了机制，而是把结果写进了分类。为了防止这种循环，情境类别必须有独立定义，并在未参与定义的新资料上检查。高阶符号的边界同样不能由“凡是成功的都属于同一组织”来设定。

十一、指标之间的汇合，需要排除共同方法

若目光、动作和成人报告都指向同一解释，看起来比单项记录有力；但三个指标可能共享同一种偏差。知道研究目标的成人可能改变提示，同一位编码者可能依照成人解释给动作归类，事后问卷又重复这一解释。表面上是多模态汇合，实际上可能只是同一个判断在三个渠道中回响。

更有价值的汇合需要一定独立性。行为编码者可以不知道照护者的自述；某项关系判据可以在建立以后用于另一段活动；不同通道的记录可以允许互相不一致。若指标总被整理到一致才提交，恰恰失去了揭示理论边界的机会。

不一致也并不自动意味着测量失败。孩子在动作上继续参与，表情却显得紧张，可能提示成功与舒适需要分开；成人认为孩子更自主，录像却显示帮助增加，可能提示评价标准改变。研究应先定位差异，再判断哪一解释需要修订。不能把所有不一致都平均掉，然后用一个综合指数宣称三界共同改善。

十二、测量方法本身会进入婴儿的现场

ManyBabies 关于婴儿导向言语偏好的多实验室研究显示，年龄、语言背景与采用的方法等因素，与观察到的效应差异有关。[M11]这项工作的启发不是存在一种万能测量，而是同一个研究名称下，材料可及性、反应要求和记录方式并非无关紧要。方法差异的观察关联也不能一概当作已随机识别的因果效果。

将这一提醒用于 SDE，可以明确说：研究装置也是相关环境 SIO 的一部分。固定座椅、头转要求、屏幕位置、成人是否可见，都会规定孩子能以什么方式参与。一个孩子没有完成某种反应，可能是目标关系尚未建立，也可能是测试要求使既有关系难以显露；两者必须尽量区分。

跨文化比较尤其如此。某种长时间面对陌生成人的任务，在不同生活史中可能具有不同熟悉程度。不能先用一种文化中的典型表达规定指标，再把其他表达计为缺少能力。与此同时，也不能因文化不同就取消所有共同比较。应当共同制定功能目标，检查反应方式是否可及，再说明比较保留了哪些相同、允许了哪些不同。

十三、让潜在构念承担有限而明确的工作

研究者可以提出一个不能直接看见的组织变量，但必须说明它如何限制可见结果。若所谓“高阶整合”无论大或小都可以解释同一行为，这个变量便没有清楚作用。比较合理的做法是让它预测事先规定的跨活动关系，并在新资料里检验，而不把它当作发生学的隐藏保险箱。

例如，候选组织可以预测：在必要支持不变、偶然提示变化时，哪些活动联系仍可持续。它不必同时预测全部情绪、词汇和家庭关系。先在有限范围内承担风险，才能逐步扩大。若变量只把已有结果压缩为一个标签，也应准确称作描述性摘要，而非已揭示的内部机制。

三界框架与这样的局部模型并不冲突。现实侧帮助界定实际可行条件，理念侧提出保留与预期问题，自我侧保留个体参与和体验边界；真正进入统计模型的则是有限观察与明确假设。保持两种语言的接口，比把三界直接画成三个因果箭头更严谨，也更容易被其他研究者检查。

十四、为不能辨认的地方设计下一次观察

一个成熟的操作方案，应当能够给出三种不同结论：资料更支持某一解释；现有资料排除了某些解释但仍有多种可能；资料不足以形成有效区分。第三种不是空话，它可以准确指出下一次需要改变什么条件、增加哪种记录，或者为什么当前问题无法在不增加负担的情况下继续。

对家庭而言，这意味着观察可以支持行动而不必制造诊断。发现某种摆放更容易参与，可以暂时保留它；机制尚不清楚，就不对孩子贴永久标签。对研究者而言，则意味着理论的精确性表现为知道自己区分到了哪里。婴儿的独特存在不由测量授予，关于其具体发生机制的知识却必须经由这些有限而可修订的区分逐步建立。

十五、从构念到证据，允许往返修订

操作化失败可能有多种含义。编码无法一致，可能是定义含混；关系不能跨情境保持，可能是边界划得过宽；预测没有增量，可能是候选结构并不必要，也可能是设计信息不足。不能把所有失败归咎于工具太粗，更不能把所有成功直接提升为本体论证明。

一个严谨的修订应指出具体改动：改变观察尺度、缩小适用范围、区分原来混同的类型，或放弃某个经验命题。修改以后，应在新的材料中重新检验，而不是反复调整到同一份数据终于支持理论为止。探索可以大胆，确认必须保留与探索不同的证据位置。

婴儿符号发生学的操作化，不是把一个丰富的生命压成可计算的替身，而是建立一条有限而诚实的通道：从具体活动出发，提出可辨别的关系，接受观察与竞争解释的限制，再把获得的认识用于更恰当的支持。三界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免检的答案，而是承担更多说明责任的研究框架。

48

第 48 章

整体、稳定、独立的三项实证测试

返回目录

一、三项判据必须分别接受失败的可能

> SDE 符号学把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作为符号粒子态的成立条件。[S01]将这一规定用于婴儿研究，不能只在观察到成功行为后分别写一句“具有整体、稳定、独立”。真正的测试必须允许某项成立、另一项暂不成立，也必须允许一个看似成熟的表现最终被解释为情境中的偶然组合。

本章提出三组研究方案，均属于尚待试点与伦理审查的设计。它们不是家庭训练教程，也不是诊断工具。目的在于辨别研究者所说的“一个单位”究竟依靠什么成立而不是要求每个婴儿通过统一考试。未通过某个研究条件，不等于缺少人格、意义或发展价值。

三组方案共同遵守一个底线：可以比较安全材料、自然情境或非必要提示，不得撤除必要照护、身体支撑、可及语言或医疗支持。理论上的“删除一个因素”进入生命研究以后，必须转化为伦理上允许的观察与比较。不能把概念实验中移走一张卡片直接类比为现实中移走一个婴儿赖以参与的条件。

二、整体性测试：关系是否比要素清单多说明了一件事

整体性首先要求明确候选单位。以“婴儿发起—成人承接—婴儿调整”的活动为例，研究者不是要证明三件事曾经发生，而是要检验它们之间的组织是否与后续活动有关。三个动作的总次数相同，排列与承接关系却可能不同。

可以先做一个纯粹的逻辑演示。序列甲依次出现 A、B、A、B、A、B，序列乙出现 A、A、A、B、B、B。两者都有三个 A 和三个 B，但相邻转移关系不同。这个演示

只证明次数清单不能恢复全部时序信息，不证明真实婴儿一定依赖这种时序，也不证明 SDE 已经优于其他理论。

实际研究可以据此预先规定一种关系特征，例如成人动作是否与婴儿刚刚显露的变化相对应，婴儿随后是否改变原来行动。然后比较只使用动作频率的模型与加入关系信息的模型。若关系特征没有增加解释或预测能力，就应限制“整体组织具有额外作用”的结论。

还可以比较相同要素在不同组织条件下的自然出现。需要注意，差异可能来自活动难度、身体状态或照护者经验，因此不能只挑选两段漂亮录像就完成论证。整体性证据应包括反例：要素齐全但关系未承接的活动，以及要素形式不同但功能组织相近的活动。

三、整体性中的承重与冗余

一个关系整体不一定只有唯一通道。声音、触摸和材料位置可能部分提供重复线索。撤掉某个非必要提示后表现保持，不一定说明这个提示毫无作用，也可能是其他通道承担了补偿。反过来，某个条件改变后活动中断，也不一定证明它是整个发展过程永远不可替代的核心。

因此，本书区分局部承重、条件承重与可替代承重。局部承重是对当前活动而言重要；条件承重是只在某类身体或情境条件中重要；可替代承重则意味着某项功能可以经由不同渠道实现。这些是待检验的分析类型，不是婴儿的固定分类。

研究可以先从自然替代中寻找线索。例如，同一位婴儿在一种活动中依赖成人的声音，在另一种安全熟悉活动中依赖触摸或物体变化。若两者都能组织相似的后续参与，便值得研究功能关系是否保持。但不能把“结果差不多”直接当成同一机制，因为不同路径也可能产生相似结果。

整体性测试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关键因素，而是辨认在明确范围内哪些关系共同成立、哪些可以替换、哪些变化会改变活动类型。它应当使理论更具体，而不是使所有因素都被宣布为同样重要。

四、稳定性测试：对什么变化保持，对什么变化敏感

稳定性不是同一条件下反复出现同一动作。若所有表面线索都被保留，就难以区分关系保持与机械依赖。研究应先规定允许变化集合：哪些改变在当前理论上不应破坏候选组织，哪些改变则可能改变其成立条件。

例如，一个关于安全物体接触的研究，可以在适宜范围内比较物体外观或位置的小变化，同时保留必要支撑与活动入口。若候选组织跨这些变化继续出现，支持的是限定范围内的稳定性。不能据此推断它对所有物体、所有照护者和所有身体状态都稳定。

形式上，设一个活动实例为 x，允许变换为 t，研究者的关系分类为 c。希望检验的是 c(t(x))是否仍与 c(x)一致，或者其差异是否落在预先规定的可接受范围内。公式只说明比较结构，不决定哪些变换安全、合理，也不替研究者选择统计标准。

还必须设置真正改变承重条件的比较。若某个分类对任何变化都不敏感，它可能只是过于宽泛。例如，无论婴儿主动发起、成人完全代替，还是孩子已经退出，都被归为“共同探索”，这样的稳定来自定义失去区分力，而不是高阶符号得到证明。

五、跨情境保持需要区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形式与关系都保持，例如熟悉活动在相近条件下再次出现。第二种是形式改变而关系保持，例如婴儿通过不同动作重新影响成人回应。第三种是外观相似而关系改变，例如成人依然微笑，但已经不再根据婴儿反馈调整活动。

这三种情况如果被同一个行为分数覆盖，稳定性就会被误判。研究者需要对关系与外观分别编码。一个孩子换了动作，不一定失去原来的组织；成人保持同样动作，也不一定维持了原来的回应关系。

稳定性还具有时间范围。当天重复、隔日重现与跨发展阶段延续不是同一要求。婴儿成长会改变身体条件和活动可能，某个早期组织后来消失，可能是被新的组织替代，而不只是能力退步。研究应记录替代路径，不能只追踪旧形式是否永久存在。

因此，稳定并非越久越好。一个不能根据新条件调整的模式也可能长期重复。本书所说的积极稳定，是在可辨认的同时保留适当敏感性；是否具有这种性质，需要从变化中的表现判断。

六、独立性测试：离开偶然提示，不是离开一切支持

独立性的操作必须先区分两类条件。必要支持使活动具有可及性或安全性，不能为了测试而取消；偶然提示则可能只是最初情境中的某种外观、成人固定口令或特定材料。研究关心的是候选组织能否不依赖某一个偶然提示而被重新调用。

例如，某段活动最初总伴随同一句话。后续可以在合乎伦理、孩子状态适宜的自然活动中观察：没有这句固定话时，孩子是否仍能通过其他线索进入相似关系。不能把没有出现解释成失败后立刻反复施压，也不能据一次成功宣布已经获得普遍独立性。

对使用辅助技术或特殊支持的婴儿，独立调用可以发生在人—工具复合体之中。研究目标若是个人裸露动作能力，需要另行说明；若目标是现实生活参与，就不能把工具一概扣除。两种研究问题都可以存在，但不能互相冒名。

独立性也不等于完全脱境。一项关系能够进入新活动，仍可能依赖熟悉照护、适当身体状态或可及材料。应把这些条件保留在结论中，避免把“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再次调用”扩写成“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帮助”。

七、三项测试如何形成一个连续协议

一个可行的研究顺序，是先用自然观察识别候选单位，再检查它的边界，随后比较允许变化，最后研究在不同载体中的重新调用。这个顺序只是实践上的建议，不是宣称发生本身必然按三步完成。研究也可能因为某次迁移失败而返回重新定义整体。

每一步都应明确主要结果和停止规则。主要结果不能在看到数据后随意更换为最显著的指标；若孩子出现不适、活动不再适宜或照护者要求停止，研究应结束相应观察。被停止的活动应如实记录，而不是从资料中消失以保留漂亮结果。

正式方案还要区分确认性与探索性分析。主要假设、条件、比较和分析规则可以在收集确认性资料前登记；新的发现则作为探索结果报告，并等待新的资料检验。预注册的价值之一，是帮助读者区分事先预测与事后解释，而不是保证研究从此不会出错。[R35]

这一点对新理论特别重要。理论越能解释丰富现象，越容易在结果出来以后找到一种说法。公开失败条件，可以使解释能力不至于变成永远正确的保护壳。

八、结果可能怎样迫使我们修改理论

假设整体性关系在一次任务中成立，却不能跨允许变化保持。可以考虑候选单位只属于局部情境，不能直接称为较高层级的符号。若稳定性存在，但完全依赖一个偶然提示，则需要限制独立调用的主张。若三个方面都有局部证据，却不能预测后续活动，可能说明它们是有用的描述标准，但尚未证明所声称的发展解释力。

还有一种更强的挑战：简单频率、身体状态与活动机会模型已经给出同样或更好的预测，而关系指标在独立样本中没有增量。此时不应通过增加更多术语保存优越性可以保留 SDE 的哲学组织价值，同时承认当前经验模型没有超越竞争解释。

反过来，某项候选关系取得预测增量，也不能因此宣布整个 SDE 本体论得到证实。可能是一般时序建模的优势，其他理论也能提出同样指标。要讨论独特贡献，必须说明指标为何由本理论导出、与近邻模型在哪里不同，以及结果是否在公平比较中重复出现。

九、研究的终点不是给婴儿盖章

三项测试最终应帮助研究者与照护者更清楚地理解支持条件。例如，一个活动只能在熟悉提示下出现，说明可以继续寻找更可及的迁移入口；一个关系跨材料保持，却在照护者交接时中断，提示交接本身值得研究。这样的认识比给孩子贴上“符号成熟”或“符号不足”更有实际价值。

婴儿不是来替理论通过考试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的判据，也必须接受婴儿生活的反向检验：它们是否帮助人看见了此前忽略的关系，是否减少误判，是否使支持更恰当，还是只制造了一套新的排名语言。

本章因此把验证与谦逊放在一起。符号发生学可以提出新的单位、新的关系和新的预测，但每一项都要说明证据到哪里为止。只有在这种有限而可修订的研究中，婴儿的独特高阶符号才不会被理论本身重新压成一个标准化对象。

49

第 49 章

个案、双胎与跨文化纵向设计

返回目录

一、同一个婴儿必须在时间中被研究

一次观察能够揭示一个事件，却难以说明这个事件怎样成为历史。婴儿符号发生学关心的，不只是今天有什么表现，还包括此前怎样形成、现在怎样改变、哪些组织能够进入下一轮活动。因此，纵向研究不是把横断面测量重复若干次，而是建立事件之间可追溯的联系。

本章提出一个分阶段研究计划。它是供后续实施和修订的方案，不是已经完成的项目，也没有虚构样本、经费、伦理批准或研究结果。计划的核心是先把概念变成可执行的观察，再扩大比较范围；不能因为理论宏大，就一开始同时收集所有家庭的所有生活。

纵向设计也必须尊重变化。婴儿的身体、活动兴趣和照护安排都会改变，如果每次都强迫重复完全相同的任务，研究可能失去与真实生活的联系。但如果每次任务都任意变化，又无法比较。需要保持的是研究问题和关系判据，同时允许材料与支持方式依据发展条件调整，并详细记录这些调整。

二、第一阶段：用少量个案检验研究工具

试点阶段首先检验能否看清事件，而不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研究者应选择愿意参与、具有不同日常条件的家庭，在低侵入的自然活动中试用记录与编码。数量由可行性目标和资源决定，不应把一个随意数字包装成充分统计效力。

试点需要回答具体问题：活动起止规则是否可执行，哪些通道容易被遮挡，照护者是否觉得记录负担过重，编码者能否区分事实与解释，哪些字段经常无法填写。一个漂亮但无法稳定使用的表格，应当在这一阶段被简化，而不是把困难推给家庭。

还应主动纳入不顺利的资料。婴儿不愿参与、照护者临时有事、设备位置改变，都属于实际研究条件。若只有最配合的家庭和最顺利的活动进入分析，后续结论可能只适用于少数经过筛选的生活片段。

试点之后形成修订版手册，并保存版本变更。哪些定义改变、为什么改变、旧资料能否重新编码，都要清楚。不能把根据试点结果作出的规则修改，回头描述成研究开始前已经确定的预测。

三、第二阶段：围绕一个窄问题建立确认性队列

正式纵向研究应先选择一个足够窄的主要问题。例如：在适宜的日常物体活动中，婴儿反馈与照护者调整之间的关系特征，是否能够在既有身体条件、活动机会和先前表现之外，预测后续跨情境参与？这个问题比“是否证明婴儿是高阶符号”更容易被清楚检验。

主要结果可以是后续新情境中的某种预先定义的参与表现，但不能由研究者随意从众多行为中挑选最有利的一项。观察时间安排也应服务问题：既需要足够近的记录捕捉互动调整，也需要相隔较远的记录检查保持与迁移。具体间隔须依据试点、活动性质与家庭负担确定。

样本量应在明确主要效应、误差结构、失访预期和最小有意义差异之后，通过合适方法规划。没有这些假设，宣称“几十个家庭足以证明”或“必须上千人才科学”都没有根据。可以用模拟检验不同设计在假定条件下的识别能力，但模拟参数必须标明是假设，不得冒充真实儿童数据。

研究还应预先说明纳入与排除标准。排除某类身体差异可能方便分析，却会缩小结论适用范围；将不同支持需要的儿童全部混在一起，也可能掩盖重要差异。选择哪种方案，应由研究问题决定，并公开其代价。

四、同一家庭中的双胎：有用比较，不是天然实验室

双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观察高度相近的家庭条件下怎样出现不同互动，但不能把同卵双胞胎当作两个完全相同的起点。已有基因研究也提醒人们，同卵双胎并非在所有遗传细节上绝对一致。[R27]更不用说身体状态、位置、经历和照护机会从来不可能逐时复制。

本书建议双胎子研究首先记录共享与非共享事件，而不是只在表格上写“同一家庭”。同一段音乐响起时，两名婴儿的注意与身体位置可能不同；同一位照护者可能先回应其中一人；一个孩子的反应也可能改变另一个孩子即将遇到的条件。双胎之间本身还可能存在互动。

分析中可以比较家庭内差异，但不能因此自动获得因果结论。照护差异可能由孩子先前差异引出，孩子差异又可能受照护改变，二者具有反馈。若只测一次照护、一次表现，再把相关关系解释为“父母造成差异”，就违背了本书的共同发生立场。

双胎也不是可任意分配养育条件的材料。不能为了增加对比而故意减少其中一人的回应、语言或活动机会。研究应利用自然存在的差异，或比较均属适宜支持范围内的安全安排，并经过正式伦理审查。

五、跨文化研究首先比较活动，不先比较民族性格

跨文化设计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先假定某个社会代表独立、另一个社会代表依赖，再把所有观察塞进预设类别。本书主张先与当地照护者和研究伙伴共同确定活动含义谁通常参与、何时发生、哪些动作被理解为回应、哪些条件使活动无法进行。

同样一次眼神转向，在不同身体位置、语言安排和活动目标中可能具有不同功能。一个只在面对面游戏中建立的编码体系，不能不经检验就用于成人劳动中的身体照护比较需要寻找功能上可讨论的关系，同时保留形式差异，而不是强迫所有家庭表演同一种城市实验室场景。

量化指标的可比性也要检验。翻译了同一个词，不等于测到了同一种关系；观察次数相同，也不等于活动机会相同。研究可先报告各地活动内部的组织，再谨慎比较

哪些关系具有共同性。若无法建立可比条件，应明确停止某些排名，而不是为了完整表格硬作比较。

跨文化合作还包括资料解释权与成果分享。当地参与者不应只承担招募和翻译，却在理论解释中失去声音。对研究者认为“奇怪”的实践，应先理解其生活条件，再区分可接受差异与需要保护儿童的风险，避免浪漫化与贬低两个极端。

六、家庭、照护者与事件具有嵌套，也具有交叉

一名婴儿有多个事件，多个事件属于不同场次；一个家庭可能有两名儿童，某位照护者又可能照顾多个孩子。这样的资料不是彼此独立的行。若把所有事件随机拆开一部分放进训练集、一部分放进测试集，模型可能已经在训练中见过同一婴儿和同一家庭的惯常特征。

关于具有时间、层级等结构的数据，交叉验证方法研究强调，应使验证划分与真正想检验的推广问题相匹配。[R36]对本书的研究而言，至少要分清三种预测：预测同一婴儿的未来、预测同一环境中新婴儿、预测新家庭或新文化条件。三者难度和所允许的信息不同。

若目标是同一婴儿的未来，应按时间保留后续资料，避免用未来信息计算过去特征；若目标是新家庭，就需要把家庭作为划分单位；若讨论跨地点推广，还应保留地点层面的独立检验。不能用最容易的划分得到高分，再宣称模型适用于所有婴儿。

统计模型可以处理部分嵌套与交叉结构，但模型名称不替代设计判断。需要说明家庭共有因素、照护者因素和事件条件怎样进入分析，也要承认未记录的共同原因仍可能存在。

七、失访与缺失本身可能带有生活信息

家庭退出研究，可能因为搬迁、工作、照护压力、孩子健康或单纯不愿继续。这些原因不必向研究者无限解释，但在获得许可且可行时，可以记录退出类型。若负担更重的家庭更容易失访，剩下的资料便可能偏向资源较充足的家庭。

处理缺失时，不能机械地填补成平均状态，也不能只分析资料最完整的人而不讨论选择偏差。应报告每个阶段的参与情况、关键变量缺失范围和不同处理方式对结论

的影响。研究者对缺失原因掌握有限时，要明确这种限制，而不是用复杂方法制造完全解决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反向改进研究负担。若某种密集记录导致家庭难以持续，应考虑减少不必要采样或调整方式，而不是以“科学需要”为由要求生活服从研究。纵向研究的连续性，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合作上。

八、把家庭利益与研究利益区分开

研究观察不一定给参与家庭带来直接好处。招募时不能承诺儿童会因此更聪明、更加独立，或者必定获得个性化治疗。发现发展担忧时，应依据协议引导家庭寻求适当专业支持，不能把研究编码结果包装成诊断。

研究反馈也需要克制。可以向家庭解释观察方法和一般性发现，但不宜根据未经验证的指标给某个婴儿颁发“高阶符号水平”。家庭希望得到确定答案的心情可以理解，研究者却不能用理论新颖弥补证据不足。

对照护者的记录同样不能变成隐性绩效审判。研究发现某段互动没有承接，不等于某个人不爱孩子。其身体状态、工作条件、支持资源和活动目标都可能影响表现。把研究结果用于改善条件，与把结果用于归责个人，是不同的社会行动。

九、纵向设计最终检验的是改变的路径

本书真正关心的，不只是关系指标与后来表现相关，而是这种关系怎样在时间中出现、维持、失效和重组。一个较完整的研究报告应保留成功与不成功的路径，说明哪些转折能够被事先预测，哪些只能事后解释，哪些仍然无法理解。

研究还应允许“不同路径、相似结果”与“相似起点、不同结果”同时存在。前者提醒我们不能从终点倒推出唯一经历，后者提醒我们不能把早期特征当作命运。高阶符号的独特历史，不是取消一般规律，而是要求一般规律明确自己的条件与概率边界。

纵向研究因此是一种耐心的承诺：不给一次表现赋予终身结论，不把一个家庭缩成一个变量，也不因理论需要而抹去生活中的不整齐。只有沿着可追溯、可修订的路径，婴儿符号发生学才可能从富有启发的解释，走向能够承担经验检验的研究。

50

第 50 章

什么结果能够反驳 SDE 婴儿符号假说

返回目录

一、理论不能让婴儿只负责证明它

一种能够把所有观察解释为自己正确的理论，看似强大，却难以从错误中学习。孩子主动探索，可以说纠缠促进了自由；孩子没有探索，也可以说纠缠形成了制约。两句话都可能有解释价值，但如果事先没有说明什么条件对应什么预测，结果便无法真正改变理论。

本章建立“失败也有位置”的研究纪律。婴儿符号发生学必须允许某个单位划分失败、某个预测失败、某种支持方案没有效果，以及某项理论优势不成立。承认这些失败，不等于否定婴儿的独特存在；恰恰是把对婴儿的尊重与对某个模型的忠诚分开。

首先需要区分三类主张。符号首先作为存在方式，是本书的本体论立场；特定关系指标能够提高预测，是经验假说；每个婴儿都应得到尊严和适当支持，是规范主张三者可以相互启发，但不能互相代替证明。一个经验模型失败，不会取消儿童权利；一个伦理原则值得坚持，也不能使统计预测自动正确。

二、第一项假说：关系组织比孤立特征提供额外信息

H1 可以被收窄为：在预先界定的活动和样本范围内，加入跨通道、跨事件的关系组织特征，在公平的独立验证中，比只使用相同原始资料的孤立行为摘要更好地预测后续迁移表现。这里的“更好”必须对应明确指标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改进，而不是任何微小差异。

要使比较公平，两个模型应拥有同样的可用历史、相同的情境信息和合理的复杂度选择机会。不能让基线只看月龄，让 SDE 模型看到完整录像，再把优势归功于本体

论。也不能在许多关系指标中挑选表现最好的一个，却不计算这种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

若独立验证显示没有有意义的改进，或优势在控制模型复杂度以后消失，H1 在该范围内就没有得到支持。若结果反复出现，研究者应放弃“关系指标必然优越”的表述，重新检查是否选错了关系、任务，或者本理论在此没有新增预测。

即使 H1 获得支持，还要与发展动力系统、具身认知等同样重视关系的模型比较。胜过一个刻意贫弱的特征清单，不能证明 SDE 独有优势。理论的强近邻必须以最有力的版本进入竞争。

三、第二项假说：保护、稳定、自由之间存在可辨别的交互

H2 不是宣称三者都重要，而是提出更具体的问题：在安全与适宜支持范围内，某一条件对自主参与的作用，是否随另外条件而改变。假如保护安排相同，熟悉性不同会不会改变孩子可进入的探索方式；假如稳定支持相同，成人是否保留孩子影响活动的空间，会不会产生不同结果。

这里不能实验性制造危险、忽视或长期不稳定。可以比较自然存在的适宜情境，或在伦理允许的低风险范围内调整材料、交接与非必要提示。所有方案都应满足最低照护要求，不能把儿童权益作为估计交互效应的代价。

若预先规定的交互项没有稳定证据，而加性模型已经充分解释资料，就不应继续把“相互促进与制约”说成已得到该研究证实。也可能发现交互只在某类活动中成立这时应缩小适用范围，而不是把条件性结果写成普遍育儿规律。

另一方面，未发现交互不等于三者在哲学上可以彼此孤立。经验研究检验的是一个具体操作方案，而不是通过一个系数直接裁决整个本体论。这样的层次区分既防止过度否定，也防止把本体论当作逃避经验失败的盾牌。

四、第三项假说：婴儿反馈改变照护者，而非只有反向作用

H3 关注双向性：在控制可记录的既往状态后，婴儿某类反馈是否有助于预测照护者下一步调整，照护者调整又是否与婴儿后续活动相关。它要求真正记录两个方向的时间过程，而不是只在理论部分说“彼此影响”。

但双向预测仍不等于双向因果。两者可能共同受到活动变化、家庭安排或未测状态影响。研究需要比较替代模型，检查时间窗口，并尽可能利用安全、明确的情境变化增强辨别。不能把一张双向箭头图当成因果证明。

若成人行动主要由固定程序解释，而婴儿反馈在该任务中没有额外预测价值，就应承认这一局部关系的限制。若婴儿反馈只改变成人口头解释，却没有进入实际行动也不能宣称爱的结构已经完成重组。意义表征与行为回写必须分别观察。

H3 得到支持时，结论仍是婴儿参与关系组织，不是婴儿应为照护质量承担责任。因果参与与道德责任属于不同问题，不能从前者偷渡到后者。

五、第四项假说：改变可及通道能够改变参与轨迹

H4 可以表述为：对特定支持需要和活动而言，改善某个预先界定的可及通道，能够改变参与、迁移或调节的轨迹，且这些改变不能仅由原有标签充分预测。这里要明确支持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比较条件是什么，避免把任何温暖行为都称为有效介入。

研究应优先采用能够保障必要支持的设计。若支持本身是儿童需要的基本条件，不能随机剥夺；可以观察引入支持前后的自然过程，比较不同适宜支持方式，或使用符合伦理的分阶段实施安排。设计的因果强度与限制都要公开。

若某项支持没有产生预期变化，应检查使用是否适宜、目标是否合理、测量是否覆盖实际收益，也应允许它确实无效。不能因为理论强调可能性，就要求家庭无限重复没有根据的做法。积极发生不是对每种介入的无条件乐观。

H4 的价值在于阻止标签成为结论的终点，但它不保证所有限制都能被环境消除。身体条件真实存在，支持的收益、负担与边界也需要被认真评估。

六、第五项假说：功能关系比单一形式更有跨情境解释力

H5 提出：在经过适当文化与测量检验的范围内，照护是否实际承接婴儿信号、是否允许反馈改变活动，可能比某一种固定形式的频率更稳健地解释相关结果。这里的“功能”不能由研究者随意判断，必须有可复核的证据规则。

如果所谓功能编码在不同研究者或文化伙伴之间无法获得足够清楚的理解，就不能凭它宣布跨文化普遍性。若眼神、语言或触摸的某种具体形式，在某类活动中确实提供了额外解释，也应保留这个结果，而不是为了支持功能优先而把形式作用删除。

若功能指标并不比形式指标表现更好，或只在原始文化样本中成立，H5 就需要限制。这个失败不会证明某一种文化养育天性更优，只说明当前指标或理论推广不足。文化比较的失败，不应被转化为民族等级判断。

七、什么是能够真正约束结论的预注册

一个有用的预注册至少要说明主要问题、资料来源、纳入规则、主要结果、关键预测变量、比较模型、缺失处理和验证划分。还要说明哪些差异被认为具有实际意义以及什么结果将被报告为不支持。仅写“我们预计 SDE 有效”，不足以约束分析。

研究过程中可以遇到预料之外的问题，也可以修改计划，但修改时间、原因和影响必须留痕。原来登记的分析与后来探索的分析，应在报告中分开。预注册不是禁止创造，而是防止把结果之后的创造伪装成结果之前的预测。[R35]

还应为理论版本建立记录。若一个失败结果促使我们把“所有活动”改成“熟悉物体活动”，这是实质缩小范围；不能在下一版叙述中抹去原来较强的主张。理论发展史本身也需要可追溯性。

八、失败之后有四种不同动作

> 第一种是测量修订：研究者发现编码不可靠或关键条件遗漏，需要改进工具。第二种是边界修订：原来的命题范围过宽，应缩小到证据支持的条件。第三种是机制修订：原先认为承重的关系并不重要，需要提出新的可检验解释。第四种是放弃命题：在公平比较中反复失败，且没有充分理由继续保留其经验优势主张。

这些动作不能任意互换。测量确实有问题时，不必立刻否定全部理论；但也不能每次失败都宣布“工具还不够先进”，永远不让命题承担风险。是否修订，应依据可公开讨论的证据，而不是依据保护学派声誉的需要。

本书把这种纪律称为理论的“可终止承诺”：一项具体研究主张必须说明何时停止把它当作当前最佳解释。终止的是某个主张，不是儿童获得支持的权利，也不是研究者继续提出新问题的自由。

九、对理论有利的结果也要受到限制

显著结果可能来自偶然、选择、测量偏差或模型过拟合；不显著结果也可能来自信息不足。因此，不能只凭一次研究的一个阈值决定理论生死。需要结合效应大小、不确定范围、独立重复、设计质量和竞争解释，形成分层判断。

特别要防止从局部成功跳到体系胜利。某个关系指标预测了抓握迁移，不等于已经解释语言、亲情和自我；某项家庭支持改善参与，不等于证明三个世界已经作为实体被测量。理论越完整，越需要逐项建立证据账目。

可以把结论分成已观察的事实、在当前设计下支持的推断、尚待检验的扩展和规范性选择。这个分层不会削弱文章的力量，反而让读者知道哪些地方可以依赖，哪些地方仍需谨慎。

十、大型重复研究提供的不是一句失望结论

Lucca 等人的多实验室预注册研究检验了婴儿在爬坡情境中对帮助者与阻碍者的选择。研究测试 1018 名婴儿，按规则纳入 567 名；社会条件中选择帮助者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并未高于随机水平。[M13]这不是“婴儿没有道德”的证明，却直接限制了在该范式、样本与程序下所预期的偏好。

该研究随后发布的勘误修正了一项探索分析对习惯化状态的表述，说明主要结论没有因此改变。[M14]把勘误纳入引用，不是挑剔研究者，而是保存证据的实际版本。若理论借用一项结果，却不允许来源随着核验而更新，那么它所坚持的就不是证据，而是某一时刻方便使用的故事。

对于婴儿符号发生学，这个反例提示一条清楚的边界：某种社会选择未被重复，并不等于关系史不存在；关系史存在，也不能使该选择预测免于失败。高阶存在、具体心理能力和某个实验范式的表现，应分别受到与其尺度相称的判断。

十一、一个预测分数怎样制造虚假的理论优势

考虑一个作者构造的模型比较。基线模型只能看到孩子的月龄与当天成功次数，SDE 模型却能看到全部录像、照护者访谈和未来一周的记录。后者预测更好，并不令人惊讶；但差别同时来自信息量和未来信息泄漏，不能被归为理论结构优越。一个不公平的比较能够产生准确数字，却不能产生准确的理论结论。

公平比较至少要把信息截止时刻、原始输入、验证对象和调参机会对齐。若候选关系指标来自同一段录像，可以让竞争模型获得同一录像所提取的合理特征；若研究目标是未来一周的活动，模型构建就不能使用该周之后的观察。解释更丰富不应以偷偷提前知道答案为代价。

即使对齐以后出现优势，还要问它是可重复的实际改进，还是增加复杂度带来的样本偶然。若新增十几个关系变量，只在原样本中改善拟合，不能据此指导照护。模型的成功应在未用于选择变量的资料里出现，同时报告不确定范围和错误类型，而不是只给一个看上去领先的总分。

十二、同一个孩子的许多片段，不是许多独立婴儿

设想每个孩子都有大量录像片段，研究者随机把片段分入训练集和测试集。模型可能借助同一家庭的背景、成人声音或固定摆放，识别出熟悉个体，而没有学到可迁移的关系组织。测试分数很高，换一个家庭却失效。这样的结果不能被命名为发现了普遍的婴儿符号规律。

验证划分应与问题对应。若要预测同一孩子后来的变化，应按时间保留真正较晚的资料；若要推广到新孩子，应让整名孩子及其相关家庭记录一起退出训练；若要跨文化使用，还需要保留未参与建模的文化或地点。结构化交叉验证的一般方法文献，为这种安排提供了依据；具体实施仍须适配婴儿资料。[R36]

这三种能力并不等同。一个工具可以很好地帮助某个熟悉家庭记录变化，却不适合给陌生孩子分类；也可以在群体比较上有效，却难以预测同一孩子明天的状态。说明实际推广范围，比把一个局部工具宣传成通用发生诊断更有价值。

十三、同步的反证，需要保留共同输入

如果成人与婴儿总是相近时刻转头，一种解释是彼此协调，另一种解释是两人同时听见门外声音。简单相关不能区分。把婴儿记录任意打乱以后相关消失，也不一定解决了问题，因为打乱同时破坏了双方对共同声音的时间关系。

更有区分力的方案需要记录共同事件，或者在保留活动结构的条件下比较替代时间配对。即使如此，非平稳状态与未观察因素仍可能限制判断。此处的关键不是推荐一种万能统计操作，而是明确：一个用于排除共同原因的检验，不能把共同原因本身从对照中无意删除。

SDE 强调双向反馈，因而更应允许某些场景最终由共同输入得到较充分解释。并非所有同步都必须被归入关系共调节。承认这一点不会损害互动本体论，却能阻止经验模型把世界上所有共同变化都登记为自己的机制。

十四、没有差异，也需要说明能排除多大的差异

“没有达到显著”与“已经证明没有实际作用”并非同义。资料较少、测量误差较大时，结果可能容许从明显负效应到明显正效应的广范围；这种不确定性不能被当作等效。另一方面，若估计足够精确，已能排除事先认为有实际意义的优势，就应认真承认该主张未获支持。

因此，研究应在知道结果前说明什么程度的改进值得改变判断。这个标准需要结合任务、负担和误判后果，不能由本书提供一个适用于所有婴儿活动的固定数字。照护方案即使有微小统计优势，若需要显著增加家庭负担，也未必具有同样的实践价值。

同样，支持某项机制并不意味着每个孩子都会受益。报告分布、条件差异与可能伤害，比只报告均值更贴近本书的个体立场。但也不能事后无数次细分人群，直到找到有利小组。探索性的个体差异，应当获得新的验证机会，而不是立即被包装成精准教育。

十五、反证应留下一个可以继续工作的版本

一次失败以后，研究者应当公布原命题、原操作与实际结果，再说明修改了哪一部分。例如，将“所有活动均可迁移”改为“在熟悉支持保持时的某类活动可迁移”

就是缩小范围；它可以合理，却不能在修订稿中伪装成从未作出过更强主张。理论的发生史也需要诚实记录。

对本书而言，失败的最佳后果不是更加复杂的免责措辞，而是使下一次问题更准确。也许需要换掉无效指标，也许应放弃一个过宽预测，也许发现竞争理论已经足够解释。保留这些结果，才能使五项假说与高阶符号主张成为研究计划，而不是永远只能被证明正确的信念装置。婴儿无需为理论提供胜利；理论需要以能从婴儿的实际差异中学习，来获得继续使用的理由。

十六、让理论接受婴儿的反向教育

婴儿符号发生学最终应当具有一种特殊的开放性：它研究的不是静止对象，而是能够不断显露新差异、迫使成人修改理解的生命。若理论只允许孩子重复已经写好的故事，它就背离了自己的发生立场。

因此，验证不是在理论完成后追加的一道手续，而是理论发生的一部分。新的观察可以改变我们怎样划分整体、怎样理解稳定、怎样辨认独立，也可以改变我们对积极支持的判断。三方程、六路径与三原理只有进入这种可修改的工作，才不只是解释的装饰。

本章所提出的五项假说并不保证 SDE 获得胜利。它们提供的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机会：让 SDE 在真实问题中知道自己解释了什么、遗漏了什么，以及应当怎样继续发生。对婴儿有益的理论，不是永远不输的理论，而是愿意让证据改变自己、同时不让儿童为理论错误付出额外代价的理论。

第十一编 / PART 11

全球近邻理论对话与本体论冲突

第 51—55 章

51　从索绪尔到皮尔斯：符号是表征还是发生

52　皮亚杰与维果茨基：个体建构、社会中介与高阶符号

53　吉布森、泰伦和动态系统论：关系不是 SDE 的专利

54　鲍尔比、安斯沃思与气质适配：安全如何容纳新的“我”

55　剥夺研究、神经可塑性与伦理边界：历史能够改变什么

51

第 51 章

从索绪尔到皮尔斯：符号是表征还是发生

返回目录

一、真正的对手不能被预先写成错误

本书把符号首先理解为存在方式，其次理解为表征方式。这个转向具有明确的研究意图，但不能据此把所有传统符号学概括成“给现成对象贴标签”。如果旧理论本来就研究关系、差异、解释与变化，那么仅仅宣布符号不是静态标签，并没有完成新的理论工作。

索绪尔讨论语言单位在系统关系中的价值；皮尔斯讨论不同符号关系，并明确谈到符号在使用与经验中的发展。[R15][R16]因此，本章不采取“旧理论全是静态，SDE 第一次发现发生”的叙述。我们要比较的，是研究单位如何确定、解释任务在哪里开始，以及这些差异怎样在婴儿这个案例中产生可讨论的后果。

还有一个翻译问题必须先处理。皮尔斯所用 sign 与 symbol 并不等同；后者在其分类中有较特定的含义。SDE 中文语境中的“符号”则指向特征纠缠的粒子化存在。不能因为中文都出现“符号”，便把两套概念强行放在同一层比较，再宣布其中一方不够全面。

二、索绪尔给出的提醒：一个单位的意义不只来自自身

在索绪尔的课程材料中，语言价值与系统中的区别和关系相联系，而不是把语言当作给预先划定的事物逐个配名的清单。[R15]这一点对婴儿符号研究构成重要提醒：成人叫一个孩子“乖”，这个词的实际作用也与家庭中“闹”“听话”“懂事”等分类及使用规则有关。

下面的分析属于本书对一个作者构造情境的展开，而非索绪尔原文的婴儿理论。一个婴儿在访客面前安静，祖母说“真乖”；另一次他积极发声，父亲也说“真乖”同一个词可能承担不同评价功能。如果研究只统计被称赞次数，就忽略了这个名称在关系系统中的具体位置。

SDE 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评价怎样进入实际行动：成人是否继续等待，是否停止活动，是否允许孩子提出新的差异。语言系统中的区别并不自动等于婴儿自身的存在规定性，但它可以通过成人活动回写婴儿的发生条件。

由此，两种研究并非必须互相排斥。对评价词意义的分析，可以帮助 SDE 避免把成人表征当成透明窗口；SDE 对具体互动历史的分析，则可以追踪表征怎样获得实际后果。比较的价值在于连接不同解释任务，而不是把其中一个任务宣布为不必要。

三、婴儿不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词项

不过，本书的研究对象不能止于成人关于婴儿的称呼。即使没有一个成熟词语准确描述，婴儿的身体调节、活动组织与照护关系仍然发生。这个存在过程是 SDE 符号发生学所要放在前面的层次。

这里的“前面”是本体论上的优先，不是排除语言的时间顺序。胎儿尚未出生，家人就可能已经使用名字、亲属称谓和未来叙事；表征可以早早进入关系。但某个名称是否已经形成，不决定生命活动是否存在，也不能替代对实际互动条件的说明。

因此，SDE 要承担一个额外任务：说明为什么某个生命互动复合体可以被视为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的存在单位，而不是仅仅说明它在某套语言区别中占据位置。这个任务是否完成，必须接受前面提出的边界与关系检验，不能只靠更换符号定义得到答案。

一个反对者完全可以说：“你已经把符号重新定义为一种存在单位，那么你证明的是自己的用词，而非传统符号学错误。”这个批评是有效的警告。回应它，需要展示新定义打开了什么研究问题，以及是否产生其他定义较难提供的操作性区别。

四、皮尔斯并没有把符号关进一张标签表

皮尔斯在《什么是符号？》中区分像似、指示和依惯常使用成立的符号关系，并讨论符号如何成长；在另一组分类材料中，他也区分性质、实际事件和一般规律等符号层次。[R16][R37]这些内容足以表明，不能把他的理论描写成只研究静态文字。

对本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把皮尔斯的分类重新列成一张表，而是承认一个强近邻已经存在：符号可以涉及实际事件、习惯、解释与后续符号过程。SDE 必须进一步说明，它把婴儿自身称为高阶符号时，究竟是在提出新的存在论单位，还是以另一套语言描述已有的符号过程。

解释项也不能简单当作“负责解释的那个人”。在理论比较中，把三元符号关系直接翻译成“主体—互动—客体”会掩盖差别。三项都不等于三项可以逐字对应；结构数量相同并不是理论同一的证明。

因此，本书不提出一张强制对应表。更合适的方法，是让两种理论面对同一个具体活动，分别说明自己的问题、单位和证据，再比较重合与差异。

五、同一声“妈妈”，可以怎样被不同理论研究

设想一名幼儿在熟悉照护者离开时发出接近“妈妈”的声音，照护者回头，孩子改变身体姿势并继续表达。这是作者构造的比较情境，不对应某项已完成实验。

一种语言符号分析会关注声音形式、在语言系统中的区别以及它怎样被成人理解。皮尔斯取向可以关注这段声音如何与对象、惯常关系和解释后果相联系。SDE 则进一步把声音放回身体状态、先前照护、当下分离、成人回头与孩子后续行动所组成的复合体，研究这些关系怎样形成可再次调用的单位。

但必须承认：后一个问题并不天然被皮尔斯排除。若皮尔斯取向同样追踪这些关系，SDE 就不能仅以“我也看见了互动”宣布超越。真正可能形成区别的是：整体性、稳定性与独立性的判据，是否帮助我们在不同活动之间作出了更清楚、可重复的边界判断。

例如，孩子只在一个固定情境中发出该声音，与在不同照护活动中使用不同形式恢复相似关系，是不同的研究现象。SDE 可以提出分层分析，但它还需要证明这种分层的解释价值，而不是把层数更多当成理论更深。

六、从“符号指向什么”推进到“这个符号怎样成立”

本书的主张可以被更精确地表达为：在分析指称与解释之前，先考察某个可被调用的整体怎样从互动中成立；成立以后，再研究它如何进入表征、传播和其他符号过程。这个顺序不否认表征反过来改变成立条件。

对婴儿而言，某种调节组织可能尚未被成人正确命名，却已经在反复活动中发挥作用；成人的错误命名又可能改变后续回应，使原有组织发生变化。存在与表征因而既需区分，又能通过具体路径相互影响。

这种分析的潜在贡献，是避免两个缩减：把婴儿缩成成人意识中的形象，或者把符号缩成脱离生活历史的抽象标记。但这些缩减并非所有传统理论必然犯下的错误。SDE 应当针对具体解释中的不足，而不是把整部符号学史设为一个方便击败的对手。

七、符号层级扩张也带来新的证明负担

如果从哭声、动作、关系一直到整个婴儿都可以被称作符号，研究范围确实扩大了，但概念也面临失去边界的危险。高阶符号不能只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同义反复。需要说明哪些局部关系被聚合，聚合依据是什么，高阶组织怎样通过实际路径改变局部活动。

还需要区分不同层级的独立性。一个动作关系可以离开最初材料被重新调用，整个婴儿的存在却不能因此被理解成离开照护与环境的孤立自存。层级转换时，判据的操作含义也会变化，不能用同一句话包办所有对象。

这正是婴儿案例的挑战所在。它迫使 SDE 说明存在连续性、行动组织、社会表征和自我叙述之间的联系，而不把它们合成一个含混的“我”。理论如果能够在这里保持区分，才有理由讨论更广泛的高阶符号。

八、一个公平的理论比较矩阵应当回答什么

比较不应只列“旧理论缺少、新理论具有”。每一方都应回答同样的问题：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哪些关系被视为必要；怎样处理时间和历史；怎样区分存在与解释；什么观察可能迫使修订；在哪些问题上暂不提供答案。

对一个具体婴儿事件，可以分别形成最强解释，再让熟悉各理论的研究者检视是否被公平呈现。若几种解释对同一结果都兼容，就报告兼容，而不是人为制造对立。只有当它们提出不同的可观察预期时，才进入经验区分。

有时，新理论的贡献可能是整合与澄清，而不是替代。例如，它把身体行动、关系历史和表征回写放进一个共同的研究协议，使不同学科更容易对话。这种贡献可以真实而重要，却不应被夸大成所有前人都没有想到互动。

九、符号发生学的自我要求

从索绪尔和皮尔斯回到婴儿，我们获得的不是一场轻易的胜利，而是一组更严格的问题。名字不是存在本身，语言区别不是完整生命历史，解释过程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外壳。婴儿符号发生学必须在这些层次之间建立关系，同时避免把它们混为一谈。

本书所坚持的“首先存在、其次表征”，最终要体现在研究行动上：先观察婴儿怎样参与，再检查成人怎样理解；先说明关系怎样成立，再讨论名称怎样传播；先保留那个具体生命的差异，再让理论接受这些差异的挑战。

只有这样，“符号”才不会成为另一张更抽象的标签。它应当帮助我们看见一个独特的“我”怎样在无数关系中持续发生，而不是借宏大的哲学语言，再一次替这个婴儿决定他已经是什么。

52

第 52 章

皮亚杰与维果茨基：个体建构、社会中介与高阶符号

返回目录

一、一块布究竟把什么遮住了

把一件熟悉的玩具放在垫子上，再用布遮住一部分。孩子伸手，先碰到布，随后抓住露出来的边角。成人没有立即把玩具交给他，而是看着他的动作，适当地调整位置。下一次，孩子改变了伸手的方向。这个为比较理论而构造的场景没有特殊设备，却包含一个困难问题：改变的究竟是孩子关于物体的认识，是他的行动组织，是成人提供帮助的方式，还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成年人容易把终点当成全部事实：拿到了，就是会；没拿到，就是不会。但拿到同一玩具可以有很不相同的过程。一个孩子只是握住成人送到掌心的物体，另一个孩子调整了姿势和动作，第三个孩子通过目光使成人改变物体的位置。结果都是玩具到了手里，发生的结构却未必相同。把动作的完成与能力的形成分开，是本章的起点。

这个问题并不是 SDE 第一次提出。皮亚杰研究感觉运动活动怎样产生新的组织，维果茨基研究社会活动与符号中介怎样参与心理功能发展。他们都不是把孩子看成一只等待灌输的容器。本书与他们对话，不是寻找两个方便否定的旧标签，而是检查：在已经承认活动、建构与社会关系之后，把婴儿自身理解为高阶符号，是否还带来了新的分析责任。

二、皮亚杰的贡献不是一张年龄表

皮亚杰在《儿童智慧的起源》中，把智力的发展放在有机体与环境的适应关系中讨论。同化与顺应并非两个孤立动作，而是对既有组织吸收经验、又因经验而调整的

不同侧面的说明。其研究关注感觉运动活动如何逐渐协调，不能缩减为某个年龄对应某项测验成绩。[N01]

从这一贡献出发，布下面的玩具就不再只是等待被看见的现成答案。抓、拉、看、转向等活动如何衔接，决定了孩子能够怎样处理当下问题。这里的“建构”也不是随意想象：布的摩擦、身体的支撑和物体的位置会实际约束活动。一个解释若说孩子只需改变观念便能取到任何物体，就已经离开了需要解释的事件。

SDE 继承的，是必须说明组织怎样形成的要求；提出的进一步问题，则是这个组织的边界应画在哪里。若只把“取物图式”放在孩子一边，把成人和材料写成外部条件，我们可能低估成人等待、材料摆放与先前互动对组织成立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证明皮亚杰理论必然排除这些条件。真正的比较必须针对一个具体解释，而不能从“个体建构”四个字推出“孤立主体”的罪名。

因此，本书不把同化翻译成 E，把顺应翻译成 D，再声称两套理论完全一致。概念在原理论中承担的任务不同，字母对应会遮蔽差异。比较应当先问：一个新的行动整体如何成立；哪些变化只是既有动作的重复；哪些变化改变了后续可进行的活动。回答相同问题，比强行对齐术语更有价值。

三、维果茨基让“帮助之中”成为发展问题

维果茨基在《社会中的心智》（Mind in Society）的相关讨论中区分已经能够独立完成的活动与在协助中能够达到的水平，以最近发展区追问正在成熟的功能。他还强调社会历史形成的符号系统能够中介活动。相关论述不能简化为“成人告诉答案，孩子把答案记住”。[N02][N03]

这给婴儿符号研究一个重要启发：孩子在帮助之中做成的事情，不应一律从发展记录中删除。但也不能反过来，把成人完成的结果全记到孩子名下。关键是帮助怎样分配了活动，孩子实际承担了什么，反馈又如何改变下一步帮助。协助不是一个只有“有”和“无”的开关。

须同时保留历史与年龄边界。最近发展区的经典论述并不是一套专门针对新生儿的标准化工具；“支架”一词后来在 Wood、Bruner 与 Ross 的辅导研究中得到明确运用，

该研究面对的是三至五岁儿童。将这些思想延伸到婴儿活动，需要另建观察规则，不能把一项幼儿任务的发现直接宣布为所有婴儿的规律。[N04]

在本章场景中，成人扶稳垫子可能是必要的参与条件，把玩具推入掌心则可能代替了目标动作。两种行为都叫“帮助”，其发展意义却不同。对于需要身体支持的孩子，某些帮助还可能长期保留。独立性的研究不能把撤掉所有支持当成最后目标，否则所谓发展评价就会惩罚那些通过辅助条件有效参与的人。

四、共同完成不等于共同发生已经得到证明

一次活动有两个人参加，只能说明人员构成，尚不能证明发生了相互规定。要说明共同发生，必须追踪一个方向怎样改变另一个方向：孩子的动作是否使成人调整，成人调整是否改变孩子下一步活动，这些变化是否进入后来的组织。如果成人完全按程序移动材料，而孩子没有实际影响程序，共同在场不等于充分的双向组织。

另一方面，孩子改变了成人，也不意味着双方承担同样责任。婴儿的抗拒可以改变照护方式，却不能因此被要求为成人的不耐烦负责。SIO 中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关系事实，道德与照护责任则要根据能力、权力和依赖程度另作判断。理论越强调双向性，越需要守住这一不对称。

我们可以把假设中的活动写成连续记录。第一步，孩子看向玩具却没有伸手；第二步，成人把玩具移近；第三步，孩子转身而非取物；第四步，成人意识到原来的姿势不便，重新提供支撑；第五步，孩子开始探索。此处没有哪个动作单独拥有全部解释权。尤其不能因为最后一步成功，就宣布第二步移近是决定性原因。

这段记录把“成人有教导”和“孩子有学习”连接起来，又不把两者混同。一个成人可以教得很投入，孩子却没有获得新的活动机会；一个孩子也可能在成人没有设定教学目标时形成新的协调。研究者必须分别记录教学意图、实际组织、孩子的参与与后续变化。

五、从图式和中介进入高阶符号的成立条件

SDE 提出的高阶符号，不是给上述过程加一个总称就算完成。它至少要解释局部活动如何互相约束，为什么这种组织能够跨越一次事件，以及它如何改变后来局部活

动的安排。本章据此提出三个问题：取物、目光和求助之间是否形成可以辨认的协调这种协调在合宜条件下能否再次出现；换一种材料或适当减少偶然提示时，关系是否仍有组织能力。

整体性在这里不是活动越多越好。一个孩子同时看、叫、挥手，不必然形成有效整体；也可能是彼此竞争的反应。稳定性不是动作轨迹完全一致，而是在条件变化中保持某种可说明的功能关系。独立性也不是摆脱身体与他人，而是不被最初某个偶然线索彻底绑住。这三项判据都必须注明研究层级。

对局部取物关系的检验，不能直接推出整个婴儿的“我”已经被测量。高阶“我”涉及跨活动、跨关系和跨时间的连续组织。研究可以从局部入手，但需要避免两种跳跃：一次成功被当作成熟自我，或者局部任务尚未成功被当作这个孩子没有独特主体地位。能力判据与人格尊严不是同一张表。

本书说符号首先是存在方式，指的是这种实际组织不以成人正确命名为成立前提。孩子已经可以用动作改变共同活动，即使成人尚未给这个能力起名。随后，名称、期待与教育安排又可能回过来改变活动。存在与表征因此有层次之别，却并非两条互不接触的线。

六、三界不是把同一行为重复说三遍

在取物事件中，现实侧的分析记录支撑、位置、动作及其可实现关系；理念侧的分析考察预期、分类与后续使用的可能组织；自我侧的分析关注属于这个孩子的感受取向和参与连续性。三界在同一事件中纠缠，不意味着每一侧都已经有可以直接观测的成熟形态。

孩子连续看向布的边缘，可能支持某种预期正在形成，也可能有更简单的注意解释。孩子停止伸手，可能表示疲劳、兴趣改变或不适，不能被写成“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研究者要把观察与推断分开，保留竞争解释。三界的作用应当是使证据要求更细，而非使任何动作都自动变成宏大的心灵事实。

设想孩子已经会在母亲帮助下拉布取物，换到父亲身边却只伸手等待。这个差异不宜立即解释为“不会迁移”。也许支撑改变，也许提示改变，也许与父亲共同活动

的历史不同。SDE 要求重新界定具体复合体；皮亚杰取向会追问图式协调，社会文化取向会追问协助组织。几种问题可以共同成立。

只有当我们事先规定了要比较的条件，才能辨别理论增量。若所有理论都预测相同结果，研究应报告它们在此处兼容；若 SDE 只把“图式加情境”改称“高阶符号”，却没有改变观察和判断，就没有完成更强的说明。

七、一个可以公平比较的研究设计

可以设计一个低负担、无伤害的探索任务，在保持必要支持的前提下比较两种合宜协助。一种由成人在孩子动作之后调整材料，另一种提供相近数量的协助，但时机不依赖同一孩子的即时动作。任务不得涉及喂养、安抚或其他不可延迟的需要；孩子退出或不适时立即停止。这只是研究设计提案，不是已实施的实验。

两种条件都可能使孩子完成当前动作。真正的问题是，在后来安全的新材料情境中，哪一种历史与更灵活的参与相联系。SDE 可以把“孩子对帮助的实际影响”作为候选变量，社会文化或动力系统模型也可以纳入相同信息。比较必须给它们同样的数据、建模机会和验证范围。

即使发现反馈相关的协助有优势，也只能支持一个限定命题，不能据此宣布 SDE 独有正确。双向反馈的重要性并不是其专利。可能的增量在于：三项符号判据能否预先确定哪种组织将迁移、哪种只是情境性完成，以及这样的判断是否比已有解释更清楚、可靠、节省条件。

反之，若调整协助的时机并不影响后续参与，或者简单的练习量已经解释差异，就应缩小相关主张。研究者还要检查任务难度、测量敏感性和样本范围，而不能用“高阶纠缠太复杂”永久豁免检验。复杂性应使研究分解得更认真，而不是使理论免于失败。

八、一个真正的分歧：我们究竟在成就什么

皮亚杰问题可以突出行动组织的变化，维果茨基问题可以突出协助与中介的转化，SDE 婴儿符号问题则试图把这些变化放回独特生命的连续发生之中。它关心的不仅是

一个任务能否完成，还包括这次活动怎样改变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参与的关系，以及成人如何因此改变对孩子的组织方式。

这里的“更高阶”不是等级更高、价值更多，而是解释单位包含了更多相互规定的层次。一个较慢形成动作的孩子，并不因此比动作早熟的孩子低一阶。高阶描述若被拿来排儿童的高低，就把本体层级误作价值等级，背离了本书的目的。

也不能把独特性浪漫化为拒绝一切共同知识。共同的发展研究使我们能够识别风险、提供支持和比较不同方式；个体历史使这些知识在一个具体孩子身上得到修正。两者相互制约：没有共同证据，照护容易变成任意经验；没有个体修正，证据容易变成压在孩子身上的模板。

因此，本章不以一套理论取代另一套理论作结，而是确立一种合作中的严格性。建构不能被写成孤立制作，中介不能被写成单向灌输，发生不能被写成无条件赞美变化。三者都必须说明：什么关系在改变，改变通过哪条路径发生，孩子究竟因此获得了什么新的参与能力。

九、把一次教学重写为两份相互改变的记录

还可以把布与玩具的例子展开成两个并行记录。孩子一侧记录视线、姿势、接触与重新尝试；成人一侧记录预期、提示、等待和调整。两份记录使用同一时间轴，但不预先认定任何一侧始终领先。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区分共同在场与真正的相互影响。

设想第一次成人提示以后孩子没有行动，成人把原因归为“不理解”；第二次改变支撑，孩子开始尝试；第三次即使减少提示，活动仍然继续。这个构造序列会使成人修订原解释：先前没有完成，未必是缺少概念，也可能与进入活动的条件有关。与此同时，孩子是否获得新的组织，仍需在后续合宜活动中继续观察。

成人的学习与孩子的学习因此相关而不相同。成人可能学会了辨别支持，孩子可能学会了协调行动；两者通过活动连接，却不能合并成一个“共同进步分数”。如果成人理解改善而孩子活动暂时没有变化，可以报告前者，而不强行补写后者。若孩子在成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方式，也应保留这种不对称。

SDE 的三方程可以帮助标明分析位置。S 是这次能够观察到的不同显露，不是孩子本人；D 是从提示、等待到改变支撑的实际差异序列，不是笼统的努力；E 是使这些动作互相规定的关系组织，不是房间里所有因素的清单。只有把三个含义具体化，方程才有机会组织新的问题。

例如，S 变化而原先假定的 D 没有改变，可能提示我们漏掉了身体状态或历史条件；D 改变而 S 保持，可能说明不同路径可以实现相近功能；E 中的某项关系改变却毫无后果，则应重新审查它是否真有重要作用。这些不是方程给出的必然结论，而是由方程生成的互查方向。

对皮亚杰取向，可以进一步问图式怎样协调；对维果茨基取向，可以问协助如何重新分配活动；对 SDE，可以问上述变化怎样进入婴儿与照护者各自的高阶历史。三份解释应在相同记录上展开。这样，理论比较不再是抽象术语之间的争论，而是对同一生活过程不同解释责任的比较。

这种双记录方法也有局限。影像不直接揭示感受，成人自述可能受记忆影响，观察本身也会改变现场。方法的意义在于暴露这些局限，使不同证据可以相互校正，而不是宣称已经把关系完整捕捉。一个能够记录自己的不确定性的方案，比把所有空白填成理论语言更可靠。

十、真正的比较对象应是局部解释，而非整个人名

皮亚杰与维果茨基的理论都包含丰富的内部发展。把前者写成只看个体，把后者写成只看社会，随后宣布 SDE 把两者结合起来，这种三段式叙述太容易成功，也太少承担责任。前文所引原著已经提示，两种传统都需要认真处理活动与发展，只是问题安排及解释重点不同。[N01][N02]

因此，本节不替两位思想家宣布一个统一的婴儿实验预测，而是构造三个有限模型，检查同一现场能够提出怎样不同的问题。图式组织模型关注孩子怎样协调已有动作；中介组织模型关注帮助与符号如何重新分配活动；高阶符号模型则追踪这些组织怎样跨活动保留，并回写孩子和成人后来的参与。它们是本书为比较设定的工作版本不等于三套理论的全部内容。

比较的价值在于让问题分工清楚。如果三个模型最终都需要相同记录、提出相同预测，那么在该任务上就主要是解释语言不同。若出现可以事先说明的预测差别，才有理由进行经验辨别。不能把问题覆盖得更广，当成每个具体机制解释得更深的替代证据。

十一、把一项活动拆成进入、承担与接续

继续使用布与玩具的构造情境，可以把共同完成分成三个环节。进入指孩子能否实际接近材料；承担指关键调整由谁完成；接续指本次经验怎样影响下一次。成人扶稳身体可以改善进入，把玩具直接推入手中可能承担了目标步骤，而在孩子尝试以后调整材料，则可能改变双方接续活动的方式。

这三个环节并不对应三种固定养育好坏。身体支持可能长期必要，成人直接递物也可能只是满足当前生活需要，未必以训练为目的。研究者必须先说明活动目标，才知道哪一步有资格被当作能力证据。不能因为一种帮助没有促成自主动作，就贬低它在照护中的其他价值。

对图式组织问题，可以追踪孩子是否改变了拉、看、抓之间的协调；对中介问题，可以追踪成人的提示是否逐渐转化为孩子能够参与的组织；对高阶符号问题，则进一步观察这些改变是否进入不同材料、不同关系与后续安排。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的证据终点，不应在第一个环节成功后替后面全部作答。

十二、三类转移情境，迫使机制显出边界

> 第一类情境改变材料外观，保留可行动关系与必要支持。如果孩子仍能组织相似调整，可以支持某种跨表面形式的保持，却不能直接证明跨照护关系的迁移。第二类情境保留材料，改变由哪位熟悉照护者参与，同时尽量保持关键支持；它更适合追问关系历史与提示约定的作用。

第三类情境保留材料与人员，却改变谁决定活动下一步。原先成人逐步提示，现在在合宜范围内给孩子接续机会。如果活动中断，可能是孩子尚依赖提示，也可能是新的等待规则尚不熟悉；若继续，也要检查究竟哪些组织被孩子承接。这些是研究设计提案，不是要求家庭撤除必要帮助的训练流程。

三类转移不能互相代证。换颜色仍成功，不足以断言孩子已能在任何社会情境中独立使用；更换照护者后失败，也不足以断言动作图式不存在。将转移条件分别描述使不同理论能够在相同资料上提出可检查的解释，而不必争夺一个含义过宽的“迁移成功”。

十三、共同建构何时只是成人替代的美称

设想成人非常善于预判，孩子还未尝试，材料已经被调整到必然成功的位置。最终活动顺畅，孩子也可能愉快；但研究若把全部成果写成孩子掌握了新组织，就抹去了成人实际承担的工作。共同完成的证据，不能自动兑换为个体独立掌握的证据。

另一种误差发生在反方向。孩子通过转头、停顿或重新接近，使成人改变原有计划；研究者却只登记成人随后完成的帮助，忽略孩子对帮助形态的影响。这样，婴儿就被写成了没有因果位置的接受者。两种误差都需要通过连续记录纠正，而不是简单把功劳从成人转移给孩子。

高阶符号研究应当保留贡献的非对称性：一些协调主要由成人承担，一些由孩子承担，一些只有在双方接续中才能成立。它们可以随着发展改变，却不必走向所有支持最终消失。对具有长期支持需要的孩子，活动分工改变与表达效力增加，同样可以构成重要发展。

十四、从任务内进步到跨活动改变，需要新增证据

某次拉布活动更熟练，尚不能说明孩子的整个“我”发生了可测量的重组。要提出更高阶主张，可以继续追踪：新的求助或尝试方式是否进入其他适宜活动；成人是否依据孩子的变化重新安排材料；这些安排是否又改变孩子后来的参与。高阶性不来自研究者把标题写大，而来自连接得到实际支持。

然而，连接也可能中断。孩子在一种物体关系中有所进步，其他活动仍然不变；成人更新了理解，却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无法调整安排；新的安排出现，孩子却暂时没有使用。这些结果并不取消局部进步，反而说明各层机制并不自动串联。SDE 的作用应是让断点可见，而不是把所有局部变化写成整个人的全面升维。

从三界看，实际协调的变化、预期的调整以及参与取向，需要分别寻找观察入口。可以有某一侧证据较充分，另一侧暂时未知。不可分割是关于发生关系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对三个侧面的知识必须同步充足。容许这种证据不对称，才能避免用本体论的完整性弥补经验材料的空缺。

十五、理论对话最终要改变研究者怎样行动

这场比较若只留下三个新的名词对应表，工作尚未完成。更有用的结果是一套共同问题：活动可否进入，关键步骤由谁承担，反馈是否改变了帮助，什么关系得到保持，在哪类转移中失效，以及局部改变是否进入其他活动。不同理论可以据此提出不同答案，也可以承认局部兼容。

对 SDE 而言，潜在原创性在于将存在单位的形成、实际帮助的分配、表征对照护的回写与高阶历史连续性放进同一研究协议；它的有效性则需要这套协议确实帮助发现旧记录遗漏的区别。若没有新增区别，整合价值仍可讨论，但不宜宣称机制已经超越。婴儿符号发生学从前人那里继承的不是等待否定的错误，而是必须继续回答的问题；它对前人的推进，也应发生在这些问题获得更精确处理之处。

十六、从被帮助的孩子到参与形成帮助的孩子

回到那块布。成人最初以为任务是把玩具藏起来，再看孩子是否聪明。经过观察，任务本身改变了：怎样摆放才让孩子有行动机会，哪种提示真正被使用，什么时候继续帮助反而替代了探索。孩子没有向成人讲一套理论，却已经通过参与使成人修改了理论在现场的用法。

这就是本章对婴儿高阶符号的最低要求：他不是教学过程中的被加工材料，而是能够以自己的身体条件和活动历史改变过程的存在。这个“我”无需等待语言证明其价值，却会在语言、行动和社会关系中不断获得新的组织。

下一章将把问题推向一个更强的近邻：如果生态心理学与发展动力系统论也已经把身体、活动、环境和历史放在一起，那么 SDE 究竟还需要承担什么不能回避的理论工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只靠“相互纠缠”四个字。

53

第 53 章

吉布森、泰伦和动态系统论：关系不是 SDE 的专利

返回目录

一、一个圆环放在这里和放在那里

桌面上有一个尺寸适宜、经过安全检查的玩具圆环。对已经能够稳定坐姿的孩子，它可能是可以伸手拿起的物体；对仍需支撑的孩子，圆环的可接近性取决于姿势、距离和帮助方式；对正在转身看别处的孩子，它甚至没有进入当前活动。这是作者构造的分析情境。圆环没有变成三件不同的物质材料，三个孩子却没有面对同一个完整的行动问题。

如果把圆环的大小、重量和颜色列成一张表，再把孩子的月龄、力量和兴趣列成另一张表，我们仍然不知道手与圆环如何在这一刻相遇。两张表提供条件，却没有自动给出关系。需要解释的是：哪些条件共同使某种行动成为可能，哪些条件使同样的行动暂时不可进入。

SDE 十分重视这一点，但它不能因此宣称只有自己承认关系。吉布森的可供性研究与发展动力系统论，恰好构成最不能轻视的近邻。与弱化的理论比较，可以轻易获得语言上的胜利；与真正强的理论比较，才会逼迫符号发生学说明自己的单位、层级和证据。

二、可供性不是物体上写好的使用说明

吉布森提出可供性时，强调环境与动物之间的互补关系。能够支持某种行动，不是仅凭一个脱离行动者的物理尺度就能决定的；同样的表面对于不同身体可以构成不同的行动条件。这一论述把知觉与行动可能联系起来，不能被改写成“物体先有固定意义，动物再把意义读出来”。[N05]

在圆环场景中，可拿取性并非孩子的单方能力，也非圆环的单方属性。这样的关系分析，已经对“先有完全独立主体，再接触完全独立客体”的简单图景提出挑战。SDE 若把吉布森当作这种简单图景的代表，就会错过真正能够推动自身的问题。

不过，可供性与符号粒子化也不是两个完全同义的说法。一个行动机会可以存在而尚未被某个孩子实际利用；一次利用可以发生而未形成可反复组织的模式；一种组织还可能进一步进入亲情、期待和自我相关经验。SDE 希望研究这些层次如何连接，但不能把其中所有变化都压成“可供性变多了”。

由此可以提出本章的第一个分析区别：行动可能、行动实现和符号组织不是同一件事。安全、可及的玩具布置提供了可能；孩子实际参与使可能成为事件；跨事件的关系保存、调整与再调用，则构成符号发生的研究对象。三者相关，但哪一步成立都需要自己的证据。

三、泰伦的工作使历史进入当下动作

Thelen、Schöner、Scheier 与 Smith 在 2001 年的研究中，用动力场模型讨论婴儿的 A 非 B 错误，把观看、动作计划、到达动作与记忆等过程的耦合纳入解释，并用模型提出可与实验比较的预测。该工作并非只是说“发展很复杂”，而是让具体过程之间的关系承担说明任务。[N06]

这个近邻对 SDE 提出严厉而有益的要求。若动力系统模型已经处理历史、情境、相互作用和变化，SDE 仅仅把这些词换成“差异”“纠缠”“回写”，就没有增加机制。更复杂的词语也不会自动带来更好的预测。理论之间的区别必须落在研究者会做什么不同的记录、如何划定单位、预期哪种结果上。

但动力模型也不会因为形式明确，就自动回答所有存在论问题。一个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伸手方向，而不以解释“整个婴儿如何保持同一性”为任务。这里不是模型缺陷，而是解释范围不同。SDE 可以承担跨活动单位的整合任务，但必须承认：范围更广同时意味着更多证明责任，而非天然更高明。

公平的比较应允许两种理论互相改进。动力模型可以帮助 SDE 把“稳定”从形容词变成可检验的条件；符号发生学可以要求研究者明确某个局部模型怎样进入对高阶

个体的理解。互补不等于已经证明两套体系统一，也不要求为了维护学派界限制造冲突。

四、把三方程从宣言变成工作问题

在本书的记号中，S 是显露，D 是差异序列，E 是特征纠缠；S 不是 SIO 中的主体简称，E 也不是环境一词的英文缩写。三方程 S=F(D,E)、D=G(S,E)、E=H(S,D)，规定了三个研究方向，而不是已经估计好的婴儿发展函数。

面对圆环，我们首先描述 S：孩子看向哪里，手如何移动，动作是否中断，后续是否继续。然后追踪 D：圆环位置、孩子姿势、帮助时机和先前尝试怎样连续改变。最后提出 E 的候选结构：哪些身体、材料、注意与照护关系相互规定，使某种显露能够成立。E 不能因为不可直接看见，就成为可以任意添加的解释物。

三方程的实用性在于强迫研究者反向检查。若原先认为只需改变距离便能改善参与，但孩子的动作仍然受限，就要检查支撑或目标是否定义错了。若孩子出现新的动作，成人随后改变摆放，新的 S 又实际改变后续 D。若这种改变持续重新组织材料与照护，E 的候选描述也需要更新。

这不是三种理论语句轮流套在同一事件上，而是三次不同的责任追问：结果怎样成立，过程怎样被改写，组织怎样重构。每一个答案都应指向可描述的关系。缺少这一要求，三方程只能作为启发语言，不能冒充解释模型。

五、高阶符号不能成为看不见的第四种力量

高阶“我”不是躲在感觉和动作后面的一位小指挥者。它不在三个世界之外发号施令，也不凭借“整体”这个名称对身体施加神秘影响。所谓高阶组织回写局部，必须通过具体路径实现：过去形成的预期改变注意，活动习惯改变姿势，照护关系改变可接近材料，语言解释改变成人的下一步行动。

因此，局部与整体并不是两种互相争夺因果的实体。整体约束通过局部关系发生，局部改变又可能重新组织整体。一个家庭建立了安静玩耍的习惯，这种高阶描述的实际作用可以表现为谁在何时关掉噪声、把什么材料放在何处、怎样回应退出，而不是另有一个叫“家庭氛围”的不可检验力量。

同样，一个婴儿形成较稳定的求助组织，不是他拥有了某种永恒求助本质。我们需要看到：在哪些情境中，身体转向、发声或目光能够调动支持；换一个活动是否仍然有类似组织；成人的变化是否使该组织失效。边界是定义的一部分，不能等发生失败以后才临时补上。

这也防止了泛化：不是任意一群 SIO 放在一起就构成高阶符号。研究需要说明聚合的承重关系、可维持的边界和可追溯的连续性。若只是同一天发生过的事件清单，尚不足以称为一个有组织的高阶单位。

六、从走路到照护语言：跨尺度问题怎样进入

Karasik、Tamis-LeMonda 与 Adolph 研究爬行和行走婴儿的物体交流及母亲回应，发现两类活动方式与不同的交流机会和成人言语反应相关。其价值在于让运动变化与社会互动进入同一观察，而不是证明走路本身能够单向决定语言发展。[N07]

本书由此提出一个研究方向：局部行动关系的改变，是否通过可定位的中间环节改变较大尺度的共同活动。这里的中间环节不能省略。孩子能够移动到成人身边，不等于成人必然理解他的意图；成人作出回应，也不等于孩子已经形成更复杂的自我叙事。每一步都可能受到不同条件制约。

为了分析这种过程，可把观察尺度分开。短尺度记录一次趋近、展示与回应；中尺度记录同类活动在一天或一周中的组织；长尺度追踪家庭如何调整材料、时间和理解。跨尺度不是把三种记录相加，而是检查某种改变怎样从一个尺度进入另一个尺度。

例如，孩子开始主动把物体带到成人身边，成人不再只把玩具放在固定位置，而开始留出共同活动空间。这个构造案例提出的是一条可观察的路径：行动变化改变照护安排，照护安排又改变后续行动机会。若记录只显示成人说话更多，而没有这条路径，就不能宣布整个高阶结构已经重构。

七、路径次序为什么值得研究

两个孩子最终都能够拿起圆环，不代表他们获得了相同的关系组织。一个孩子先通过稳定支撑进入动作，再尝试不同材料；另一个孩子先对材料产生兴趣，随后成人

调整支撑。终点相似，进入路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路径差异必然造成长期差异，而是提示终点测量可能遗漏历史。

六路径在这里可以被用来提出不同进入次序。由某个新显露出发，重新检查纠缠再调整差异，是 S→E→D；由已经能够改变的条件进入，观察活动差异再看显露，是 E→D→S。实际活动可以往返、多次循环，不能强迫它只经过三个整齐步骤。

关于次序的候选假说可以具体化：在终点完成率与帮助总量相近时，是否存在某种先前参与组织，使孩子在后续材料变化中较少依赖同一偶然提示。这个问题对动态系统研究并不陌生，不能被称为 SDE 独有发现。本书可能提供的是一套把进入次序、符号判据与照护改写连接起来的记录协议。

若协议只能事后重述已发生的路径，而无法事先区分哪些历史值得记录，它的研究价值就有限。若增加路径变量只提高训练资料中的拟合，却不能推广到新的活动，也不能宣布获得了更强的发生解释。历史越丰富，越需要防止研究者从中挑选有利故事。

八、一个不靠削弱对手的比较方案

可在同一批低风险日常观察中建立三类描述。第一类保留动作次数、完成率等单项摘要；第二类采用充分表达历史与情境的动力系统模型；第三类加入事先定义的符号组织判据。三者应获得同样的原始资料、相近的模型选择资源，并在同样的未来任务中比较。

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第三类是否总能拟合得更好，而是额外结构是否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可以复核的判断。若两类关系模型表现相近，SDE 的贡献可能主要是概念整合或照护沟通；若预测更好，还须检查是否只是模型容量更大；若更差，则需要修改判据，而非贬低任务不能理解哲学。

一个特别有力的反例是：原先被称为“承重”的关系改变后，活动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一个被忽略的简单条件决定了结果。这时，整体性判定必须修正。另一个反例是所谓稳定只能在原观察者的编码中成立，换人记录就消失。那说明我们可能稳定地保存了自己的解释，而不是孩子的组织。

也应保留尚无结论的情形。资料太少、孩子不愿参与、任务无法安全区分，不意味着理论得到支持或否定。研究者可以暂缓判断；不能因为急于完成体系，就把不确定性变成肯定语气。谨慎不是放弃问题，而是为问题保留继续研究的资格。

九、稳定组织与暂时吸引状态之间的区别

发展过程可以出现反复回到某种行为的现象，但反复本身还不能告诉我们这种组织是否有益、是否能够迁移，甚至不能保证我们已经找到适当的解释单位。SDE 的符号稳定性，需要与具体功能、条件和层级一起讨论，不能把任何重复都称为已成符号。

以圆环为例，孩子可能始终采用同一个方向伸手，因为摆放与提示始终相同。另一种情况是，摆放变化以后，他能够调整动作而实现相似参与。前者是轨迹重复，后者是关系在变化中的保持。两者都可能值得研究，却不应由相同的稳定分数直接代替。

这也使“独立性”的含义更清楚。我们不是要求孩子从环境中抽离，而是问功能是否能够由不止一种具体形式承接。必要支撑保持，材料变换或非必要提示改变以后活动能否继续？若能，支持的是一种有边界的灵活性，而不是抽象的完全自主。

高阶符号的层级可以据此逐步建立：先定位一次活动的协调，再追踪协调在多个事件中的重复与变奏，最后检查它是否进入其他活动或共同安排。每一次向上推进，都要有可追溯连接。不能因为局部出现稳定，就直接宣布已经测到全部人格；也不能因为全部人格无法测量，就放弃局部的严格分析。

一个有价值的对照来自组织改变而表面结果暂时不变的情况。两次孩子都拿到了圆环，但第二次的成人帮助方式不同，孩子在过程中承担了更多调整。当前完成率无法区分它们，未来材料变化却可能区分。这里提出的是待检验问题，而非从参与更多直接推导未来更好。

相反，如果未来结果仍然没有差异，或者差异完全由已知动作熟练度解释，便应承认当前高阶描述尚未增加预测。它仍可能帮助成人沟通，但不能同时占据未经证明的机制优势。区分解释层级，也就是区分不同贡献。

这样的分析使 SDE 与动力系统研究有了真正的连接面：二者都需要处理时间与条件，而 SDE 额外提出符号单位怎样成立、不同成立条件如何连接存在与表征的问题。

这个额外问题能否转化为可用知识，取决于方法是否产生了新的、可复核的区别，不取决于概念听起来多么宏大。

十、动力系统的力量在于关系产生具体后果

Thelen 及同事关于婴儿持续伸手的动力场研究，将动作计划、记忆与当前输入等过程连接起来，用来解释 A 非 B 错误及其条件变化。[N06]这项工作的价值不只是提醒发展具有复杂性，而是要求关系经过明确形式以后产生可检查的预期。SDE 若要深化机制，就需要接受同样的约束。

下面构造一个本书自己的最小动力模型。它不是 Thelen 模型的缩写，不是神经系统的拟合，也不是对真实婴儿参数的估计。其任务只有一个：把“稳定能够容纳变化”“历史能够改变转折”“同样输入未必得到同样结果”这些语句，变成可以推导其成立条件与失效条件的命题。

模型越简单，越应明确省略了什么。它不包含语言、亲情质量、疼痛或完整身体运动；只能演示一个抽象选择倾向如何随驱动改变。对这个模型进行数学检验，可以检查推理，却不能证明婴儿按照它运行。形式正确是机制研究的一道门槛，不是经验验证的替代品。

十一、一个选择变量如何拥有两个稳定位置

令 x 表示两种行动路线之间的连续倾向，正负方向分别代表路线甲与乙，绝对值仅表示倾向强弱。设当前总驱动为 h，定义变化关系为 $dx/dt = a\cdot x - b\cdot x^3 + h$，其中 a、b 均为正数。所有量均是演示性的无量纲变量，并不对应某个现成的婴儿量表。

当 h 等于零时，平衡位置为零与正负 $\sqrt{(a/b)}$。对变化函数求导，得到 $a - 3b\cdot x^2$。因此在零点附近微小偏离会被放大，而在两侧平衡附近的小偏离会被拉回。模型在这个条件下有两个局部稳定位置，中间位置不稳定。这里“稳定”具有明确含义：小扰动之后是否趋向返回，而非动作是否毫无变化。

同一外部驱动因而可以与不同初始状态共同产生不同结果。若开始时位于不同吸引范围，最后可能停在不同侧。这是多稳态产生历史依赖的一种数学方式；它既不是

每一种历史必然重要的证明，也不是婴儿性格被锁定的证据。只有当实际活动近似具有这些动力条件时，相关解释才有经验候选资格。

十二、阈值由方程推导，不由“张力”一词指定

上述关系可写成沿一个势函数下降：V(x)＝－a·x²/2＋b·x⁴/4－h·x，且 dx/dt＝－dV/dx。当 h 变化，两侧局部最低点的深浅和存在条件也改变。在平衡与其导数同时为零时，可以得到折叠边界的驱动绝对值为 2a^(3/2)/(3√(3b))。

这个边界不是育儿中的刺激阈值。它只说明，在模型内部，某个稳定位置能够随着驱动改变而消失，原先停留于该处的状态便需要向另一侧转移。若驱动缓慢往返变化，转移位置可以依赖此前停留在哪一侧，出现迟滞。若驱动变化很快、噪声显著或参数不同，具体轨迹又需要另行分析。

SDE 的“张力促使重构”若与此比较，应当说明张力怎样对应某种可测的约束变化，重构又体现在哪个状态关系上。不能只看见一次突然转换，就反推一定存在双稳态；也不能因为写出了阈值，就把它放进真实婴儿身体。动力模型帮助的是使一种解释能够失败：如果实际变化平滑且无需这种结构，较简单模型可能已经足够。

十三、让历史进入，也让历史能够退出

进一步把 h 拆成当前线索 u 与一个历史变量 m。用离散更新 m 下一步＝ρ·m 当前＋(1－ρ)·c 当前，其中零小于 ρ 小于一，c 表示当次实际经历的方向编码。这个规则仅演示既往状态和新经历怎样共同决定当前历史量，不声称大脑逐字计算此式。

在两个系统后来接收完全相同 c 序列时，二者 m 之差每一步都乘以 ρ。经过 k 步，差异成为最初差异的 ρ^k 倍。因此，历史可以暂时改变总驱动，也可以在相同后续经历中逐渐收敛。这给“发生史不同就必然永远产生不同功能”提供了一个明确反例：过程身份仍然不同，某个功能变量却可以趋于相同。

还应区分历史变量收敛与全部行动收敛。即使两者 m 已接近，前述双稳态系统仍可能因 x 的位置不同而保持差异；若总驱动后来只容许一个稳定位置，差异又可能消失。一个模型因此能够容纳不同层次的保留与遗忘，而不是把历史的作用写成永远增强或永远不变。

十四、由局部动力走向高阶符号，还缺少哪些桥梁

这个模型解释的是一个局部选择倾向，不是整个“我”。要把它接到高阶组织，需要研究同一历史变量是否确实帮助说明多个活动，或者不同活动是否通过可追踪的支持与后果发生连接。不能因为一个方程出现稳定解，就宣布已求出婴儿符号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

尤其需要区分模型中的稳定与符号学中的有效稳定。一个不适宜的路线也可以很稳定；一个受必要支持维持的活动也可以具有实际独立调用。数学稳定性本身不给出价值判断，更不要求把环境影响降到零。高阶符号分析必须另外说明边界、支持和后续参与，才能使形式结果进入生命问题。

同样，这个小模型没有说明成人如何因孩子的选择改变安排。若要研究回写，可以在另一层明确加入成人策略或材料机会的更新，并记录其实际路径。但是，每增加一个变量都应增加可检查的预测，而不是只增加可调参数。模型越容易解释一切，越需要证明它没有靠灵活度吞掉所有反例。

十五、三种结果分别支持哪种理论责任

若资料显示前期路线影响当前选择，但简单的线性记忆模型已经足够，研究就不必坚持双稳态。若出现条件性突然转换，双稳态模型可能成为更好的候选，但还需比较注意转移、任务改变或未记录提示。若局部动力模型能够解释单任务，却不能说明跨活动的组织变化，可以再研究高阶联系，而不是预先把局部解释宣布为失败。

这样的分工使 SDE 与动力系统形成真正的对话。动力模型承担某些局部变化的形式解释；SDE 要求这些局部怎样成为可再调用单位、怎样连接三界侧面和个体历史。它们可能在某个任务上互补，也可能在经验预测上重合。重合时应承认共同性，分歧时应把分歧写成不同的可观察后果。

最重要的进步不是增加一个方程，而是让“相互促进与制约”获得可推导的内容。稳定何时提供保持，何时阻止转移；历史何时改变选择，何时逐渐失去影响；高阶描述何时提供增量，何时只是改名，都有机会成为不同问题。这样，数学既不被用作权威装饰，也不被要求替儿童的具体生活承担它尚未承担的全部解释。

十六、关系研究的积极成果

本章经过比较所留下的，不是一片空白。我们已经能够明确地改善研究：先区分行动机会与行动实现，再检验跨事件组织；将局部功能与高阶个体分层；把必要支持与偶然提示分开；追踪孩子怎样改变成人；要求所有整体解释落实为实际路径。这些工作本身就比只给孩子贴能力标签更细致。

对照护者来说，这种细致不必变成繁重记录。看到孩子拿不到圆环，先不急于判断能力不足，可以检查身体是否舒适、材料是否可及、帮助是否代替了行动。观察到成功，也不急于加码训练，可以看孩子是否仍有兴趣，新的组织是否让他更容易参与其他活动。这里的原则是改善判断，而不是制造一套新的考核。

对 SDE 而言，承认近邻并不会失去原创空间。真正能够长期成立的原创性，需要知道哪些桥已经被前人架起，哪些连接仍然缺失。符号发生学若能够把行动组织、三界分析与个体历史转成可交流、可修正的研究单位，就已有明确的工作方向；它无需靠宣布别人都看不见关系来证明自己。

婴儿的世界不断变化，理论也应如此。一个圆环不是只有一种用法，一个身体不是一张固定能力表，一个高阶“我”也不是完成以后等待检测的成品。我们所研究的是这些关系怎样使这个孩子拥有一次又一次新的进入机会，以及机会怎样在活动中成为他自己的生命历史。

54

第 54 章

鲍尔比、安斯沃思与气质适配：安全如何容纳新的“我”

返回目录

一、伸向成人的手，不只有一个意思

一个孩子刚才还在地垫上摆弄玩具，此刻转身伸手。照护者抱起他，他安静片刻，又把身体朝向原来的活动位置。成年人可能把前一动作解释为依赖，把后一动作解释为独立，好像两种品质轮流接管了孩子。实际上，这个作者构造的场景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接近照护与重新探索可能相互支持，而不是互相抵消。

如果只数孩子离开成人多远，就可能把不求助误认为安全；如果只数抱了多少次，又可能把频繁接近误认为发展不足。距离和次数都是可以记录的事实，却不是完整的关系解释。它们需要与具体活动、身体状态、熟悉程度和回应历史一起理解。

本章以依恋理论和气质适配思想为近邻，研究保护、稳定与自由如何实际共存。目的不是用 SDE 给孩子再贴一种依恋标签，而是说明：照护关系怎样参与高阶“我”的形成，同时又不吞没那个正在形成的独特个体。

二、安全基地为什么不是把孩子永久留在原地

鲍尔比以安全基地讨论亲子关系与探索之间的联系。安斯沃思与 Bell 的经典研究也把依恋、探索、分离及重聚放在相互关联的行为情境中考察。因此，把依恋理论简单说成“鼓励孩子永远依赖母亲”，并不公允。[N08][N09]

对本书来说，这个贡献的意义在于：稳定关系可以支持走向未知，而不是与自由构成零和竞争。一个可以求助、可以返回的关系，可能使探索不再意味着失去保护。这里的可能性需要具体实现，不能由家庭口头宣称“我们永远支持你”自动完成。

同样，安全也不意味着每次活动都没有波动。孩子遇到陌生材料可以犹豫，经历活动转换可以不高兴。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不适怎样被辨认、关系如何调整、孩子能否重新进入合宜活动。把所有负面反应都消灭，既不是可行目标，也可能使成人无法看见孩子正在表达的差异。

SDE 在这里可以提出“关系的可恢复性”这个工作问题：当原有互动暂时不能继续时，双方通过什么实际途径恢复可参与状态。它不是一个新发明的临床诊断名，也不取代依恋测量，而是把研究目光从某个静态状态转向转换过程。

三、从一次哭泣推断整段亲情，是一个过大的跨越

研究者设计标准化情境，是为了在限定条件中比较行为组织；家庭偶然发生的一次分离则具有自己的背景。二者不能直接等同。孩子此刻哭或不哭，都不足以单独裁决整段关系，更不能据此给父母判定爱与不爱。

假设两个孩子在照护者返回时都没有立即伸手。一个仍专注于玩具，另一个可能正在处理陌生环境中的不适。只有后续的动作、接近、回避、回应与活动变化，才可能帮助解释差异。这不是说任何判断都不可能，而是要求判断与证据规模相称。

同样，成人表情温柔也不能自动证明其回应合适。一个孩子已经转身退出，成人仍不断把玩具推到面前，可能出于热情却没有承接反馈。反过来，一位不善言辞的照护者可能通过位置、动作和停顿及时调整。表情、语言与实际功能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不可由审美偏好替代。

婴儿符号发生学因此增加一层审查：研究者的符号表征是否过早封闭了孩子。一旦“黏人”“冷漠”“难带”等词成为固定解释，成人可能只看到符合标签的事件。理论若仅把这些词升级为专业术语，而没有改善观察，就只是在更精致地制造成见。

四、气质适配把困难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关系之中

Chess、Thomas 及其同事的研究把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放入儿童行为发展解释；此后的良好适配思想强调，个体倾向与环境期待、要求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忽略。这里值得保留的是适配视角，而不是将每个孩子永远装入几种类型。[N10]

在作者构造的例子中，一个对快速转换较敏感的孩子，在连续换玩具的活动里频繁退出；换到节奏较可预期的安排中，他可能参与得更充分。我们不能仅从后一表现

宣布气质已经改变，也不能仅从前一表现宣布孩子不愿学习。活动组织改变，使不同的能力和取向得以显露。

另一个孩子可能喜欢主动移动，却生活在成人为了整洁而不断限制活动的环境里。问题不是简单地把成人判为控制欲强，也不是把孩子判为多动，而是识别哪些限制出于真实安全需要，哪些来自可以协商的生活习惯。适配需要改变双方能够进入的活动条件，而不只是要求孩子适应。

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能够消除一切身体或调节困难。个体差异真实存在，支持也有成本与边界。关系分析的积极性在于寻找可改变的环节；其严肃性则在于承认哪些环节不能仅靠父母努力改变，以及什么时候需要专业和公共支持。

五、保护、稳定和自由如何在同一事件中互相规定

保护不是禁止一切变化，而是守住身体与关系的基本安全。稳定不是规定每次动作完全一致，而是使一些必要条件可以依赖。自由也不是让婴儿独自承担风险，而是保留他通过活动和反馈影响后续过程的空间。这三个工作定义需要放回同一 SIO 才能判断。

例如，照护者把安全的大块材料放在适宜位置，并在旁边提供必要帮助。保护规定哪些材料与活动可以进入；稳定使支撑和回应不至于突然消失；自由使孩子可以选择继续、改变或退出。但如果成人不断替他摆好每一块材料，原本的保护和稳定就可能压缩活动的生成。

反过来，成人若为了培养独立而撤去孩子必要的支持，自由也可能只是成人对风险的重新命名。孩子并没有获得更多可行动机会，只是失去了原本能够参与的条件。判断一项安排是否扩大自由，不能只问成人是否少管，而要问孩子能否实际参与、表达与改变活动。

三者的相互制约具有时间性。今天需要保留的协助，明天可能成为多余控制；今天有益的变奏，在孩子疲劳时可能变成额外负担。没有一种固定比例能够替代持续观察。真正值得稳定下来的，往往是愿意根据孩子变化修订安排的关系，而不是某套永不变化的程序。

六、稳定的是关系规则，还是孩子的沉默

一个家庭可能非常安静，因为孩子能够得到合宜回应；也可能非常安静，因为表达总被迅速压下。外表相似，不等于内部组织相同。SDE 不能把低波动直接当作积极稳定，也不能把频繁变化一概当作创造性。

可以从三个方向辨别。首先，孩子是否能够在需要时改变活动，而不必维持成人偏好的表现；其次，照护者是否根据反馈调整，而非只要求孩子恢复原样；再次，新的稳定是否使后续参与更容易，而不是只使现场管理更省事。它们是研究问题，不是凭一次录像就能得到的诊断结论。

从符号粒子化看，整体性应当包含婴儿的参与，而不是只有成人安排的完整。稳定性应当保存可恢复、可继续的关系，而不是永久复制一个表情。独立性应当允许组织在适宜的新情境中发挥作用，而不是证明孩子从此不需要任何人。

这样的区分使“好带”失去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的资格。一个孩子可以让成人更省心，却没有获得充分参与机会；另一个孩子提出更多差异，让照护更费心，却不因此更差。理论应帮助家庭看见实际需要，而不是把管理方便冒充儿童利益。

七、婴儿怎样参与改变安全基地

传统的单向叙事容易把成人描写为稳定来源，把孩子描写为接受者。但实际研究还应记录孩子对照护安排的影响。孩子不再接受原来的抱姿，成人要调整身体；孩子开始主动移动，家庭要改变空间；孩子通过新的声音寻求交流，照护者要学习辨认。

这些改变并不只是婴儿发展以后的附带结果，它们又成为下一次发展的条件。成人学会一种新的支持方式，孩子可能获得另一种活动入口；成人错误理解新的表达，孩子也可能遇到不同限制。爱的结构在这些反复调整中改变，而非作为一份固定情感从成人流向孩子。

可以用 S→D→E 描述一种分析进入方式：从原来安抚方法失效这一显露出发，记录成人和孩子怎样尝试不同过程，再检查新的关系组织是否成立。三原理中的相关问题是：已有显露与既有组织之间的张力，是否促使差异路径重构。这里的张力不是婴儿必须遭受挫折的理由，而是对已经出现的失配作说明。

另一条路径则可以从关系组织进入。照护者已经知道孩子更适合较缓的转换，于是先调整交接和材料安排，再观察孩子活动的差异与显露。两条路径不是优劣等级，而是不同的工作入口。是否有效，需要看它们实际改变了什么。

八、多位照护者之间的稳定，不等于所有人一模一样

母亲、父亲、祖辈或托育者可以用不同声音、动作与游戏风格参与照护。多样性本身不必破坏稳定；需要协调的是孩子的基本需要、必要支持、退出信号和重要信息若把稳定理解成只有一个人才能照护，可能把关系连续性错误地缩成单一身份。

在一个构造案例中，祖母习惯边抱边说话，父亲习惯在地垫上安静陪伴。两种方式都可能支持同一个孩子，前提不是风格统一，而是两人都能辨认疲劳、不适和活动意愿，并按实际情况调整。孩子也可能在不同关系里形成不同而相容的组织。

真正的困难可能出现在交接信息断裂时。前一位刚发现某种动作引起不适，后一位却不知道；前一位已经安排必要休息，后一位又启动密集活动。这里需要的不是比较谁更爱，而是建立能够保存关键信息的共同实践。家庭作为更高阶符号，必须通过这样的实际路径发挥作用。

多照护者安排也不能被浪漫化。人员频繁变化、责任不清或必要资源不足，都需要被具体评估。相同人数可以形成不同组织，一位照护者也可能需要更多社会支持。人数不直接等于质量，家庭形式不能替代对关系功能的观察。

九、把适配理解为共同调整，而不是给两个人配型

气质适配容易被误读成给婴儿和家长各测一次类型，再寻找匹配组合。那样的做法会把不断变化的关系重新冻结。对本书而言，适配首先是一项持续工作：当孩子的反应与活动要求不相容时，哪些条件可以调整，哪些需要进一步理解，哪些变化不应被强迫。

设想两次进入陌生游戏区。第一次，成人快速摆出多件材料，孩子转向熟悉的身体接触。第二次，成人保留必要陪伴，材料较少，允许孩子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若孩子在后一次进入活动，这只能成为一个关于安排适宜性的线索，不能立刻诊断他属于某种固定气质，也不能证明所有孩子都适合相同做法。

下一次可能又不同。孩子身体状态改变，原先有效的安排未必继续有效。真正稳定的不是某个动作处方，而是成人能够使用反馈进行合宜调整的关系能力。婴儿也在学习怎样表达、求助和转换活动，使适配过程具有双向历史。

保护、稳定、自由在这个例子中相互规定。保护提供可承受的范围，稳定使熟悉支持可以被调用，自由保留孩子影响进入次序的机会。三者不是成人心中的三个意图而是需要在实际行为中确认的关系。成人可以宣称给了选择，但如果所有选择最后都通向同一规定动作，选择的实际范围就很有限。

这种分析还可以帮助区分两个结果：孩子在活动中不再明显抗拒，以及孩子获得了更有条件的主动参与。前者可能是改善，也可能需要更多观察；后者则需要记录孩子怎样影响了后续过程。把两者分开，能够避免以安静作为安全感的唯一替身。

对于照护者，自我调整也应有支持。成人可能知道应当等待，却受时间与任务要求限制；可能愿意改变，但缺少可用方法。把这些条件纳入，不是替不当照护免责，而是寻找真正能够改善关系的入口。仅要求更加耐心，往往还没有说明怎样使耐心能够持续。

依恋研究、气质适配与 SDE 在这里可以合作：前者提供关于关系组织的研究问题，适配强调倾向与要求之间的相容，SDE 追踪调整怎样进入高阶历史。合作并不消除理论差别，却使家庭不必在学派名称之间作选择，而能得到对具体活动更准确的理解。

十、一段看似和谐的互动，可以有不同组织

设想两段作者构造的游戏。第一段中，成人紧跟孩子每个动作，孩子一转头，成人立即把玩具送到新的视线前；第二段中，成人保持可回应，却容许孩子短暂移开视线，然后根据其再次接近来继续。第一段可能显得更紧密，第二段可能显得较松散，仅凭同步程度却不能裁决哪一种更合宜。

需要问的是孩子的变化有没有实际改变活动，以及成人的承接是否保留了孩子能够调节参与的空间。不断追随也可能抵消退出，暂时等待也可能是回应；反过来，等待可以成为忽略，紧密协助可以是必要支持。动作形式不能独自决定关系功能，判断仍须进入具体需要与活动历史。

因此，保护、稳定与自由的互构不能用一个同步最大化目标替代。三者有时通过不同节奏共同实现：成人稳定地可获得，孩子可以不持续接触；身体支持保持，注意可以改变；一次互动暂停，关系并未因此消失。这些条件比永远保持同一表情更接近可持续共同活动的问题。

十一、微观研究区分了自己与他人的时间联系

Beebe 及同事把四个月母婴互动中的自我连续性与双方之间的时序联系分别分析，并考察它们与十二个月依恋分类的关系。研究中相关差异并非在所有通道上都朝同一方向：某些联系较高，另一些较低。[M10]这不支持把“越同步越安全”当作无条件规则，也不等于给出了适用于每个家庭的最佳同步数值。

这里的自我联系，是一个人当前行为与自身先前行为的可预测关系；互动联系，则涉及一方行为与另一方先前行为的关系。两者概念上有别。如果孩子本来就长时间保持某种状态，成人也保持不变，两条记录可能显得一致，但这种一致未必意味着彼此持续调整。

对 SDE 而言，这项区分特别重要。一个复合体既需要组成活动能够延续，也需要参与者之间可以调整。只研究双方相似，会遗漏各自的组织；只研究各自稳定，又会遗漏相互改变。高阶关系不是把个体差别磨平，而是使不同组织能够在具体事件中接续。

十二、方向、时滞与内容必须一起进入解释

如果孩子发声以后成人经常发声，可以把这一时序关系作为研究线索。但还应检查成人是否本来就频繁发声、是否有共同的外部提示，以及成人的回应内容是否与孩子活动相容。次数或概率差异可以帮助描述，并不能单独证明成人正确理解了孩子。

反方向也需要单独记录。成人调整以后孩子怎样变化，与孩子变化以后成人怎样调整，不一定具有相同强度和时滞。双向并不等于对称；不对称也不必意味着没有共同发生。成人承担更多理解和保护责任，正可能使其调整更加显著，而不是使关系质量降低。

内容还能改变相同时间关系的意义。孩子移开目光以后，成人立即加强刺激与成人立即减轻刺激，都可能被计作快速回应，但两者的后果不同。一个只记录是否迅速

发生的指标，会把相反的活动组织合并。机制研究需要追踪回应如何改变下一步，而非把时机本身当成充分解释。

十三、关系修复不是让一切尽快恢复原样

设想孩子在熟悉游戏中退出，成人尝试原来有效的方式，却没有恢复参与。此时的修复可以是改变材料、暂停目标、提供必要支持，甚至结束这项活动。若预设修复成功必须等于孩子重新完成原任务，就可能把成人目标的恢复误写成关系恢复。

可以把修复结果区分为身体不适减少、表达得到承接、活动重新可进入，以及原先目标是否实现。四者并不总是同时出现。孩子得到支持以后选择另一活动，可能是关系重新具有可参与性，而非修复失败；原任务完成了但退出信号始终被忽略，也不能仅凭完成宣布关系已改善。

这种分层解释了稳定为何不等于程序固定。值得保持的可能是反馈能够改变安排，而不是安排永远不变。关系因而能够容纳短暂失配，同时避免把反复失配合理化为有益锻炼。研究自然出现的修复，不意味着为了获得修复机会而制造婴儿的不安。

十四、依恋关系与高阶“我”不能互相取代

依恋研究关注特定照护关系中的组织；高阶婴儿符号则试图连接多种活动、关系与发生历史。后者范围更广，不代表可以用一个大概念取消前者的具体研究。相反，若没有可靠的关系描述，高阶论述很容易只剩“所有关系都重要”的泛泛陈述。

同一孩子与不同照护者之间可能有不同互动组织，因此一次关系评估不能直接成为全部个性的判词。这并不是说所有关系差异都无足轻重，而是要分别研究哪些作用局限于该关系，哪些通过交接、日常安排或孩子的活动进入其他关系。跨关系传播需要中间路径，不能由“高阶”两个字自动完成。

对于 SDE，一项有分量的候选判断应是：某种可恢复、可调整的关系组织，是否能够通过实际交接提高别的活动的可进入性。若仅在原照护者处成立，就报告局部成立；若变化进入新关系，再逐步研究其承接方式。这样的研究既尊重依恋的具体性，也为高阶连续性建立不跳步的桥梁。

十五、把证据变成支持，而不是变成监控

微观研究可以逐秒编码，却不意味着父母需要逐秒监督自己。把研究工具直接变成家庭考核，会增加不必要的压力，还可能使照护者为了表现敏感而持续干预。真实生活需要可持续的判断，不是永远符合某个同步曲线。

更适宜的实践转化，是保留几个具体问题：孩子的变化是否被注意，解释是否允许修正，必要支持是否可得，结束或改变活动是否有位置。它们不能替代专业评估，也不提供亲情分数，却能够把注意从“我有没有做得完美”转向“这一次怎样继续得更合适”。婴儿参与改变爱的结构，意味着成人能够从其差异中学习，而不是意味着婴儿必须不断向成人提供和谐的反馈。

十六、从适配走向可以检验的改善

本书提出一个有限的改善问题：当活动不适配时，改变某个可辨认条件，是否使孩子更能参与、恢复或进入新的活动。它与“父母更加努力以后孩子更好了”的笼统故事不同，因为它要求说明改变对象、预期结果和可能失败的条件。

例如，在专业建议和安全要求内，改变活动交接的节奏，记录孩子是否更容易从一种活动进入另一种活动。研究不应只选择改善的几次，也要保留无效和反向变化，并检查孩子身体状态与其他条件。若没有改善，就应考虑调整方案，而不是把失败解释为父母爱得不够。

对研究者来说，依恋、气质适配与 SDE 可以提出不同层级的解释。依恋问题关注特定关系组织，气质适配关注个体倾向与环境要求，SDE 试图追踪这些关系怎样进入高阶符号的连续发生。它们可能相互补充，不能用更宽的词汇吞并较具体的证据。

本章的积极结论是：安全不是把婴儿固定成某个样子，而是让他在受到保护的关系中有条件地改变自己，也改变关系。照护者无需成为永不失误的人，但需要有机会有支持、有方法重新看见这个孩子。一个能够修订的安全基地，才可能持续容纳不断发生的“我”。

55

第 55 章

剥夺研究、神经可塑性与伦理边界：历史能够改变什么

返回目录

一、不能让一个受伤的孩子成为理论的展品

关于婴儿成长，最容易引起震动的往往不是普通生活，而是极端故事：一个孩子没有得到照护，没有学会语言，没有按照熟悉的方式行动。这样的故事仿佛可以直接证明，人不是由出生条件独自完成的。然而，震动不是证据。一段缺少原始记录的传奇，不能因为符合发生学的立场，就被提升为可靠实验。

我们在讨论中曾从所谓“狼孩”追问人类生活方式如何形成。这个问题值得保留，证据却必须重新选择。对于来历不明的报道，应当先核实记录者、发现经过、此前病史、观察方法和后续资料。在这些条件不清楚时，不能把不会说话或特殊行走方式，唯一归因于没有与人类共同生活。营养、疾病、身体条件、创伤以及记录错误，都可能构成不同解释。

更重要的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并不是“缺少了人性”的演示材料。语言、动作或社会交流的困难，不取消其人格地位。我们研究剥夺，不是为了划定谁算人，而是为了说明哪些条件本应得到保护，哪些伤害需要被停止，以及后续支持能够改变什么。这个起点决定了本章的伦理方向。

SDE 在这里要坚持自身的存在论承诺：婴儿不是达到某个功能标准以后才成为独特的“我”。一个需要大量帮助、尚无法给出研究者期待反应的孩子，仍然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史。研究失败可能意味着任务设计不足，不能被翻译成这个生命没有意义。

二、从极端故事走向有边界的因果证据

> 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可核查的研究。King 等人的 2023 年综合分析涉及 136 名随机分组儿童；随机化比较的是既有机构照护处境中的寄养干预与常规照护，而不是人为把儿童送入剥夺。不同发展领域的干预结果并不一致，研究也没有普遍发现随时间扩大的正向级联效应。寄养安置时机、稳定性等组内分析属于相关性分析，不能与随机分组效果等同。[N12]

这些限定不削弱研究，反而使我们知道结论属于哪里。一个改善照护的干预可以具有真实价值，同时不是万能修复；某类结果有变化，也不必意味着所有领域沿同一速度改变。对于发生学来说，这比“爱能改变一切”更有建设性，因为它迫使我们说明具体变化的路径。

因果证据也不是对象的全部。随机分组可以帮助回答平均意义上的干预效果，却不能从一个平均值读出每个孩子经历的全部关系。对具体生命的理解，还需要经过审慎的个体记录、照护条件分析和时间追踪。平均效果与个体历史各有任务，不能互相取消。

因此，本书不把这一项目改写成 SDE 的专属实验。它并未以 SDE 三方程为研究前提。它能够为照护条件的重要性提供经验依据，而高阶符号如何组织、哪些关系承担结构作用、能否提出不同于既有模型的预测，仍是本书需要继续承担的问题。

三、剥夺不是一种简单的“少”

从分析角度看，剥夺不宜被想象成一只容器里少装了若干刺激。少一些声音、少一些拥抱、少一些玩具，可以是描述入口，却还没有说明这些差异如何组织起来。一个孩子可能听见大量声音，但没有人根据他的表达调整；也可能置身安静场所，却持续获得适宜的回应。这两个情境不能只按声响数量排序。

为了展开这个区别，我们构造两个照护现场。甲处按固定时间播放声音，物体不断变换，成人完成程序后离开。乙处材料很少，成人却能够注意孩子的活动，适时回应，并在孩子疲劳时停止。这里不预先宣布乙在所有结果上更优，而是指出两者提供了不同的关系结构：前者增加外部变化，后者保留反馈对后续过程的影响。

SDE 的 D 不是刺激总量，E 也不是设备数量。差异序列需要说明前后如何衔接，特征纠缠需要说明哪些关系相互规定。即使数量相同，时机、可预测性、可参与性和恢复机会不同，也可能构成不同的研究对象。是否产生发展差异，仍要由具体观察判断。

这一点带来一个实用后果：修复不应只追求把缺少的东西加回来。还要检查孩子能否实际进入所提供的活动，信号是否被理解，退出是否被尊重，照护者能否持续调整。提供得很多与获得得充分，并不是同一件事。发生学关注的正是从条件到实际经历之间常被省略的环节。

四、伤害也会留下组织，却不因此成为值得赞美的发生

如果符号发生包括特征纠缠的形成，那么受限制或受伤的经历也可能进入后续组织。由此不能推出“所有发生都是好的”。本体论描述回答某种结构怎样成立，价值判断回答这种结构是否值得支持。两者必须相互联系，却不能被合并为同一个结论。

设想一个孩子为了避开不适而减少某类活动。作为分析，这可能显示一种有条件的调节组织；作为照护任务，我们仍要追问不适能否减轻、替代路径是否存在、孩子是否失去了重要的参与机会。能够理解一种反应为何出现，不等于应当让造成它的条件继续存在。

还要区分适应与福祉。某种行为可能在局部条件下帮助孩子维持生活，却未必意味着条件本身合宜。例如，成人只奖励安静，孩子最终很少打断成人，不能仅凭管理顺畅便断言发展良好。研究必须观察其表达、探索、恢复和关系可及性，而不是只看对成人的便利程度。

SDE 所说的积极发生，因此不能由“形成了稳定符号”自动推出。我们需要增加价值上的检查：这种稳定是否保护生命，是否保存表达与参与，是否容纳新的调整，是否以过高负担压在孩子或照护者身上。一个僵固的整体也可能很稳定；稳定需要受到其他价值和条件的制约。

五、可塑性不是无限承诺，早期重要也不是命运封条

“可塑性”在日常讨论中很容易变成两种相反口号。一种认为只要足够努力，一切都可以恢复；另一种认为错过最早阶段，以后的帮助就不再值得。两者都把具体发展问题压成了没有条件的总判断。本书不接受这样的推理方式。

对于任何一项能力，都应分别说明目前状态、希望改变的目标、可提供的支持、观察期限与可能限制。一个孩子可以在某方面获得进步，同时在另一些方面继续需要长期帮助。不同结果之间不必有统一速度，更不能以某项未改善否定其他真实收益。

从 SDE 历史观出发，后来的活动不是把过去删除，而是在已有条件上重新组织。过去可以留下影响，新的条件也可能改变这些影响在当下的作用。这里的“重新组织”是一项研究任务，不是对所有困难都能解决的保证。要知道能改变什么，必须进入具体活动与专业评估。

积极的态度由此具有明确边界：不把孩子判定为没有未来，也不向家庭销售无限未来。真实支持可以包括改善舒适、增加一次有效交流、建立更可持续的照护安排，而不必每次都以“追上所有同龄人”为唯一成功标准。目标可以分层，但尊严不能分层。

六、从照护改变到高阶重组，中间还有什么

设想一个儿童开始接触较稳定的照护者，研究者想知道这是否改变了他的高阶符号组织。不能从关系名称直接跳到结论。需要寻找中间过程：照护者是否学会辨认信号，孩子是否有更多机会影响活动，某些调节方式能否在不同场合继续使用，新的共同活动是否改变了日常安排。

这可以构成一个拟议的发生链：支持条件变化，参与方式变化，局部组织获得可重复性，活动之间形成新的连接，随后改变下一轮支持。每一环都应允许没有出现、只部分出现或经由另一条路径出现。完整链条是一种待检验模型，不是研究记录中可以自动补写的空白。

三方程在这里提供的是互查要求。若只记录 S 的改善，而不清楚 D 怎样改变，就暂不宣称掌握发生过程；若只记录增加了什么 E 条件，却没有孩子的实际显露，也不

能把投入当作效果；若 D 已经变化却没有预期结果，则应检查原先假定的关系是否真正重要。

同样，高阶回写必须有落点。孩子开始主动表达，使家庭调整活动顺序，新的顺序又支持表达，这才是一条可以记录的反馈。仅仅说“整体影响部分”，没有说明由谁、通过什么动作、在何时改变了什么，还不是机制解释。这个要求使宏观概念能够回到具体生活。

七、观察如何避免再次把儿童变成手段

研究者可能很想获得整齐的前后对照，但儿童的需要不会为了设计整齐而暂停。必要的营养、疼痛管理、身体支持、语言接入与安全保护，不应成为故意撤除的变量可以研究合宜方案之间的差别，可以追踪自然发生的变化，却不能以证明理论为由延长伤害。

即使是低风险观察，也需要考虑记录本身的负担。镜头是否使成人改变对孩子的态度，过密测验是否挤占休息，家庭是否觉得不配合就会失去服务，这些都属于研究现场的真实关系。形式上的同意不能替代对压力和依赖的持续检查。

对不能以语言表达意愿的孩子，应当认真记录行为性不适、拒绝和疲劳，并由合适的专业与伦理程序决定何时暂停。不能把所有退出都视为缺失数据而忽略其发生意义。一个孩子不愿继续，本身可能提示任务与当下条件不适配。

资料的使用也应服从最小必要原则。研究者需要的可能只是互动次序，不一定需要公开面部、家庭地址或完整病史。去标识化、权限、保存期限和撤回安排应事先明确。婴儿不是因为还不会反对，就可以被无限记录、展示和训练模型。

八、研究史也要保留不符合期待的结果

对一个强调纠缠与共同发生的理论而言，最有吸引力的结果是：改善一处关系，许多领域依次改善。但这种整齐故事不能成为阅读研究的筛选器。只要某一领域没有出现预期变化，就需要保留它，而不能把它挤进“将来必定发生”的叙述。

一个研究方案应预先区分主要结果与探索结果，并说明什么变化足以支持所提出的具体命题。某项新解释来自观察之后，可以作为有价值的发现，但应明确其探索身份。后续研究再检验，比把它改写成一开始就预见的事实更有助于知识积累。[R35]

家庭记录同样可以遵守这一原则的轻量版本。不只写“这周成功了”，也写“这一次没有变化”“孩子并不喜欢”“原先判断可能错了”。记录不是给照护者评分，而是防止一种有效过的方法变成永不修订的规定。孩子的变化可能使昨天正确的安排在今天需要调整。

理论的成熟不表现为永远能够挽救自己的语言，而表现为知道何时缩小主张。若某个高阶指标不能提供额外解释，就暂时不用它指导家庭；若某种支持确实有效，而机制尚不清楚，也可以承认实践价值，不强迫它等待本体论的最终证明。

九、为恢复保留不同时间尺度

修复研究还需要一种时间上的耐心：即时舒适、短期参与和较长期组织，可能并不同步。一个孩子在新的照护安排中较快表现出某种变化，并不能说明所有发展领域已经重组；暂时没有显著变化，也不自动证明支持无价值。应当预先说明观察的是哪一尺度。

可以构造一份分层记录。当天记录必要需要是否得到承接；随后一段时间观察某种活动是否更容易进入；更长时间考察有效方式是否能跨场景保持，以及成人安排是否发生可持续改变。这里的层级不是固定疗程，也不能直接给出医学上的等待期限，而是防止不同问题被一个“有效”包办。

例如，家庭可能先学会更准确地报告不适，孩子的某项功能分数暂时不变。这是信息与协作层面的改变，不应被夸大为全面恢复，也不应被忽略。若后来专业支持因此更适宜，可以进一步研究中间连接；若没有出现，则保留局部收益的边界。

还要分别观察稳定与累积。某项改善持续存在，不等于它不断扩大；某种收益没有扩散到其他领域，也不意味着原收益消失。SDE 所说的回写，需要实际路径，不能把时间经过本身当作级联发生。这个区别能保护理论免于把所有正向结果都叙述成无限增长。

研究报告也应让不同时间尺度的结果彼此可见。不能用较长期的一项好结果掩盖期间的负担，或用一次短期困难抹去后来真实变化。对于家庭，清楚知道哪些方面正在改善、哪些仍需支持、哪些暂不确定，比得到一个笼统乐观或悲观的总判断更有用。

由此，恢复不是返回某个假想原点，而是在现有条件中形成更适宜的持续组织。它可以有不同速度、不同方向和不同边界。发生学所提供的希望，应当建立在这种可描述、可修订的时间结构上，而不是建立在“只要继续努力就必然全部恢复”的承诺上。

十、随机化回答的究竟是哪一个问题

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的长期综合分析使用随机分组的意向治疗比较，考察寄养干预相对常规照护的效果，并报告多个领域上的收益与差异。[N12]随机分配的是改善支持的方案，不是把儿童随机放入最初剥夺；这一点决定了能够提出何种因果结论也决定了伦理上不能怎样重述这项研究。

意向治疗的问题是：被分配到某项安排，相较另一安排，后来总体结果怎样。它保留了分组时产生的可比性，但不等于精确估计每个儿童实际接受的每一分钟照护的作用。实际生活会发生变化，方案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经历完全按最初分组保持。理解这个区别，可以避免把随机试验的权威移借给所有后续关联。

同样，干预获得支持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其中哪一个成分单独承重。更稳定的成人、不同日常活动、语言经验与生活条件可能一起变化。效果证据与机制证据有联系，却不相等。SDE 若要说明高阶重组，就必须进一步定位这些变化怎样进入具体活动，而不是在有效干预之后补上一句“纠缠改善了”。

十一、干预之后的差异，不能重新假装成随机

设想研究者进一步比较安置后关系较稳定与较不稳定的儿童。这个比较具有价值，却不再自动享有原始随机分组的全部优势。安置稳定性可能与家庭资源、儿童支持需要、服务安排及其他未记录条件有关；后续结果与稳定性相关，尚不足以识别稳定性独自造成了多少变化。

如果直接按实际稳定程度重新分组，再把差异叫作随机试验结果，就改变了问题而没有承认。研究应说明哪些比较来自原随机分配，哪些是后续组内观察，哪些还需要更强假设。原论文对不同分析层级的区分，为本书提供了重要方法提醒。[N12]

这个提醒也适用于家庭实践。愿意长期坚持某方案的家庭，可能同时拥有更多资源与支持；观察到其孩子表现较好，不能把全部差别归给坚持本身。反过来，无法坚持也不自动意味着家庭不重视孩子。机制分析应帮助寻找可以改变的实际障碍，而不是把复杂选择重新道德化。

十二、中介路径需要比“先变化后改善”更多证据

可以提出一条本书自己的候选链：照护安排改变，使婴儿的信号更容易被承接；更有效的承接使某些活动得以持续；活动持续又改变局部组织的保持；这些组织随后进入新的活动。链条包含不同层次，每一层都可能失败或由别的路线替代。

仅观察到承接先改善、发展分数后改善，还不能证明前者中介了全部效果。一个共同的条件变化可能同时影响二者，测量时机也可能掩盖其他路径。若研究调整了干预后出现的变量，还可能无意改变原先比较的含义。因此，画出中介箭头只是明确提案，不能使未识别的因果自动成立。

更扎实的做法是为每个环节规定独立记录：实际支持怎样变化，孩子怎样参与，哪些组织在哪类情境中保持，以及何时开始影响后续安排。还应记录那些前一环改变而后一环没有改变的情形。这样的断点能够缩小机制，而不是被总体平均改善遮蔽。

十三、敏感时期不应被写成统一的关闭时刻

早期经历重要，并不逻辑地推出所有能力在同一时刻永久关闭。不同功能可能受到不同时间、剂量与支持方式的影响。对于具体能力，研究需要说明观察范围与不确定性；本书不能仅凭“发生有历史”就宣布某个年龄以前决定一生，或反过来宣布任何阶段都能无代价重建全部组织。

一个有用的分析区分是形成条件、维持条件与重建条件。某种组织最初形成可能需要特定经验，保持它可能需要另一类活动，受损以后恢复又可能需要不同支持。三

者不能被统一为一个刺激量。把后来恢复困难简单解释为最初机会已过，也可能遗漏当前仍可改善的条件。

这并不是淡化及时支持。恰恰因为不同关系有不同历史，应在发展担忧出现时寻求适当专业帮助，而不是等待哲学证明一切都能自行发生。及时性是支持责任的一部分；它不应被转换为对已经错过某段时间的儿童与家庭撤回希望和服务的理由。

十四、恢复可以是功能替代，而非返回原路线

在作者构造的例子中，某个孩子通过一种常见方式表达需要较困难，新的可及通道使其更容易参与。所得收益不一定表现为原通道恢复，却可能显著改变共同活动。如果评价只承认回到一条预设路线，就会遗漏这种真实改善。

但功能替代也不能仅由成人主观满意判定。需要观察新通道是否真正可用，能否支持不同需要，是否增加不适或负担，以及不同照护者能否承接。一个操作装置让成人更容易记录，不等于孩子获得了更大表达效力；一次成功演示也不能代表日常持续使用。

高阶符号的连续性使这种比较成为可能：新的局部路线可以在同一生命史中承担某些功能，同时改变别的关系。它不是另造一个替代孩子，也不是把旧历史清空。研究应保留改变前后哪些需要得到承接、哪些限制仍在，以及新的支持怎样成为后续生活的条件。

十五、把恢复的评价从单一路线改成明确的结果组合

一种支持可能改善舒适却暂未提高某项测验，一种支持可能提高活动成功率却增加照护负担。两者都需要具体报告，而不能被一个“有效”或“无效”吞没。评价至少应区分儿童当前福祉、可参与关系、较长期能力及家庭可持续性，并说明它们之间的权衡。

这些结果不能无限互相抵偿。为了未来分数改善而容许当前伤害，不由发生论获得正当性；为了成人省事而压缩必要表达，也不能被称作整体利益。与此同时，照护者的休息和公共支持并非与儿童发展无关，它们会实际参与回应能否持续。高阶分析应把这些关系展开，而不是用总效益遮蔽其中某一位参与者。

本节最终把希望放在可说明的改变上：哪些条件有证据支持，哪些机制仍需追踪，哪些限制要求长期帮助，哪些目标应当重新协商。恢复的价值不在于宣称历史从未发生，而在于使那个带着历史的独特生命，获得更可及、更少伤害且能够继续改变的生活组织。

十六、修复的目标不是把历史改成没有发生过

一个生命不能重新拥有一份从未受伤的过去，但可以在当下获得不同的承接方式。本书所说的继续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成立。它既不否认过去，也不允许过去独占对未来的解释权。

对照护者而言，这意味着从“我要把他修成什么样”转向更具体的问题：今天有哪些困难可以减轻，哪些表达可以被理解，哪些活动可以变得可及，哪些帮助可以稳定而不僵化。答案未必壮观，却能真正改变孩子所在的复合体。

对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把差异当作要理解的历史，而不是方便分类的缺陷。对社会而言，则意味着不能把支持的责任完全退回一个家庭。医疗、教育、照护时间和专业资源能否衔接，也会参与那个独特“我”的后续发生。

婴儿符号发生学研究剥夺，最终不是为了证明婴儿需要他人这句常识，而是为了建立更精确的责任：哪些关系不可被忽视，哪些伤害不能被浪漫化，哪些改变有证据哪些承诺还没有根据。只有这样，发生学才能从解释受伤的生命，走向支持生命继续拥有自己的可能。

第十二编 / PART 12

人类学意义与符号发生学的新命题

第 56—60 章

56 “我”与“我们”并行发生：个体和共同体的高阶组织

57 爱的发生学：给婴儿以什么，而非宣称多少

58 婴儿权利、残障正义与文化谦逊：谁有权规定一个“我”

59 SDE 符号发生学的创新边界：从存在论主张到能够承担风险的命题

60 让每一个婴儿拥有继续发生的可能

56

第 56 章

“我”与“我们”并行发生：个体和共同体的高阶组织

返回目录

一、一个家庭开始使用新的时间

在一个为本章构造的家庭里，孩子出生以前，晚饭、工作、睡眠和探访主要按成人的习惯安排。孩子到来以后，成人不断调整。父亲学习一种新的抱姿，祖母改变到访时间，母亲与另一位照护者重新分配休息。孩子不是通过命令参与这一过程，而是通过身体需要、睡眠变化、表情和活动，使原来的安排不能照旧运行。

如果只说“孩子改变了家庭”，我们得到的仍是一句总述。更值得观察的是：哪些改变停留在某个成人一次性的反应，哪些变成共同知道的做法，哪些又因为孩子的新变化而被修改。家庭的“我们”，就在这些能够衔接、传递和修订的关系中获得具体形态。

这也是高阶符号的一个检验现场。几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不等于已经形成有效的共同照护；一套共同规则存在，也不等于孩子有机会影响它。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人数叠加，而是差异怎样被组织成能够共同承担生活的整体。

与此同时，婴儿的“我”没有因为进入“我们”而消失。他所经历的舒适、不适、熟悉与陌生，不能由家庭平均满意度代替。共同体若只能通过压低某一个人的表达来维持整齐，就需要重新检查这种整体以什么为代价。

二、“先有我”与“共同发生”并不矛盾

本书确认，婴儿在能够说出“我”以前，已经是独特的存在。这种优先性不表示一个与关系无关的完整主体先在孤岛上形成，然后再进入家庭。它表示：这个生命不能因为尚无成熟的自我表征，就被降为别人意识中的材料。

“我们”的关系也可能早于孩子理解“我们”这个词而运行。婴儿已经参与共同调节，成人已经围绕他协调责任，但这些事实并不证明婴儿具有成熟的群体概念。存在组织、实际参与、语言表征和反思认同，是需要分辨的层级。

因此，“我、你、他、我们”不能被排成一张所有孩子必须逐项通过的固定时间表。它们在存在和关系上可以同时发生，在明确理解和语言表达上又有不同的形成过程。我们的研究应追踪层级之间的连接，而不是由代词的排列顺序推断心理成熟的顺序。

SDE 的关键是保留两种不可替代性：关系不能被孤立个体的属性表代替，个体也不能被关系总体的功能表代替。婴儿需要他人，并不因此成为他人的附属物；家庭包含婴儿，也不因此有权替他穷尽全部可能性。

三、高阶聚合究竟聚合了什么

把家庭称为更高阶符号，需要说明被聚合的不是几具身体，而是相互依赖的活动关系。谁知道孩子近期的变化，谁能提供哪类支持，谁把信息传给下一位照护者，谁在计划失效时重新组织，这些连接使多个局部 SIO 不再只是并排发生。

可以用一个概念记号帮助澄清：以 B 表示婴儿的高阶符号，以 C 表示照护共同体，以 L 表示两者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事件。B 与 C 不是互不相交的两个箱子。同一次安抚既进入孩子的个体历史，也进入成人的照护历史，并可能改变共同安排。这个记号是分析图式，不是已经拟合的数量模型。

L 也不是一个神秘的第三实体。它需要被展开为具体动作、回应、信息传递和后续安排。孩子在一种姿势中表现不适，照护者调整并告诉另一位照护者；后一位据此改变活动，又发现新的反馈。只有追踪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知道关系如何跨越一次事件继续起作用。

这使“聚合”区别于“集合”。集合告诉我们哪些元素在场，聚合解释元素之间形成了什么约束和支持。两户家庭可以有相同人数、相近资源与相似活动表，却因为责任衔接、信息流通和反馈处理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共同生活组织。这是需要研究的关系差异，而不是道德排名。

四、高阶回写不是一个整体在暗中发号施令

假设家庭决定在照护交接时，用简短语言说明孩子今天的状态。这一约定似乎来自“家庭整体”，但真正发挥作用时，必须通过成人记忆、交接时间、记录材料和具体行动来实现。如果没人执行，约定并不因写在纸上就已经改变婴儿的经验。

高阶回写因此应被理解为组织通过可定位路径改变局部活动。它可以改变物体的摆放、活动的次序、可获得的帮助、判断的依据以及谁来承担下一步责任。每一种改变都能被进一步检查，而不是以“家庭氛围影响孩子”一句话结束分析。

同样，婴儿回写家庭也要有中间环节。新的表达先被某位照护者注意，随后进入共同理解，再影响安排。任何一环都可能失败：没有被看见，被误读，没有传递，或者虽被理解却缺少资源落实。研究这些中断点，比笼统要求成人更加用心更能帮助实际改进。

这里可以看见三方程的不同入口。一个新显露 S 促使成人调整差异序列 D，最后改变共同的纠缠结构 E；也可以先改变 E 中的责任分配，使 D 获得新的空间，再出现不同 S。实际过程往返发生，六路径不是六条互不相通的单行道。

五、共享历史与私人经历之间有一条边界

> 家庭成员可以共同记得某次旅行、一次夜间安抚或一段困难时期，但共同记忆不等于每个人拥有相同经历。成人记得的是安排和担忧，婴儿参与的是身体感觉与活动。日后家庭给这段经历命名，也不能自动证明婴儿当时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一区分防止一种常见替代：成人说“我们都很快乐”，于是孩子的不适被当作不重要；成人说“这是为了我们好”，于是自己的目标被写成所有人的目标。共同体可以有公共安排，但仍需保留成员状态不一致的可能。

婴儿的私人性并不要求我们假定他已经会用语言维护边界。正因为他的表达依赖成人辨认，成人更需要谨慎解释。一次转头可能有多种原因，不能把它固定为某种成熟意愿；但也不能因为不能确定原因，就完全取消它对下一步行动的影响。

对研究而言，可以同时保存三栏：可观察的孩子活动，成人当时的解释，以及实际采取的行动。三栏之间不一致，往往比表面一致更有信息。它让我们看见表征怎样介入存在，也让家庭获得修改解释而不否定孩子的空间。

六、多样性怎样成为整体的条件

一个共同体并不需要每个人用相同方式爱孩子。有人擅长安静陪伴，有人擅长材料探索，有人能够发现活动转换中的细微信号。只要必要照护得到保障，差异可以使孩子有机会进入不同关系，而不是把稳定理解为全部风格相同。

不过，多样性要形成积极作用，需要可衔接的边界。成人可以有不同游戏风格，却不能彼此隐瞒重要不适；可以对某个行为有不同解释，却应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专业评估；可以安排不同活动，却应共同尊重休息和安全。相容不是意见完全一致，而是能够在分歧中持续承担责任。

这给全书强调的统一性、多样性与和谐性一个生活含义。统一性保留生命支持和基本责任，多样性保留可进入的不同路径，和谐性要求这些路径不相互破坏。三者不是一张家庭评分表，而是分析共同生活是否正在把差异转成支持的不同问题。

若统一压倒差异，所有人只能执行一种做法，孩子的新反馈可能被忽略；若多样失去衔接，孩子可能在互相冲突的安排之间承受负担；若所谓和谐只要求不争论，必要修订又可能无法发生。共同体的成熟不在于没有张力，而在于张力有途径得到处理。

七、共同发生不意味着责任平均分配

婴儿可以改变父母，却不应被要求照顾父母的情绪；可以使家庭重新安排时间，却不应为家庭资源不足承担罪名。因果参与、行动能力与道德责任需要分开。把“彼此影响”写成“各负一半责任”，是从关系描述到伦理结论的不当跳跃。

成人之间的责任也不由感情宣称决定。谁有时间、资源、专业能力和决策权，谁承担了实际劳动，都影响公平安排。照护者需要休息和帮助，不是对孩子爱得不够；一个无法持续的照护系统，即使每个人都很投入，也可能难以承接新的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 2020 年早期儿童发展指南把回应式照护、早期学习支持与照护者支持联系起来，并纳入母亲心理健康支持。这提醒我们，不应把儿童发展简化成要求一个成人无限增加投入。[N18]

本书据此提出自己的制度性分析：为照护者提供支持，不只是外围福利，也可能改变婴儿实际接触到的互动条件。但具体政策能产生多大效果，需要分别研究，不能从本体论直接推出某项制度的必然收益。

八、共同体符号怎样获得稳定而保持可修改

家庭的整体性，可以从任务是否衔接、信息是否能够流通、反馈能否改变安排来研究。稳定性可以表现为在人员或活动变化时仍能承接必要照护。独立性则在这一层级上指不被某个偶然动作或单一提示绑死，而不是家庭不再需要社会资源。

一个构造案例可以说明三者的关系。主要照护者临时外出，其他成员依据共享信息继续适宜照护；孩子的活动与平时不同，他们又作出调整。这里稳定的不是完全相同的表现，而是持续辨认与回应的能力。如果大家只机械复制原来的动作，不接受孩子的新反馈，表面稳定反而可能掩盖组织失效。

研究还应区分替代能力与可替代的人。某项任务可以由另一位成人接续，不表示关系中的任何人都无差别；孩子可能对不同照护者有不同熟悉历史。共同体需要既保存具体关系，又不把全部支持锁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分布，而非情感上的去个体化。

要检验这类高阶组织，可观察正常生活中的交接与变动，不必故意制造分离。看信息如何进入行动，谁发现了新差异，安排如何修订，比只统计家庭成员数量更接近本章提出的问题。孩子是否愿意参与、是否需要停止，也始终属于观察边界。

九、把家庭的“我们”写成一条具体协作链

为了使高阶共同体不只停留在抽象层面，可以构造一个交接微型案例。甲照护者发现孩子在某类活动后需要暂停，记下观察而不急于定性；乙接手时获得这一信息，在自己的活动中继续观察；丙负责与相关专业人员沟通需要评估的问题。三个人的任务不同，却可以围绕同一孩子形成可衔接关系。

第一条连接是观察到记录，第二条是记录到理解，第三条是理解到行动，第四条是新反馈返回记录。每一条都可能中断，也都可能被改善。若只知道家庭有三名照护者，便看不到这条协作链；若只计算各人陪伴时长，也可能遗漏信息衔接的重要作用。

家庭作为高阶符号的整体性，不在于每个人掌握全部资料，而在于必要知识能进入相应行动。稳定性不在于每次交接使用完全相同语言，而在于关键意义不被丢失。独立性不在于不再需要专业服务，而在于某项功能不依赖一个偶然提示或一个人私有的秘密。

这条链还应允许修正。如果乙在不同条件下看到孩子愿意继续，不能立即判定甲观察错误，也不能机械服从旧记录。两人可以比较身体状态、材料和活动方式，发现先前结论适用的条件。分歧由此成为新的差异入口，而不是家庭必须消除的噪声。

婴儿也不是链条最后被执行的对象。他的活动决定哪些记录需要更新，哪些安排应当暂停，哪些新的参与值得支持。只有把这些反馈真正送回共同安排，我们才有理由说“我们”在回应“我”，而不是“我们”只是在更高效地管理一个生命。

这一案例提出的组织原则可以跨家庭形式讨论，但不能因此认定某种人数或亲属结构最佳。有效协作需要资源、时间与角色清晰，也可能由不同组合实现。研究应比较实际路径，而不是让家庭形式替功能作答。这样，婴儿符号发生学才有可能从亲情赞美进入具体共同生活的研究。

共同体是否成立，最终还要看关系能否承接新的差异。成员之间的协议可以写在纸上，真正的整体却只能通过持续行动得到维持。共享名称是一种表征，共同承担才使它具有相应的存在内容。

十、“我们”不能吞掉未来的“我”

婴儿将来会进入家庭之外的关系，也会对家庭讲述形成自己的理解。本书不能把早期共同体描绘成永远包围个体的唯一世界。高阶符号的开放性包括：新的关系能够进入，已有意义能够重新解释，个体可以逐渐获得更丰富的表达方式。

因而，亲情所成就的不是永久归属的证书，而是一种能够承接成长的关系。今天需要细密支持，未来可能需要不同边界；今天成人代为理解，未来应逐渐让出更多表达空间。这些变化需要随着实际能力与情境调整，而不是根据一个抽象独立年龄统一宣布完成。

“我”与“我们”并行发生，最终意味着双重承诺：我们不把婴儿放回孤立主体的神话，也不把他融化成共同体的功能。一个好的“我们”，应使每个具体的“我”更有机会被看见；一个不断发生的“我”，也会推动“我们”学会新的共同生活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婴儿并不只是家庭的未来。他的存在已经在此刻要求家庭改变自己的现在。我们是否能够回应这一要求，决定了“爱”“责任”和“共同体”这些词究竟只是成人对自己的描述，还是已经进入那个孩子真实经历的世界。

57

第 57 章

爱的发生学：给婴儿以什么，而非宣称多少

返回目录

一、从一句“我很爱他”出发

一个照护者说：“我当然爱这个孩子。”这句话可能完全真诚，却还没有回答婴儿经历了什么。真诚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内在事实，实际照护又需要另一个层次的说明孩子的需要怎样被辨认，行动怎样作出，反馈是否改变下一次回应，必要支持能否持续。

本章不把爱缩成行为清单。一个人可以做完清单，却始终不愿意理解眼前的生命；也可以感情深厚，却因资源、知识或身体状态而无法独自完成照护。内在情感与实际行动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宜彼此割裂。研究爱的发生，需要把二者之间的转换及其条件作为问题。

因此，我们不追问“爱究竟有多少”这一难以统一的数量，而追问“爱在什么关系中实现了什么”。一个安抚动作在此刻有帮助，在另一时刻可能不合适；一种保护今天有必要，后来可能需要调整。爱的价值不是由动作名称预先决定，而要在具体生命的变化中接受检验。

这也是婴儿对成人提出的挑战。他没有能力听取成人关于爱的完整辩护，却会以身体与活动显示回应是否承接了当下。成人可以坚持自己的善意，但不能用善意取消这些反馈。爱若要进入共同发生，就必须允许被爱者改变爱的表达。

二、内在情感怎样进入婴儿的存在历史

为了澄清这个过程，可以提出一条分析链：情感取向影响注意，注意形成解释，解释进入行动，行动改变互动条件，婴儿反馈又修订注意与解释。这不是所有照护都按顺序经过的心理程序，而是帮助我们查找中断点的概念结构。

例如，成人非常心疼孩子，却把每次停止活动都理解为需要更多刺激，于是不断换玩具。问题可能不在于感情不足，而在于解释没有承接疲劳或兴趣变化。另一个成人能够正确理解信号，却因无人轮替而无法及时调整。这里的困难又发生在行动条件而非解释本身。

SDE 分析需要把这些不同困难分开。把所有问题归为“缺爱”，会让具体修订失去方向；把所有问题归为“技巧不足”，又会忽略情感承诺、劳动安排和权力关系。爱的发生不是把一个总量输入婴儿，而是多种关系在现场组织起来。

其中任何一环都可能有意义而不充分。注意到孩子，不等于理解正确；理解正确，不等于有条件行动；行动完成，不等于取得预期结果；取得一次结果，不等于形成稳定而可继续的组织。将这些区别保留下来，爱才可能从自我宣称走向可学习的实践。

三、保护、稳定、自由不是三份可以分别赠送的礼物

设想孩子试图越过地垫边缘，成人在安全要求内调整空间。这是一个构造案例，不是运动训练方案。成人首先保障环境适宜，同时保留孩子自己改变方向的机会，并让某些支撑保持可预测。三者在同一次活动中成立，而不是先完成保护、再开始稳定最后发放自由。

保护会改变能够尝试的范围；稳定支持使尝试不必每次从混乱中开始；自由则使孩子的新活动能够检验原安排是否仍然合适。三者既促进又制约：保护若完全替代行动，可能关闭探索；稳定若拒绝任何新反馈，可能成为僵化；自由若不顾身体需要，又可能破坏后续参与的条件。

这里没有一个可以普遍套用的最佳比例。对同一个孩子，身体状态、活动性质和既有经验变化，都会改变恰当的安排。我们应当说明某次选择的理由及观察后果，而不是用“七分自由三分保护”这样的数字制造虚假的精确。

更深的变化在于，自由不只是成人放开了多少，也包括婴儿的反馈是否有力量改变活动。一个孩子可以身处开放空间，却只能按照成人指定方式玩；另一个孩子需要身体辅助，却能够选择方向、速度和是否继续。后者的依赖与参与并不矛盾。

四、一个夜晚的三次调整

下面以作者构造的连续场景展示爱的改写。一位照护者听见婴儿哭泣，首先按熟悉方式抱起。孩子没有安静，反而转动身体。照护者暂停自己的解释，检查眼前情境在适宜范围内调整回应，并在持续不适时寻求需要的专业帮助。故事没有给哭声配一张确定翻译表。

第一次调整，是行动层面的：原来习惯的动作不再自动继续。第二次调整，是解释层面的：从“我知道他要什么”转为承认尚不确定。第三次调整，是关系层面的：成人不再把孩子的反馈看成妨碍自己完成照护，而把它视为重新组织照护的依据。

这种改写不需要成人拥有一套宏大的哲学。但哲学可以帮助说明它的价值：婴儿不是被爱的终点，而是爱的发生参与者。他以尚未语言化的方式，使成人学习另一种注意和行动。成年人所说的“我懂这个孩子”，也因此应是一种可修订的熟悉，而不是永久的解释权。

同样，无法立即安抚并不自动证明爱失败。身体不适可能需要专业评估，活动转换可能需要时间，照护者也可能需要帮助。评价不应只看婴儿是否立即停止哭泣，而要看必要需要是否被认真承接，错误解释是否能被修正，支持是否得到合理组织。

这段场景的重点，不是提供治疗建议，而是把善意、判断、行动与结果分开。一个可以学习的爱，允许“我刚才没有理解”成为责任的开始，而不是羞耻的终点。

五、爱与控制之间不是靠动机划界

出于善意的安排也可能替代孩子的活动。成人为了促进学习，把每一次探索都变成任务；为了避免受挫，把每一次尝试都提前完成；为了让孩子有稳定生活，不允许已经变化的需要修改程序。动机可以是关心，实际作用却需要另行判断。

反过来，一次限制也不必然否定爱。阻止危险、保护休息、坚持必要医疗照护，可能正是成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不能把“孩子当下没有得到想要的”直接等同于受到压迫，也不能把“成人为你好”当作无需说明的通行证。

本书提出一个区分问题：这项安排究竟在保护什么，以及它是否保留未来重新讨论的条件？必要限制应有具体依据，并随情境与能力变化而调整；控制则可能把成人偏好的结果当成唯一目标，不允许孩子的新显露影响定义。两者之间的边界需要持续检查，而不是由一句口号永久划定。

对于尚无法完整表达意愿的婴儿，这种检查主要依赖谨慎观察、专业知识和照护责任。我们不能把一次抗拒解释成成熟选择，但可以要求成人认真看待它可能携带的信息。承认解释的不确定性，恰恰使成人更需要说明自己的行动依据。

六、爱在三界中的一致与不一致

在理念世界的分析中，成人可能坚持“我尊重孩子”；在现实活动中，却因为时间紧张而总是代替孩子完成；在自我体验中，又可能把孩子拒绝理解为自己不被需要这些侧面之间的张力，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美好的理念没有自动变成合宜互动。

这里不是把三界设为三个彼此独立的箱子。成人对爱的理解影响行动，孩子的反馈改变成人体验，疲劳和资源又影响能够实践的理念。它们在一个具体复合体中相互规定。婴儿也以自己的身体、活动和逐渐形成的预期参与其中。

例如，成人原先把“好照护”理解成孩子永远不哭，遇到无法立即安抚便高度紧张，随后更加密集地干预。研究可以追问：是哪个表征把成人锁在唯一结果上，什么反馈被遗漏，怎样的帮助能使成人重新获得观察空间。这是一条关于关系重组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对个人心理状态作诊断。

一个改进可能从理念进入，重新理解照护目标；也可能从现实支持进入，让成人获得休息；还可能从一次新的婴儿反馈进入，使原有判断被修改。六路径提示的是多种进入方式，而非所有家庭都要从同一个心理环节开始。

七、支持照护者，也是改变婴儿的发生条件

把爱的价值完全压在某个成人是否足够耐心上，会掩盖时间、住房、医疗、工作和家庭分工等条件。一个理论若只要求父母更敏感，却不问他们有没有持续回应的条件，就容易把结构性困难变成道德羞耻。

世界卫生组织的早期发展指南将照护者支持纳入回应式照护与早期学习的实施要求。[N18]本书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发生学解释是：支持并非站在婴儿关系之外，而是可能通过改变成人的可行动条件，进入婴儿每天实际经历的 SIO。

这不意味着资源越多必然照护越好。资源需要通过具体组织才能发挥作用；形式上的服务也可能与家庭的实际需要脱节。我们要研究的是支持到行动之间的转换，而不是把经济条件直接翻译成爱的等级。

对于家庭实践，一项可行的改进有时不是增加活动，而是减少彼此冲突的安排；不是要求一位成人再多坚持，而是明确轮替；不是追求更昂贵的材料，而是让孩子能够安全接近现有材料。是否有效仍需看具体情境，但这些选择已经改变了“更爱就是做得更多”的单一路径。

八、爱的价值可以讨论，却不宜被压成总分

若完全拒绝评价，任何行为都可以躲在“每家不同”后面；若用一个分数统合所有关系，又会制造新的误判。本书因此主张分层评价：基本安全与尊严是不能用其他优点抵消的底线；参与、恢复、探索和关系可持续性是需要具体观察的方面；更长远的意义则需要开放的时间理解。

一次活动让孩子更快乐，却剥夺必要休息，不能只用即时情绪评为成功；一次安排使家庭更整齐，却压低婴儿表达，也不能只用效率评为良好；一项帮助使局部动作完成，却增加难以持续的照护负担，需要重新判断其整体价值。不同方面之间可能有真实张力。

这种评价不需要父母每天制作复杂表格。它首先是一种判断习惯：不要让单一漂亮结果遮蔽代价，不要让一次失败取消全部关系，也不要把成人满意当作婴儿福祉的唯一代理。必要时借助专业人员，把可改变条件与暂时限制分开。

从 SDE 符号发生看，爱的价值在于它参与建立了什么样的整体，以及这个整体是否能够继续响应新的差异。存在的稳定并非价值的最后答案。能够被孩子改变、能够承认误判、能够接入他人支持，是一种关系保持开放的重要条件。

九、不把爱变成预测孩子未来的许可证

成人可以因为爱而对未来抱有希望，但希望不能变成提前规定的身份。孩子可以喜欢音乐而不必成为音乐家，可以动作缓慢而不必被写成一生怯弱，也可以在成长中改变现在的偏好。高阶符号保存历史，并不意味着任何早期显露都已包含未来结局。

这里的积极发生不是让所有可能性同时实现。生活有身体条件、资源和责任的限制。重要的是，限制能否被清楚识别，可改变的部分是否得到支持，不确定的未来是否仍被保留。爱不能保证没有困难，却可以避免把困难过早改写成完整命运。

父母同样不必成为一个永远正确的符号。与婴儿共同生活可能使他们修订自我认识，学习不同的合作，改变对成功与照护的理解。承认这种变化，不是让婴儿负责成人成长，而是承认关系中的每个成人都还需要学习。

我们于是回到全书最初的问题：内在情感怎样成就一个不同的婴儿？答案不在于一份固定的爱被灌进孩子，而在于爱通过具体行动进入其独特历史，并在反馈中改变自己。不是成人先完成了爱的定义，婴儿再来符合；而是婴儿的存在不断要求爱获得更准确、更有条件也更开放的形式。

十、同一个爱的动作，为什么会有不同后果

可以把“抱起”放进三个不同的构造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孩子需要帮助，抱起使必要照护得以开始；在第二个场景中，孩子正在安全探索，成人因为不愿等待而每次提前抱走；在第三个场景中，孩子身体条件需要特定支持，抱起是否合宜必须结合专业判断。动作名称相同，关系功能不同。

这说明爱的评价单位不宜只是单个动作。必须同时观察动作之前的需要、动作之中的参与、动作之后的变化，以及它是否形成一种持续安排。一个动作可以在此刻有帮助，长期重复却需要重新评估；一种限制可以当下必要，却不应自动延长为永久规则。

照护者也需要辨认自己的判断标准。是孩子停止打断自己，就认为有效，还是孩子实际需要得到承接；是活动完成就认为成功，还是孩子在过程中获得适宜参与？这两组标准并不总是冲突，但不能默认一致。发生学使它们可以被分别讨论。

所以，爱的发生性评价不是用另一套复杂词语责备成人，而是把选择理由变得更清楚。理解一次行为为何没有达到预期，可以减少重复误判；发现某种帮助已经不再必要，可以重新组织空间；看见成人缺少支持，则可以把责任从自责转向协作。

在这样的分析中，爱仍然是一种内在情感，却不再被封闭在内心。它经由行动、反馈、共同修订进入婴儿的生命史，也经由婴儿的新显露重新塑造成人自身。爱的独特性不只在于对象是谁，还在于这段不可复制的共同发生如何继续。

十一、爱的承诺是一种可以继续修订的在场

本书愿意把这种承诺表述为：我不会只爱我已经理解的你，也愿意为尚未理解的变化保留回应的条件。它不是无条件满足一切要求，而是不以自己当前的解释封闭对方的发生。对于婴儿，这种承诺需要由实际照护、可靠支持和可修订判断共同承担。

这样的爱有时是靠近，有时是等待，有时是提供界限，有时是请另一位更有能力的人加入。它的共同点不是动作相同，而是持续把那个具体生命的需要放回判断中。情感因此没有被取消，而是获得了与现实连接的责任。

婴儿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这种承诺。他不会按照成人的书稿长大，却会在每一次新的活动中，使我们重新理解“保护”“稳定”“自由”和“我”。爱的发生学最终不是一门让成人永远占据正确位置的学问，而是一门让关系能够再次开始的学问。

58

第 58 章

婴儿权利、残障正义与文化谦逊：谁有权规定一个“我”

返回目录

一、在能够主张权利以前

婴儿不会向成人提交一份关于自身利益的完整陈述。这不表示他的利益只能由成人喜好决定，反而使解释权成为需要约束的力量。谁替他判断，依据什么判断，错误怎样被发现，决定能否修订，都属于婴儿符号发生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书强调婴儿有独特的“我”，但人格尊严不能依赖某套理论得到实验确认。即使研究者尚无法描述高阶符号结构，也没有理由暂停儿童应得的保护。存在论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对象化，权利的保障却不能被设置为通过本体论测试之后才发放的奖励。

《儿童权利公约》将不歧视、儿童最大利益、生存与发展、表达、隐私、残障儿童的尊严与参与，以及支持家庭的责任纳入共同框架。[N19]本章以此作为规范对话的基础，不提供具体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意见。其余分析是本书对这些原则如何进入日常互动的讨论，而非把每项实践建议都宣称为公约原文。

对于婴儿来说，权利首先需要被翻译为可以经历的条件。一个原则写得再完整，如果孩子无法获得必要照护、无法被辨认反馈，或者家庭找不到适当支持，它还没有充分进入现实生活。发生学因而追问的，不只是“孩子有哪些权利”，还有这些权利怎样通过具体关系成为可获得的生活。

二、尊严不能被能力指标代理

我们可以测量某种动作，也可以评价语言接入或探索机会，但不能由此排列儿童的人格价值。能力是有条件的表现，尊严不是一项表现。把两者分开，是研究先天差异与长期支持的前提。

设想两名孩子面对同一件物体。一名迅速伸手，另一名需要辅助定位。可以研究他们各自的行动关系，也可以讨论适宜支持，却不能把较慢的动作写成较少的“我”高阶符号的层级描述不应转化为儿童之间的等级称谓。

同样，无法观察到某种反应，也不等于可以断言没有体验。研究者需要说明测量所能覆盖的范围，以及有哪些身体或交流条件影响结果。不确定性要求谨慎，而不是给排除提供方便。婴儿无法反驳成人的解释，更需要成人公开解释的边界。

尊严也不应被浪漫化。说“他以不同方式存在”不能成为不提供医疗评估、语言接入或必要辅助的理由。承认差异的价值与认真减轻困难可以同时成立。真正的尊重不是把一切限制改称特色，而是不让限制吞掉整个生命，也不让赞美遮蔽实际需要。

三、无障碍不是额外恩惠，而是参与条件的重组

以作者构造的日常场景为例：某个孩子只能在获得适当支撑时触及桌上的材料。若评价只在没有支撑的条件下进行，结论可能是“不能参与”；若在安全、专业认可的支持下观察，则可能看见另一套主动活动。变化的不是孩子突然获得了新的道德资格，而是参与条件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让我们分清三个问题：身体功能目前是什么，环境要求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可调整的关系。三者共同影响活动，却不能互相替代。无障碍改造可能打开部分路径，也可能仍有真实限制；每一种支持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SDE 在此提供的分析方向，是不把一次失败完全封闭在身体标签中。还要检查物体的位置、交流通道、活动节奏、辅助方式和成人判断。它不是承诺环境能够消除一切差异，而是要求研究者对可改变条件尽到说明责任。

积极参与也不等于无休止训练。一个孩子有权休息，有权不被每一段生活都当成康复任务。辅助工具的目标应与日常生活联系，而不只服务于测验数字。对于必要的专业方案，家庭与专业人员需要共同澄清收益、负担、可持续性和儿童实际经历。

四、谁来代表尚不能完整表达的婴儿

代表不是占有。成人需要作决定，但应当承认自己是在有限信息下为另一个生命承担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的愿望直接等同于对方的利益。尤其在多位成人意见不同的时候，需要区分证据分歧、价值分歧和资源限制。

例如，一位照护者希望增加活动，另一位认为孩子需要休息。可以先共同回到具体记录：孩子在什么状态，活动持续多久，出现了什么反应，原有专业建议是什么。这样的讨论不保证立即一致，却能避免把分歧简化为谁更爱孩子。

婴儿的非语言反应在这里具有重要地位，但不能被赋予不切实际的精确含义。转头、沉默或身体紧张可能有多种原因。成人应据此调整观察、考虑暂停或寻求评估，而不是声称自己已经读出了完整意愿。尊重反馈与承认解释不确定，可以同时成立。

一个负责的代表机制，还需要允许新的信息改变决定。今天适合的安排，未必永久适合；一个熟悉孩子的人，也可能误判。让多个相关视角有机会进入，不是稀释责任，而是防止唯一解释者将错误固化为孩子的命运。

五、文化谦逊不等于没有判断

前面各章显示，亲密、独立、回应和照护责任可以在不同生活方式中获得不同形式。本书因此拒绝以某一城市中产家庭的风格作为全人类唯一模板。但拒绝模板，不等于任何实践都无需接受儿童安全与尊严的检验。

文化谦逊首先要求研究者承认：自己熟悉的形式不一定就是某种功能的唯一实现。少说话不必然等于少关注，多位照护者不必然等于关系混乱，亲密依赖也不能被直接写成缺乏主体性。具体判断需要回到当地实践和婴儿实际经历。

与此同时，文化解释不能替伤害免责。如果某种做法造成危险或剥夺必要支持，研究者仍应提出问题，并与社区成员、家庭和专业人员寻找合宜改变。需要批评的是具体实践及其作用，而不是把某个民族整体写成落后或不爱孩子。

这也要求比较方法接受修订。一个只统计面对面说话次数的工具，可能遗漏身体性回应；一个只强调触摸的工具，也可能忽略孩子不同的感觉需要。跨文化研究不应先把自己的指标设为中立，再把所有差异解释成别人偏离标准。指标本身也在主客互动中形成，需要被检验。

六、资源差异不能被改写成爱或价值的差异

两个家庭作出不同安排，可能出于文化，也可能出于工作时间、住房、交通、语言服务或医疗可及性。若不把这些条件分开，就容易把无法做到误读为不愿做到，把需要帮助误读为没有责任心。

本书提出一种责任分层：成人需要对自己能够改变的行动负责，家庭需要讨论共同分配，服务系统需要保障可获得的支持，公共制度需要面对资源分布。不同层级相互关联，却不能把所有责任最终压回一个最疲惫的照护者。

这不是取消家庭能动性。相反，只有把无法独自解决的条件辨认出来，家庭才更可能把有限精力用于真正能够改变的环节。专业服务也应说明自己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避免以专业权威要求家庭接受没有证据的无限投入。

SDE 环境论在这里提醒我们，环境不是一个抽象背景词。影响当前婴儿 SIO 的相关活动包括工作排班、服务交接、交通与家庭支持，它们通过实际路径进入照护。研究不必把世界上所有因素同时纳入，却应说明选择哪些关联、遗漏哪些关联，以及这些边界如何影响结论。

七、数据化的“我”不是婴儿的替身

照护记录、照片、视频和智能工具，可以使某些变化更容易被看见，也可能使一个孩子被持续固定在成人建立的数据形象中。把记录称为“数字档案”，并不使其自动等同于那个正在发生的高阶“我”。记录保存的是选择后的显露，而不是完整生命。

当一份档案写着“难安抚”“迟缓”“高风险”，这些表征可能帮助获得支持，也可能影响后来的人怎样对待孩子。关键在于表征是否保留条件、时间和可修订性，是否被限定在必要用途，是否允许新的证据改变旧判断。标签一旦脱离发生历史，就容易从帮助理解变成提前定型。

本书主张，儿童资料应按明确目的、最小必要和合理权限组织。并非每次家庭活动都需要上传，未经审慎授权的公开展示也不应被包装成教育研究。孩子未来可能对今日记录拥有不同感受，成人需要为这种尚未形成的表达保留空间。

这些是本书的治理原则，并非某款技术已经满足的保证。使用工具时仍需核查实际隐私条款、保存机制、访问权限和所在地规则。理论上的尊重若不能改变资料如何被收集和使用，就仍停留在表征层。

八、儿童利益不是一项可以被总体收益抵消的小数

某项研究可能具有学术价值，某个产品可能使许多家庭便利，但不能因此默认每个参与儿童都应承担未被认真解释的负担。总体收益与个体保护之间存在需要专门判断的关系，不能用“促进科学”一句话抹平。

对于婴儿研究，必要照护不可作为故意撤除的对照条件；参与与服务资格不应不当捆绑；退出和不适应当得到认真对待；研究目的、资料范围与可能风险应由适当的伦理和专业程序审查。这里的规范不依赖 SDE 独有成立，却约束任何使用 SDE 名义的实践。

对教育项目也是如此。不能因为目标是积极发生，就假定密集活动没有代价。孩子是否仍有休息、普通游戏和不被评价的生活，照护者是否承受不可持续压力，都应进入方案评估。没有限制的善意，也可能变成没有边界的干预。

本书因此把“继续发生的可能”理解为一种受保护的开放，而不是不断增加任务的要求。开放包括尝试，也包括暂停；包括获得帮助，也包括避免不必要介入；包括被看见，也包括不被无限展示。这样的开放才与尊严相容。

九、一个以孩子为中心、又不只责备家庭的案例会商

可以构造一场小型会商：家人认为某个活动值得坚持，托育者发现孩子经常退出，专业人员指出某种身体支持可能需要调整。一个粗糙的讨论会寻找谁对谁错；一个发生学讨论则先整理三者各自看到的事实，辨认它们是否来自不同条件。

随后，共同确定最小而可观察的目标，例如让孩子在适宜支持下有一次更清楚的选择机会，而不是立即要求达到某项成人成绩。再明确谁实施、谁观察、何时复核，

以及什么情况需要停止或改变。孩子的表现不必被三方解释成同一句话，但应有共同可检查的记录。

若调整没有效果，可以修改对关系的理解；若出现收益，也要说明适用条件。这样，理论不是一个凌驾于家庭与专业知识之上的判决者，而是帮助不同证据在同一孩子身上相互校正的工作方式。它的价值在于改善协作，而不是夺走解释权。

会商还应问谁缺席了。长期承担照护的人是否有机会表达，服务是否使用家庭可理解的语言，孩子退出活动是否被认真看见。真正的共同体不是发言人数多，而是相关的差异能够进入决定。

十、对一个决定作四次不同的追问

为把权利讨论落到具体判断，可以对一项影响婴儿的安排提出四次追问。第一，它要解决什么实际需要，依据是观察、专业评估，还是成人未经检查的偏好？第二，它通过什么路径改变孩子的活动，必要支持是否得到保留？第三，谁承担收益与负担是否有人被迫承受不相称代价？第四，新反馈出现以后，谁有能力和责任修订？

这四个问题不能合并成一个总分。一个安排目标善良而路径不清，仍需改进；效率很高却取消儿童必要保护，也不能被其他收益抵消；家庭愿意配合而缺少资源，应得到支持，不应被判为不负责任。分开追问，是为了防止一种优势遮蔽另一种严重问题。

可以构造一个服务情境：机构希望用统一流程减少等候，家庭则反映孩子难以适应某个环节。统一具有合理管理价值，但需要检查是否存在不损害服务目的的合宜调整。若调整能够打开参与，就不应仅以“别人都能完成”拒绝；若存在确切安全要求则应说明并寻找适宜替代，而不是把困难归为家长不配合。

儿童的独特性在这里不是要求所有规则都消失，而是要求规则能够说明适用条件，必要时承认例外，并为实际参与提供路径。共同标准保护基本权益，个别调整使标准不至于只服务一种身体或一种家庭。两者可以相互支持。

这样的决策结构还保护专业人员。清楚记录理由与边界，使讨论不必依赖个人直觉或道德指责；把资源问题指出来，也使一线人员不必独自承担制度缺口。以儿童为

中心，并不是把其他参与者变成没有需要的工具，而是让各方责任围绕儿童的实际利益形成可承担的安排。

本书把这种结构视为一种规范性提案。其执行效果还需要在具体服务中研究，包括是否真正提高参与、是否增加过多文书负担、是否被用来掩盖原有不平等。伦理原则的实践同样需要反馈，不能因为名义正确就免于检查。

十一、发生学的伦理底线

婴儿符号发生学最终不能只赞美独特性，还要说明独特性怎样被现实保护。不能用能力决定尊严，不能用文化掩盖伤害，不能用资源不足羞辱家庭，不能用研究目标占有儿童，不能用过去记录封闭未来。

这些底线并不消除所有困难。不同利益之间仍会有张力，具体行动仍需要知识、判断和公共支持。但它们为判断规定了方向：我们所建立的理论和制度，应当使那个还不能充分为自己说话的生命，更有机会成为实际决定中的参与者，而不是更容易被成人解释的对象。

一个婴儿已经是他独有的“我”。社会的责任，不是等待这个“我”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为他的生存、表达、关系与继续发生提供合宜条件。只有走到这里，符号首先作为存在方式这一命题，才真正改变了我们如何对待一个人。

59

第 59 章

SDE 符号发生学的创新边界：从存在论主张到能够承担风险的命题

返回目录

一、原创性不能由新词数量决定

本书已经提出，婴儿的“我”是多 SIO 在三界中纠缠聚合的高阶符号。这一研究以 SDE 的符号粒子化论述为理论底本，并将其扩展到婴儿的独特发生历史。[S01]这个表述改变了研究的起点，却不能仅因词语组合新颖，就宣布完成了一套更强的发展科学。原创性需要回答：它改变了什么问题，增加了什么区分，导出了什么可以被经验约束的工作。

尤其要避免一个容易获得的虚假优势：用 SDE 最完整的版本，对比其他理论最简化的版本。关系、历史、活动、身体和社会中介，并非前人没有研究。本书与强近邻对话以后，不能再把“看到互动”当作独有发现。真正的增量必须在共同关注互动之后继续说明。

同时，也不必把所有理论价值压缩为一次预测比赛。存在论可以重新规定研究对象，方法论可以改善资料组织，经验模型可以提高判断，实践协议可以促进协作。四者都可能有贡献，但需要分别评价，不能用一种贡献冒充另一种已被证明的优势。

本章因此不作学派胜利宣言，而建立一份明确的研究账目：哪些是本书的定义承诺，哪些已经得到逻辑展开，哪些属于候选机制，哪些仍有待数据。这样的区分不是给原创性降温，而是使原创性能够持续积累，而不被一次夸大消耗。

二、第一项贡献：把婴儿从表征的对象转为符号存在本身

若只研究名字、评价和文化象征，婴儿容易成为别人意义系统中的所指。本书则先研究那个实际参与活动、保持生命连续性、改变关系的复合体。成人是否正确描述它，不决定它是否已经发生；表征随后通过行动进入其历史，又真实地影响后续组织。

这个区分至少带来一种研究上的改进：任何关于婴儿的判断，都需要同时注明实际活动与成人解释，不能把后者当作透明窗口。孩子停止伸手是观察，“他缺乏兴趣”是解释，成人因此撤走材料是行动后果。三者分开，表征回写才可以被具体研究。

创新边界也在这里。皮尔斯等符号理论并非只讨论任意标签，具身与发展理论也并非只研究成人命名。因此，本书不能宣称它们必然无力分析上述过程。更合理的贡献主张是：将存在—表征—回写的层级，集中组织为婴儿研究的一套明确问题结构。

这套结构若没有改变资料如何记录、错误如何识别，就仍主要是哲学重述。若它帮助研究者发现过去被合并的差异，并改善后续判断，才进入可评价的方法贡献。存在论的优先性，需要通过研究行动获得具体内容。

三、第二项贡献：高阶符号必须说明聚合与回写

本书不满足于说婴儿“由很多经验组成”。经验数量不能自动解释统一性。高阶符号的主张要求识别：哪些局部关系互相约束，哪些能够跨事件持续，哪些改变又会进入后来的局部活动。聚合不是相加，回写也不是一个整体在暗处施加力量。

为便于研究，可以把高阶组织的候选证据分为关联、承重和再组织。关联表明不同活动存在有条件的联系；承重考察某项关系改变时，整体表现是否按预期变化；再组织追踪新的整体怎样通过实际安排改变后续局部。三个层次不能互相替代。

例如，求助与取物经常同时出现，仅能构成关联线索。若在安全范围内改变偶然提示而保持必要支持，孩子仍能通过另一种表达恢复相似活动，则可能支持某种较稳定的组织。若成人据此改变材料与交接安排，随后又影响孩子参与，就进一步看见回写路径。整个例子是研究提案，不是已有结果。

这种分层使高阶符号不至于成为包罗一切的总词。研究者必须指出层级、时间窗和有效范围。局部组织的成立，不等于整个“我”已被充分解释；一项局部检验失败也不取消婴儿的存在地位。这是概念扩展必须承担的纪律。

四、第三项贡献：独特历史不只是个人的统计指纹

每个生命的经历不可完全复制，这个判断本身不足以解释个体发展。若每一段历史都独一无二，那么仅靠“历史不同”可以解释任何差异，却不能预测具体变化。本书必须继续追问：哪些历史差异具有后续作用，哪些只是没有可检测后果的细节。

因此，要把历史唯一性与功能差异分开。两名婴儿有不同经历，仍可能形成相似的行动组织；同一组织也可能经由不同路径成立。相反，表面表现相同，背后关系可能不同。研究不能预先要求不同历史一定产生不同人格，否则独特性就被误用为不可收敛的宿命。

本书提出“有后果的历史差异”作为较窄对象：一种可记录的先前关系，在控制相关条件之后，是否帮助说明未来活动的差异。它可以涉及帮助的次序、反馈的使用跨情境衔接或必要支持的连续性。具体变量必须在结果出现之前定义，不能事后从无限历史中寻找巧合。

这也说明个人符号不等于一串数据指纹。指纹可以区分两个记录，却未必解释生活；一个关系指标可能不能唯一识别个人，却有助于改善支持。身份识别、发生解释和实践判断，应当分别讨论。

五、一个透明的小模型：相同次数为什么未必相同

为了说明次序问题，可以构造一个最简逻辑模型，而不是假装已经发现神经机制。设状态含两个量：a 表示某项活动通道此刻是否可进入，r 表示孩子是否已在可进入条件下实际参与过。二者仅在这个玩具模型中取 0 或 1，初始状态记为(0,0)。

规定操作 P 为准备适宜通道，使 a 变成 1 而不直接改变 r；操作 X 为一次探索机会，只有在 a 为 1 时才使 r 变成 1。于是先 P 后 X 得到(1,1)，先 X 后 P 得到(1,0)。两条路径都发生了一次准备与一次机会，最终通道也都可进入，但实际参与历史不同。

这段推演的价值是展示：若某种过程具有前置条件，次数相同不保证结果相同。它没有证明现实婴儿必然服从这些规则，更没有证明只有 SDE 能够描述次序。规则本来就是作者设定的，结论在规则内成立，经验任务则是判断真实事件是否存在相应依赖。

还应立刻构造反例。如果 X 无论通道如何都能建立 r，次序差别就消失；如果孩子在 P 之后自行探索，两条路径可能很快收敛；如果 a 的测量错误，所谓路径效果也可能只是状态遗漏。一个有用模型，应把这些可能写出来，而不是只展示符合预期的一条推演。

因此，这个小模型不是婴儿的缩微复制品，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生成器。它提示研究者：当表面终点相同，是否需要记录机会出现时的可进入条件；当历史不同，是否有理由预期差异继续存在；什么时候应该允许两条路径收敛。

六、从六路径中提出一项限定的新假说

在第五十章五项候选假说之外，本书提出 H6：在某项预先限定的安全活动中，当参与需要某种可观察的前置关系时，先建立该关系再提供变异机会，与次数相当但次序不同的安排相比，可能产生不同的后续迁移。这个命题不是六路径的普遍优劣排序。

它要求明确前置关系是什么，迁移如何测量，哪些支持不可撤除，以及比较安排为何都合宜。不能故意使孩子处于不适或无可及语言状态，只为制造明显差异。可选择低风险材料操作与非必要提示的安排，并允许孩子退出。

若次序差异在独立验证中消失，或被当前状态与练习量充分解释，H6 就不应继续被宣传为独立机制。若关系性动力系统模型同样预测了结果，则该研究支持的是一类历史依赖解释，而非 SDE 独有胜利。

SDE 可能增加的，是把进入路径与整体、稳定、独立判据连接，并要求记录后续回写。这一协议是否更清楚、是否提高跨人员复核的一致性、是否减少错误支持，都是可以单独评价的贡献，不必全部挤进一个预测分数。

七、第三维重构如何避免成为万能解释

三原理强调两维之间的张力可以促使第三维重构。要让这个表述产生分析约束，研究者应在观察前说明旧构型、失配表现、预期的主要重构方向和可能后果。例如，已有结果 S 与既有组织 E 不再相容，成人是否通过改变差异路径 D 来寻找新的活动形式。

关键在于“主要方向”只是工作假说，不是其余维度暂停变化。现实过程可能多维同时调整，也可能没有形成新稳定。研究记录应保留这种复杂性，而不为了画出整齐箭头，删掉不合图示的事件。

本书进一步要求区分失败、暂缓与重构。原方法失效不等于新方法已经发生；尝试增加不等于差异组织改善；孩子停止参与也不自动代表高级整合。只有出现可辨认的新关系，并在适宜条件下接受后续检查，才有依据谈论重构。

这样，三原理不再是对任何变化都适用的赞美词，而成为一组提问：哪里不相容，谁改变了什么，哪条路径被重新组织，新的显露是否值得保留。它们服务于发现可修改的关系，而不是保证每次张力都会产生进步。

八、怎样评价理论的四种贡献

存在论贡献看它是否清楚区分研究对象，并避免把婴儿缩成表征。方法贡献看它是否使资料更可复核、关系更可定位、解释更少混淆。经验贡献看它是否在公平比较中提供可靠的额外信息。实践贡献则看它是否帮助人们作出更合宜、可持续且有边界的行动。

这四类评价需要相互联系。方法清楚而预测尚无优势，可以报告为方法贡献；某种做法有效而机制不清，可以保留实践价值；某个哲学问题得到澄清，却没有直接临床用途，也不必伪装成治疗突破。准确命名贡献，比一律使用“颠覆”更有利于知识传播。

对于经验比较，训练与验证的划分应尊重个体、时间和家庭结构。不能把同一孩子相邻记录分别放进训练与测试，再把模型认出了熟悉轨迹说成对新孩子的预测。结构化资料的验证设计，本身就是方法质量的一部分。[R36]

对于实践比较，不能只看家长是否喜欢 SDE 语言。还应看判断是否改善、负担是否可接受、误用是否减少，以及孩子的实际参与是否得到支持。学派认同可以是传播结果，却不应替代儿童收益。

九、一个研究单位何时值得保留

除了预测准确率，还需要评价符号单位本身的工作价值。一个单位若只能由提出者辨认，不能帮助其他观察者在相同资料中找到相近边界，就很难成为公共研究对象相反，单位划得极其宽泛，所有活动都被归入一个整体，也会失去区分作用。

因此，可以提出一组单位选择问题：是否能够说明事件从哪里开始、在何种意义上结束；是否保留与前后历史的关联；是否使关键反馈可见；换一个合理时间窗时，主要结论是否仍成立；更简单的划分是否已经足够。回答这些问题，不等于把生命切成真正独立的小块，而是使分析尺度可以被讨论。

例如，研究一次求助可以以声音开始，也可以以此前未成功的行动开始。两种划分可能导致不同解释。SDE 不应预先宣布越长越完整越好，而应说明研究问题需要哪些关系。若关注成人回应时机，较短片段可能有用；若关注求助如何形成，则需要更长历史。尺度应由问题与证据共同约束。

进一步可以检验高阶单位的必要性。如果把几个局部事件分别分析，已经能够解释后续变化，就不必强行增加高阶构造；若某种跨事件关系提供了不可忽略的信息，才有理由扩大单位。这里的“不可忽略”需要具体判据，不能只凭理论偏好。

这个原则为高阶符号提供了一个可控制的扩展方式：从足够解释当前问题的最小关系开始，在证据要求下逐步扩大。它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把婴儿拆成无历史的反应另一种把整个宇宙都作为必要解释条件，因而无法实际研究。

最后，单位的成功也应允许任务特异性。用于研究语言的划分，不一定最适合研究身体支持；能够帮助家庭沟通的单位，也不一定适合神经测量。SDE 的统一性可以体现在共同的关系原则与转换接口，而不是强求所有学科使用同一尺寸的分析格子。

十、不是再增加一条“关系重要”的总判断

前面的机制分析使我们可以把 SDE 的研究目标缩小到更有区分力的位置。单纯认为互动、身体或历史重要，已经不足以构成增量；真正需要推进的是，哪些局部关系的变化能够改变跨活动组织，哪些不能，以及成人的表征怎样通过实际安排进入这个过程。

本节提出的桥接命题，不宣称已经被数据证实，也不宣称其他理论无法提出类似问题。它们的意义在于把存在论关注连接到明确的观察与比较：符号首先怎样成立，成立以后怎样进入新的活动，成人怎样解释这些变化，解释又如何改变未来条件。若这些连接没有被观察到，就不能用理论完整性把它们补齐。

所谓“桥接”，也不是把不同学科的词逐一对号。神经反应、动作组织、照护判断和家庭安排有不同尺度，不必都用相同单位描述。一个可用命题应指出跨尺度的实际承接者，例如一次物体带来、一次成人调整或一个交接规则，而不是用宏观概念直接跳过中间过程。

十一、第一项桥接，当前成功能否区分未来的支持需要

可以预先界定两种当前完成率相近的活动历史：一种关键步骤主要由固定提示连接，另一种允许孩子依据后果调整，并保留必要支持。本书提出的有限问题是，在适宜的新材料中，两种历史对提示变化的敏感性是否不同。这里比较的是支持依赖的结构，不是把受助本身当作低级。

若能够用明确关系指标事先辨别后续支持需要，就可能改进仅记录成功次数的评估。若差异完全被更简单的注意、动作或熟悉度指标解释，SDE 就不应独占解释。还应让动力系统、社会中介等强模型使用同样历史资料，检验符号判据究竟增加了什么组织优势。

失败条件可以明确写出：候选判据不能跨编码者复核；在新资料中不优于合理基线；或优势只在撤去必要支持时出现。最后一种甚至可能说明设计问错了问题，而不是发现了一类较弱婴儿。一个为尊重不同发生路径而建立的理论，不应通过不适配测试制造自己需要的差异。

十二、第二项桥接，表征更新是否真的改变活动

第 29 章已经说明，成人的标签能够参与后续安排。更精确的研究不是只问家长是否改口，而是追踪三个接点：理解是否更新，行动是否随之改变，孩子是否实际经历了不同活动。三者可能脱节。一位成人承认孩子并非“不愿意”，却仍因资源不足无法提供合适支持；另一位未采用理论术语，却已改变了实际安排。

因此，SDE 可以提出“表征—行动脱节”这一候选区分：相同的解释改善，在不同可实施条件下是否产生不同参与后果。要比较的不是谁更懂理论，而是新解释通过什么资源、规则和动作获得效力。研究还需检查相反路径：孩子先改变，使成人随后更新解释，而不是成人认识先行造成全部变化。

这项命题可能连接符号表征与存在发生，却不能由宣讲 SDE 以后家长满意度提高来验证。应将知识认同、实际行为、儿童参与分别测量，并保留它们不一致的结果。若只有认同上升，贡献就先停在沟通层；若行为改变而儿童暂未变化，也应保留这一有限结果。

十三、第三项桥接，局部支持怎样跨越照护交接

一个支持方式在母亲身边有效，换到另一位照护者处便失效，可能有多种原因：必要条件未保留、提示约定不同、任务要求改变，或活动本就具有关系特异性。不能一律解释为孩子不会迁移，也不能要求新照护者复制前一人的全部动作。

本书提出一个功能交接方案作为研究提案：交接记录保留孩子实际使用的支持、可观察退出信号和允许变化的部分，而不是只传递“他胆小”“他必须这样抱”的标签。比较对象应是同样合宜的既有交接方式，不能以不给信息或取消必要照护作为对照。结果关注新关系中的进入、恢复与调整，而不是动作外形是否一致。

如果功能交接的优势只是因为记录更长、成人投入更多时间，就不能全部归于符号发生框架。需要比较相同信息负担下的不同组织方式。若在某类活动中确实减少了不必要重复，并改善了孩子的可参与性，才形成一项有限而有实际价值的方法贡献；它不需要被夸大为所有养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十四、三项桥接怎样进入同一研究程序

可以先进行小范围自然观察，检验事件边界和编码规则是否清楚；再把候选判据固定，用于新的孩子与活动；最后在伦理允许的合宜方案之间比较实践作用。探索、确认与支持评价具有不同任务，不应因为使用同一本体论就混成一次研究。

研究的最低资料可以包括活动前的重要条件、谁发起差异、谁承接关键步骤、活动如何结束，以及随后一次相关活动怎样出现。不是记录越多越好，而是每一条记录都有对应问题。过密影像可能增加隐私和家庭负担，却未必增加机制区分力；高阶理论不应成为无限收集生活数据的理由。

对于模型比较，应保留不包含 SDE 术语但具有充分关系结构的竞争模型。若它已能给出相同判断，就承认共享机制或方法兼容。若 SDE 协议用较少资料得到相当判断，可以研究其记录效率；若预测更好，可以研究增量是否稳定；若实践协作更顺畅而预测不变，也可以把贡献准确定位于协作，而不伪装成新定律。

十五、把原创性分成能够分别积累的成果

存在论贡献在于明确研究对象；机制贡献在于给出实际承接路径；测量贡献在于形成可复核的区别；实践贡献在于帮助支持更合宜。这些成果可以相互促进，却不必同时完成。某项哲学澄清有价值，不保证某个指标有效；一个支持方案有收益，也不自动使整套存在论获得独家验证。

这样的区分能够保护真正的创新。它让尚未有大规模数据的思想可以提出严密问题，又防止思想以尚未实现的经验优势争取权威。它也允许一个失败指标被舍弃，而不会要求读者放弃对每个婴儿独特存在的尊重。理论与儿童价值不被绑在一起，理论才有自由接受修订。

本书因而把下一阶段最值得争取的成果，定位为可以公开复核的关系档案、明确的替代解释、保存负结果的比较，以及负担可接受的支持协议。每一项都比反复宣告“世界在发生”更具体。若这些工作最终表明某些 SDE 表达没有增加理解，就应修改表达；若确实显露出过去遗漏的连接，就沿着连接继续研究。原创性不是提前拥有全部答案，而是把一个新的问题组织成别人也能够检查、反驳和继续推进的工作。

十六、创新最重要的边界是能够修改自己

> 一个理论越强调发生，就越应允许自己的符号规定性继续发生。新证据可能改变整体边界，新案例可能迫使我们修订独立性，新文化研究可能暴露原指标的偏见。把这些变化记录下来，不是理论不稳定的耻辱，而是它认真面对对象的表现。

但修订也不能无迹可寻。若原先主张所有活动都适用，后来只保留某类任务，应公开缩小范围；若一项预测多次失败，应允许停止使用；若竞争理论表现更好，应说明其优势。发生史同样适用于理论自身，不能只要求孩子暴露差异，而让理论隐藏改口。

本书对原创性的最终主张因而是有限而明确的：以婴儿为特殊现场，把存在优先、三界高阶组织、符号三项判据和表征回写，连成一套能够生成问题并接受修订的研究框架。其经验优势尚需逐项建立，不能由体系完整性代替。

这样的边界并不减少雄心。真正的雄心，是愿意把最重要的概念带到可以失败的现场，在失败以后仍然守住对婴儿的尊重，并继续寻找更好的解释。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必须证明理论正确的孩子，而是一个足以使理论改变的独特“我”。

60

第 60 章

让每一个婴儿拥有继续发生的可能

返回目录

一、把全书放回一件小事

本章从一个作者构造的普通场景开始。孩子坐在安全、适合其身体条件的位置，面前有一件可以探索的材料。他伸手，停下，看看成人，又转向别处。成人原先准备教一种用法，此刻却发现，孩子正在展开另一段活动。

这里没有一个必须出现的结局。孩子可能继续，可能需要帮助，也可能已经不想玩。全书的理论，应该使成人更有能力辨认这些差异，而不是提供一段无论孩子怎样反应都必须执行的流程。若读完本书以后，成人只学会把所有行为称为 SIO，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判断，理论就还没有真正进入生活。

反过来，成人不必在现场说出三方程。只要能够区分自己的期待与孩子的实际活动，注意帮助是否承接需要，允许反馈修订安排，并在需要时接入专业支持，就已经在实践本书所强调的发生性责任。

因此，最后一章不是一份能够包办所有婴儿的训练计划，而是一套轻量的工作方向：从眼前活动出发，辨认关系，改变可改变的条件，检查结果，保存继续修订的可能。它必须受健康、安全与儿童权利的约束，也必须适应具体家庭能够持续承担的生活。

二、先看见，而不是先归类

最初的观察可以非常简单：孩子在做什么，什么发生在之前，成人随后做了什么，孩子又怎样变化。这四个问题已经能使描述从“他很难带”转向一段具体事件。分类有时必要，但分类不应提前结束观察。

例如，“他总是不配合”可以改写为：“材料被移近以后，他连续转头；成人继续演示，他停止伸手；换一种活动以后，他重新参与。”改写并没有给出唯一原因，却保留了需要检查的关系。它使接下来可以讨论姿势、节奏、兴趣或身体状态，而不只是讨论孩子是否听话。

观察也应包括成人自己的行动。若只记录婴儿反应，不记录提示、等待、替代操作与环境变化，我们就看不到相互规定。一个孩子在不同成人身边表现不同，不必立即归因于偏爱或气质，也可能与活动组织有关。

不过，观察不能变成全时监控。家庭无需把每分钟都量化。可以选择一个确实需要理解的小问题，记录少数有代表性的片段，保留无效与例外。记录的目标是减轻误判，而不是增加照护焦虑，或让普通亲情都变成研究任务。

三、把问题放在关系中，但不抹去身体事实

面对困难，先问关系在哪里受阻，而不急于给孩子下完整结论。材料是否可及，必要支持是否存在，成人的提示是否被接收，活动时间是否合宜，孩子是否有改变过程的空间，都可以成为分析入口。

同时，身体状况、疾病与功能差异不能被关系语言溶解。持续不适、发展担忧或功能问题需要适当的专业评估。发生学的任务，是让家庭更清楚地描述现场、理解支持条件，而不是凭哲学解释替代医学判断。

可以把两种工作连接起来：专业人员评估相关功能，家庭提供具体生活中的活动记录，共同讨论怎样让建议进入可持续的日常。一个方案在诊室能够完成，回到家却无法实施，需要研究的不只是家长是否认真，也可能是材料、空间、时间或协作条件不适配。

这就是环境 SIO 集合的实践含义。对当前活动有影响的关系，可能来自医疗服务、家庭交接、托育安排或工作节奏。研究者不必一次处理所有层级，但应知道哪些限制超出了单次亲子活动，避免把系统性困难全部归咎于婴儿或某个照护者。

四、让三方程成为三次核对

在日常分析中，S 可以帮助我们核对实际显露：观察到了什么，而不是希望看见什么。D 帮助核对过程：事情怎样变化，哪一步调整之后出现了什么。E 帮助核对组织：身体、材料、经验与关系怎样互相规定。三者需要互查，而不是分别填写完就算完成。

例如，孩子终于碰到材料是一个显露，但如果完全由成人移动孩子的手实现，就不能与孩子自行调整后的碰触混同。过程不同，所能支持的能力解释就不同。反之，孩子没有碰到材料，也不等于没有形成新的观察、求助或方向调整。

E 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一次成功完全记到孩子或成人某一方。必要支撑、材料位置、既有熟悉与当下活动共同参与了结果。说明这些条件，不是削弱孩子的主动性，而是使主动性如何得到实现变得更清楚。

三方程的实际价值，在于阻止三种省略：只有成绩没有过程，只有投入没有经历，只有故事没有关系。它们并不替代具体科学测量，却能帮助家庭和研究者提出更完整的问题。任何更强的因果结论，仍需与证据相称。

五、一次只改变能够说明的部分

当关系需要调整时，并非总要彻底更换全部活动。可以在安全和专业建议允许的范围内，先选择一个有明确理由的小改变。例如调整材料的可接近位置，减少不必要提示，增加交接信息，或者为照护者安排实际可用的轮替。

如果同时改变十件事，即使结果改善，也难以知道哪些关系真正重要。日常生活当然无法像实验室一样完全控制，但仍可以保留基本的可追溯性：为什么改变，改变了什么，期待看见什么，实际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记录有助于避免把偶然成功变成万能方法。

改变的目标也可以很小。不是立即学会一项复杂能力，而是让孩子有一次更清楚的参与；不是保证每次都安静，而是更准确地识别何时需要帮助；不是让所有照护者风格统一，而是让重要信息不在交接中丢失。

小目标并不低级。高阶符号的发生，恰恰通过这些具体关系实现。宏大目标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路径，就可能停留在成人理念世界；一个可实施的小改变，则可能真实地进入孩子的现实、自我相关经验与后续预期之中。

六、看见收益，也看见代价

改变以后，不宜只寻找支持原判断的结果。孩子参与了多久只是一个方面，是否舒适、是否能够退出、是否保留新的变化、家庭是否能够持续承担，同样需要观察。一个活动有明显收益，也可能有需要调整的负担。

有时，当前表现没有立刻变化，但照护者更清楚地知道了不适出现的条件；有时，局部动作增加，却使孩子疲劳，说明方案需要重新安排；还有时，原以为重要的因素改变后并无作用，这会帮助家庭减少无效投入。失败记录可以成为节省资源的知识。

要把结果的层次分开。一次表现是线索，多次在合宜条件下重复才可能说明某种稳定；跨情境继续发挥作用，才进一步涉及独立调用；如果新的组织又改变了后续安排，才有依据讨论回写。每个层次都需要自己的证据。

正向发生因此不是“结果越来越多”或“能力越来越早”。它更关心这个孩子是否获得合宜而可持续的参与机会，是否有新的调节与交流路径，是否在必要保护下保留自己的活动空间。不同孩子的目标可以不同，不能用单一速度排名替代具体判断。

七、给家庭一份可以真正使用的简短记录

一份家庭记录可以只有四句：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当时怎样理解；作了什么调整；孩子的反馈让我们需要保留或修改什么。它不要求记录全部生活，也不自动生成气质诊断。对于持续担忧，应把记录带给合适的专业人员讨论。

以下是构造示例：“孩子多次看向材料，没有伸手。我们先以为他在等待示范，后来发现位置可能不便。按已知安全条件调整后，他开始尝试；第二次却选择了别的材料。暂时不能认定他已经稳定掌握，也不能说他缺乏兴趣。”这份记录保留了误判和变化。

如果换一个照护者，记录可以成为共同起点，而不是指令。后一位成人仍需看当下情境，并补充自己的观察。信息流通的价值是减少重复误解，不是用昨天的解释管住今天的孩子。家庭整体性因此具有可传递又可修订的形式。

记录还应有停止条件。当它让照护者过度焦虑、占据大量亲子时间，或者被用来反复比较儿童优劣，就需要缩减甚至暂停。任何方法都可能在使用中偏离目的，SDE 的方法也不例外。工具应该服务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服务工具。

八、托育和社会支持怎样接住家庭之外的关系

婴儿并不只生活在父母的目光里。托育、医疗、社区和家庭支持会通过不同方式进入日常。若这些服务之间缺乏衔接，家庭可能在重复解释中耗费精力，孩子也可能遇到彼此冲突的安排。本书由此建议把交接质量作为实践研究的重要对象。

合宜的交接应包括当前必要支持、已知不适、近期变化和仍不确定的问题，不必携带孩子全部私人历史。接受信息的一方也应有能力提出疑问，而不是把上一个标签机械复制。共享的是有助于照护的关系知识，不是对儿童的永久定义。

WHO 与 UNICEF 的《儿童发展关怀》项目将游戏、沟通与照护者观察回应联系起来，提供支持照护实践的材料。[N25]SDE 可以与这类已有工作对话，但不能把它们的实践价值自动登记为自身的验证结果。新增方法需要说明到底改善了哪一环。

在制度层面，未来研究可以比较不同交接工具、支持方式与协作安排。评价不仅包括工作效率，也包括家庭负担、信息误读与儿童参与。某个方案简化了机构管理，却增加了家庭困难，不能仅凭系统运行顺畅便宣布成功。

九、把研究做成可以返回生活的知识

一个负责任的婴儿符号研究计划，应先从有限问题起步，而不是一次宣称解释全部成长。可以选择某种活动的跨情境组织，某类辅助条件如何支持表达，或者婴儿反馈怎样改变成人安排。问题小而明确，才更容易形成可以检验与修订的知识。

研究过程应保留原始事实与理论解释的区别，清楚说明资料来自观察、构造案例还是已有文献。比较对象应包括最强的近邻模型，而不是只比较一个被故意简化的基线。对于没有得到支持的结果，也应让家庭和研究共同体知道。

知识返回生活时，需要再次改变表达方式。论文中的复杂指标不一定适合直接交给家长；家庭需要的是可理解的判断依据、适用范围和停止条件。把学术术语堆进育儿指导，不等于完成了理论应用。传播本身也是新的 SIO，需要重新检查其后果。

最有价值的结果，也许不是一条覆盖所有婴儿的定律，而是帮助我们少犯一种误判、多辨认一种参与、找到一个可以改变的支持环节。这样的知识可以逐步积累，并在不同情境中接受检验。发生学的宏阔，必须通过这种具体工作才能获得可信的深度。

十、一项小改变怎样走完完整的发生循环

可以把本章开头的材料活动继续写成一条完整而有限的工作记录。第一次，成人发现孩子停在某个环节，暂不贴性格标签；第二次，在安全条件内检查一个可改变因素；第三次，保留结果与例外；随后，与其他照护者分享有效条件，而不是只宣布孩子已经会了什么。

设想改变材料位置以后孩子开始参与，这只是第一步。后来换到另一个合宜情境，效果可能保持，也可能消失。若消失，成人不必立即否定孩子，可以检查支撑、提示和身体状态；若保持，则继续观察这种组织是否使孩子能够提出新的差异。每一步都由反馈决定下一步，而非预设必须升级训练。

这个循环包含三个不同成果。孩子可能获得新的参与，成人可能获得更准确的判断，家庭可能获得更可衔接的安排。三者相互关联，但应分别记录。不能只因为成人学会了理论，就宣布孩子必然受益；也不能因为孩子一次表现没有变化，就认为成人判断的改善毫无价值。

循环的结束并不是永远完成，而是当前问题得到合宜处理，可以把注意力还给普通生活。研究与照护不需要永久围绕同一动作运行。若孩子出现新变化，再重新进入观察。这种可以退出、也可以重新开始的组织，比不断增加任务更接近可持续的积极发生。

它也解释了知识怎样在家庭中诞生与更新。一条经验先在某次活动中形成，经由交流进入共同安排，再在新情境中被修正。旧知识失效时，不必把它解释为过去全部

错误；可以说明它曾经适用于哪些条件，如今哪些条件改变。发生学由此同时研究婴儿、照护与照护知识本身。

真正的实践价值，就在于使这些循环更加清楚、更加可承担。理论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发出命令，而是帮助参与者知道何时相信已有经验、何时需要重新观察、何时应当请更多支持加入。

十一、把未来留给那个正在发生的“我”

当成人说“我知道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最好同时为这句话留出一个缺口：他还会改变，我们的理解也还会改变。这个缺口不是不了解的失败，而是对成长本身的尊重。高阶符号具有历史连续性，却不是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

本书以婴儿为特殊符号研究 SDE，并不是把孩子变成哲学的例证，而是试图让哲学承担更具体的责任。它应使我们不再把婴儿看成被动材料，不再把独特性缩成标签不再用一个分数替代生命，也不再以爱的名义免除理解和修订。

每个婴儿都需要他人，但不是他人的复制品；都带着历史，但不是历史的机械延长；都有真实条件，却不能被眼前条件穷尽未来。保护、稳定和自由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生命需要在能够继续存在的关系中，获得继续改变的机会。

让每一个婴儿拥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最终不是一句宽泛祝福。它要求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为那个具体的“我”提供安全、可及、能够回应又允许变化的关系；也要求我们在理论里，为尚未理解的事实保留位置。婴儿向世界伸出的手，既是在探索物体，也在不断改变我们如何理解人。

结 语

在名字之外，让一个生命继续成为自己

返回目录

一、一个名字还没有决定的清晨

想象一个孩子刚刚进入家庭生活，名字还没有最后决定。成人在几个字之间犹豫，希望把平安、勇敢、聪慧或温柔放进那个将伴随他很久的称呼。与此同时，孩子已经在呼吸、感受、活动，也在改变周围的人。他没有等待命名完成，才开始成为这个家庭无法忽略的存在。

这个构造场景贯穿了本书最重要的区分。名字可以承载关爱，可以进入公共关系，也可以成为后来表达“我”的资源；但名字不是生命存在的开关。一个被准确称呼却没有得到必要回应的婴儿，并不因为表征完整就已经获得良好生活。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婴儿，也不因为描述贫乏而缺少自身的独特性。

符号首先是存在方式，其次才是表征方式。对本书来说，这不是一句用来取代常识的口号，而是研究次序的调整：先看那个具体生命怎样参与，再看我们怎样说明他先说明关系怎样发生，再看名称怎样流通；先保留他的反馈，再检验我们的理解。

这样的次序没有取消语言。相反，它使语言获得责任。每一个关于孩子的判断，都可能通过成人行动进入下一次互动。我们说他“胆小”“聪明”“难带”或“特别”，不能只考虑这句话表达了什么，还要考虑它使我们接下来做了什么。表征不是存在本身，却能够改变存在的条件。

二、独特性不在那张越来越长的清单里

随着孩子成长，成人会积累越来越多描述：喜欢什么声音，怎样寻求帮助，遇到陌生物体如何反应，在哪种活动中愿意坚持。这些描述有价值，却不等于一个人的全部。相似的表现可以来自不同过程，同一个表现也可能在不同关系中承担不同作用。

本书把独特性放在特征之间的纠缠结构、运行规律与不可复写的发生历史之中。这里的历史不是一份必须全部记下的档案，而是过去怎样以当前关系的形式继续起作用。一个熟悉的声音、一种等待方式、一次帮助的时机，都可能进入后来可以进行的活动。

但历史不是封条。一个孩子曾经拒绝，不意味着以后必定拒绝；曾经需要密集支持，不意味着所有支持永远保持同一形式；曾经在某种条件中形成稳定，也不意味着稳定不能被新的差异重新打开。连续性使我们能够说是同一个“我”，变化则使这个“我”不是永远相同的成品。

因此，尊重独特性不是拒绝共同知识，也不是把每个差异浪漫化。共同知识帮助识别需要，个体历史帮助判断这些知识怎样适用。我们既需要知道哪些条件值得普遍保护，也需要知道眼前这个孩子怎样实际进入这些条件。标准和个人之间，应当形成可修订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取消。

三、三界不是三个等候装满的房间

婴儿的现实世界、理念世界与自我世界，并不是出生时已经布置完整的三个容器，也不是依次打开的三扇门。我们借助三界，研究身体活动、意义组织与自身相关经验怎样在同一生命中相互规定，并在成长中逐渐分化。

一件物体可以被看见、碰触、期待，也可以与熟悉、不适或主动尝试纠缠。研究者能够记录其中一些行为，对另一些侧面提出谨慎推断。不能因为拥有三界的语言，就声称已经直接读懂婴儿全部体验。概念的丰富，应当增加我们对证据的敏感，而不是降低判断的门槛。

出生前后的差别也因此获得新的位置。已有生命历史不会在出生时清零，新的互动渠道又使原来的关系发生重大转换。连续与重组同时成立。我们不必在一切早已决定与一切从零开始之间选择，也不应把出生前的条件写成出生后全部命运的说明书。

三界分析最终所要求的，是不把身体、意义与自我经验彼此割裂。一个孩子不是先有身体、随后被装进意义、最后领到自我；他是在具体活动中持续成为可以感受、

参与、改变并被改变的存在。这个“我”的成熟形态可以继续发展，独特的存在地位却无需等待成熟的证明。

四、石头不会回应，仍然进入了生命的意义

我们曾经问，自然对象没有意识，能否参与婴儿的意义发生。答案不能由对象是否像成人那样理解孩子来决定。水流、光线、重量、表面与空间，都能够在孩子的活动中构成差异与约束。自然无需有意教育，也可以参与世界的形成。

这里不必把自然人格化。一块石头不会因为婴儿悲伤而调整自己，却能以凉、硬、重和可触及的方式进入活动。照护者与自然对象的参与方式不同，二者都不能被省略只有亲情而没有实际活动条件，或只有材料而没有适宜照护，都不足以概括婴儿的生活。

这种区别使 SIO 不至于缩成面对面交流。主体、互动和客体的相互规定，存在于更广的身体与生活关系之中。环境也不是一个围在婴儿外面的空背景，而是那些与当前活动共享条件并能够产生影响的相关 SIO。研究边界可以有限，但不能把没有进入镜头的关联一律当作不存在。

对家庭而言，这意味着意义不只藏在昂贵玩具或专门课程中；对研究而言，则意味着日常活动值得被认真观察。不过，这不是对任何材料都适合婴儿的保证。安全与可及性依然是前提，具体使用仍应根据年龄、身体条件与专业建议判断。发生的丰富不以取消边界为代价。

五、爱的形式需要被那个被爱者改变

本书从爱出发，又不断回到爱。最初的问题似乎是：成人内在的情感怎样成就一个不同的孩子。讨论逐渐显示，情感必须通过注意、解释、行动与持续支持进入生活而婴儿的反馈又不断改变这些过程。爱的发生不是一条从成人流向孩子的单向线。

孩子不接受原来的抱姿，成人需要重新理解身体；孩子开始新的探索，保护方式需要改变；孩子在熟悉活动中表现不同，稳定也要容纳变奏。保护、稳定与自由由此不是三种互相排斥的教育哲学，而是具体关系中不断相互促进与制约的规定性。

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自规定全部意义。成人有知识与责任，却也可能误判；婴儿有反馈与主动参与，却不能承担成人的照护义务。双向发生并不抹平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称。恰恰因为孩子无法充分解释自己，成人更应当为谨慎理解、必要支持和错误修订负责。

这样的爱不要求一个人永不疲惫、从不出错。它要求关系中存在恢复与求助的条件，要求家庭和社会不要把所有责任压在一个人身上。一个能够持续修订的照护共同体，比一份宣称绝对完美的爱，更可能真正承接不断变化的生命。

六、不同的身体，不是较少的“我”

当一个婴儿需要不同的感觉通道、身体支持或长期照护，本书不把他放在关于“标准孩子”的故事之外。相反，他使我们更清楚地看见：相同物体、相同房间和相似安排，并不意味着相同的可参与关系。身体条件真实存在，环境是否可及同样真实。

支持可能改变某些通道，也可能无法消除所有限制。两种事实都需要诚实面对。不能用乐观承诺要求家庭承担无限努力，也不能用一项诊断提前取消未来。实际目标可以包括舒适、表达、关系、参与和日常生活的可持续性，而不只是一条与他人同步的速度线。

“我”的尊严不需要通过这些目标的完成来兑换。即使某项能力没有出现，生命仍不是失败的符号。高阶符号描述的是存在组织的层级，不是人的价值等级。对于研究者，这条边界必须清楚；对于照护者，它应成为不被成绩竞争吞没的基本信念。

也正是在这些差异面前，发生学得到最严格的检验。它能否帮助发现可改变的关系，能否与专业知识协作，能否减少误读，而不是仅仅提供漂亮的安慰语言？如果不能，就应当修订自己的方法。真正有益的理论，不能只在容易解释的生命身上成立。

七、文化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也要求我们检查目光

不同社会对婴儿的期待不同，对亲密、独立、回应和责任的安排也不同。跨文化研究的价值，不是替世界上的孩子排列优劣，而是让我们发现原来当作自然的做法，也可能只是某种历史生活的产物。别人的实践可以使我们的指标暴露局限。

但文化差异并不取消安全、尊严和必要支持。我们既不应把陌生形式直接写成缺乏关爱，也不应以文化之名拒绝检查实际伤害。要讨论的是具体实践怎样作用于具体孩子，而不是从民族名称推断每个人的情感和能力。

同一文化中的孩子也不会因此拥有相同历史。家庭资源、照护网络、身体条件、偶然事件和孩子自身活动，都可能使相近生活形成不同关系。文化是重要的发生条件却不是一套把个体复制出来的模具。

因此，婴儿符号发生学需要双重谦逊：对孩子，承认我们的解释不等于他的完整存在；对其他文化，承认我们的熟悉不等于普遍标准。谦逊不是停止判断，而是使判断愿意接受更多事实，并在必要时改变自己。

八、让理论有被孩子修正的可能

本书提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与符号三项判据之间的研究连接，也提出若干可以具体检验的假说。这些不是已经完成的婴儿发展定律。它们的价值，需要在清楚的观察、合宜的研究与公平的理论比较中逐项建立。

我们愿意保留这种未完成，不是因为问题不值得解决，而是因为对象值得认真对待。若一个框架把所有结果都解释成自己正确，它便很难再从孩子身上学到新的东西若一项方法失败，却让家庭背负爱得不够的责任，它更已偏离了支持生命的目的。

研究应能明确说明哪些部分得到支持，哪些只是相容，哪些还不清楚，哪些需要放弃。理论的边界越清楚，实践越容易知道何处可以依赖，何处应谨慎。诚实不是原创性的对立面，而是原创性能够形成公共知识的条件。

未来的研究也许会保留本书的一些区分，改变另一些概念，发现目前没有想到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并不取消今天的工作。它说明知识同样在互动中诞生、传播和修订发生学若有生命，就应当把这种开放也留给自己。

九、回到那只伸出的手

现在再看那个还没有定下名字的孩子。成人会继续为他取名，为他安排生活，学习如何理解他的变化。他也会不断以新的方式参与，改变关系，进入此前无法进入的

活动。一个独特的高阶符号，不是这样被一次制造完成，而是在持续生活中保持自己又不断成为不同的自己。

本书不承诺每一个困难都有简单答案，也不把生命的价值押在某种成长结果上。它所坚持的是一个更基本的方向：在解释之前先看见，在安排之中保留反馈，在保护之中提供活动，在稳定之中允许变化，在承认限制时仍认真寻找可改变的条件。

所谓成就一个婴儿，不是把成人预先设想的人放进他的身体。它是与这个已经有其独特存在的生命共同建立条件，使他可以在现实、理念与自我三界的纠缠中，获得自己的感受、关系、表达和继续发生的空间。

那个空间不会完全属于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位照护者或任何一种理论。它首先属于那个孩子。我们能够做的，是让自己的知识与爱成为支持，而不是围墙；让“我们”的形成容纳“我”的变化，而不是把“我”变成“我们”期待的回声。

一个婴儿向世界伸出手，世界并没有因此立刻给出完整答案。但从那一刻起，关系可以改变，判断可以修订，新的可能可以进入。这就是婴儿符号发生学最终愿意守护的事情：不是替一个生命写好结局，而是让他拥有继续成为自己的条件。

参考文献与核验范围

本册列示正文引用编号。除本次审校报告另列的核查项外，下列“核验”记载沿用原稿的来源核验范围，不表示 v1.1 重新取得了全部原典。来源结论、作者分析与研究提案应分别阅读；内部项目文件不承担独立实证证明。

[S01] 王德生：《SDE 数学导论》，第 53 号，第 38 章“三大规范学科的 SDE 发生学统一：符号的粒子态、逻辑的波态、数学的场态”。

核验：公开原文相关章节。

理论底本；不是婴儿发展实证证据。本书高阶“我”的理论接口沿用王德生的项目理论约定，具体论证由本书展开。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01] Rochat, P. (2003). Five levels of self-awareness as they unfold early in life.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2(4), 717–731.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6/S1053-8100(03)00081-3

[R04] Kuhl, P. K., Tsao, F.-M., & Liu, H.-M. (2003). Foreign-language experience in infancy: Effects of short-term expos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n phonetic lea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5), 9096–9101.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73/pnas.1532872100

[R08] Fernald, A., & Morikawa, H. (1993). Common theme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mothers’ speech to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64(3), 637–656.

核验：原论文摘要及作者机构收录的摘要。

作者机构摘要另见 https://profiles.stanford.edu/anne-fernald；60 组母婴，三个年龄组，不能泛化为国家或民族本质。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j.1467-8624.1993.tb02933.x

[R09] Mesman, J., Basweti, N., & Misati, J. (2021). Sensitive infant caregiving among the rural Gusii in Kenya.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3(2), 124–133.

核验：原论文摘要、作者机构存档与书目信息。

本版采用 2021 刊出版、2020 在线发表记录；另有 2018 早期版本，不能当作另一组独立研究。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80/14616734.2020.1828512

[R10] Hewlett, B. S. (1993 paperback edition). Intimate Fathers: The Nature and Context of Aka Pygmy Paternal Infant Ca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核验：出版方书目信息与内容简介。

采用出版方列明的 1993 平装版。具体父婴实践同时参照作者原文[R29]，不以出版宣传语证明普遍因果。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3998/mpub.13211

[R11] Gottlieb, A. (2004). The Afterlife Is Where We Come From: The Culture of Infancy in West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核验：出版方介绍与作者配套材料。

配套民族志材料：https://press.uchicago.edu/books/gottlieb/gottlieb_videos.html；本版不声称已逐页核查全书。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15] de Saussure, F. (1910–1911/1993).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Pergamon Press. Lecture-note excerpts, online transcription.

核验：讲义原文节选。

此处引用的是第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笔记节选，不冒充对 1916 年《普通语言学教程》任一版本的逐页引用。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16] Peirce, C. S. (1894). What Is a Sign? Online transcription of the manuscript text.

核验：原文，重点核查第 3、8、9 节。

转录页标明其来源为 Peirce Edition Project；未用该文历史性的文化评价作为本书事实依据。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24] Carpenter, M., Nagell, K., & Tomasello, M. (1998). Social cognition, joint attention,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rom 9 to 15 months of age.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3(4).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正文仅采用 24 名婴儿、七次月度观察及研究主题，不从摘要延伸具体效应。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25] Tronick, E., Als, H., Adamson, L., Wise, S., & Brazelton, T. B. (1978). The infant’s response to entrapment between contradictory messages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17(1), 1–13.

核验：原刊书目信息与该范式原始研究记录；1978 全文需出版终审复核。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6/S0002-7138(09)62273-1

[R26] Saffran, J. R., Aslin, R. N., & Newport, E. L. (1996). Statistical learning by 8-month-old infants. Science, 274(5294), 1926–1928.

核验：原论文摘要、作者机构论文副本与书目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26/science.274.5294.1926

[R27] Jonsson, H., et al. (2021). Differences between germline genomes of monozygotic twins. Nature Genetics, 53, 27–34.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只用于反对同卵双胎所有遗传细节绝对相同的表述，不用于推导人格差异。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38/s41588-020-00755-1

[R28] Plomin, R., & Daniels, D. (1987). Why are children in the same family so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0(1), 1–16.

核验：作者论文的 2011 重印文本与原刊书目信息。

所列页码为目标论文；原刊还包含评论与回应。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7/S0140525X00055941

[R29] Hewlett, B. S. (n.d., institutional manuscript copy). The Cultural Nexus of Aka Father-Infant Bonding.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author repository.

核验：作者机构保存的原文章节，25 页。

已核查原文父婴照护及文化背景讨论；此副本未附足以确认出版版次的扉页，故不猜填年份、所属文集版次与正式页码。出版终审需补此项。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30] Richman, A. L., Miller, P. M., & LeVine, R. A. (1992).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variations in maternal responsivenes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4), 614–621.

核验：原文摘要、方法与相关讨论。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37/0012-1649.28.4.614

[R31] Fitch, A., Lieberman, A. M., Frank, M. C., Brough, J., Valleau, M., & Arunachalam, S. (2025; online 2024). Referential transparency of verbs in child-directed input by Japanese and American caregivers.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52(6), 1367–1382.

核验：原论文摘要、资料来源与出版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7/S0305000924000382

[R32] Gottlieb, A. (2005). Babies' Baths, Babies' Remembrances: A Beng Theory of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Memory. Africa, 75(1), 105–118.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作者机构出版目录。

关于精神世界的叙述是当地信仰的民族志记录，不是对超自然事实的证明。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R33] Tan, M. L., Ng, K. L., Loh, L. W. L., Haugan, G., Wang, W., & He, H.-G. (2022). A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study exploring the postpartum confinement experiences among first-time mothers from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 Midwifery, 114, 103463.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16 人，来自同一家三级医院的两所产科门诊；不作为总体比例估计。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6/j.midw.2022.103463

[R34] Fok, D., et al. (2016). A comparison of practices during the confinement period among Chinese, Malay, and Indian mothers in Singapore. Birth, 43(3), 247–254.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作者机构书目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birt.12233

[R35] Nosek, B. A., Ebersole, C. R., DeHaven, A. C., & Mellor, D. T. (2018). The preregistration r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11), 2600–2606.

核验：原论文核心论点与书目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73/pnas.1708274114

[R36] Roberts, D. R., et al. (2017). Cross-validation strategies for data with temporal, spatial, hierarchical, or phylogenetic structure. Ecography, 40(8), 913–929.

核验：作者机构记录的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结构化交叉验证的一般原则被本书延伸为婴儿研究设计建议；该文不是婴儿实验。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ecog.02881

[R37] Peirce, C. S. (1955 collection). Three trichotomies of signs. In J. Buchler (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Dover. Online excerpts.

核验：原文节选。

网页集合多个写作时期的段落；本版只援引三分法内容，不据此作原稿断代。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01] Piaget, J. (1936). La naissance de l’intelligence chez l’enfant. Delachaux et Niestlé.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later-edition excerpt.

核验：作者基金会保存的序言、导论原文节选。

1936 为初版年份；所阅文件使用后续版本，不能据此声称核查了全书所有观察。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02]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Cole, V. John-Steiner, S. Scribner, & E. Souberman (E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核验：原著第 6 章相关段落，尤其印刷页 84–87。

中文正文采用《社会中的心智》称谓以免与《思维与语言》混淆。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03] Vygotsky, L. S. (1930). The Instrumental Method in Psychology. English translation, online text.

核验：作者原文的英译文本。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04] Wood, D., Bruner, J. S., & Ross, G. (1976).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7(2), 89–100.

核验：原论文方法节选与书目信息。

研究对象为 3–5 岁儿童；本书不把其结果直接等同婴儿干预证据。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j.1469-7610.1976.tb00381.x

[N05]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Houghton Mifflin. Chapter 8: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核验：原著第 8 章节选。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06] Thelen, E., Schöner, G., Scheier, C., & Smith, L. B. (2001). The dynamics of embodiment: A field theory of infant perseverative reaching.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4(1), 1–34; discussion 34–86.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书目信息。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7/S0140525X01003910

[N07] Karasik, L. B., Tamis-LeMonda, C. S., & Adolph, K. E. (2014). Crawling and walking infants elicit different verbal responses from mother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7(3), 388–395.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作者实验室资料。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desc.12129

[N08]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Basic Books.

核验：出版方书目与原著预览。

采用美国版书名；本版安全基地的经验讨论同时参照[N09]，不声称逐页核查全书。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09] Ainsworth, M. D. S., & Bell, S. M. (1970). Attachment, exploration, and separation: Illustrated by the behavior of one-year-olds in a strange situation. Child Development, 41(1), 49–67.

核验：原刊书目信息与研究主题；原文细节需出版终审复核。

正文不把单次行为当作诊断，也不由此给家庭的爱评分。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10] Chess, S., & Thomas, A. (1999). Goodness of Fit: Clinical Applications, From Infancy through Adult Life. Routledge / Brunner-Mazel.

核验：出版方书目和内容简介。

1999 为版权/初版年份；出版方所列纸本为后续印行。仅据此引用适配概念，不援引未经核查的临床结果。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12] King, L. S., Guyon-Harris, K. L., Valadez, E. A., Radulescu, A., Fox, N. A., Nelson, C. A., Zeanah, C. H., & Humphreys, K. L. (2023). A comprehensive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 Causal effects on recovery from early severe depriv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0(8), 573–583.

核验：原论文方法、结果与局限相关段落。

区分寄养随机分配的意向治疗估计与寄养稳定性的组内观察关联。 本轮再核对原论文摘要与出版元数据；新增的机制分析明确为本书提案。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76/appi.ajp.20220672

[N1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Improv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WHO guideline.

核验：官方指南发布页与建议摘要。

仅作回应式照护、早期学习与照护者支持的公共卫生依据，不作为 SDE 的验证。 本轮核对官方发布页；网址中的末尾数字沿用实际官方地址，不按 ISBN 推测改写。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19] United Nations. (1989).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fficial text hosted by UNICEF.

核验：公约原文相关条款。

本书为伦理与原则性讨论，不提供任何辖区的个别法律意见。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25] UNICEF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2 update). Care for Child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Care of Young Children.

核验：项目官方说明与 2012 更新信息。

采用其观察、解释、适当回应及游戏沟通的原则性说明；本书家庭记录法是作者另行构造。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26] Joint Committee on Infant Hearing. (2019). Year 2019 Position Statement: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Early Hearing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Executive Summary.

核验：官方执行摘要原文。

引用范围限于早期识别、干预、家庭支持及可及语言；不是个别诊疗方案。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27] 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2021 updat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核验：官方语言说明相关正文。

用于说明 ASL 具有自身语法且并非全球通用；不把美国手语与所有视觉语言混为一谈。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28] Waxman, S. R., & Markow, D. B. (1995). Words as invitations to form categories: Evidence from 12- to 13-month-old infants. Cognitive Psychology, 29, 257–302.

核验：作者实验室原论文首页摘要与书目信息。

物体类别实验不证明成人的人格标签必然改变婴儿人格。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2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Eye care, vision impairment and blindness. Official health topic page.

核验：官方主题页关于眼保健和视力康复的相关内容。

动态网页，检索日期 2026-10-21；不据此推断个别婴儿的视力状况或预后。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N3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Standard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small and sick newborns in health facilities.

核验：官方标准发布信息与相关标准文本。

用于支持小而患病新生儿的照护质量、沟通、尊重与家庭支持原则；不代替临床判断。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S05] 《婴儿符号发生学》项目文件（2026）。《总控 Skill_六智能体协作_v1.0》，第 3 节“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分工”。2026 年 10 月 21 日本项目写作约定。

来源性质：原稿所列内部写作约定；本版根据正文核对方法论用法，未重新取得该项目文件。

内部理论与写作依据，不是独立实证证据。本版不向读者提供尚未取得的项目文件链接；方法论的具体用法见第 2、41、53 及 59 章。

来源：内部项目材料，原始附件未随本版提供；不作为公开可访问链接。

[G0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6, February 17). Developmental Monitoring and Screening. Learn the Signs. Act Early.

核验：官方网页中发展监测、规范筛查与进一步评估的区别。

仅用于解释监测、筛查与评估，不将 SDE 记录表当作临床筛查工具。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G0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WHO recommendations on maternal and newborn care for a positive postnatal experience.

核验：WHO 原始出版页与关于产妇、新生儿支持及积极产后体验的概述。

本书不提供个体化产后医疗处方。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G0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UNICEF (2023). Global report o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核验：WHO 与 UNICEF 发布的报告书目信息和官方内容概述。

官方解读另见 https://www.who.int/news/item/15-09-2023-new-reports-highlights-neglected-health-needs-of-children-with-developmental-disabilities 。只用于需要、参与和服务可及性的论述，不推定具体疾病预后。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G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UNICEF (2022). Global report on assistive technology.

核验：WHO 原始出版页的报告范围、可及性问题与建议概述。

不以总体报告保证某种具体辅助产品对某位婴儿有效。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G13]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2023). Early Years Development Framework. Singapore.

核验：官方框架入口及原文前言关于出生至三岁、中心式照护的适用范围。

只引用框架对象和用途；不声称框架验证 SDE。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G14] UNICEF Innocenti (2025). Guidance on AI and children, version 3.0.

核验：官方第三版介绍及儿童安全、隐私、公平、透明与问责要求。

这是儿童权利与 AI 治理指导，不是 AI 可以替代婴儿人际照护的实证依据。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G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health: Guidance on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核验：WHO 发布原文关于错误输出、偏差与自动化偏见的风险说明。

指导报告原始发布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8 日；部分出版入口网页标注后续更新时间，不能将其混成另一次实证研究。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S06] 王德生（2026）。《婴儿符号发生学》项目理论约定及《30 万字详纲_v1.0》。本项目 2026 年 10 月 21 日讨论与研究设计。

来源性质：原稿所列王德生的项目理论约定与研究详纲；本版未取得所列原始项目文件，不能将其作为独立经验研究证据。

涉及符号作为存在方式、婴儿高阶“我”及保护—稳定—自由互构；这些命题在本书正文中明确展开，原始项目文件仍属来源补核事项。

来源：内部项目材料，原始附件未随本版提供；不作为公开可访问链接。

[S07] 王德生：《婴儿-SDE 活体发生学.docx》，用户文献库版本。

核验：本轮读取目录、“我最后才长出来”相关表述与部分感觉/发展段落；未完成全书逐页核验。

用于理论接口辨析，不以其中的科学性叙述代替原始发展研究。文件 ID：file_00000000aa9c72078fa755200482d138。

来源：内部项目材料，原始附件未随本版提供；不作为公开可访问链接。

[S08] 王德生：《SDE_0-3 岁婴儿教育发生学_V24_感觉之门 (1).docx》，用户文献库版本。

核验：本轮读取“感觉之门”相关段落、三态总纲相关节选及目录；未完成 313 页全书核验。

用于感觉通道、共同教育发生与三态的理论接口。文件 ID：file_0000000010ec7208aee4738e8ad04ab1。

来源：内部项目材料，原始附件未随本版提供；不作为公开可访问链接。

[B01] DeCasper, A. J., & Spence, M. J. (1986). Prenatal maternal speech influences newborns’ perception of speech sound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9(2), 133–150.

核验：出版方检索所返回的书目与摘要片段；直接全文页面访问受限，未取得全文。

正文仅引用前期听觉经验与后期偏好的有限关联；不支持胎教提升智力、语义理解或人格预测。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B02] Bahrick, L. E., & Lickliter, R. (2000). Intersensory redundancy guides attentional selectivity and perceptual learning in infanc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2), 190–201.

核验：原论文摘要及书目信息。

五个月婴儿特定节律辨别任务的研究；不能直接外推为亲情或全部三界的验证。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37//0012-1649.36.2.190

[B03] Adolph, K. E., Cole, W. G., Komati, M., Garciaguirre, J. S., Badaly, D., Lingeman, J. M., Chan, G. L. Y., & Sotsky, R. B. (2012). How do you learn to walk? Thousands of steps and dozens of falls per da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1), 1387–1394.

核验：原论文公开检索摘要、PMC 摘要及作者机构书目信息；本轮未逐页阅读全文。

正文仅采用自然移动练习分布与变异的概括，不把样本平均步数/跌倒次数转成家庭训练指标。机构书目：https://pure.johnshopkins.edu/en/publications/how-do-you-learn-to-walk-thousands-of-steps-and-dozens-of-falls-p/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77/0956797612446346

[B04] DeCasper, A. J., & Fifer, W. P. (1980). Of human bonding: Newborns prefer their mothers’ voices. Science, 208(4448), 1174–1176.

核验：原论文出版方/数据库检索书目与公开摘要信息；本轮直接 PubMed 页面正文未完整返回。

只支持特定任务中的声音偏好，不支持成熟母亲概念或反思性自我。出版方：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7375928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26/science.7375928

[B0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WHO recommendations for care of the preterm or low-birth-weight infant. Geneva: WHO.

核验：2022 年 11 月 15 日官方发布页、书目信息与用途概述；本轮未逐条复核 75 页指南全部建议。

作为早产/低出生体重专业照护边界的依据，不在本书内给出个体化医疗方案。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M01] Partanen, E., et al. (2013). Learning-induced neural plasticity of speech processing before bir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37), 15145–15150.

核验：作者机构记录的原论文摘要及出版元数据。

支持限定的出生前后听觉经验连续性，不证明语言理解或长期智力优势。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73/pnas.1302159110

[M02] Needham, A. W., et al. (2017). Characteristics of Brief Sticky Mittens Training That Lead to Increases in Object Explor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64, 209–224.

核验：原论文方法、结果及讨论相关段落。

区分观看、接触与探索指标；不将局部差异等同全面运动增益。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6/j.jecp.2017.04.009

[M03] van den Berg, L., Libertus, K., Nyström, P., Gottwald, J. M., Licht, V., & Gredebäck, G. (2022). A Pre-registered sticky mittens study: active training does not increase reaching and grasping in a Swedish context. Child Development, 93(6), e656–e671.

核验：原论文摘要、研究设计、预注册说明、结果及讨论相关段落。

与早期研究并非所有条件逐项相同；未支持本样本所测运动效益，不推论所有互动无效。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cdev.13835

[M04] Goldstein, M. H., King, A. P., & West, M. J. (2003). Social interaction shapes babbling: Testing parallels between birdsong and spee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3), 8030–8035.

核验：原论文摘要及出版元数据。

限定于回应安排与咿呀发声的研究，不作为全部语言或亲情的因果定律。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73/pnas.1332441100

[M05] Kidd, C., Piantadosi, S. T., & Aslin, R. N. (2012). The Goldilocks Effect: Human Infants Allocate Attention to Visual Sequences That Are Neither Too Simple Nor Too Complex. PLOS ONE, 7(5), e36399.

核验：原论文任务、方法、结果与讨论相关段落。

事件概率模型与观看脱离的关系；不能直接转换为家庭刺激最佳配额。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371/journal.pone.0036399

[M06] Stahl, A. E., & Feigenson, L. (2015). Observing the unexpected enhances infants'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Science, 348(6230), 91–94.

核验：原论文摘要及出版元数据。

限于具体预期违背任务；本书关于分岔路径的分析属于理论延伸。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26/science.aaa3799

[M07] Oostenbroek, J., et al. (2016). Comprehensive Longitudinal Study Challenges the Existence of Neonatal Imitation in Humans. Current Biology, 26(10), 1334–1338.

核验：原论文摘要与作者机构记录。

与 M08 合读，保留模仿争论；不把某一行为测验当成人格地位的门槛。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6/j.cub.2016.03.047

[M08] Meltzoff, A. N., et al. (2018). Re-examination of Oostenbroek et al. (2016): evidence for neonatal imitation of tongue protrusion. Developmental Science, 21(4), e12609.

核验：原论文摘要、作者及出版元数据。

在线发表于 2017 年；期刊卷期为 2018 年。对同一资料再分析，不是独立新样本重复。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desc.12609

[M09] Smith, L., & Yu, C. (2008). Infants rapidly learn word-referent mappings via cross-situational statistics. Cognition, 106(3), 1558–1568.

核验：原论文方法、结果与关于机制不能唯一辨认的讨论。

2007 年在线、2008 年卷期。词物对应不等于完整语言或全部语义。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16/j.cognition.2007.06.010

[M10] Beebe, B., et al. (2010). The origins of 12-month attachment: A microanalysis of 4-month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12(1–2), 3–141.

核验：原论文关于自我/互动时序联系、结果及解释边界的相关段落与出版元数据。

时序预测关联不是每项通道机制的随机因果估计；不据此制定个体家庭的同步分数。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080/14616730903338985

[M11] The ManyBabies Consortium. (2020). Quantifying Sources of Variability in Infancy Research Using the Infant-Directed-Speech Preference. Advances in Methods and Practi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 24–52.

核验：原论文摘要、作者机构记录与项目说明。

区分偏好效应与测量方法、年龄及语言背景的调节，不把方法关联一律解释为随机因果效应。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77/2515245919900809

[M12] Bahrick, L. E., Lickliter, R., & Flom, R. (2006). Up Versus Down: The Role of Intersensory Redunda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s' Sensitivity to the Orientation of Moving Objects. Infancy, 9(1), 73–96.

核验：原论文摘要及出版元数据。

卷期年为 2006 年；平台后期上线时间不作出版年。方向辨别与 B02 节律辨别属于不同任务。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207/s15327078in0901_4

[M13] Lucca, K., Yuen, F., Wang, Y., et al. (2025). Infants' Social Evaluation of Helpers and Hinderers: A Large-Scale, Multi-Lab, Coordinated Replication Study. Developmental Science, 28(1), e13581.

核验：原论文摘要、出版元数据及关联勘误。

2024 年在线、2025 年卷期。测试 1018 名、纳入 567 名；不得将该范式零结果等同婴儿没有道德。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desc.13581

[M14] Correction to "Infants' Social Evaluation of Helpers and Hinderers: A Large-Scale, Multi-Lab, Coordinated Replication Study." (2025). Developmental Science, 28(4), e70029.

核验：出版方勘误全文。

修正探索分析中习惯化状态效应的表述；勘误说明主要研究结论不变。

来源：打开原始来源 | DOI：10.1111/desc.70029

编辑附录

附录：新增量、插入位置与编辑审计

以下表格保留 v0.5 的扩写历史，不代表 v1.1 新增字数。本版统一作者为秦莉，修订引文接口与编辑疏漏，配套六十章学习任务及智能问对；理论来源仍按原作者著录。

全部 62 个正文单元保留：导论、60 章、结语。25 章获得实质扩写，其余章节原正文保留。新增模块在对应原章最后收束节之前插入，不作为 61 章以后另行增加的章节。

原文逐段顺序保留；标题编号属于编辑调整，不计正文增量。全稿引用编号均有文献条目；本轮新增段落未发现与旧稿完全相同的长段落或内部完全重复长段落。此项不等于宣称不存在任何概念层面的重复。

第 53 章最小动力模型已核对势函数梯度、零驱动平衡点、局部稳定性、折叠阈值及历史差异衰减式。数学核对只确认所设模型内的推导，不提供婴儿经验验证。

原稿记录其起草未启动六个独立模型并行，也未实施书中提出的婴儿实验。本版三轮审校由同一 AI 辅助编辑流程完成，不能替代独立同行评审；原始文献未获全文核验的范围仍逐项保留。

章号	原正文	净新增	合并后正文
2	2,422	2,324	4,746
3	2,667	2,169	4,836
4	2,581	2,284	4,865
5	2,543	2,128	4,671
6	2,345	2,019	4,364
10	2,400	2,184	4,584
11	2,158	2,038	4,196
13	2,109	2,074	4,183
14	2,073	2,105	4,178
16	2,167	2,108	4,275
18	2,297	2,122	4,419
21	2,051	2,004	4,055
22	1,980	2,079	4,059

章号	原正文	净新增	合并后正文
23	2,105	1,957	4,062
24	2,116	2,050	4,166
25	2,966	1,812	4,778
26	3,503	1,660	5,163
30	3,944	1,799	5,743
47	3,533	1,982	5,515
50	3,117	1,855	4,972
52	4,683	2,000	6,683
53	4,476	1,969	6,445
54	4,252	1,858	6,110
55	4,381	1,959	6,340
59	4,143	2,069	6,212

本版配套材料以各章正文为共同底本，学习任务另行标明为教学设计；智能问对引用所选章节，模型建议与读者本人修订分别记录。

SDE / 符号发生学研究

婴儿符号发生学

从独特的“我”
到三界高阶符号的发生

不是复制一个标准的孩子，
而是理解一个独特的“我”
如何继续发生。

秦莉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v1.1 / 三位一体在线阅读版